

夏伯阳与虚空

维克多·佩列文 著
郑体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伯阳与虚空 / (俄罗斯) 佩列文 (В. Пелевин) 著;
郑体武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7

书名原文: 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

ISBN 7-5327-3236-3

I. 夏... II. ①佩... ②郑...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6141 号

В. Пелевин

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ВАГРИУС》
Москва, 2000 年版译出
简体字中文本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
总公司帮助获得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夏伯阳与虚空

[俄] 维·佩列文 著

郑体武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2 字数 230,0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3236-3/1·1885

定价: 24.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望着这浩浩荡荡的人马，
望着这残阳如血的草原上
 我的意志掀起的这股
 涌向虚空的无边洪流，
 我常自问：
我在这洪流中的何处？

——成吉思汗



本书 20 年代上半期完稿于内蒙古的一座寺院。由于诸多原因,本书是以编者的名义出版的,作者的真实姓名已经无从查考。编者删掉了原稿中对一系列神秘疗法的描写,以及叙述者有关自己在革命前的彼得堡的生活(即所谓的“彼得堡时期”)的大量回忆,没有考虑作者本人对体裁的界定——“思绪遗飞”。总的来看,把这本书视作一个玩笑更为恰当。

作为一部在艺术上具有许多可取之处的心理日记,作者讲述的故事无疑是引人入胜的,它并没有给自己提出更多的要求,尽管作者有时也试图讨论一些在我们看来毫无必要加以讨论的事情。对于某些叙述上的杂乱之处,可以做出的解释是,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并非在于创作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为了把机械性地周而复始的意识记录下来,以便彻底摆脱那所谓的内心生活的困扰。此外,在两三个地方,与其说作者是企图强迫读者看到渐次展开的用词语编织成的幻象,毋宁说是作者希望直接指向读者的思维;遗憾的是,这项任务过于简单,以致此类企图无法冠以成功的名号。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也许会将我们的叙述仅仅看成近年来时髦的批判唯我主义的又一件产品,但这份文献真正的价值却在于,它是世界文化领域以艺术手段来再现有关万劫不复思想的古代蒙古神话的初次尝试。



现在我们稍微谈一谈书中的主人公。本书的编者有一次给我朗读了诗人普希金的一首短歌：

忧郁的一年，见证了多少
勇敢、善良和美好的牺牲，
只依稀留下一份
对自身的回忆，在一首
朴实、凄凉、悦耳的牧歌中。

“勇敢的牺牲”翻译成蒙古语听起来有些古怪。但这里不适合深入探讨这一话题，我们只想说，这首诗的最后三行完全可以移植到瓦西里·夏伯阳的故事之中。

关于此人，人们现今都了解些什么呢？据我们所知，在民间记忆中，他的形象被赋予了纯粹的神话特征，在俄罗斯的民间传说中，夏伯阳是一位有点类似著名的阿凡提一样的人物。他是无数笑话的主人公，而这些笑话的依据就是三十年代的一部著名电影。在这部影片里，夏伯阳是以一个红军骑兵指挥员的身份出现的，他与白军英勇作战，时常跟自己的副官彼得卡和女机枪手安卡倾心长谈，最后，在遭到白军追击，试图渡过乌拉尔河时，溺水身亡。但是，这些事与现实生活中的夏伯阳毫无关系，即便有关系，事实的真相也是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杜撰扭曲得面目全非了。

所有这些混乱都与一本名为《夏伯阳》的书有关。该书最早于1923年由巴黎的一家出版社以法语出版，随即又在俄罗斯莫名其妙地仓促再版。我们不打算浪费时间来证明这本书与事实的出入。任何一个有心者都会毫不费力地发现，里面



有大量相互冲突和前后矛盾之处，而且该书的精神本身已极好地证明，作者（或是作者们）与他所竭力描写的那些事件毫不相干。借此机会，我们还想指出，尽管富尔曼诺夫先生与历史上的夏伯阳至少有过两次会面，但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该书的创作者，其中的原因将会在我们的叙述中得到揭示。虽然难以置信，但是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差不多是把归在他名下的这本书视为纪实性作品。

在这部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伪作背后，不难发现那些得到慷慨资助且异常活跃的势力的活动，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长久地对欧亚各族人民隐瞒有关夏伯阳的真相。但这份手稿的发现本身，在我们看来，已经足够清楚地表明了欧亚大陆上新的力量平衡。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我们对原始文本的名称作了改动（原名为《瓦西里·夏伯阳》），以免与广为流传的伪作混淆。我们选择了《夏伯阳与虚空》这一最简单、最不具暗示性的书名，尽管编者也曾推荐过另外两种方案——《各奔东西的彼得卡们的花园》和《黑面包圈》。

愿此文本能为所有的生灵带来福祉。

唵嘛呢叭咪吽^①。

全面彻底解放佛教阵线主席^②

乌尔罕·江博恩·图尔库七世

① 佛教中的六字大明咒。佛教认为念六字大明咒可以净心、消灾、去病。

② 这是作者伪托的一个佛教组织和佛教人士。此序言也是作者假他人之名所作。



译者序

维克多·佩列文 1962 年生于莫斯科,1985 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力设备与工业和交通自动化系,1987 年考取莫斯科动力学院研究生,1989 年考入高尔基文学院函授部,但未毕业,经朋友介绍进入“神话”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在编辑工作之余,翻译了不少美国人类学家卡洛斯·卡斯塔奈达的著作,同时通过俄文译本接触了老子和庄子。这段经历使他受益非浅,对他日后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89 年发表处女作《伊格纳特魔法师和人们》后,开始以科幻小说家的身份崭露头角,但其知名度仅限于科幻小说爱好者的圈子,尽管有不少人认为他的短篇小说严格地讲并不属于科学幻想一类。1992 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蓝灯》,虽然该书很快被抢购一空,但并未引起严肃批评界的注意。真正使佩列文在严肃文学界名声大噪的是 1992 年发表在以乐于刊载先锋性和实验性作品著称的大型文学刊物《旗》上的中篇小说《奥蒙·拉》。这是佩列文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的《蓝灯》(他认为应该是《奥蒙·拉》)能在第二年获得小布克奖,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与《奥蒙·拉》给他带来的名气有关。这部



中篇小说的情节有些耸人听闻：苏联的宇航计划完全是一场服务于意识形态宣传的骗局，其真正使命是举行一场血腥的祭祀仪式，以供养社会主义国家的魔法体制。《奥蒙·拉》发表后，佩列文的创作势头更趋旺盛，先是相继在1993年发表了两部中篇小说《昆虫的生活》和《黄箭》，继而又分别于1996年和1999年推出两部轰动文坛的长篇小说《夏伯阳与虚空》和《百事一代》（已有中文译本）。

《夏伯阳与虚空》是佩列文的代表作，刚一发表，就立刻被许多评论家推为年度最佳小说。佩列文也因而一跃成为当今俄罗斯最走红的作家之一，其作品不光在俄罗斯国内拥有大量读者，还竞相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更有人将他与海明威、卡夫卡等经典作家相提并论，并将佩列文的成功称为“佩列文现象”^①。

下面试从时空结构、人物形象、梦境与现实、与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夏伯阳》和电影《夏伯阳》之间的关系、风格等方面，对这部小说做一初步的探讨，以期对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够有所帮助。

《夏伯阳与虚空》开篇所引（其实是假托）成吉思汗一段话，非常引人注目，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望着这浩浩荡荡的人马，
望着这残阳如血的草原上
 我的意志掀起的这股
 涌向虚空的无边洪流，



我常自问：
我在这洪流中的何处？

故事发生在何时、何地？读罢这部小说，读者难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确实，不断转换的时空，扑朔迷离的情节，为解读这部作品增加了难度。尽管作者在该书的封面上加了一个醒目的自注，宣称“这是世界文学中第一部情节发生在绝对虚空之中的长篇小说”，还是有论者不以为然，认为小说的情节并非发生在“虚空”之中，而是发生在“虚空”周围^②。

小说的情节是在两个时空层面上展开的：十月革命后不久夏伯阳的部队和苏联解体后不久莫斯科的一家疯人院。联接这两个时空层次的是在其中往来穿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主人公彼得·虚空。关于这一点，评论界没有什么分歧，只是在两个时间层次的具体年月以及何为真实何为梦境的问题上，看法不尽一致。有人认为是疯子虚空幻想自己是在1919年，也就是说，90年代是现实，1919年是幻觉^③；有人认为是虚空“在有预见性的梦中以某种先验的方式从战火纷飞的1919年转移到相隔数十年后的90年代中期”，也就是说，1919年是真实，90年代中期是梦境^④。亚·博尔舍夫和奥·瓦西里耶娃认为“小说的情节发生在两个时间层次：1918—1919年和1990—1992年”。^⑤恐怕也不是十分确切，因为故事的开始显然是在1919年2月的一天，再者，根据书中对炮打白宫事件的提示，后一个时间层次应该不晚于1993年。因此，我认为，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应为1919年和20世纪90年代初。然而，还有一点令人困惑不解，作者在书末标明的写作时间



和地点是：“1923—1925年，卡夫卡—尤尔特”。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如果确实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这部长篇小说是一部回忆录，那么回忆的时间和被回忆的时间该如何确定呢？是身在1923—1925年回忆1919年，再由1919年“回忆”（梦见）90年代呢，还是在1923—1925年“回忆”90年代，再由90年代回忆（梦见）1919年呢？如果这是现实与梦境的交替，那么何为现实何为梦境呢？显然，深谙佛教与禅宗的佩列文在此有意混淆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时间状态，以体现《金刚经》所云“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有意思的是，主人公彼得自己倒是倾向于将1919年当作真实，而把90年代初当成梦呓。

佩列文在《夏伯阳与虚空》中彻底抹杀了梦与醒之间的界限。^⑥在幻境中往来穿梭的主人公们自己也不知道何为梦何为醒。根据自己的生活逻辑彼得·虚空发现自己同时置身于两个现实中——在他自认为是真正的现实中，他是彼得堡的现代派诗人，阴差阳错地在1919年成为夏伯阳师的政委。其实，夏伯阳，安卡，还有彼得他自己，只是在外表上像自己传奇式的原型。在彼得认为是梦的另一现实中，他是精神病院的患者，医生试图用集体疗法使他摆脱“伪人格”。主人公并不知道何种现实是真的，何种是假的，但他自己为自己选择的是他当夏伯阳的政委的那个世界。这一点从他对冷美人儿安卡的一段表白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果对我而言世界上还有什么真实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您。”

在这里，医生给主人公彼得·虚空的诊断耐人寻味：“伪人



格的分裂”。也就是说，真实的人格在这里似乎是缺席的，消失在了形形色色的“自我”之中。在这些“自我”之中，没有一个可以称作真正的人格的。小说的主人公们不断地探讨着这个问题：“除了做警察，你还有好多的面包师、公子哥儿和狗杂种等着轮流做呢，可还没等你把这些人全都做完，你这辈子也就过去了。你内心里排起的这条长队，就连共产党掌权时买香肠排的队都比不了。”自我的迷失和缺失，无疑使真实与幻觉的界限变得更加无从把握。

佩列文的主人公生活在意识的内在现实与周围世界的外在现实相交织的世界里。好莱坞影星施瓦辛格、墨西哥肥皂剧中的“就叫马利亚”、古巴英雄切·格瓦拉成为佩列文作品中的人物，与主人公们并肩而行。让人产生一种感觉，人所生活和被迫适应的基本环境就是人的意识构筑起来的虚拟环境。无论是读者还是主人公都始终无法区分梦与醒，幻象与真实，而且归根结底，这也无关紧要。

《夏伯阳与虚空》的开头对当时（1919年2月的一天）环境与气氛的描写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的真实。而当读者对作者的讲述信以为真时，故事又戛然而止，笔锋一转进入了70多年以后的精神病院，对环境和气氛的描写也开始变得近乎荒诞和具有超现实主义特征。接着同样出人意料的是，故事随即又回到1919年。类似的叙述原则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能找到，在布尔加科夫的小说中，情节同样是在两个时间层次上展开的。但与《大师与玛格丽特》不同的是，佩列文笔下的故事情节的主体在由一种现实向另一种现实转换时保持不变。这是同一人物的两个维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



“一体两面”。主人公同时生活在两个现实中。通过两种现实的对比,他逐渐领悟了存在的意义和周围世界的“结构”。

彼得·虚空断断续续的病史是小说文本的组成部分。从这些零散的病史读者可以知道:主人公早在少年时代,自从他突然关注起自己姓氏的形而上学本原那天起,即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他开始痴迷休谟、巴克莱和海德格尔,探索虚空和虚无的哲学内涵。他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人都无法与他“沟通”,于是他也就顺理成章地进了精神病院。彼得的病在小说的结尾有关黏土机枪的部分达到了高潮。凭借这挺主人公臆想出来的机枪,夏伯阳和安娜可以消灭宇宙,只留下这样一个结论:“形即空,空即形。”

精神病院的医生对主人公的精神病采取的治疗方法并不新鲜。但在佩列文笔下,这种治疗方法除了承担诗学任务外,还要解决纯粹的哲学问题,因为它使得作者对整个存在持有的后现代主义观念更趋鲜明。难怪佩列文的小说一再强调90年代与1919年之间的界限的模糊不定。

与此同时,出现在虚空病态想象中的两个相互联系的世界尽管来源相同,但都要求获得独立存在的资格。因此,不能说90年代初的精神病患者与1919年标准的颓废派诗人绝对是一回事。根据疯子的意愿创造出来的来自1919年的诸人物与其“创造者”是有距离的,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并在探求自己的真理,哪怕这真理是极为虚幻的,因为真理似乎能够赋予他们毫无意义的生存以崇高的意义。在主人公彼得及其病友的眼里,医院窗外的世界是支离破碎的,每一个碎片都折射出特有的历史标记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例如,苏维埃政权初期看上去如一幅马赛克镶嵌画,上面既有高尔基、勃留索夫、阿·托尔斯泰、索洛古勃、梅列日科夫斯基、勃洛克、纳博科夫、布宁,又有列宁、捷尔任斯基、科托夫斯基、夏伯阳、安卡、富尔曼诺夫等。1919年在小说中是用颓废派文学咖啡馆中上演的一出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实验戏剧以及契卡的革命活动来表征的。另外,作者还对每个出场的人物形象进行了颠覆性的戏讽。如革命水兵唱的歌是“波罗的海茶”(拌有可卡因的酒),身上披挂的机枪子弹带如女人的胸罩,伊里奇看上去虚弱不堪,而科托夫斯基是个风度翩翩的瘾君子,捷尔任斯基像是从事秘密活动者,夏伯阳像是痴迷神秘主义和通灵术的人,安卡则一副拿捏作态的颓废派做派。小说中的夏伯阳自称陶醉于脚下的星空和我们体内的康德,并用洋葱头来讲解一些形而上学问题。布宁笔下的干草房在佩列文的小说文本中被说成“染了淋病”,纳博科夫成了“捷尼舍夫学校的沃夫卡”,而勃洛克长诗《十二个》的结尾被改写成基督拖着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与赤卫队员背道而驰。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初期在小说中是以另外的方式展示的:前一个层面的人物荡然无存,政治人物中只提到一个“醉醺醺的”总统,而且没点名,而文化的代用品是用无所不在的歌星菲利普·基尔科罗夫来象征的。隐隐约约地给出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线索,通过这些线索我们可以推断:故事发生在90年代——瓦解苏联的别洛维日协议和炮打白宫。无法接受新现实的原苏联人患上了基于伪人格分裂的精神分裂症。发了疯的“新民主国家的公民”成了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诊所



的病人。这显然是时代特征，不言而喻。

精神病院的医生铁木尔·铁木罗维奇通过观察，发现四位患者不是简单的精神病人，而是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彼得·虚空是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们的化身，既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又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弗拉基米尔·沃洛金是企业家，“俄罗斯新贵”中的一员，做与石油有关的生意，上头有“保护伞”；谢苗·谢尔久克是位好酒贪杯的知识分子，与维·叶罗菲耶夫《莫斯科——佩图什基》中的酒鬼维涅奇卡庶几近之；最后是十八岁的青年马利亚（据说是父母为纪念雷马克而给他取了这么一个名字），代表在大众传媒浸染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就连做梦都梦见自己——“就叫马利亚”——撞到了奥斯坦基诺电视塔上。

引人注目和耐人寻味的是，在俄文中，彼得·虚空、弗拉基米尔·沃洛金、谢苗·谢尔久克三个人物的名和姓的第一个字母分别是 ПП, ВВ, СС，也就是由同一字母重复而得。显然这并非巧合。伊姆希巴耶娃撰文指出：“名和姓开头一个字母的重复具有象征意义：主人公们不是简单的‘诗人’、‘企业家’和‘从前的知识分子中的酒鬼’，而是‘艺术家’、‘俄式商人’和‘醉不休的彻头彻尾的‘俄国佬’。与这些人相伴相随的一切，他们所有的本质特征——都不是租借来的，而是‘属于自己的’，受到历史时代、环境、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⑦

“就叫马利亚”不然，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个性的东西。他生活在荧光屏的世界里。他的头脑中装满了墨西哥肥皂剧、好莱坞动作大片和施瓦辛格。尽管年轻人把自己看成电视连续剧中的女主人公并体验了一场与美国终结者阿诺德



(“阿尼”)的恋爱,但就自己的趣味和需求而言,他还是再正常不过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是第一个出院的。

病人们在审美治疗课上临摹亚里士多德胸像、制作日本的纸鹤、创作场面宏大的油画《柳树站之战》、在自己脱位的世界里思考着俄罗斯忽而与西方忽而与东方炼金术式的联姻的实质。他们可以说是俄罗斯当代人生存与意识深层秘密的理想表达者。他们并不清楚他们是梦着还是醒着。他们入院前饮酒无度,沉湎于麻醉品制造的幻觉,在大众文化的熏染中丧失了理智。这种醉生梦死正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的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佩列文深信,尽管存在 70 年的间隔,但两个时间层次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光顾 1919 年的文学咖啡馆“音乐鼻烟盒”的客人们与 90 年代初聚集在“约翰牛”酒馆的客人们在彼得·虚空眼里是没有丝毫区别的,“所有的面孔仿佛都汇聚成了一张脸,一张媚态百出而又厚颜无耻的脸,一张俗不可耐而又自鸣得意的脸——毫无疑问,这是已经投胎转世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脸。”这句话两次出现在“过去人”和“现在人”的脑海中。布景变了,可生活主人的嘴脸依旧。那些被观念主义诗人基比罗夫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老太婆”的人,在佩列文看来,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

在佩列文的作品中,梦境不是简单地起烘托和渲染作用的。作者的诗学建立在梦的基础上。对佩列文的创作方法,有人归为观念主义,有人归为“纯”后现代主义,尽管后一种定义有相当的相对性。其实,观念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不矛盾,这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表现。根据后



现代主义理论,自在自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它已被从前的共同人类文化或现代大众传媒手段、电影、电视、通俗和流行音乐、广告、商业性读物等构筑起来的世界所取代。他们认为存在的只是现实的模块。因此,对后现代主义来说,写作的素材是文化的语言,而非可以触摸和感知的世界。

佩列文对意识的诸种变化状态,如恍惚、错觉、幻觉和幻想以及引发这些状态的因素,对麻醉品、致幻剂、电脑游戏和信息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企图用艺术手段创造虚拟的现实。虚拟的现实是在意识的状态发生变化时出现的。梦是在一系列可能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米·爱泼斯坦称佩列文的小说为虚拟的、滑动的、闪烁的、建构在意义的相互转换之上的小说。^⑧

后现代主义者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一种迷失状态,他们所标榜的立场是去中心。谢·科尔涅夫说:“后现代主义意味着人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不自信’,他看不见他可以依靠的东西……即便他笑,那也始终是在笑他自己。”^⑨因此,现实的概念在佩列文笔下是破碎的。首先,这是日常生活的现实,具有装饰性;其次,是彼岸的现实,从本质上讲同样是虚幻的;再次,是虚无的现实,也就是他所谓的“内蒙古”。

小说是由梦与梦的转换结构起来的。但沃洛金和就叫马利亚的梦呓与植根于东方观念的虚空和谢尔久克的梦呓有些不同。它建立在观念性的游戏上,带有当代大众文化标记。后现代主义的戏仿后面隐藏着对神圣的亵渎,如对“客人”、“未婚夫”和“赞助人”的荒唐寻觅,就表现了对象征主义“永恒女性”说的亵渎。



“人生如梦！”——这是主人公时常发出的感叹；“今宵酒醒何处？”——这是主人公不断遭遇的困惑。夏伯阳的开导使彼得逐渐领悟到，其实真实与幻想的界限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切都是空，都是空的产物。他要学会的首要事情是“出院”，换句话说，是要认识到所有的现实都是同样虚幻的。包括他自己，正如他的名字所喻示的。

亚历山大·格尼斯称《夏伯阳与虚空》是俄罗斯第一部佛教—禅宗小说^⑩。对此，里杰尔曼和利波维茨基认为既对又不对^⑪。因为作者不光是写了一部“佛教入门”，他对佛教的揶揄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把夏伯阳变成佛祖的化身之一，这无形中为夏伯阳的一些连珠妙语增添了几分滑稽色彩。再如，关于彼得卡和夏伯阳的两则笑话，都可以有多种解释：

“简单地说，彼得卡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坐在一块喝酒。突然跑进来一个士兵报告：‘白军来了！’彼得卡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们赶紧跑吧。’夏伯阳不慌不忙，把两个杯子倒满，说：‘喝，彼得卡。’他们一饮而尽。又一个士兵跑进来：‘白军来了！’夏伯阳又把两个杯子倒满：‘喝，彼得卡！’第三个士兵跑进来，说白军已经包抄过来了。夏伯阳问：‘彼得卡，你能看见我吗？’彼得卡回答说：‘看不见。’于是夏伯阳说：‘我也看不见你。隐蔽得好。’”

“简单地说，他眼看就要沉下去了，可还是叼着箱子不放。彼得卡对他喊：‘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扔掉箱子，你想淹死呀！’可夏伯阳说：‘说什么呢，彼得卡！不能扔。里面有作战地图。’还好，他总算上了岸。彼得卡说：‘怎么样，瓦西里·伊



万诺维奇,把你那张差点儿要了我们命的地图拿出来看看吧。’夏伯阳打开箱子。彼得卡一看,里面竟是土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这是什么地图啊?’夏伯阳拿出两个土豆放在地上,说:‘你看,彼得卡,这是我们,这是白军。’”

小说的前言中谈到 1923 年首版于巴黎的富尔曼诺夫的长篇小说《夏伯阳》(新译《恰巴耶夫》)和 30 年代瓦西里耶夫兄弟的电影《夏伯阳》。毫无疑问,《夏伯阳与虚空》与前两者存在互文关系。因此,要真正理解《夏伯阳与虚空》必须对富尔曼诺夫的长篇小说《夏伯阳》和同名电影有所了解。

《夏伯阳》是苏联早期作家富尔曼诺夫的代表作,发表于 1923 年,并于 1932 年由鲁迅亲自翻译成了中文,在我国拥有很大的知名度。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为了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外国武装干涉势力与俄罗斯国内叛军互相勾结,以盘踞在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 30 万大军为主力,越过乌拉尔,企图与北高加索的邓尼金和波罗的海的尤登尼奇发动的新攻势形成合围,一举攻占莫斯科。1919 年 1 月,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纺织工人组成的支队,根据领导东方战线的伏龙芝的指示,出发去同高尔察克的军队作战。各厂的工人都到车站送行。克雷奇科夫代表工人支队在欢送仪式上讲话。他是个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成为党的一名优秀干部,深得工人们喜欢。工人支队来到乌拉尔斯克,见到了伏龙芝,几天后,克雷奇科夫被伏龙芝派去担任夏伯阳的政委。夏伯阳的师是一支农民武装,在夏伯阳的领导下,英勇善战,屡建战功,但觉悟不高,自由散漫,游击习气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克雷奇科



夫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改造这支队伍。他决定先在师长夏伯阳身上寻找突破口。夏伯阳农民出身,足智多谋,骁勇善战,身先士卒,临危不惧,在草原上威名远扬,令敌人闻风丧胆,深得战士们爱戴,但作风粗暴,政治上不够成熟,对党的政策了解不多,有时刚愎自用。克雷奇科夫循循善诱。遇到夏伯阳犯错误,他不是简单粗暴地予以批评,而是正面讲道理,帮他总结经验教训,以理服人;遇到夏伯阳闹情绪,他总是耐心细致地加以开导。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一经政委点拨,夏伯阳便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了。渐渐地,夏伯阳对克雷奇科夫由起初的反感和排斥,转为最后的信任和敬佩,将之引为无话不谈的知己。在政委的帮助下,夏伯阳逐渐克服了自身的缺点,夏伯阳的师也成为一支训练有素、有革命觉悟的队伍。在与高尔察克和哥萨克白匪的战斗中,多次获得胜利。后来,克雷奇科夫奉命调往别处工作。有一次,夏伯阳的师遭到敌人突袭,夏伯阳本人在泅水撤退时中弹牺牲。

作者(假托乌尔汗·江博恩·图尔库七世)在前言中明确表示出版此书的目的在于颠覆同名小说和电影在公众中制造的传奇英雄夏伯阳神话。因此,《夏伯阳与虚空》中1919年时间层次实际就是对《夏伯阳》小说和电影的改写和戏仿。《夏伯阳与虚空》仿制了《夏伯阳》中的重要场景、基本情节和主要人物体系,诸如火车站广场上的送行场面,斯洛米欣斯卡亚的战斗(柳树站的战斗),紧张战斗的间歇战士们围坐在篝火旁哼唱歌曲(荣格伦带彼得漫游燃烧着点点篝火的地府“瓦尔加拉宫”),彼得卡向女机枪手安卡调情,夏伯阳遇袭泅水撤退时中弹溺死在河里(夏伯阳跳进乌拉尔河——“绝对之爱的相对之



河”)等等,在《夏伯阳与虚空》中都能找到对应或线索,只是进行了颠倒、拼贴或变形。如第三章中有关纺织工人出发上战场和夏伯阳与政委彼得·虚空当众讲演的场面的描写,就是移植了富尔曼诺夫笔下的情景,只不过是做了张冠李戴式拼贴。在富尔曼诺夫笔下,当时夏伯阳尚未出场,更谈不上当众演说,真正当众讲话的是政委克雷奇科夫、女兵叶莲娜·库尼奇娜和一位老纺织工人。而在佩列文笔下,夏伯阳的讲话其实是叶莲娜的讲话^①与老纺织工人的送别讲话^②拼贴而成的,明显地有些风格相悖和驴唇不对马嘴。

“小伙子们!”他提高嗓门喊道。“你们聚在这里干啥,这你们自己知道。没有什么好磨蹭的。你们会碰到各种情况,会经受各种考验。不这样行吗?啊?到了前线——要给那帮狗娘养的点厉害瞧瞧。想啥呢——上前线可不是躺在摇篮里玩啊……”

他冲安静下来的广场点了点头。夏伯阳的话在广场上空回荡:

“只要不给自己的事情抹黑就行——我说的是咱们的大事啊!……前方没有后方不行,后方没有前方也不行……要是你们这里也搞得一塌糊涂,那还打什么仗呢?……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上前线去——这就是我要向你们说的,别忘了,我这个指挥员会给你们撑腰的……现在由政委讲话。”

纺织工人支队政委富尔曼诺夫的讲话与克雷奇科夫的讲话有着同样的开场白,却有着不同的内容:



“同志们！我们在一起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最后一遍铃声一响，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将渡过河去，登上大理石砌成的坚固的堤岸，登上悬崖，筑起自己的堡垒……”

不过，将《夏伯阳与虚空》与小说《夏伯阳》和电影《夏伯阳》细加对比，不难看出，佩列文作品（文本）的对话指向主要是电影《夏伯阳》，这从小说的人物设置可见一斑。电影《夏伯阳》根据电影艺术的特点和需要，对小说《夏伯阳》的人物体系做了大幅度的改编，使之更为集中，除夏伯阳之外，主要人物只有政委富尔曼诺夫、副官彼得卡和女机枪手安卡。佩列文保留了相对集中的人物结构系统，只是副官彼得卡换成了科托夫斯基，而彼得卡成了政委，原来的政委富尔曼诺夫则退居次要人物之列，成了一个伺机夺权的阴谋家。

在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和瓦西里耶夫兄弟的电影里，政委时常找师长谈心。佩列文的小说复制了这样的场景，只是双方的地位做了个颠倒，再不是政委改造师长，知识分子改造农民，而是师长改造政委，农民改造知识分子。彼得与夏伯阳的关系，从安娜对彼得说的一段话可以得到印证：“夏伯阳……是我所知道的最高深的神秘主义者之一。我认为，他把您当成了一个理想的听众，也许还是一个理想的信徒。”请看夏伯阳在浴室里对彼得卡的一番循循善诱的开导：

“请您告诉我，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但一定要说实话。您是红还是白？”



“我？”夏伯阳扭头看着我，问道。“要说吗？”

他从桌上拿起两个洋葱头，开始默不做声地剥皮。他把一个葱头红皮全剥光，只剩下白色的葱肉，而另一个葱头则只去除了表面上的一层干皮，里面紫红色的厚皮还保留着。

“看着，彼得卡，”他把葱头摆到眼前的桌面上，说道。“你面前有两个葱头。一个白，一个红。”

“嗯，”我说。

“看看白的。”

“看了。”

“现在再看看红的。”

“又怎样？”

“现在两个都看看。”

“看着呢，”我说道。

“那么你本人是什么样的——红的还是白的？”

“我？什么意思？”

“当你看着红葱头时，你会变成红的吗？”

“不会。”

“而当你看着白葱头时，你就会变成白的吗？”

“不，”我说道，“不会的。”

“那我们继续，”夏伯阳说道。“有各种各样的地形图。而这个桌子就像是一张简易的意识地图。这是红军。而这是白军。然而，难道由于我们意识到了红的和白的，我们就能获得相应的颜色吗？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获得这些颜色呢？”

“您可真能绕圈子，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还不如直说，既



非红,也非白。那我们究竟是谁呢?”

“你,彼得卡,在谈论复杂问题之前,先要弄清简单的问题。要知道,‘我们’——这比‘我’更复杂,对吧?”

“对,”我说道。

“你把什么称作‘我’?”

“显然是自己啦。”

“能否告诉我,你是谁?”

“彼得·虚空。”

“这是你的名字。而使用这个名字的人是谁呢?”

“嗯,”我说道,“可以说,我是一个心理个性。是诸多习惯、经验……还有知识、趣味的总和。”

“这是谁的习惯,彼得卡?”夏伯阳热切地问道。

“我的,”我耸了耸肩。

“可你刚刚才说过,彼得卡,你就是诸多习惯的总和。既然这些习惯是你的,那么就是说,这是诸多习惯总和的习惯?”

“听起来很可笑,”我说道,“不过,实际上正是如此。”

“而习惯又会有什么习惯呢?”

我感到我要发火了。

“我们这番谈话相当粗浅。要知道,我们刚开始讲的是,就自己的本质而言,我是谁。假如可以的话,我认为自己是……嗯,比方说,是单子。这是莱布尼茨的术语。”

“而那个认为自己是单子的人又是谁呢?”

“还是单子,”我下定决心控制住自己,回答道。

“好吧,”夏伯阳狡猾地微微眯缝起眼睛说道,“关于‘谁’的问题我们过会儿再谈。而现在,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探究



一下‘哪里’这个问题。请你告诉我，这个单子在哪里？”

“在我的意识里。”

“而你的意识在哪里？”

“就在这里，”我拍拍自己的脑袋，说道。

“而你的脑袋在哪里？”

“在肩膀上。”

“而肩膀在哪里？”

“在房间里。”

“而房间在哪里？”

“在房子里。”

“而房子呢？”

“在俄罗斯。”

“而俄罗斯又在哪里？”

“在灾难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别来这一套，”他严厉地喝斥道。“开玩笑要得到长官的命令才行。说。”

“还会在哪里？在地球上。”

我们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

“而地球在哪里？”

“在宇宙里。”

“而宇宙在哪里？”

我想了一下。

“在自身里。”

“而这个‘在自身里’又在哪里？”

“在我的意识里。”



“这么说，彼得卡，结论是，你的意识在你的意识里？”

“结论是这样。”

“好吧，”夏伯阳捋了捋小胡子，说道。“而现在，你仔细地听着。你的意识在什么地方？”

“我不明白，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地方这一概念也是一个意识范畴，因此……”

“这个地方在哪里？地方这一概念在什么地方？”

富尔曼诺夫笔下的“大老粗”到了佩列文笔下，变得异常机敏和睿智，时常以追问和诡辩的方式，逼得彼得无言以对，直至“豁然开朗”。

佩列文的书在俄罗斯很畅销，甚至有人说他是当今严肃的俄罗斯文学中“唯一的畅销”^④，这在苏联解体后严肃文学一直不景气的时下，是颇耐人寻味的。这里面除了商业炒作因素（佩列文的书曾上电视广告，这在俄罗斯的作家中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也与作家在结构文本时表现出的独特而高超的艺术技巧，能够及时反映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现实，准确把握人们精神上的裂变，大胆触及俄罗斯历史与现实中的重大和迫切问题有关。

米·别尔格说，佩列文的作品是一种易于接受的、引人入胜的、极其明快的、“拥有浓缩的内容”、带有神秘和彼岸色彩的哲理小说，即便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读者也不难读懂，因为它触动的正是那些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人最为敏感的问题：死亡，自由，爱情，生命的意义，存在的意义等。恰到好处的哲学穿插与悬念迭起的平缓叙述保持着平衡^⑤。谢·科尔涅夫



认为,佩列文其实并非后现代主义作家,而是“极其彻头彻尾的俄罗斯经典的思想型作家,跟托尔斯泰或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俄罗斯经典的思想型作家是这样的人,他善于抛出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和引人入胜的文学产品,与此同时又不失为一个思想家,亦即一个真正的传道者和道德家——社会的或宗教的。且他不光是个思想家,还是个喜欢强加于人、不可救药的思想家,几乎每一句话都在不遗余力地公然向读者的头脑灌输同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理论。”^⑩

这些都可以说是佩列文的特点,也是他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作家。事实上,批评界对他的非议还是不少的,有的还相当尖锐,但细看下来,主要还是集中在他的文字风格上。确实,与作家在结构文本方面表现出的高超技巧相比,他的文字功夫要逊色许多。他经常在一个有限的段落里重复使用同一个动词,如第三章中描写夏伯阳军刀的一段文字,总共三句话里,重复使用了七次“БЫТЬ”(译文难以体现),人物的对话中无论有无必要,从头到尾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安娜说道”“彼得说道”,如安娜与彼得很短的一段对话中,竟连用了七次“安娜说道”。另外,从他笨拙而又单调的句式也可窥见一斑,如:“这是非常古老而奇特的轿子,由一间轿厢、一个圆顶、四只长长的把手构成”;“这是一盏由酒精和玻璃烧瓶构成的照明灯……”“阿尔泰—维德尼扬斯克这座城市主要是由一些木头房子组成的……”这类生硬的句子,与其说是文学语言,不如说是科学表述。再如:“我突然发现”,“我突然感到害怕”,“我突然意外地惊醒”,“我突然想起”,“我突然明白了”,“我突然意识到”,“我突然完全



清楚了”等等,这样的句式比比皆是。

有批评者指出:佩列文“绝对缺少个人语调”^⑩;“词汇贫乏”,“风格停留在小学生作文水平”上^⑪;“佩列文的文本在写作技巧方面经不住起码的检验”,他之所以喜欢使用形形色色的黑话和俚语,喜欢卖弄佛教和禅宗,其实是为了掩盖他在语言艺术方面的苍白^⑫。

仿拟本来是后现代主义作家喜用和常用的一种手法,如鲁宾斯坦就曾在长诗《英雄的诞生》中故意模仿小学生作文的笔调,但仿拟毕竟不是真的稚拙,拿《夏伯阳与虚空》来说,也实在不是一个仿拟所能够解释的。毋庸讳言,文采的匮乏,确实是不少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一个先天不足。

著名评论家沙伊塔诺夫甚至对佩列文的作家资格也产生了疑问,称佩列文的作品是危险的“电脑病毒”：“佩列文不是作家,而是丧失了语言的话语文本的编撰者。他依靠的是音调、谈话单元、习语、结构。他运用的是电脑线条画形象及电脑线条画技法。且在创造不太复杂但却有效的意识模式方面,做得不错。也许是在电视片段层面上,也许是在性安全用品广告层面上:一张脸变成另一张脸,男人的脸变成女人的脸……佩列文笔下也是这样:未来主义咖啡馆变成夏伯阳的司令部车厢,战斗场面变成佛教幻象。如果继续用电脑语言来打个比方的话,那么不妨这样说:该程序一旦闯入文化记忆空间,会像病毒一样吃掉文化记忆。”^⑬

从细部考察,佩列文的作品确实有明显的缺陷,但从大处着眼,也绝不能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他能迅速成功和走红,并进而成为一种现象,这并不是偶然的。叶赛宁说过:“面对面,



彼此看不见,保持距离方能见出高大。”佩列文毕竟刚过不惑之年,前面的路还很长,对他现在就盖棺论定还为时过早。诚然,走红和成功,远非衡量一个作家价值的全部标准,但不管怎么说,佩列文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对翻译而言,《夏伯阳与虚空》是一部难度极大的小说。首先,要克服语言障碍,就远非一件易事,莫名其妙的黑话和俚语,常使人如坠云中雾里,即便一般的俄罗斯读者,有时也会不知所云,更不消说是外国人了。其次,书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文化意象和思想内涵,从西方的神秘主义到东方的老庄哲学,从俄罗斯黑手党的吸毒到日本武士道的剖腹,从荣格心理学到佛教和禅宗……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常使译者的学识有捉襟见肘之感。理解之难,查对之烦,传译之苦,更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道得明的。译界的共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译者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算是有了最充分的体验。现在,译稿虽然已经告竣,诚惶诚恐的感觉却未能完全释然,惟望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我的博士研究生谢周和赵杨、硕士研究生张力的帮助,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赵丽君女士帮助还原了书中的部分日语译名,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郑体武

2003年11月于沪上



注释:

- ① 《星火》,1996 第 35 期。
- ② 伊姆希巴耶娃:《〈夏伯阳与虚空〉:佩列文的后现代主义游戏》,《文学问题》,2001—11/12。
- ③ 德·贝科夫:《逃往蒙古》,《文学报》1996 年 29 期。
- ④ 罗·阿尔比特曼,书评报,1996 年 28 期。
- ⑤ 亚·博尔舍夫、奥·瓦西里耶娃:《当代俄罗斯文学(1970—1990 年代)》,彼得堡,2000 年,101—102 页。又见《俄罗斯文艺》2003 第三期。
- ⑥ 尼·里杰尔曼、马·利波维茨基:《当代俄罗斯文学史》,下册,莫斯科,2001 年,64 页。
- ⑦ 同②。
- ⑧ 米·爱泼斯坦:《作为文学的网络》,《普希金》,1998 年第一期。
- ⑨ 谢·科尔涅夫:《虚空与虚空的碰撞:后现代主义能否成为俄国的和经典的》,《新文学评论》,1997 年 28 期,247 页。
- ⑩ 亚·格尼斯:《伊万·彼得罗维奇死了》,莫斯科,1999 年,232 页。
- ⑪ 同⑥,65 页。
- ⑫ 参看《恰巴耶夫》,郑泽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10—11 页。
- ⑬ 同上,11—12 页。
- ⑭ 刘文飞,《百事一代》译者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
- ⑮ 米·别尔格:《文学圈》,莫斯科,2000 年,300 页。
- ⑯ 同⑨,244—245 页。
- ⑰ 弗·诺维科夫《佩列文人侵后的文学风景》, <http://pelevin.nov.ru/stati/o-novik/1.html>
- ⑱ 谢·乌里扬诺夫:《佩列文与虚空》, <http://pelevin.nov.ru/stati/o-ulan/1.html>



⑱ 《文学问题》，2003年7/8期。

⑳ 沙伊塔诺夫：《佩列文方案》，《文学问题》，2003年7/8期。



1

特维尔街心花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跟我两年前最后一次见到它时一样,依然是二月,满地的积雪,以奇怪的方式甚至潜入白昼的光亮的雾霭。长凳上依旧坐着纹丝不动的老太婆们;头顶纵横交错的黑色树枝上方,依旧是灰蒙蒙的天空,如一张沉重地垂向地面的破旧床垫,上面躺着熟睡的上帝。

不过,也有不同之处。今年的冬天,林荫道上的暴风雪刮得格外猛烈,简直像是在草原上,要是迎面碰上两只狼,我丝毫不会感到奇怪。普希金铜像似乎比平时更为忧郁,也许是由于它胸前挂了一条红色的横幅:“向革命一周年致敬”。虽然致敬的对象是一周年,且“革命”一词的书写也有错误^①,但我并无任何要予以嘲弄的念头——近来的各种遭遇使我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些写在红纸或红布上的荒唐短句背后,隐藏着一张恶魔般的面孔。

天色已经开始变暗了。透过一片雪幕,耶稣受难修道院

^① 以前许多缺少文化知识的俄国人对旧体的俄文字母 *x* 和 *e* 不能区分,一概写作 *x*。



依稀可辨。修道院前的广场上停着两辆货车，高大的车厢裹着鲜红的帷布；四周人群蠕动，传来一名演讲者的声音，尽管我几乎什么都听不清楚，但凭他的语调和“无产阶级”、“恐怖”等词语中打机关枪似的舌尖颤音^①，我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两名醉醺醺的士兵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从我身旁经过。他们正急匆匆地奔向广场，可其中一人突然放慢了脚步，用放肆无礼的目光打量着我。他张开口，似乎想要说什么；幸好——无论对他，还是对我——另一个士兵拽了一下他的衣袖，他们马上离开了。

我转过身，沿着街心花园快步往下走，一面不住地揣摩，为何我的模样总是引起这帮混蛋的怀疑。当然，我的穿着不成体统，身上是一件扣带松弛的邈邈的英式大衣，头上是一顶军帽，不用说，没有帽徽，类似亚历山大二世戴过的那种，脚上是一双军官靴。但事情的原因显然不仅仅在于我的衣着。周围有不少人看上去比我更加离谱。比如在特维尔大街上，我就见过一位精神彻底失常的先生，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胸前抱着圣像，往漆黑无人的克里姆林宫走去，然而没人在意他。我却不然，经常有人斜眼打量我。每到这时我就会想起自己身上既没有钱，也没有证件。昨天在火车站附近的厕所里，我曾把一个红色的领结戴在自己胸前，可当我从一面裂缝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模样时，我马上把它取了下来：戴上领结不仅使我显得傻里傻气，而且更容易招人怀疑。

不过也有可能，实际上我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特别注意，

^① 俄语中“无产阶级”和“恐怖”两个词都带有颤音 p。



是我紧张的神经在作怪，觉得自己随时会被逮捕罢了。我并没感觉到死亡的可怖。说不准，我想，我已经死了，而我行走于其间的结了冰的街心花园，就是靠近阴界的一个地方。我其实早就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即俄罗斯的灵魂注定要在封冻时渡斯堤克斯河^①，且收钱的不是摆渡手，而是一个身着灰衣、出租冰鞋的人（不言而喻，就是那个精神本质）。

啊，我突然清晰地看见了这一幕！托尔斯泰伯爵穿着紧身运动衣，大幅摆动着手臂，沿着冰面向远方滑去；他的动作缓慢而凝重，但他的速度却很快，快得跟在他身后无声地吠叫着的三头犬怎么也追不上他。幽暗的、非尘世的红黄色晚霞为这幅图画涂上最后一笔。我无声地笑了，就在这时，不知是谁用手掌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向旁边一闪，猛地转过身，正想拔出口袋里的左轮手枪，这才惊讶地发现，站在我面前的原来是格里戈里·冯·埃尔年——我儿时的老相识。可是，我的上帝啊，瞧他的模样！他从头到脚都裹着黑色的皮衣，腰上挂着一把放在枪套里的毛瑟枪，手里提着一个不伦不类的妇产科医生用的手提包。

“很高兴，你还会笑，”他说。

“你好，格里沙，”我回答说。“真奇怪会见到你。”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奇怪。”

“你这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呀？”他警觉地问。

“从彼得堡来，”我回答说。“至于说到哪儿去——连我自

^① 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冥河。



己还想知道呢。”

“那么就到我那儿去吧，”冯·埃尔年说道，“我就住在附近，单独住一套房子。”

我们微笑着打量着对方，彼此间说些无关紧要的话，然后沿着街心花园往下走去。我们没见面的这段时间里，冯·埃尔年的下巴上留起了胡须，这使他的脸看起来就像一个发了芽的葱头；他面色红润，皮肤略显粗糙，仿佛一连几个冬天都在滑冰锻炼身体，而且效果明显。

我们曾在同一所中学读书，但此后就很少见面了。有两次我在彼得堡的文学沙龙上遇见过他，他写的那些诗不是让人联想起沉湎于鸡奸的涅克拉索夫，就是让人联想到信奉了马克思的纳德松^①。我感到有些恼火的是，他有当众吸食可卡因的习惯，还经常暗示自己跟一些社会民主团体有联系。不过，从他目前的装束判断，他的暗示倒是不假。能在一个当年曾就圣三位一体的神秘意义夸夸其谈的人身上，发现他与魔鬼战士为伍的鲜明标记，这是大有教益的。不过，这种转变丝毫也不出乎意料。许多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的颓废派，一嗅出新政权明显的地狱气味，就急忙赶过去为之效劳。其实，我想，他们并非受到自觉的撒旦主义的支配——就这一点来说他们还太幼稚——而是一种审美本能使然：红色的五角形符篆能为他们的黄色短衫^②增光添彩。

① C. Я. 纳德松(1862—1887)，俄国诗人。

② 马雅可夫斯基在其自传《我自己》中有一段标题为“黄色短外衣”的文字，讲述他如何用一条黄色的饰带作领带，并“把领带放大”，“做了一件领带式的衬衫”。



“彼得堡的情况如何？”冯·埃尔年问道。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说。

“好吧，”冯·埃尔年脸色阴沉下来，同意道。“我知道。”

我们转身离开街心花园，穿过马路，来到一栋正对着“帕拉斯”旅馆的七层公寓楼跟前。旅馆门口架着两挺机枪，水兵们在抽烟，长杆子上迎风飘摆的红旗就像西班牙斗牛士手中的红布。冯·埃尔年扯了扯我的袖子。

“看，”他说。

我转过头。楼门口对面的马路上停着一辆长长的黑色小汽车，前排的座位是敞篷的，后面的乘客室又低又窄。前排座位上落了厚厚一层雪。

“怎么了？”我问道。

“是我的，”冯·埃尔年说道。“公务车。”

“啊，”我说，“祝贺你。”

我们走进楼门。电梯不能用，我们只好爬楼梯。楼道很暗，铺的地毯还没来得及收掉。

“你目前在干什么？”我问道。

“哦，”冯·埃尔年说，“这可一言难尽。事情多得很，简直干不完。东一趟，西一趟，一会儿这件事，一会儿那件事，忙得不亦乐乎。没办法，这些事总得有人干才行。”

“是文化方面的工作，对吧？”

他不置可否地把头往旁边歪了歪。我没有再问下去。

上了五楼，我们走到一扇很高的门旁边。门上有一块浅色的长方形印记，显然这里原来挂过一块牌子。门开了，我们走进昏暗的前厅，恰好这时墙上的电话响了。冯·埃尔年取下



听筒。

“是我，巴巴亚辛同志，”他对着胶木话筒喊道。“对，记得……不，不用派……巴巴亚辛同志，可我不行，这会很可笑的……想想吧——带着几个水兵，太丢人了……什么？我服从命令，但提出强烈的抗议……什么？”

他瞟了我一眼，为了不让他难堪，我去了客厅。

客厅里的地板上摆满了报纸，多数是早已被查禁了的，看得出来，这套房子里保存着一些合订本。此外，这里还能看出其他一些过去生活的痕迹：墙上挂着一张精致的土耳其壁毯，壁毯下方摆着一张活面写字台，台面上嵌着五颜六色的菱形搪瓷砖。看到这张写字台，我马上就明白了，这里曾是某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家。对面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旁边有一副现代风格的耶稣受难十字架，这让我不由得考虑起能够与之相符的宗教情感的性质。一张上面悬着黄色天盖形幔帐的大床占去了屋子很大一部分空间。房间的中央摆着一张圆桌，桌上的物品——可能是靠近十字架的缘故——我觉得就像是一幅以秘传基督教为主题的静物画：一个一公升的伏特加酒瓶，一只心形的装酥糖的洋铁罐，一条由三片黑面包叠成的通向虚空的阶梯，三个带棱的玻璃杯和一把十字形的罐头刀。

镜子旁边的地板上散乱地堆放着几个货包，那形状让我不由得想到了走私；房间里有股酸味，有股包脚布的臭味和烧焦的气味，还有许多空瓶子。我在桌旁坐下来。

不一会儿，门吱地一响，冯·埃尔年走了进来。他脱下皮夹克，身上只剩下一件显眼的士兵穿的套头衫。

“鬼知道要分派什么任务，”他一面坐下来，一面说，“肃反



委员会来的电话。”

“你还在他们那儿干？”

“我也是能推则推。”

“你是怎么跟这伙人搞到一起去的？”

冯·埃尔年咧嘴笑了笑。

“这再简单不过了。跟高尔基通了五分钟电话。”

“就凭这个，马上给你配了毛瑟枪和汽车？”

“听我说，”他说道，“生活就是剧院，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只是人们很少提及，在这个剧院里，每天都在上演新的剧本。比如现在，彼佳，我就在导演一出戏，一出……”

他把双手举过头顶，在空中抖了一下，仿佛是要把装在一个看不见的口袋里的钱币抖得叮当作响。

“问题甚至不在剧本本身，”他说道，“假如继续使用这个比喻。以前是什么人都可以从台下往台上扔臭鸡蛋，现在则是每天都有人拿着左轮枪从台上朝台下射击，兴许还会扔炸弹呢。想想吧——现在做什么人好？演员还是观众？”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该怎样回答你呢，”我沉思着说道。“你的戏剧整个是从挂衣钩^①开始的，我认为，还会以挂衣钩结束。至于将来，”我用一根指头指着上面说，“终究还是电影的天下。”

冯·埃尔年嘿嘿一笑，摇了摇头。

① 俄罗斯稍好的剧院都有专门的存衣处，观众去看戏时，穿着都很正式，进入剧院后，将外衣挂在存衣处，气氛显得很庄重；而此处的“挂衣钩”暗指“绞刑”，一语双关，具有讽刺意味。



“不过你还是考虑一下我的话吧，”他说。

“我会考虑的，”我回答道。

他给自己倒了些伏特加，一饮而尽。

“对了，”他说。“说到剧院。你知道现在谁是剧院的政委吗？马林诺夫斯卡娅女士。你们认识吧？”

“不记得了。哪个见鬼的马林诺夫斯卡娅女士？”

冯·埃尔年叹了口气。他站起来，一言不发地在房间里踱着步。

“彼佳，”他在我对面坐下，望着我的眼睛说道，“我们这是开玩笑，开玩笑，不过我还是看得出，你碰上麻烦了。出什么事了？我们俩毕竟是老朋友，就算没有这层关系，我也愿意帮你一把。”

我终于下定决心。

“老实跟你说吧。三天前在彼得堡，有人来找过我。”

“从哪儿来的？”

“从你的剧院。”

“这是怎么回事？”他扬起眉毛问道。

“很简单。从豌豆街来了三个人，一个自称是什么文学工作者，其余两个根本用不着表明身份。他们和我谈了四十来分钟，以这位文学工作者为主。谈完以后他们说，我们的谈话很有趣，但需要另外找个地方继续谈。我可不想去这个另外的地方，你也知道，很少有人能从那里回来……”

“可你还是回来了呀，”冯·埃尔年打断我。

“我不是回来了，”我说，“我压根儿就没去。格里沙，我从他们身边跑掉了。知道吗，就像小时候从看门人那儿跑掉



一样。”

“可他们为什么要来找你呢？”冯·埃尔年问道。“你可是不关心政治的呀。你干了什么吗？”

“什么也没干。讲起来都可笑。我发表了一首诗——按他们的观点，发表的杂志不对头——他们不喜欢诗的韵脚。‘装甲车’——‘只是一闪而过’。你能想出这里头有什么不对吗？”

“诗里写的是什么呢？”

“哦，尽是些抽象的东西。里面写到，时间的流水冲刷着‘现在’这堵墙，使墙上不断出现新的纹路，这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过去。记忆使我们确信，昨天确实存在过，然而，焉知这整个的记忆不是随着第一缕晨光一同出现的呢？”

“我不太明白，”冯·埃尔年说道。

“我也是，”我说，“可问题不在这里。我想说的主要是——诗里没有任何政治成分。也就是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可他们不以为然，他们还就此向我作了解释。最可怕的是，与他们的顾问谈过话以后，我确实理解了他的逻辑，而且理解得如此深刻，以致……这实在太可怕了，所以，当他们把我带到街上时，我撒腿就跑——与其说是要逃离他们，倒不如说是要逃离我的这种理解……”

冯·埃尔年蹙起了眉头。

“全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他说。“毫无疑问，他们都是白痴。不过你也真行。你就是因为这个才到莫斯科来的？”

“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我逃跑的时候还开了枪。你也明白，我开枪打的是我自己的恐惧编织成的幽灵，可这毕竟是



在豌豆街，有理也说不清楚。也就是说，就算我能说清楚，他们也肯定会问——那您为什么，老实说，要向幽灵开枪呢？莫非您不喜欢在欧洲游荡的幽灵？”

冯·埃尔年扫了我一眼，陷入了沉思。我注视着他的双手——他先是把双手放在桌布上，轻轻地蹭着，似乎要擦掉上面渗出的汗水，然后又突然拿开，藏到桌子下面。他的脸上浮现出绝望的神情，我感到，我们的会面和我的故事搅得他心绪不宁。

“这样只会更糟，”他咕哝道。“不过你能信任我，这很好。我想，这件事我们会解决的……会解决的，会解决的……我就给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①打电话……举起手来。”

最后这句话我直到看见桌布上毛瑟枪的枪口，才听明白。可他接下来的做法更令人吃惊：他从胸前的衣袋里掏出一副夹鼻眼镜，戴在鼻梁上。

“举起手来，”他重复道。

“你这是干什么，格里沙？”我一边举手，一边问。

“不对，”他说。

“什么‘不对’？”

“我说的是把武器和钱放到桌子上。”

“我怎么放呢？”我说，“我的手是举着的呀。”

他扳起手枪的扳机。

“上帝，”他说，“你最好放明白点，这种话我听得多了。”

“那好吧，”我说，“手枪在大衣里。你真是个十足的下流

^① 即高尔基。



坏。不过，这我打小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呢？会赏给你一枚勋章吗？”

冯·埃尔年微微一笑。

“到走廊里去，”他说。

我们来到走廊，他继续用枪对着我，挨个搜查我的大衣口袋，掏出我的左轮手枪，把它塞进自己的口袋。他的动作有些扭捏慌乱，很像一个初次嫖娼的中学生，我不由得心中暗想，他以前可能从未公然干过这等卑鄙勾当。

“打开门，”他命令道，“到楼梯上去。”

“让我穿上大衣，”我说，同时拼命在想，能否对这个心生邪念的人说点什么，以改变事态的发展。

“我们没多远，”冯·埃尔年说，“穿过街心花园就到。不过，想穿就穿吧。”

我用双手从衣架上取下大衣，稍微侧转身，以便把手伸进衣袖，但接下来的一刹那，连我自己也没料到，我竟把大衣朝冯·埃尔年扔了过去——不是简单地朝他扔过去，而是兜头盖脸地用力掷过去。

我至今也没搞懂，他为何没有马上向我开枪。可事实终究是事实：等他扣动扳机时，我已经用自己沉重的身躯把他压倒在地了，子弹贴着我身旁几厘米处飞了过去，射进楼梯口的门里。冯·埃尔年倒在地上，大衣蒙住了他的头，于是我就隔着大衣扼住他的脖子。虽然衣料很厚，却几乎没有什么妨碍。我用膝盖顶住他握枪的那只手的手腕，他在手指松开之前又向墙壁开了几枪。我的耳朵快要被枪声震聋了。在我们搏斗的时候，我似乎用头撞到了他被蒙住的脸——无论如何，我清



楚地记得，在他两次开枪的间歇，我听到了夹鼻眼镜轻微的碎裂声。

当他安静下来之后，我仍旧久久不敢松开他的脖子。我的双手几乎不听使唤了。为了恢复呼吸，我做了一套气功动作。奇怪，居然有用——我简直要歇斯底里了。突然，我仿佛是从旁观者的角度目睹了这一幕：一个人坐在刚被他掐死的朋友身上，正按《伊希斯^①》杂志上所描述的瑜伽功的方法使劲呼吸。我站起身，这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刚才杀了人。

当然，跟任何一个还没有完全信任当局的人一样，我也经常随身带着手枪，并且两天前还镇定自若地开过。但这次却不同，这次有点模模糊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②意味——空空荡荡的房屋，一具被英式大衣覆盖着的尸体和一扇通向敌对世界的门，也许，一些无聊的人正朝这扇门走过来……我极力驱赶这些想法——不用说，这整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味并不在于这具尸体和这扇被子弹击穿的门，而在于我自己，在于我脑海中突然涌现出的一股陌生的忏悔念头。

我把楼梯门推开一条缝儿，仔细听了一会儿。什么声音也没有。于是我想，几声枪响也许并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的手枪还在冯·埃尔年的裤子口袋里，我可不情愿伸手去掏。我捡起他的毛瑟枪，端详了一阵，这是件很棒的武器，而且是崭新的。我硬着头皮搜索他的上衣，搜出一包“伊拉”

① 古代埃及神话中管理天、地、黄泉三界的女神。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善于描写复杂、压抑、变态的人物内心活动。



牌香烟^①、一夹毛瑟枪备用子弹和一张肃反委员会的工作证，上面登记的名字是格里戈里·法涅尔内伊^②。果不其然，我想道，果不其然。其实小时候就能看出来。

我蹲下身子，打开他那只产科医生用的手提包上的锁。里面放着一个公文夹，公文夹里有一张还没填好的逮捕证，另外还有两夹子弹、一个装满了可卡因的洋铁罐、几把式样难看的医用镊子（我立即把它们扔到墙角）和厚厚的一叠钞票，其中不但有杜马百元大钞^③，还有美元。这一切来得正好。为了在紧张激动之余稍稍恢复一下神志，我往鼻孔里填了许多可卡因。它就像一把剃刀，在我的大脑上刮了一下。我马上平静下来。我并不喜欢可卡因——它会使我感情过于脆弱，但我现在需要赶快清醒过来。

我提起冯·埃尔年的两只手臂，沿着走廊把他拖到一间屋子门口。我踹开门，正准备把他拖进去，却在门口怔住了。尽管屋内一片狼藉，了无生气，但战前祥和生活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这间屋子从前是儿童室，靠墙摆着两张小床，床边上装有轻巧的竹栏杆，墙上是用炭笔画的一匹马和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头像（不知为何我竟然想到了十二月党人）。地板上放着一个红色的皮球，一看到这个皮球，我赶紧关上门，拖着

① 马雅可夫斯基有一首名为《“伊拉”牌香烟》的广告诗：旧世界给我们留下的好东西嘛，/只有这一种香烟：“伊拉”。

② “法涅尔内伊”与“冯·埃尔年”发音相近。在姓前加“冯”表示出身贵族，而“法涅尔”在俄语中有“胶合板”之意，表示“又蠢又壮的人”。“法涅尔”也指革命时期用于写各种标语的标牌，因此含有“革命”之意。

③ 1917年俄国临时政府发行的印有杜马大厦的纸币。



冯·埃尔年到了隔壁的门口。这间屋子的陈设简单得令我吃惊：中间摆着一架揭开了盖子的黑色钢琴，旁边是一张转椅，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了。

这时，我又陷入了另外一种状态。我把冯·埃尔年拖到墙角，让他半靠在墙上（在拖拽过程中，我一直很小心，以免他的脸从灰大衣下面露出来），自己则在钢琴旁坐下。真令人惊讶，我想道，法涅尔内伊同志既在又不在我的身旁。有谁知道，他的灵魂此刻正在经历哪些变化呢？我回想起大概三年前他发表在《新讽刺之窗》上的一首诗，诗的内容似乎是对报纸上刊登的一篇关于解散本届杜马的文章的转述，但却写成了一行贯顶诗^①：弥尼，提客勒，毗勒斯。^② 他毕竟还是生活过，思索过，评判过。真是奇怪。

我转身面向钢琴，信手轻弹起一首莫扎特的曲子——我喜爱的那首F小调赋格曲。每当弹起这首曲子时，我就会觉得遗憾，遗憾自己缺少这位伟大的狂人所梦想的四只手。我的郁闷与我对冯·埃尔年的过火行为毫不相干；我的眼前蓦地浮现出隔壁房间的小竹床，某人童年时的生活情景，那双凝望着满天晚霞的纯洁无邪的眼睛，那个感人至深、终又化为乌有的世界。不过我没有弹多久——钢琴音不准，况且我也该走了。可往哪里去呢？

是该想想今天晚上怎么过了。我回到走廊，迟疑地瞥了

① 各行第一个字母构成一个词或一句话的诗。

② 弥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客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毗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与玛代人和波斯人。见《旧约·但以理书》，第5章。



一眼冯·埃尔年的皮夹克。看来，除了这件皮夹克，也找不到什么可穿的了。尽管我在文学方面的某些尝试颇为大胆，但我毕竟还没颓废到敢于穿上我那件已经成为裹尸布的大衣的程度，况且大衣的后背还被子弹射穿了。我从挂衣钩上取下皮夹克，拎起他的提包，来到有镜子的那间屋子。

皮夹克挺合身——我和死者个头相当。我系紧挂着枪套的皮带，端详一下镜子里的自己，竟发现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布尔什维克。我想，如果去翻拣一下墙根的那几包东西，也许只需几分钟我就会成为一个富翁，可是洁身自爱的心理打消了我的这一念头。我仔细地重新给毛瑟枪装上子弹，检查了一下，看能否轻松地把它从枪套里拔出来，结果令人满意。正当我准备走出房间时，听到了走廊里有人说话的声音。我这才想起来，这段时间里，外面的门一直开着。

我冲到阳台上。它正对着特维尔街心花园，下面是一块二十平方米左右的空地，又阴又冷，飘着雪花。借着微弱的路灯光，我看到了冯·埃尔年的汽车，前排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人，头上戴着一顶布尔什维克头盔。我猜想肯定是冯·埃尔年预先打电话叫来了肃反人员。翻到楼下的阳台上去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又跑回房间。已经有人在砰砰地敲门了。有什么法子呢——这一切总得有个了断。我用毛瑟枪对着门，喊道：

“请进！”

门开了，闯进来两个水兵，穿着短呢衣和难看的肥腿裤，身上挂满了酒瓶似的炸弹。其中一个留着唇髭，已经上了年纪，另一个很年轻，但长着一张松松垮垮和萎靡不振的脸。他



们对我手里的毛瑟枪毫不在意。

“你就是法涅尔内伊？”那个年岁较大、留着唇髭的人问道。

“是我。”

“拿着，”水兵说着递给我一张对折起来的纸条。

我把毛瑟枪放进枪套，打开纸条：

法涅尔内伊同志：

马上到音乐鼻烟盒来执行我们的路线。我派了热尔布诺夫和巴尔博林来协助您。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同志。

巴巴亚辛

纸条下方有一个模糊的印章。我正在考虑该说什么，他们已经在桌子旁边坐下了。

“下面的司机是你们的？”我问道。

“是我们的，”留唇髭的人说。“我们要用一下你的车。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①，”我说，差点咬着舌头。

“我是热尔布诺夫，”那个年长的留唇髭的人说道。

“巴尔博林，”年轻人自我介绍道。他柔声细气的，简直像个女人。

我在桌子旁边坐下，和他们面对面。热尔布诺夫倒了三

① “彼得”是“彼佳”的大名。



杯伏特加，推给我一杯，然后抬眼望着我。我想，他可能在等什么。

“那好吧，”我抓起自己的杯子说，“还是那句话，为世界革命胜利干杯！”

我的祝酒词并没有引起他们的热情。

“为胜利干杯是当然的，”巴尔博林说，“你的洗衣粉呢？”

“什么洗衣粉？”我问道。

“你别装糊涂了，”热尔布诺夫严厉地说，“巴巴亚辛跟我们讲过，今天给了你一罐。”

“啊，你们是指可卡因，”我估摸着说道，伸手到提包里去拿罐子。“要知道‘洗衣粉’这个词可有多种意思，同志们。也许，你们想来点乙醚吧，就像威廉·詹姆斯一样。”

“他是谁？”巴尔博林问，一面把洋铁罐抓在自己粗大的手里。

“一位英国同志。”

热尔布诺夫怀疑地哼了一声，而巴尔博林脸上却闪过一丝19世纪俄罗斯画家们在塑造典型人物时特别喜欢刻画的神情——某处有个广大而神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许多难于理解而又令人神往的东西，而你并不真正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这个世界，只不过有时需要对无法实现的东西做一番幻想罢了。

紧张气氛很快就消失了。热尔布诺夫打开铁罐，拿起桌布上的刀子，用它挑起一撮剂量大得吓人的白粉，放进酒杯里迅速搅拌。巴尔博林如法炮制——先给自己弄一杯，然后给我弄一杯。



“现在才好意思为世界革命干杯嘛，”他说。

大概是见我的脸上现出了疑惑的神情，热尔布诺夫冷笑一声，说道：

“这是从‘阿芙乐尔’号上学来的，老兄，源远流长啊。这叫‘波罗的海茶’。”

他们举起杯子，一饮而尽，我除了效仿他们之外，别无他法。我的喉咙几乎一下子就哑掉了。我点燃一支烟卷，狠命吸了一口，但丝毫没有感觉到烟味。我们一言不发地坐了大约一分钟。

“该走了，”热尔布诺夫突然从桌旁站起来说道。“伊万都快冻僵了。”

我呆呆地把装水果糖的铁罐收进提包，起身跟他们走。我在走廊里停下来，想要找到自己的帽子，可找不着，便索性把冯·埃尔年的制帽戴在了头上。我们走出屋门，顺着半明半暗的楼梯默默地往下走。

我突然发觉，我内心既轻松又平静，并且越往下走，越觉得轻松和平静。我没去考虑未来——我心里充溢着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并无直接的危险，当我走过昏暗的楼梯拐角处时，我甚至还有心欣赏玻璃窗外飘舞的异常优美的雪花。如果细想下去，我自己也可以说是一片雪花，命运之风卷着我，让我跟在另外两片穿着黑色短呢衣、啪嗒啪嗒地走在楼梯上的雪花身后，去往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我心态轻松，却并未失去对现实的清醒的理解力，而且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还是在彼得格勒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这些水兵身上塞满弹药的沉重装备是如何套上去的。在亮着



一盏孤灯的三楼楼梯拐角处，我分明看到热尔布诺夫后背上有几个小钩子，乳罩般的机枪子弹带就挂在这些小钩子上。我马上联想到热尔布诺夫和巴尔博林每次去杀人之前做准备时的情景，他们就像两个姑娘，在浴室里相互帮助，把这身装扮中最麻烦的部分佩戴好。在我看来，这是一切革命所具有的女性实质的又一明证。我突然领悟了亚历山大·勃洛克^①的某些新情绪；想必是我兴奋得叫出了声，巴尔博林扭过头来。

“你刚才还不想用呢，傻瓜，”他说道，露出一颗金牙。

我们出了公寓楼，来到街上。巴尔博林对坐在前排敞篷位置上的士兵说了句什么，然后打开车门，我们钻了进去。汽车马上开动起来了。透过乘客室前面磨钝了边缘的玻璃，可以看到驾驶员挂满雪花的后背和他头上的尖顶头盔；似乎为我们驾车的是易卜生^②笔下的神人特罗利^③。在我看来，汽车的结构极不方便，同时对总是暴露在恶劣天气下的驾驶员来说也不够尊重，但也有可能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目的是让乘客在旅途中不仅能够欣赏到窗外的景色，还能感受到阶级之间的不平等。

我把头转向侧面的玻璃窗。街道上空空荡荡的，飘落到路面上的雪花异常美丽。雪幕中映照着稀稀拉拉的路灯；灯

① 亚历山大·勃洛克(1880—1921)，俄国象征主义诗人，早期追求“永恒女性”这一世界灵魂，他的《美妇人集》对此有所体现。后来支持革命，创作了《十二个》等反映十月革命的诗作。

②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

③ 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传说中的神人，大多为巨人，通常与人类为敌。



光中,眼前掠过一行写在房屋墙壁上的谩骂列宁的法文大标语。

汽车停下来时,我已经有点回过神来。我们在一条叫不出名的街上一个毫不起眼的院门附近下了车。院门前面停着两辆汽车和几辆考究的马车,稍远一点,停着一辆模样吓人的装甲车,装甲车的机枪发射塔上盖着一层雪,就像戴了一顶帽子,但我来不及细看,两个水兵已经一闪身钻进院门。我们穿过异常压抑的院子,来到装有生铁遮阳板的楼门口。遮阳板上刻着具有商业气息的涡纹图案和爱神雕像,还嵌着一块不大的牌子:

音乐鼻烟盒

文学酒吧

靠门的几扇窗户挂着严实的玫瑰色窗帘,里面亮着灯;一种不知是什么乐器发出的凄切而又优美的声音传了出来。

热尔布诺夫拽开门。里面是一截挂满厚重的皮衣和外套的短走廊;走廊尽头是一幅厚实的天鹅绒帘子。一个身穿红色侧领衬衫、罪犯模样的人迎着我们从凳子上站起来。

“水兵公民们,”他说,“我们……”

巴尔博林要杂技似的将肩上的步枪掉转过来,猛地用枪托砸在他的小腹上。这个可怜虫靠着墙壁,慢慢地瘫倒在地;他那不怀好意的脸上现出疲惫和厌恶的神色。热尔布诺夫掀开帘子,我们走进半明半暗的大厅。

这时,我感到格外兴奋。我扫视一下四周。这地方很容



易让人联想到一家穷摆阔气的二流餐馆。一张张烟雾缭绕的圆桌旁坐着形形色色的客人。似乎有人在抽大烟。谁也没有注意我们，于是我们就在一张离门口不远的空桌旁坐下。

大厅的尽头是一个亮着灯光的小型舞台，台上一只黑色天鹅绒面的凳子上，坐着一位跷起一条腿、身着燕尾服、脸刮得精光的先生。他光着一只脚，右手里的琴弓在一把长锯的背沿上不停地拉动，锯的一端被他踩在地板上，另一端握在他的左手里，锯身被压得弯弯的，不住地颤动。当他需要让这条熠熠生辉的金属片暂时停止颤动时，他就用那只光脚往那上面按一下；他旁边的地板上放着一只漆皮鞋，里面露出一只白色的袜子。这位先生用他的乐器拉出来的声音仿佛来自天外，既迷人又忧伤；他演奏的旋律似乎很简单，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音色，是婉转起伏、久不绝耳而又沁人心脾的音符。

入口处的帘子摆动了一下，钻进来一个穿侧领衬衫的人。他朝暗处打了一个响指，冲我们的桌子点点头，然后转身向我们礼节性地微微鞠了一躬，随即消失在帘子后面。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伙计，一手举着托盘，另一只手提着铜壶（其它桌上也摆着同样的壶）。托盘上放着一盘馅饼、三个酒杯和一只小哨子。伙计给我们摆好酒杯，倒上酒，然后在一旁呆呆地候着。我随手从提包里掏出一张钞票递给他，好像是张十美元的票子。一开始我还没弄明白，为什么要在托盘上放一只小哨子，可就在这这时从邻桌传来一声轻柔悦耳的哨音，伙计立即寻声奔了过去。

热尔布诺夫喝了一口酒，不满地哼了一声。我也端起杯



子喝了一口。酒是劣质的中国烧酒，高粱酿制的。我开始咀嚼馅饼，根本吃不出味道来——我的喉咙依旧麻木，可卡因的威力还没有消失。

“馅饼什么馅的？”巴尔博林柔声问道。“听说这里经常有人失踪。别是斋期里开了荤吧。”

“我就吃过，”热尔布诺夫径直说道。“就像牛肉。”

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些，就取出洋铁罐。巴尔博林开始往每个杯子里放白粉。

这时，穿燕尾服的先生已经结束了演奏，优雅而迅速地穿上了袜子和皮鞋，站起身来鞠了一躬，然后拎起凳子，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下了台。靠近舞台的一张桌子旁站起来一位胡须斑白、仪表堂堂的男士，脖子上缠一条像是用来遮掩牙齿印的灰色围巾。我惊讶地认出他就是瓦列里·勃留索夫^①。他变得苍老了，消瘦了。他登上舞台，对着大厅说道：

“同志们！就算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的时代，印在纸上的文本受到部分观众的排斥，或者说……呃……”他转了转眼珠，停顿了一下，显然是要马上弄出点白痴般的双关语来，“或者说，更有甚者，受到所有观众的排斥……呃……但传统并没有缴械投降，它在为自己寻找新的形式。你们今天将看到的演出，我称之为自我凸现后现实主义艺术的典范之一。现在要为你们上演的是由一位……呃……一位淘气鬼^②所创作

① 瓦列里·勃留索夫(1873—1924)，俄国象征主义诗人，早期象征主义领袖；后接受了十月革命，从事过苏维埃的文化工作。

② 俄语中的“淘气鬼”与“后现实主义艺术家”谐音。



的……呃……小型悲剧。它的作者，室内诗人约翰·帕夫卢欣正是这样定义他这部作品的体裁的。请欣赏小型悲剧《拉斯柯尔尼科夫和马尔美拉多夫^①》。请。”

“请，”热尔布诺夫回声似的重复了一遍，接着我们干了一杯。

勃留索夫从台上走下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两个身穿军服的人从后台搬出一架高大笨重、表面镀金、带有琴桥的竖琴和一张凳子，随即又搬出一张小桌，并在桌上放了一个大肚甜酒瓶和两个高脚杯，然后在舞台两侧各贴了一块硬纸板，纸板上分别写着“拉斯柯尔尼科夫”和“马尔美拉多夫”（后一个名字的末尾加了个软音符号，我马上感觉到，这个软音符号并非书写错误^②，而是具有某种象征意味），最后又在舞台中央挂了一块小牌子，上面画了一个蓝色的五角星，五角星里面写着一个莫名其妙的词“伊赫弗伊”^③。摆好这些东西后，他们迅速离开。一个穿着长衫的女人从后台走了出来，坐到竖琴旁，开始不慌不忙地拨起琴弦来。就这样过了几分钟。

这时，舞台上出现了四个身穿黑色长披风的人，他们单腿跪到地上，撩起披风的下摆遮住脸。有人鼓起掌来。两个脚穿高高的厚底靴^④、身着白色长袍、头戴希腊面具的人物分别从舞台的两端走出来。他们缓慢地向对方走去，然后隔着一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两个主人公。

② 按旧体俄语的写法，此处两人的名字都应以硬音符号结尾，而后一个名字的末尾写的却是软音符号。

③ 此词无法译出。

④ 古希腊及罗马演剧时，演员穿着厚底靴，以显示角色的高大。



点距离停下来。其中一人腋下吊着一把斧子，斧子上挂着一个玫瑰花缠绕成的环扣。我明白了，这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其实，没有斧头我也能认出他来，因为他背后挂着带名字的标牌。在写着“马尔美拉多夫”的标牌旁边站定的演员缓缓地抬起一只手，拖长了声音说道：

“我是马尔美拉多夫。告诉您一个秘密，
我再也没有可去的地方。
我在世间浪迹已久，
可前方却见不到些微的灯光。
凭您的眼神我可以断言，
对受压迫的人民，您并非漠不关心。
或许，我们该干一杯？给您斟上？”
“不用。”

带斧子的演员答话时同样拖长了声音，只是噪音低沉。说话间，他抬起一只手，伸向马尔美拉多夫，而后者迅速为自己斟了一杯酒，并倒进面具的口子里，然后继续说道：

“您随意。为您干杯。看哪，
您的脸上充溢着神秘的荣耀，
您优雅的嘴唇笑而不语，
您额头苍白，双手沾满鲜血。
而我再也找不出什么理由，
说您毫无表情的脸皮下面的空虚



迸射出令人自豪的威力，
从而使您看上去与上帝无异。
您可明白我的意思？”
“我想，我明白……”

热尔布诺夫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他悄声问。
“现在还难说，”我小声回答，“往下看吧。”
热尔布诺夫敬佩地点点头。舞台上的马尔美拉多夫说：

“对。少了这一条——您自己明白。
每天早晨都会血流遍地。
都会有人被砍死在斧头之下。
您能想象吗，我的小伙子？”
“能。”
“我不愿意探视人的灵魂。
里面黑黢黢的，像是在长筒靴里。
像是窄小阴冷的储藏室里
躺着两个死去的女人。可怕吧？”
“嗯。您想要什么？用意何在？”
“要我直截了当告诉您吗？”
“快点说吧。”
“要不，咱们先来一杯甜酒？”
“您真够讨厌的，好像理发师。
我要走了。”



“亲爱的小伙子，别发脾气。”

“我讨厌这哑谜似的谈话。”

也许，您终于要解释了？

您究竟想要什么？”

“把斧子卖给我吧……”

这时我打量了一下大厅。每张桌子旁边都坐着三四个人；尽管他们身份各异，但正如人类历史中常见的那样，其中大多是些尖嘴猴腮的投机分子和衣着华贵的风骚娘们。与勃留索夫同坐一桌的是阿列克塞·托尔斯泰^①，与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时相比，他明显地发福了，脖子上的领带也换成了一个大领结。他身上长出的脂肪仿佛是从骨瘦如柴的勃留索夫身上抽出来的一样。他们两人呆在一起，令人触目惊心。

我移开目光，发现另外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怪人，套头军便服上的皮带扎得紧绷绷的，小胡子朝上翘着。他单独占用了一张桌子，面前摆的不是酒壶，而是一瓶香槟。我猜他可能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名高官；我也说不清楚，他那刚毅平静的脸上，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觉得与众不同，但我的目光还是在他身上停留了好一会儿。他发现了我的目光，于是我马上把头转向舞台。台上还在进行空洞无聊的对话：

“……什么？为何要卖给您？”

^① 阿列克塞·托尔斯泰(1883—1945)，俄罗斯作家，十月革命后曾侨居国外，后回到苏联，成为苏联文学的重要作家。



“我这是工作需要。

它象征着存在的一个方面。

如果需要，您可以再偷一把。

想必偷来的更好用，不对吗？”

“是这样……不过我想，您是在暗示什么吧？

难道您去过那里？就躲在屏风后边？”

“知道吗，罗季翁，您城府还浅，

尽管带着斧头。不过，青春总是

在有限中发现原因和本质，

它要的是简单——是笑，是爱，

是与腋下的环扣温柔的游戏。

您要多少钱？”

“请问，您要它何用？”

“我从一开始就反复说——

力量、希望、恐惧、物由心生、

永恒、光芒、月圆月缺、

利刃、青春……把斧子卖给我吧。”

“我不明白。不过，您拿去吧。”

“看……它闪闪发光，如山岩间的火焰……

您要多少钱？”

“您随便给吧。”

“够了吗？”

“十……十五……嘿，偷到手了。

不过我觉得，问题不在钱上。

有什么东西在变……似乎



就要崩溃……果然如此……寒风
狠命地吹打着撕裂的灵魂。
您是谁？我的上帝呀，原来您戴着面具！
您的双眼——就像两颗黄色的星星！
真卑鄙！摘下来！”

马尔美拉多夫久久地保持着可怕的沉默。

“摘下来！”

马尔美拉多夫一下子摘掉面具，与面具连在一起的长衫也同时从他身上掉落下来，暴露出一个戴着胸罩、穿着花边裤子的女人，头上的银灰色假发拖着一条老鼠尾巴似的小辫子。

“上帝啊……老太婆……可我两手空空……”

拉斯柯尔尼科夫啜嚅着说完这句话后，从高高的厚底靴上扑通一声瘫倒在地。

接下来的一幕吓得我面无人色。两个小提琴手跑到台上，发狂地奏起一首茨冈曲子（又是勃洛克^①，我想道），而那个扮演马尔美拉多夫的女人则把自己的长衫扔到倒在地上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然后一个箭步扑过去，一面掐他的脖子，一面兴奋地晃动她那穿着花边衬裤的屁股。

^① 勃洛克曾出版过一本名为《竖琴与小提琴》的诗集。



有一阵子我觉得，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完全是个可怕的阴谋，并且所有在场的人都在盯着我。我困兽似的环顾一下四周，再次遇到那个留着小胡子、身穿黑色军便服的人的目光，不知怎么我突然领悟到，他对冯·埃尔年的死知根知底——说不定，他还了解我那些更为严重的事情。

这一刻，我几乎要从椅子上蹦起来夺路而逃，只不过强大的意志力迫使我呆在了原地。人群懒洋洋地鼓着掌；有的在笑，还时不时地指点一下舞台，可大多数都在忙于谈话和喝酒。

掐死拉斯柯尔尼科夫之后，戴假发的女人蹦跳着跑到舞台边上，在两把小提琴疯狂的伴奏下跳起舞来，还不时地把裸露的双腿抬向天花板，并不停地挥舞着斧头。自始至终站立不动的四个黑衣人抬起覆盖着长衫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把他送到后台。我忽然一闪念，觉得这是借鉴《哈姆雷特》的做法；那出戏的末尾似乎也有四名军官，抬着死去的王子离去；奇怪，但这一念头却使我回过神来。我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并非针对我的阴谋——这样的事情谁也来不及事先安排——这只不过是一种常见的、具有神秘意味的挑战而已。我当即决定接受挑战，随后把身子转向陷入沉思的两个水兵。

“小伙子们，够了。这是背叛。”

巴尔博林抬起迷惑不解的眼睛看着我。

“这个英国女人太放肆，”我信口说道。

这句话似乎对他非同小可，他马上从肩上扯下步枪。我制止了他：

“别这样，同志。等一会儿。”



这时那位拿长锯的先生又出现在舞台上，他往凳子上一坐，然后装腔作势地脱起鞋来。我打开手提包，掏出一枝铅笔和一张肃反委员会的逮捕证；在长锯悲切的伴奏和引导下，几分钟后我就写好了一首合适的诗。

“你在写什么？”热尔布诺夫问道。“要逮捕谁吗？”

“不是，”我说，“如果要抓，那就得全抓起来。我们要干别的事。热尔布诺夫，你还记得命令吗？我们不仅要制止他们，还要执行自己的路线，对吧？”

“是这样，”热尔布诺夫说道。

“那好，”我说，“你和巴尔博林到后台去。我马上就到台上去执行路线。至于怎样执行，到时候我一发信号，你们就出来。现在，我们要让他们听听革命音乐。”

热尔布诺夫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酒杯。

“不行，热尔布诺夫，”我坚决地说，“不然你就不能干活了。”

热尔布诺夫眼中闪过一丝像是委屈的神情。

“你说哪里话，”他嘟囔道。“不信任我？我……我为了革命情愿献出生命！”

“我知道，同志，”我说，“但可卡因还得等会儿。出发。”

两名水兵站起身，向舞台走去。他们叉开双腿，两脚稳稳地踩在地上，仿佛脚下不是地板，而是遭遇风暴的装甲舰倾斜的甲板；就在这一刻，我几乎对他们产生了好感。他们登上舞台旁边的台阶，消失在幕后。我把剩余的兑了可卡因的烧酒倒入口中，起身向托尔斯泰和勃留索夫的桌子走去。很多人在看我。先生们和同志们，我一面慢慢穿过大厅中奇怪地闪



向两旁的人群，一面想，今天本人也有幸从自己的老太婆身上跨过去，但你们休想用她那双想象出来的手掐死我。啊，让这咬住俄罗斯人不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结见鬼去吧！让那些在四周只能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结的俄罗斯人见鬼去吧！

“晚上好，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在休息呀？”

勃留索夫哆嗦一下，并端详了我一阵，显然没认出我来。过了一会儿，他疲惫的脸上才现出将信将疑的微笑。

“彼佳？”他问道。“是您吗？真高兴见到您。跟我们坐一会儿吧。”

我在桌旁坐下，并冷淡地跟托尔斯泰打了声招呼——尽管我和他在《阿波罗》杂志社经常见面，但彼此并不太熟。托尔斯泰醉得很厉害。

“您怎么样？”勃留索夫问道。“写什么新东西没有？”

“现在顾不上这个了，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我说。

“噢，”勃留索夫飞快地扫了一眼我的皮夹克和毛瑟枪，若有所思地说，“原来是这样。这就对了。我也是……可我竟然不知道，彼佳，您是‘我们的人’。我原来一直很赞赏您的诗，尤其是您的第一个集子，《列比亚德金上尉之诗》。当然，还有《‘我’王国之歌》。只是有点难以想象……您写的可都是些骏马呀，皇帝呀，还有中国呀什么的……”

“Conspiration^①，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我说，“尽管这个词很怪……”

“明白了，”勃留索夫说，“现在明白了。尽管我也一直，请

① 英语：秘密活动，密谋。



您相信,有类似的感觉。可您变了,彼佳。变得这么干练……双目炯炯有神……顺便问一下,您读了勃洛克的《十二个》没有?”

“见过,”我说。

“那么您认为如何?”

“我不太懂结尾处的象征意味,”我说,“为什么走在赤卫队员前面的是耶稣呢?难道勃洛克还想把革命钉在十字架上不成?”

“对,对,”勃留索夫赶紧说道,“刚才我和阿廖沙还在谈论这个问题呢。”

听到自己的名字,托尔斯泰睁开眼睛,举起酒杯,可杯子是空的。他从桌子上摸索到哨子,塞到嘴里,但还没有吹,脑袋便又一次耷拉下来。

“我听说,”我说道,“他修改了结尾。现在是一个水兵走在赤卫队员前面了。”

勃留索夫沉吟片刻,忽然眼睛一亮。

“对,”他说,“这样更好。更准确。而耶稣却走在后面!他无影无形,走在后面,背负着自己那歪斜的十字架,穿过暴风雪!”

“对,”我说,“并且是朝另一个方向。”

“您这样认为吗?”

“我确信无疑,”我说,同时估摸着,热尔布诺夫和巴尔博林大概已经在后台睡着了。“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我对您有一个请求。能否请您宣布一下,诗人法涅尔内伊将朗诵一首革命诗?”



“法涅尔内伊？”勃留索夫问道。

“我的党内笔名，”我解释说。

“好，好，”勃留索夫点着头，“真是寓意深刻！我本人也将洗耳恭听。”

“不过我劝您别听。您最好马上离开。这里一会儿要有枪战。”

勃留索夫脸色变得煞白，点了点头。此后我们就再也没说一句话；当长锯安静下来，燕尾服先生穿上皮鞋之后，勃留索夫站起身，登上舞台。

“今天，”他说道，“我们已经谈论过最新艺术了。现在，诗人法涅尔内伊将继续探讨这一话题。”他忍不住翻了一下白眼。“呃……请不要与纸老虎和锡纸兵混为一谈^①……呃……诗人法涅尔内伊，他将为大家朗诵革命诗歌。请！”

他迅速返回大厅，歉意地冲我微微一笑，无奈地摊开双手，然后扶起无力地反抗着的托尔斯泰，把他拖到门口；此时他活像一名退休教师，身后牵着一套着皮带的、蠢笨而又不肯听话的大猎犬。

我登上舞台。舞台边上正好有一只忘了拿走的天鹅绒面的凳子。我把穿着靴子的一只脚踩在凳子上，扫了一眼慢慢安静下来的大厅。我眼前所有的面孔仿佛都汇聚成了一张脸，一张媚态百出而又厚颜无耻的脸，一张俗不可耐而又自鸣得意的脸——毫无疑问，这是已经投胎转世的放高利贷的老

① 纸老虎和锡纸兵：儿童玩具。此处讽刺勃留索夫借“法涅尔内伊”所玩的文字游戏。



太婆的脸。舞台不远处坐着约翰·帕夫卢欣，披头散发，相貌丑陋，戴着眼罩；他旁边一个肥胖的女人正在嚼馅饼，花花绿绿的头发上绑了两个红色的大蝴蝶结——似乎她就是剧院政委马林诺夫斯卡娅女士。在这漫长的一瞬间，我多么憎恶所有这些人啊！

我从枪套里拔出毛瑟枪，把它举过头顶，清了清嗓子，然后就像自己往常习惯的那样，面无表情地望着前方，只在诗行间稍作停顿，一点儿也不拿腔作调，朗读了写在肃反委员会逮捕证上的那首诗：

革命军事十四行诗

战士同志们！我们无比悲痛。
法涅尔内伊同志被凶残地杀害了。
我们的肃反委员会
失去一位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
事情是这样的。审讯结束后，
在回家的路上，他停下来点烟，
这时，一个反革命军官
暗地里掏出手枪，瞄准了他。

同志们啊！毛瑟枪砰地一响，
子弹钻进法涅尔内伊同志的额头。
他还没来得及把手伸入怀中，
便身体一晃，眼睛一闭，轰然倒下！



战士同志们！让我们列队，齐声高唱，
并用革命的恐怖反击狗娘养的白匪！

读到这里，我朝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开了一枪，但没有打中。

然而紧跟着从我右侧传来一声枪响，吊灯随即炸裂开来，我看见自己身旁的热尔布诺夫正在拉枪栓。他单腿跪着，又朝台下开了几枪。台下的人大声叫喊着，纷纷卧倒，或躲藏到柱子后面。这时，巴尔博林也从后台出来了。他东倒西歪地走到舞台边上，尖叫着往台下扔了一颗炸弹。大厅里升起一团白色的火光，发出一声可怕的巨响，一张桌子被掀翻在地。在接下来的寂静中，不知是谁“啊”地惊叫了一声。出现了令人难堪的停顿；为了以什么方式结束这种停顿，我又向天花板开了几枪。这时，我突然又一次看到了那个身着黑色军便服的怪人，他不动声色地坐在自己的桌子旁，正从容地端着杯子喝酒，似乎还面带微笑。我感到自己很蠢。

热尔布诺夫又朝台下开了一枪。

“住手！”我喊道。

热尔布诺夫咕哝了一句“还轮不到你来指挥我”之类的话，但还是把步枪背到了肩上。

“我们走，”我说着转身向后台走去。

躲在幕后的一些人一见到我们，马上四散逃命。我和热尔布诺夫穿过昏暗的走廊，拐了几道弯，然后打开后门，到了外面，并又放了一通枪。我们朝汽车走去。离开烟雾弥漫的



憋闷的大厅，寒冷清新的空气反倒像是乙醚气体，使我头昏脑涨，恹恹欲睡。身上铺了一层厚雪的司机依旧纹丝不动地坐在汽车前排。我打开车门，扭过头来。

“巴尔博林呢？”我问道。

“马上就来，”热尔布诺夫嬉皮笑脸地说，“他在办一件事。”

我爬进汽车，仰头倒在座位上，转眼就睡着了。

一声女人的尖叫把我惊醒，我看到了正从小巷里出来的巴尔博林，手里抱着一个拼命挣扎的姑娘。她穿着花边裤子，拖着小辫子的假发歪到了一旁。

“挪一挪，同志，”热尔布诺夫一面往车里钻，一面对我说，“有补充人员。”

我往边上挪了一下。热尔布诺夫向我俯下身子，用出人意料的亲热口气说道：

“我起初还没明白你的意思，彼得卡^①。不了解你的性情。可你真棒。演说也相当好。”

我嘟哝了一句，又睡着了。

睡梦中我听到女人哇哇的大叫声、哧哧的刹车声，热尔布诺夫阴沉的骂娘声和巴尔博林嘴里发出的蛇一样的咝咝声——他们似乎在为这个不幸的姑娘争吵。后来汽车停了下来。我抬起头，看到热尔布诺夫那张模糊不清的和不真实的脸。

“睡吧，彼得卡，”这张脸孔大声说道，“我们在这儿下车。”

① “彼佳”的昵称。



我们跟老大有话要说。伊万会送你回去的。”

我瞥一眼窗外。我们位于特维尔街心花园的市长大楼附近。大雪缓慢地飞舞着。巴尔博林和那个浑身打颤的半裸女人已经到了街上。热尔布诺夫握了一下我的手，钻了出去。汽车又开起来。

我突然强烈地感到自己在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是那么孤独和无助，这个世界的居民总想把我送到豌豆街，或是用含混而诱人的话语来扰乱我的心。明天早上，我想，我得往自己的脑门开一枪。在我彻底坠入毫无知觉的黑暗深渊之前，我见到的最后的東西是覆盖着白雪的街心花园的栏杆——汽车转弯时，它近在咫尺，紧挨着窗户。



2

其实,栏杆并非紧挨着窗户,而是就在窗户上,更确切地说,是在气窗上。一缕阳光透过气窗,径直照在我的脸上。我想避开,却没有做到。当我企图用一只手撑地,翻过身来时,这才发现我的双手被捆绑着。我身上套着一件裹尸布一般的衬衫,两只长袖反绑在背后——似乎,这就是所谓的拘束衣。

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我并没有太多疑惑——显然是水兵从我的行为中发现了什么可疑之处,于是就趁我在汽车里睡着的时候,把我送到了肃反委员会。我蜷缩起身子,设法跪起来,然后坐到墙边上。我的牢房看起来很奇特——高高的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是一扇装有栏杆的气窗,把我唤醒的阳光就是从那儿射进来的。牢房的墙、门、地板和天花板都包着一层又厚又软的材料,这样,那种大仲马式的浪漫的自杀行为(“您再上前一步,大人,我就用头撞墙了”)就不可能发生了。看来,这种牢房是肃反人员专门为那些贵宾们安排的,应该承认,这还使我着实得意了一阵。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望着墙壁,回忆昨天那些惊心动魄的细节。这时,门开了。



门口站着热尔布诺夫和巴尔博林——可是，我的上帝啊，瞧他们那身打扮！他们都穿着白大褂，巴尔博林的口袋里还插着一副货真价实的听诊器。这实在让我难以接受，我不由得神经质地笑起来，可这笑由胸腔经过我那被可卡因灼伤的喉咙时，却变成了咳嗽。站在前面的巴尔博林回头向热尔布诺夫低声说了句什么。我突然止住笑声，因为我觉得，他们要揍我。

应当说明的是，我一点也不怕死；在我这种情况下，死亡是十分自然而又合情合理的事，跟离开一家上演劣等戏剧时突然失火的剧院没什么两样。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希望，送我走完最后旅程的是不太熟识的人的拳打脚踢——不难看出，在内心深处我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

“先生们，”我说，“我想你们也明白，用不了多久你们也会被打死。既然如此，出于对死亡的尊重——即便不是针对我，而哪怕是针对你们自己——我请求你们，下手痛快点，别让人太难堪。我反正对你们也说不出什么。你们看见了吧，我是单干的，并且……”

“这是干什么，”热尔布诺夫讥笑着打断我的话。“瞧你昨天在台上的表现，慷慨激昂。你读的诗多棒啊！自己还记得吗？”

他说话的腔调有点怪里怪气的，我估摸，肯定一大早就喝了不少波罗的海茶。

“我的记忆力很好，”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回答。

他的目光里没有任何表情。

“你还跟这个蠢货讲什么呀，”巴尔博林尖声说。“交给铁木雷奇去处理吧，他就靠这个拿钱呢。”



“那就走吧，”热尔布诺夫说着，走过来抓起我的胳膊。

“难道就不能松开我的手吗？”我问道。“你们可是两个人呀。”

“是吗？”热尔布诺夫问道。“要是你突然又来掐脖子呢？”

听到这句话，我仿佛挨了一记闷棍，身子晃了晃。他们全都知道了。我几乎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感觉，好像热尔布诺夫的话重重地压在我身上，让我透不过气来。

巴尔博林抓起我的另一只胳膊，他们很轻松地把我拉起来，拖进一条半明半暗、空空荡荡、确实有股医院味——也许是血腥味——的走廊。我没有反抗，几分钟后，他们把我拖进一间宽敞的屋子，让我坐在屋子中间的凳子上，随后便消失在门后。

我的正对面摆着一张大写字桌，上面堆着账本似的文件夹。桌子后面坐着一位文质彬彬的先生，穿着同热尔布诺夫和巴尔博林身上一模一样的白大褂。他用肩膀和耳根夹住黑色的胶木听筒，正在全神贯注地听电话。他的双手机械地翻着一叠纸，还时不时地点点头，但什么也没说。他对我丝毫没有在意。还有一个人，穿着白大褂和饰有红色镶条的绿裤子，靠墙坐在两扇高高的、挂着沾满灰尘的窗帘的窗户之间。

这间屋子里透出一股捉摸不定的气氛，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九一六年的总参谋部，当时我经常到那里去，在爱国主义的新闻事业里检验自己的身手。只不过穿白大褂的先生头顶上方挂的画像不是沙皇（或者哪怕是那位已经偷走半个欧洲的珊瑚石的卡尔），而是一个极为可怕的东西，吓得我不由自主地咬住了嘴唇。



这是一大块硬纸板，上面的一幅招贴画纯粹是用俄罗斯国旗的三种颜色绘成的。画面上有一个蓝色的人，长着一张寻常俄罗斯人的脸，胸膛被剖开，头顶盖被锯掉，颅腔里露出通红的脑髓。尽管他的内脏从肚子里取了出来，并用罗马数字编了号，但他的眼里却流露出毫不在乎的神色，而脸上凝结着平静的似笑非笑的表情——或许是由于他面颊上有一个巨大的切口，里面露出了部分颌骨和完美无缺的牙齿，这幅画给人的感觉又像是一张德国牙粉广告。

“就这样吧，”穿白大褂的先生嘟哝道，放下听筒。

“请原谅，”我把目光转到他身上，说。

“我原谅您，原谅您，”他说道。“根据与您打交道的些许经验，我要提醒您，我的名字是铁木尔·铁木罗维奇。”

“我叫彼得。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无法和您握手。”

“这用不着。唉，彼得啊，彼得。您怎么搞到这种地步？”

他用友善、甚至有些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他下巴上的山羊胡子使他看上去就像一名地方的理想主义者，不过我对肃反人员的做派相当了解，心里对他们毫无信任可言。

“我并没有搞到什么特别地步，”我说。“您要是硬要这样问的话，那我也只能说，我是跟别人一起搞到这种地步的。”

“到底跟什么人呢？”

我想，这是开始了。

“您显然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地址和接头暗号之类的，我说的对吧？但请您相信，我没有任何可以让您高兴的东西。从童年起，我的整个经历无非就是怎样从人们身边逃走，而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别人’应该分门别类，您听明白了吗？”



“当然，”他说，在纸上做着记录。“毫无疑问。但您的话自相矛盾。刚才您说，您是跟别人一起搞到这种地步的，后来您又说您在逃避别人。”

“得了吧，”我回答说，冒着失去平衡的危险跷起二郎腿，“矛盾只是表面的。我逃离人群的愿望越强烈，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不妨告诉您，其中的原因我也是不久前才弄明白的，当时我从以撒大教堂旁边经过，无意中瞥了一眼教堂的圆顶——您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夜幕、寒霜、星斗……是的……于是我明白了。”

“原因在哪儿？”

“原因在这儿。如果你企图逃避别人，你就会一辈子身不由己，走他们那条摇摆不定的路。即便你自以为是在继续逃避他们。对于逃跑来说，第一要紧的并非逃往何处，而是逃离何处。因此，眼前必须经常有一座自己的监狱。”

“对，”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说道，“对。一想到还要在您身上费多少心思，我就害怕。”

我耸耸肩，抬眼打量他头上的招贴画。显然这并非一个绝妙的隐喻，而是医学教具。可能是解剖图的一部分。

“您要知道，”铁木尔·铁木罗维奇接着说道，“我可是个有经验的人。很多人都从我手里经过。”

“哦，这我不怀疑，”我说。

“那么实话告诉您吧。我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表面的诊断，毋宁说是使人脱离自己正常的社会心理位置的内在原因。就您的情况来讲，我认为，是显而易见的。您只不过是愿接受新事物而已。您还记得自己多大岁数吗？”



“当然记得。二十六岁。”

“这就对了。您正好属于这样一代人，你们本该生活在一种社会文化模式中，结果却生活在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模式中。您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那还用说，”我回答道。

“于是便产生了严重的内心冲突。不过您可以聊以自慰的是，碰上这种情况的不只您一人。就连我自己也有类似问题。”

“这怎么会呢？”我略带揶揄地问道。“那您又是怎样解决冲突的呢？”

“我的事以后再谈，”他说，“我们先把您的问题搞清楚。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种潜意识的冲突目前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我只是想让您意识到它的本质而已。您知道吗，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能反映在我们的意识里，并成为我们思维的对象。当现实世界中某些业已成形的联系遭到破坏时，相同的事情也会在心理层面上发生。这时，在您的那个‘我’的封闭范围内，会释放出巨大的心理能量。这就像一次小规模的原子弹爆炸。但问题的关键是，爆炸之后这股能量会通过何种渠道释放出去。”

谈话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那么请问，通常都有哪些渠道呢？”

“嗯，大致说来，有两种。心理能量可以，这样说吧，向外运动，进入外部世界，奔向这样一些东西，嗯，比如说……皮夹克啦，豪华轿车啦，等等。许多像您这种年龄的人……”

我想起冯·埃尔年，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我明白了，别往下说了。”

“很好。第二种情况是，由于种种原因，这股能量滞留在了体内。这是最不利的一种局面。您可以设想一头关在博物馆里的公牛……”

“非常形象的比喻。”

“谢谢。这么说吧，这个博物馆连同它那些易碎的、可能还很珍贵的陈列品就是您的人格，您的内心世界。而那头在里面横冲直撞的公牛就是释放出来的、您无法控制的心理能量。这就是您来这里的原因。”

他肯定很聪明，我想。但却是个下流坯。

“我不妨再给您多讲几句，”铁木尔·铁木罗维奇接着说道。“我经常想，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开始新生活——我们姑且将他们称为新俄罗斯人^①，尽管我不太喜欢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的确很可恶。也名不符实。要是借用车尔尼雪夫斯基^②的说法，似乎应该叫做新人。”

“有可能。但问题还是摆在那儿——为什么一部分人极力奔向，这样说吧，新生事物，而另一部分人却仍在探寻与消亡世界的影子并不存在的联系……”

“真令人叫绝。简直是巴尔蒙特^③。”

① 苏联解体后，一些暴发户和新贵被称为“新俄罗斯人”。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家，文艺批评家，作家。其长篇小说《怎么办？》中塑造了拉赫梅托夫等一批从事革命斗争的“新人”形象。

③ 巴尔蒙特(1867—1942)，早期俄国象征主义代表之一，其诗作中反映出他向往投身未来的思想。



“再次表示感谢。问题的答案,我认为,非常简单。我甚至担心,您会觉得这过于粗浅。让我们绕个小小的弯子吧。在人、国家、文化等等的生活中,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有时候这些变化在时间中被拉长,因而并不引人注目,有时候却表现出非常激烈的形式——比如现在。正是对待这些变化的态度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差别。例如中国,这个令您疯狂的……”

“您这是从哪儿探听到的?”我问,不由得握紧被反绑在袖子里的两只拳头。

“这是您的卷宗,”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说,从桌上举起最厚的那本文件夹。“我正好翻了一下。”

他把文件夹扔到身后。

“对,中国。只要回想一下,您就会发现,他们对世界的全部理解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世界在不停地退化,在从某个黄金时代逐步走向黑暗和萧条。对于他们而言,理想社会的绝对标准是在过去,而且任何革新都是罪恶,因为这会导致更加远离这一标准。”

“对不起,”我说,“可这本来就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特性。这甚至在语言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在英语中,我们就被称作 *descendants of the past*^①。而 *descend* 这个词就表示向下的运动,而不是上升。我们不是 *ascendants*^②。”

① 英语:过去的后代,历史的后代。*Descendants* 意为后代,后裔。该词派生于 *descend*(下来,下落)。

② 英语:祖先。该词系 *ascend*(攀登,登上)所派生。



“也许吧，”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说。“外语里面我只懂拉丁语。但这里重要的是另外的东西。当这类意识体现在个人身上时，他就开始把自己的童年时代理解为某个失去的天堂。就拿纳博科夫^①来说吧。他那种对儿时生活永无止境的追忆就是我的观点的一个典型例证。另外他还是一个恢复健康并将意识转向现实世界的典型例证——我管这叫反升华，他巧妙地实现了这种反升华，将自己对可望不可即的、也许从来就不存在的天堂的渴念转化为简单的、尘世的、夹带着几分罪恶的对小女孩的嗜好^②。尽管初看……”

“对不起，您指的是哪个纳博科夫？”我插嘴道。“是那位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吗？”

铁木尔·铁木罗维奇做出一副很有耐心的样子，微微一笑。

“不，”他说，“我是指他的儿子。”

“您说的是捷尼舍夫中学的沃夫卡^③？怎么，您把他也抓来了？可他在克里米亚啊！这里跟小姑娘有何关系？您胡扯些什么呀？”

“好吧，在克里米亚，”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说道，“在克里

①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俄裔美国作家。其父亲曾为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之一。十月革命后与家人一起迁往克里米亚，既而先后居住于德、法、美等国家。他曾写过一部讲述自己童年的名作《彼岸》，倾心于婴儿时期的人间天堂。

② 1955年，纳博科夫发表了自己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洛丽塔》，小说描写一个中年男子迷恋上一位十二岁的少女，引起广泛的争议。

③ “弗拉基米尔”的小称。



米亚。我们不是在讲克里米亚,而是在讲中国。我们这里说的是,就正统的中国精神而言,任何前进都是倒退。不过还有另外一条路,也就是欧洲自始至终走的那条路,无论您对他们的语言有什么看法。多少年来,俄罗斯一直企图走上这条路,一再想要与西方实现那不幸的、炼金术^①式的联姻。”

“精彩。”

“谢谢。在这里,理想被认为不是停留在过去,而是潜存于未来。这立刻使存在变得有意义。您明白吗?这是关于发展、关于进步、关于从不完善走向完善的思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个人身上,即便这种个体的进步是以极其细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比如说,装修一下房屋或者更换一辆汽车。这为我们生活下去提供了可能性。而您呢,却不肯为这个‘生活下去’付账。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头用作比喻的公牛,之所以在您的心里横冲直撞,一路上摧毁一切,就是因为您不愿向现实屈服。您不想放出公牛,给它自由。您鄙视时代要求我们采取的姿态。这正是您的悲剧的原因所在。”

“您所说的这一切当然很有趣,但过于紊乱,”我说,瞟了一眼墙边的军人。“还有,我的两只手都麻了。至于说到进步,我可以简要地给您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请吧。”

“非常简单。说了半天,您无非一个意思,就是有些人能够比其他人更快地适应各种转变,如此而已。可要是有人问

^① 欧洲中世纪的一种迷信法术,据说能炼出点石成金、治疗百病的“哲人石”。



您,这些转变究竟为什么要发生呢?”

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耸耸肩。

“那么我告诉您吧。我希望您不会反对这样的说法:一个人越狡猾,越无耻,他就活得越轻松。”

“我不反对。”

“而他之所以能活得更轻松,正是因为他能更快地适应各种转变。”

“就算是吧。”

“那好,可有人居然无耻和狡猾到了那样的程度,仁慈的先生,事先能预料到会发生转变,从而适应起来也就比别人快得多。更有甚者,早在转变发生之前,那些嗅觉极其灵敏的无耻之徒就已经适应了。”

“那又怎样呢?”

“而世界上所有转变的发生之所以全都仰仗这帮嗅觉极其灵敏的无耻之徒,是因为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构建未来,他们总是朝他们认为会有风吹来的那个地方爬。结果对于风来说,除了确实要从那个地方吹,无任何其他事情可做。”

“这是为什么?”

“那还用说!我不是给您解释了吗,我这里讲的是那些极其卑鄙、极善钻营、极不要脸的无耻之徒。难道您会认为,他们没有办法让所有其余的人都相信,风正是从他们爬过去的那个地方吹来的吗?更何况这里所谈到的风,只是打个比方而已……不过我讲得太多了。说实话,我本来打算守口如瓶的,直到把我枪毙。”



墙边的那个军人干咳了一声，意味深长地看了铁木尔·铁木罗维奇一眼。

“我还没给您介绍，”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说。“这位是斯米尔诺夫上校，军队的精神病专家。他到这儿来是为别的事，但对您的情况也很感兴趣。”

“非常荣幸，上校，”我说，做了个类似于鞠躬的动作。

铁木尔·铁木罗维奇把身子俯向电话，在一个键上按了一下。

“索涅奇卡，跟平常一样，四西西，”他对着话筒说道。“直接到我这里来，趁他还穿着拘束衣。对，然后马上去病房。”

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转过身来，难过地叹口气，理了理胡子。

“我们暂时还不得不继续使用药物治疗，”他说。“实话跟您讲吧，我把这看成是自己的失败——尽管无伤大体，但终究是失败。我认为，一个好的精神病医生应该避免使用药物，因为药物……该怎么向您解释呢……就像美容品，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隐藏问题，不让别人发现。但对您的情况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您本人应该配合我。因为要想挽救一个落水的人，只把手伸给他是不够的，还需要他也伸出手来回应。”

背后的门开了，我听到轻微的脚步声。一个女人用柔软的手指抓住我的肩膀，接着我便感到，凉飕飕的针头穿透拘束衣，刺入我的皮肤。

“对了，”铁木尔·铁木罗维奇怕冷似的搓着手说，“我想告诉您，按疯人院的说法，枪毙并不是指我们现在给您注射的东西——冬眠灵和柏飞丁的普通混合剂，而是所谓的磺胺嘧啶



十字架^①，也就是说注射四针，往……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我没有回头去看给我打针的女人，而是望着招贴画上那个被肢解了的蓝、红、白三色人，正当他也看起我来，冲我微笑和使眼色时，不知从什么地方远远地传来了铁木尔·铁木罗维奇的声音：

“对，直接到病房。不，他不会捣乱。终归还是有点作用的……他很快自己就会坐到这把椅子上。”

不知是谁的手（好像又是热尔布诺夫和巴尔博林）扯下我身上的衬衣，抓起我的两只胳膊，像搬沙袋一样把我搬到一个类似担架的东西上。接着，门框在我眼前一晃，我们便到了走廊。

我麻木的身体在移动，一扇扇挂着号牌的又高又白的门在旁边掠过，后面传来两个改换了服装的水兵失真的说笑声，他们似乎在毫无忌惮地谈论女人。过了一会儿，我看到铁木尔·铁木罗维奇的脸凑了过来——原来，他就在旁边。

“您，彼得，当然不是普希金，不过我们还是决定把您送回第三厅，”他满意地笑着说。“那里现在还有四个人，加上您就有五个了。您知道康纳什尼科夫教授——就是我——的集体疗法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我吃力地嗫嚅道。

不停地在眼前晃来晃去的门让我实在难以忍受，我索性闭上眼睛。

① 在患者的背部上下左右各注射一针磺胺嘧啶。这种疗法令患者极为痛苦。



“简单说来,这是指几名患者为了恢复健康而合力采取的行动。您可以设想一下,您的问题会暂时成为大家的问题,也就是说,每个参与治疗的人在一段时间内都与您处于相同的状态。进一步说,就是等同于您。您认为,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我没有做声。

“非常简单,”铁木尔·铁木罗维奇接着说道。“一场治疗结束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宣泄效应——参与者共同走出刚才还被他们当作现实来体验的那种状态。这可以说是利用了人类喜好群居的特性来达到医疗目的。那些与您共同参与治疗的人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充分体验到您的思想和心态,而治疗一旦结束,他们又会回到自己的迷狂状态中,留下您孤身一人。这时,假如能使致病心理因素成功地宣泄到外部,患者就会感觉到,自己先前的那些观念相对于此刻来说是病态的,从而也就不会再把自已与其他患者等同起来。这样的话,距离康复也就近在咫尺了。”

我很难领会他话里的意思——假如还有“意思”的话。不过还是有点什么东西留在了我的脑海里。针药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我已经看不见周围的任何东西了,我的身体实际上已失去知觉,而内心却陷入了一种迟钝、麻木而又漠然的状态。最糟糕的是,仿佛这种状态控制的不是我,而是注入我体内的针药使我变成的另外一个人。而这另外一个人,我惶恐不安地感觉到,的确是可以治愈的。

“当然可以,”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肯定地说道。“我们会治愈的,您不必怀疑。总而言之,您只要抛开‘精神病院’这一



想法,把这件事仅仅当作一次有趣的历险就行了。更何况您还是文学家。我时不时地听到按捺不住写作冲动这类说法。比如说现在。您的病房里将会发生极为有趣的事情——这便是与马利亚一起进行的集体治疗。您还记得我讲的这个人是谁吗?”

我否定地摇了摇头。

“噢,当然,当然,”他说。“不过这件事还是很有趣。我敢说,这简直就是一场莎士比亚式的心理剧。乍一看,是诸如墨西哥肥皂剧、好莱坞大片和脆弱的俄罗斯民主这类意识对象的碰撞。您知道《就叫马利亚》这部墨西哥电视连续剧吗?也不记得了?好吧。简单地说,就是表演者把自己当作女主人公,当作这位马利亚本人。假如表演者不是下意识地把自己等同于俄罗斯,不是把自己想象成处在肛门期^①的阿伽门农^②的话,那么这次表演就会平庸至极。简而言之,我的专业就是研究伪人格的二重分裂。”

哦,天哪,我想道,他们的走廊真长啊!

“当然,您将无法真正参与这场治疗,”铁木尔·铁木罗维奇继续说道,“因此您可以睡觉。但不要忘了,很快您就得为

① 肛门期:弗洛伊德(1856—1939)关于人类和个人发展的理论分析阶段。按照这种泛性论,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阶段都可以比照五岁前的婴儿性欲发展的三个发展阶段:口腔期、肛门期和阴茎期。

② 阿伽门农: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三部曲《俄瑞斯忒亚》的第一部《阿伽门农》的主人公,他出兵特洛伊之前杀女献祭,返乡后被妻子所杀。精神病患者马利亚(同时也指俄罗斯)本为男人,在下文的潜意识流露中,却希望自己作为女人与强大的施瓦辛格联姻,从肛门获取快感,结果只能是一场悲剧。此处讽刺俄罗斯一照情愿地向西方靠拢。



自己充当叙述者。”

我们似乎进了一个房间——门吱地响了一下，我听到，房间里的谈话声停了下来。铁木尔·铁木罗维奇冲暗处打了声招呼，便有几个人一齐回答。这时，我被搬到了一张看不见的床上，有人往我头底下塞了个枕头，在我身上搭了床被子。我仔细倾听了一阵传过来的谈话（铁木尔·铁木罗维奇在跟某些人解释，为什么这么久才把我送来），随后便彻底脱离了身边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具有个人性质的幻觉。

我不知道，我跟良心在一起度过了多长时间——铁木尔·铁木罗维奇那单调乏味的噪音引起了我的注意。

“仔细看着这个小球，马利亚。您现在非常平静。假如您觉得口干舌燥，这是注射进您体内的药物的正常反应，很快就会过去的。您听得见我说话吗？”

“听得见，”一个声音回答。我觉得这与其说是女低音，不如说是男高音。

“您是谁？”

“马利亚，”这个声音回答。

“您姓什么？”

“就叫马利亚。”

“您多大年龄？”

“别人说我十八岁，”这个声音回答。

“您知道您在哪儿吗？”

“知道。在医院。”

“您因为什么到这儿来的？”



“撞的呗，还会因为什么？我都没搞清，自己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我想也没想到，他会是那样的人。”

“您撞上什么了？”

“奥斯坦基诺电视塔^①。”

“原来是这样。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言难尽。”

“没关系，”铁木尔·铁木罗维奇亲切地说，“我们不着急。您讲吧，我们听听。事情是从哪里开始的？”

“从我到滨河街散步开始的。”

“而此前您在哪里呢？”

“此前我哪里也不在。”

“好，继续往下讲。”

“就是嘛。我走着，就这样走着——可周围不知怎么起了烟雾。我越往前走，烟雾越浓……”

我突然发现，我越是往下听，传到我耳朵里的话语的意思就越是难以理解。给人的感觉是，这意思是用绳子系在话语上的，且绳子变得越来越长。我跟不上他们的谈话，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此时我的眼前似乎浮现出一幅摇曳的画面——烟雾笼罩的滨河街上走着一个女人，她肌肉发达，肩宽体阔，看起来更像是男扮女装。我知道，她就叫马利亚，我能看见她，同时也能用她的眼睛看世界。于是我明白了，我在以某种方式领会她所有的思想和感情：她在想，不管愿意不愿意，散步看来得告吹了，因为她刚来到这个苦难世界时还是阳光明媚

^① 俄罗斯最高的电视发射塔。



的早晨，一转眼竟变成了这样。并且，这件事发生得那么平稳，以致她甚至没有发现，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起先空气中散发出一股焦糊味，马利亚猜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在焚烧树叶。后来空气中又混入一股烧橡胶的臭味，再后来又朝她飘来一团团雾一样的烟，这烟越来越浓，几乎笼罩了周围的一切，除了河边的铁栏杆和周围几米远的地方。

很快马利亚开始觉得，她正走在美术馆长长的展厅里——笼罩着世界的浓烟下，渐次展现出周围世界的片断景象，这些景象显得平庸而又陈腐，很像当前的艺术所描绘的那些东西。迎面不时浮现出写着“兑换货币”字样的小牌子和被铅笔刀刻得面目全非的长凳，还有不计其数的易拉罐，这说明，新一代的人大多数还是选择啤酒。

一些躁动不安、手拿冲锋枪的人在浓烟中时出时没。他们装作没有看见马利亚，马利亚同样也不理睬他们。就算没有他们，记着她和想着她的人也够多的。有多少，几百万？几千万？马利亚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但她可以肯定，假如这些命中注定要惦记着她的人的心脏一齐跳动的话，那么汇聚在一起的轰响就会大大超过河对岸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马利亚眯缝起明亮的双眼，环顾四周，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远处某个地方——浓烟遮挡着，看不清究竟是什么地方——不时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并且每响一次，紧接着就会有一阵狗叫和众人的喧闹，就像体育场里足球比赛时进了球一样。马利亚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也许，河对岸正在拍电影，



也许,那些新俄罗斯人正在比试,他们当中谁最新。赶快把一切都分掉算了,她叹口气想道,否则不知还会有多少漂亮的年轻人惨死在街头呢。

马利亚开始考虑,如何为那些在遮天蔽日的浓烟中无端地痛苦抽搐的人们减轻这难以承受的生活负担。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些鲜明而又简单的形象——看她,身穿朴素的连衣裙,正走进一个普通的人家,主人们为了迎接她的到来,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再看这些主人——他们坐在放着茶炊的餐桌旁,正含情脉脉地望着她。她知道,此时什么也不用说,只需在他们对面坐下,亲切地看着他们就行了,尽可能不去注意那噼啪作响的炉膛。或是另一种情景:一间医院的病房,一些缠着绷带的病人,躺在简陋的病床上,还有她的画像,挂在墙上一个大家都能看得见的地方,人们从病床上望着她,暂时忘记了自己的不幸和痛苦……

这一切是那么美好,但她朦胧地意识到,这还不够。不,这个世界需要力量,需要严酷和顽强的力量,必要时能够抵抗邪恶。可是从哪儿能获得这力量呢?它又应是什么样的呢?马利亚不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但她感觉到,她正是为此才走在这流淌着苦难的城市中,走在这河边上。

吹来一阵风,暂时驱散了包围着她的浓烟。一束阳光照在马利亚身上。她伸手挡住阳光,突然明白了该从何处寻找答案——不用说,答案就在那些不可胜数的心灵和头脑之中,正是它们呼唤她来到这里,迫使她在这烟雾笼罩的河边现身。它们仿佛汇成了一片通过千百万双眼睛盯着电视屏幕的意识的海洋,且这整个意识的海洋她一览无余。她凝望着这片海



洋,起初并没发现什么有助于她的东西。不,毫无疑问,在这片意识的海洋里,显示出一种战无不胜的力量,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形成一个共同的形象:一个年轻人,脑袋不大,肩膀很宽,穿着双排扣的深红色西服,叉开双腿,站在一辆长长的、低矮而敦实的汽车旁边。这辆汽车的轮廓很模糊,像是在空气中涂抹出来的,因为马利亚见过其灵魂的那些人对那个位置上的车型见解大相径庭。年轻人的脸也是这样——朦朦胧胧,只有发型稍微清晰一些,略微鬈曲的栗色头发剪成了板寸头。不过西装倒是相当清楚,只要稍微使点劲,甚至可以看清金黄色纽扣上的字。但马利亚没有这么做。要知道,扣子上写的是什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如何把这一战无不胜的力量同她那温柔的爱结合起来。

马利亚停下来,靠在铁栅栏之间的一根花岗岩柱子上。需要重新在信任她的这些头脑和心灵中寻找答案,但这次马利亚一清二楚,那些居中的想法却不适用。要是……

“要是有一个聪明的娘儿们就好了,”她想道。

这个聪明的娘儿们几乎马上就出现了。马利亚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是谁,甚至长什么样——只是眼前在瞬间闪过一些高高的书柜,一张堆满了纸张和放着一台打字机的桌子,还有一张挂在桌子上方的照片,照片上的人蓄着鬈曲而骇人的小胡子,目光阴森可怖——所有这些都是抖动的,扭曲的,而且还是黑白的,仿佛这是马利亚趴在一台放在屋角而非中间的旧电视后面,通过只有烟盒大小的屏幕看到的。但眼前的形象消失得太快了,马利亚还没来得及对之作出考虑,它们就被随后而来的思绪取代了。



马利亚对展现在她面前的概念的激流几乎毫不明白；况且这股激流散发着一股霉腐的气味，还阴森森的，就像地下室里破旧的屏风倒地时扇起的灰尘一样。马利亚断定，她碰到的是早已成为垃圾且不完全正常的意识，因此，当一切都结束时，她感到了极大的轻松。她捕捉到的一些并不完全明白的词语留在了她灵魂的玫瑰色虚空中。这些词语是：“美妇人”（很清楚这里讲的是谁），“陌生女郎”（同样清楚），接着是“未婚夫”（不知为何要大写），然后是“客人”（也是大写），往下是一个不明不白的词组“炼金术式的联姻”，再往下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休憩徒然，我叩门环”。思绪到这里断了，此后再次闪现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怒目而视，长长的唇髭下垂着，更像是直接从鼻孔里长出的胡须。

她惶恐地四面张望了一下。周围还像原来一样，主要是烟。马利亚想，附近什么地方可能有扇大门，应该去敲一下，于是便怯生生地往烟雾中迈了几步。黑暗从四面八方一下子笼罩住她，她害怕了，赶紧退回河边，那儿毕竟还有点光亮。

“就算我去敲了，”她想，“难道会有人开门吗？”

后面传来汽车马达的咕噜声。马利亚靠在河边的栏杆上，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看烟雾中会出现什么。过了一会儿，一辆长长的、饰着彩带的黑色“海鸥”轿车从她身旁缓缓驶过。她明白，这是一辆婚礼专车。车上坐满了人，个个神情专注，沉默不语；车窗里伸出几支冲锋枪的枪管，而车顶上两枚闪闪发光的黄色戒指，一大一小。

马利亚目送“海鸥”离去，然后用手掌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毫无疑问，她明白了。正是这样。两个连在一起的戒指、



未婚夫、客人、赞助商。炼金术式的联姻——说实话，她并不清楚什么叫“炼金术式的”，不过她有个好律师，一旦需要，可以找他。马利亚摇了摇头，会心地笑了。这么长时间，她竟然对极其简单、极其重要的东西视而不见！她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她环顾一下四周，大致确定好方向，朝西伸出双手（不知为何她知道，未婚夫会从那个方向出来）。

“来吧！”马利亚低声祈祷。她立刻感觉到，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新人。

现在就只剩下等待会面了。她向前跑去，同时兴奋地感到，她和未婚夫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短。她知道，他正沿着河边向她走来，只不过与她不同，他并不着急，因为着急不符合他的性格。

浓烟中突然出现一个敞开盖子的窰井，马利亚奇迹般地跨了过去。她放慢脚步，开始急切地挨个搜索自己的衣服口袋。她想起来了，她既没带小镜子，也没带化妆盒。一时间，她内心充满了沮丧，她甚至开始回想，这一路上是否碰见过水洼，可以让她权当镜子照一下自己。但沮丧来得快，去得也快——马利亚想起来了，她愿意以什么模样出现在未婚夫面前都可以。

她沉思了一会儿。她决心让他见到一个真正的妙龄少女，两条褐色的小辫子，一张生雀斑的脸，还有……还有……得打扮一下，看上去要显得可爱，显得幼稚——戴副耳环？戴顶棒球帽？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最后时刻，马利亚决定戴上一副鲜艳的玫瑰色耳机，这似乎可以使她继续保持面颊上的



红晕。然后，她抬起眼睛，向前方张望。

在前方，在零碎的烟雾中，有个金属的东西闪了一下，转眼就不见了。随后又在稍近的地方出现，又在黑暗中消失。突然吹来一阵风，把烟雾赶到了一旁，马利亚看见一个高大魁梧的、闪闪发光的人缓缓地向她走来。同时她还发现——或者这只是她的感觉——这个身影每走一步，大地都要轻微地颤动一下。金属人的个子比她高出许多，冷漠而又英俊的脸上毫无表情。马利亚害怕起来，开始往后退。她还记得，自己身后某个地方有一个敞开盖子的窨井，但她已经无法把目光从这个金属躯干上移开，它一步步地向她逼近，就像一艘巨大的破冰船的船头压向冰块。

就在她准备大声叫喊的一刹那，金属人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形。先是两条闪光的大腿套上了在家里才穿的条纹短裤，然后上身套上一件白背心，接着身上长出了晒得黝黑的人的皮肤，转眼间又穿上了亮黄色的西裤、衬衣、条纹领带和钉着金黄色双排纽扣、潇洒俊逸的深红色西服。直到这时马利亚才安下心来。但深红色西服并没有让马利亚赏心悦目多久——随后出现的一件灰色长风衣罩住了它。客人的脚上出现了黑色的皮鞋，而脸上则是一副照得出人影的墨镜，头发也凝结成了浅褐色的板寸头发型。马利亚兴奋得简直要窒息，她认出未婚夫就是阿诺德·施瓦辛格^①，不可能是别人，这一点她马上就明白了。

① 阿诺德·施瓦辛格：美国演员，动作明星，曾在科幻片《未来战士》（亦译作《终结者》）中饰演机器人。



他站在她面前，透过墨镜的方形镜片默默地看着她；他的嘴唇上浮起一丝隐约的微笑。马利亚从他的墨镜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像，于是正了正耳机。

“啊，圣母马利亚，”施瓦辛格低声说道。

他说话时面无表情，声音雄浑而又悦耳。

“不，亲爱的，”马利亚说，神秘地微笑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就叫马利亚。”

“就叫马利亚，”施瓦辛格重复了一遍。

“是的，”马利亚说。“你就是阿诺德吧？”

“Sure^①，”施瓦辛格说道。

马利亚张开嘴，想要说点什么，可突然发觉无话可说。施瓦辛格还是那样默默地看着她，面带微笑。马利亚垂下眼睛，红了脸，这时施瓦辛格以一个温柔而又有力得无法抗拒的动作把她的身子扭过来，拉起她就走。马利亚抬眼看着他，脸上露出她那特有的愚蠢而又神秘的微笑。施瓦辛格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马利亚被压得差点蹲下，她的脑子里立即浮现出一幅意想不到的画面——在星期六义务劳动中扛着原木的列宁。画面中列宁的肩上只能见到原木的一端，于是马利亚想，也许，这实际上并非原木，而是某个强大人物的手，对于这个人物列宁也只能带着无助的微笑斜视着，就像现在她斜视着施瓦辛格一样。随即马利亚又意识到，她的这些想法不合时宜，便把它们统统从头脑中赶了出去。

施瓦辛格向她转过脸。

① 英语：是的，确定。



“你的眼睛，”他声音单调地说，“就像艾瓦佐夫斯基^①的画。”

马利亚吃惊地哆嗦了一下。她没有想到他会这么说，看得出，施瓦辛格也马上明白了这一点。接着便发生了一件怪事，或许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只是马利亚的幻觉而已：施瓦辛格的墨镜上隐约现出一些红色的字母，仿佛电子显示屏上移动的字幕，同时他的脑袋里也有什么东西开始吱吱地叫起来，仿佛里面装了一张电脑硬盘。马利亚惊恐地急忙闪开，但马上就想起来了，施瓦辛格和她一样，也只是一个虚拟的生物体，是由此时此刻正在想着他的无数的俄罗斯意识编织而成的，而人们关于他的想法可能也千差万别。

施瓦辛格把空着的一只手举到自己面前，在空中动了动指头，似乎在搜寻合适的字句。

“不，”他最终说道，“你这不是眼睛，而是两颗珍珠！”

马利亚依偎着他，信任地仰起头，望了他一眼。施瓦辛格低下头，下巴贴紧脖子，好像不想让马利亚看到镜片后面他的眼睛。

“这里有很多烟，”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河边上走？”

“不知道，”马利亚回答。

施瓦辛格拐了一个弯，领着她离开栏杆，径直钻进烟雾。走了几步之后，马利亚害怕起来，因为烟雾变得极其浓密，以

^① 伊·艾瓦佐夫斯基(1817—1900)，俄罗斯画家，善画大海，表达人与狂风恶浪作斗争的英勇精神。代表作有《惊涛骇浪》、《黑海》、《在波浪中间》等。



致什么都看不见,甚至看不见施瓦辛格,能看清的只有他那只抱住她肩头的手。

“哪儿来的这么多烟雾呀?”马利亚问道。“好像并没有什么东西着火嘛。”

“是 CNN^①,”施瓦辛格回答道。

“什么,他们在烧什么东西吗?”

“不,”施瓦辛格说,“他们在播放节目。”

嗯,马利亚明白了,大概所有那些想着她和施瓦辛格的人此时都在收看 CNN,而 CNN 却在播放烟雾。可也播得太久了点儿吧。

“不要紧,”看不见身影的施瓦辛格说。“很快就会消散的。”

可是烟雾怎么也不见消散,而他们离河边倒是越来越远了。马利亚突然意识到,也许,已经跟她走了好几分钟的不是施瓦辛格,而是另外某个人,也可能就是那个在星期六义务劳动时拥抱过列宁的人,这一想法把她吓坏了,她机械地正了正耳机,打开了音乐。音乐很奇怪,断断续续的,时而是吉他和小号奏出的甜蜜的爱情乐曲,时而是电子乐器狼嚎般的长叫。不过,这总比远处那些爆炸声和嘈杂的人声要好听一些。

突然,烟雾中冲出一个人影,直奔马利亚,与她撞了个满怀。马利亚大叫一声,发现自己面前站着一个人,身穿迷彩服、手拿冲锋枪的人。这个人抬眼看着马利亚,还没等张开口,施瓦辛格抱住马利亚肩头的那只大手便抓住这个人的脑袋,使劲

① 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的简称。



一拧，然后又把变得软绵绵的身体扔出视野之外。他的手又回到了马利亚的肩头，马利亚紧紧地依偎着他那钢筋铁骨般的躯干。

“唉，男人啊，男人，”马利亚低声咕哝道。

烟雾略微散开了些。马利亚重新看到了施瓦辛格的脸，随后又看到了他高大的、如剪彩前的纪念碑一般隐藏在浅灰色的风衣里的整个身躯。

“阿诺德，”她问道，“我们这是往哪儿去呀？”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施瓦辛格问。

马利亚红着脸低下了头。

“究竟什么是炼金术式的联姻呢？”她想道。“我是否会感到疼呢？我是说——以后？要知道，这样的事已经不止一次了。”

她抬起眼睛，看到了他面颊上两个迷人的酒窝——施瓦辛格在微笑。马利亚闭上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只管朝着肩头那只手指引的方向走。

当施瓦辛格停下来后，她睁开眼，发现周围的烟雾几乎消散殆尽了。他们站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两边尽是一些破旧的、花岗岩贴面的房屋。街上十分冷清、萧条，只有远处，烟雾笼罩的河边，隐约可见一些手持冲锋枪、弓着腰的身影在毫无意义地奔忙。施瓦辛格站在原地，有些奇怪地踌躇不决，马利亚觉得，肯定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怀疑在使他为难，而且，这些怀疑也可能涉及到她。想到这儿，她有些害怕。

“得赶紧说点浪漫的话，”她想。“可究竟说什么呢？反正无所谓。”



“知道吗，阿诺德，”她靠在他的身旁，开口说道，“我突然……我不知道，也许，你会觉得这很傻……不过，我可以跟你以诚相待吗？”

“当然可以，”施瓦辛格转过戴着墨镜的脸，说。

“跟你在一起，我是那么想飞！我觉得，天空简直近在咫尺！”

施瓦辛格抬起头，朝上看了看。

在烟雾之间的空隙，确实露出了蔚蓝色的天空，虽然不能说它特别近，但也算不上有多远。

“哎呀，”马利亚想，“我在瞎说些什么呀？”

但要就此打住已经晚了。

“而你，阿诺德，你想飞吗？”

施瓦辛格思索片刻。

“想，”他说。

“那么你会带上我吗？要知道，我……”马利亚腼腆地一笑，“我只是一个凡人。”

施瓦辛格又思索片刻。

“O.K.，”他说，“我带你飞。”

他扫视一下四周，似乎想在周围找到只有他才清楚的方向标。看得出，他找到了，因为他果断地挽起马利亚的胳膊，拉着她向前走去。一种诗意的想象这么快就变成了行动，这令马利亚惊讶不已，但她马上又想，真正的男子汉就应该这样行事。

施瓦辛格拽着她，贴着一座很长的、斯大林式的大楼跑去。跑了几步之后，马利亚适应了他快速的步伐，她抓住他风



衣的袖子,在他旁边小跑起来。她感到,只要她一放慢脚步,施瓦辛格那只殷勤地给她提供支点的手马上就会变成一只铁臂,毫不留情地拖拽着她,在马路上继续跑,不知为什么,这一想法竟使她感到无比地幸福,幸福感首先出现在她的下腹,随后就如一股股暖流涌上全身。

到了大楼的尽头后,施瓦辛格一转身,钻进一个凯旋门一样的院门。当他们置身在一个院子里,马利亚觉得,他们仿佛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在这里,早晨的宁静没有受到任何搅扰,周围没有一丝烟雾,很难相信,附近会有一些焦躁不安的人端着冲锋枪来回转悠。

施瓦辛格胸有成竹,知道自己正把马利亚引向何处。他们穿过一个带有秋千架的小型儿童游艺场,钻入两座锈迹斑斑的车库之间一条条狭窄通道构成的迷宫。马利亚怀着一丝甜蜜的恐惧想道,就在这里某个地方,将迅速而略嫌难为情地举行一场炼金术式的婚礼。可是突然,一条通道把他们引入一块空地,四周是五颜六色、高低错落的铁墙。

其实,这里也不完全是空的。脚下理所当然地丢着一些瓶子,还有两只破旧的汽车外胎、一扇压坏的“拉达”牌轿车的车门,以及大量各种各样的、经常堆积在车库旁边的准机械垃圾。

此外,还有一架飞机。

飞机几乎占据了整个剩余的空间,但马利亚却是最后看见它,也许是因为她的大脑在过滤那些从眼睛传输进来的显然是幻觉的信号时耽搁了几秒钟。马利亚害怕起来。

“飞机怎么会落在这儿呢?”她想。“还有,施瓦辛格又怎



么会出现在这儿呢？不管怎么说，这事很奇怪。”

“这是什么？”她问道。

“‘鸱’式垂直起降歼击机，”施瓦辛格说，“‘A-4’型。”

马利亚看见了他脸上迷人的小酒窝——施瓦辛格又在微笑。她微微蹙起自己的两道浓眉，心中的恐惧变成了嫉妒，这只由玻璃和金属构成的大昆虫在施瓦辛格心目中的地位显然并不比她低。

施瓦辛格向飞机走去。马利亚陷入了沉思，没有马上挪动步子，但最后还是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去，似乎施瓦辛格是拖拉机，而她则是仓促之间挂到拖拉机上的一节拖车。

“可是这儿只有一个位置呀，”见到驾驶舱玻璃罩下面的座位靠背，她说道。

“这不要紧，”施瓦辛格说着灵巧地把她举起来，放到机翼上。

马利亚蜷起腿，在倾斜的铝合金平面上站起来。起风了，她的衣服在风中颤抖起来，她想，她总是有机会扮演些浪漫的角色。

“那么你呢？”她问道。

施瓦辛格已经坐在驾驶舱里了，他的动作敏捷得惊人，马利亚以为，这可能是蒙太奇或者组合镜头。施瓦辛格从驾驶舱里探出头，微微一笑，用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在她面前晃了一下；马利亚心想，可以把这当作是订婚戒指。

“坐到机身上去，”施瓦辛格说，“那儿，机翼根部。别害怕。权当这是游艺场里的旋转木马。权当你是坐在一匹木马上。”



“什么，你就要……”

施瓦辛格点点头。

他的墨镜直透马利亚的内心，她明白，决定她命运的时刻到了。这无疑是个考验。一个配得上跟施瓦辛格呆在一起的女人，不能胆小怕事，庸俗无聊，否则只配看那些没精打采的色情连续剧。她必须敢于直面致命的危险，并始终以微笑来表达自己的感受。马利亚试着微笑了一下，但她觉得，自己的微笑有些提不起精神。

“好主意，”她说。“我不会冻坏吧？”

“我们用不了多久，”施瓦辛格说。“快坐下吧。”

马利亚耸了耸肩，小心翼翼地走到机身旁边，两片机翼之间的机身就像一个突起的鱼背，她端庄地侧身坐在上面。

“No，”施瓦辛格说。“等我们到了加利福尼亚我的大牧场，你再做女骑手吧。而现在要用正常姿势坐。否则会被风吹下去。”

马利亚犹豫片刻。

“你转过脸去，”她说。

施瓦辛格翘起左边的嘴角，微微一笑，把头转了过去。马利亚抬起一条腿，跨过铝合金脊背，骑坐在机身上。她身下的金属冷冰冰的，由于有露珠，还稍微有些潮湿；她欠起身，把上衣的下摆垫在身下，这时她突然觉得，似乎她身体最娇嫩的部分放在了一个仰面躺着的金属人——不知是被变革之风吹倒的捷尔任斯基塑像^①，还是一个可怕的机器人

^① 苏联解体后，克格勃的首任头脑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也被推倒了。



——两条硬邦邦的大腿上。她打了个寒战，但这一短暂的幻觉马上就消失了。随后她又觉得，自己坐在一个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平底锅上。她对眼前发生的事的喜欢程度越来越低了。

“阿诺德，”她喊道，“你肯定我们应当这样做吗？”

这句话她本想留到截然不同的其它场合来说，但现在却不由自主地从嘴里冒了出来。施瓦辛格沉吟片刻。

“是你自己想飞嘛，”他说。“不过，要是你害怕……”

“不，”马利亚克制住自己，说道，“我一点也不害怕。只是太麻烦你了。”

“没有什么麻烦的，”施瓦辛格说。“马上会有很大的噪音，戴上你的耳机吧。顺便问一下，你爱听什么？”

“‘吉哈德·克利姆松’^①，”马利亚正了正耳朵上玫瑰色的护垫，说道。

施瓦辛格的脸一下子变得像石头一样僵硬。若不是风吹动了他那被过氧化氢照亮的头发，马利亚肯定会认为，这是摄制组里的某个人把真正的施瓦辛格换成了模型。

“出什么事了？”她惊恐地问。

施瓦辛格好一阵子都没有动弹。他眼镜的镜片上有一些奇怪的红色亮斑在抖动——马利亚以为是车库后面那些枯黄的槭树叶映在了他的镜片上。

① “吉哈德·克利姆松”是作者自己编造的一个乐队的名称。吉哈德：指伊斯兰人对真主安拉的追求、崇拜，后来成为少数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圣战的借口；克利姆松：20世纪90年代前期，作者写作这部小说时，一个名为“克利姆松”的美国乐团在俄罗斯曾一度走红。



“阿尔尼^①，”她喊道。

施瓦辛格的嘴角抽动了几下，随后显然是恢复了活动能力。他转过头来，他的动作很费劲，好像他的头是在一个灌进了沙子的轴承上转动。

“克利姆松·吉哈德？”他反问道。

“‘吉哈德·克利姆松’，”马利亚回答说。“努斯拉特·法特赫·阿里·汗和罗伯特·弗利普^②。怎么啦？”

“哦，”施瓦辛格说，“没什么。”

他的头缩回了驾驶舱。从飞机的金属肚皮下面的某个地方传来了电动机的嗡嗡声，转眼间这嗡嗡声又变成了震耳欲聋的吼叫。马利亚觉得，她的氨纶耳塞都快被压进耳朵里了。接着，她的身子平稳地晃动起来，车库飘到了后下方。

“鹈”像小船似的左右摇晃着拔地而起，马利亚做梦也没想到，飞机还可以这样飞。她想，要是闭上眼睛，就不会这么害怕了，但强烈的好奇心战胜了恐惧，还没过一分钟，她又把眼睛睁开了。

她一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扇径直向她冲过来的窗户。它离得那么近，以至马利亚在房间里一台打开的电视机的屏幕上清清楚楚地见到一辆坦克。屏幕上的坦克向她掉转炮口，开了一炮，飞机立刻很厉害地倾斜起来，从墙边飞走。马利亚差点掉到机翼上，她吓得尖叫起来，但飞机很快又恢复了平稳。

① 马利亚对“阿诺德”的昵称。

② 此处指乐队里两个人，名字分别为伊斯兰人名和美国人名。



“抓住天线！”施瓦辛格从驾驶舱里探出头，挥着手向她喊道。

马利亚低头一看，就在她面前的机身上，立着一根圆形的金属棒，棒的顶端还有一个圆圆的粗头，不知为什么她先前竟没有发现它。它就像一个又短又窄的垂直尾翼，这让马利亚立刻产生了不体面的联想，尽管它的尺寸比现实生活中见到的要大许多。一见到这个强有力的突出物，她心中的恐惧顿时变成了兴奋，这是所有那些疲软无力的米格尔们、满身污垢的廖尼亚们和烂醉如泥的伊万们^①所不能给予的。

这里的一切看上去完全不同：天线顶端的圆形粗头上布满了小孔，有点像淋浴用的喷头，这同时使人想到了生活和爱情的超凡形式。马利亚指了指天线，疑惑地看了一眼施瓦辛格。施瓦辛格点点头，咧嘴笑了笑，牙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马利亚想，此时发生在她身上的这件事是在圆她童年的一个梦。在一部电影里，她久久地捧着童话故事，凝视着书上的插图，想象着自己骑在一条长龙或者一只巨鸟的背上，在天空翱翔的情景——如今果然梦想成真。“也许不完全是这样，”她把一只手放到天线的金属头上，想道，“不过梦想的实现总与我们的预期有出入。”

飞机略微向一侧倾斜起来，马利亚发现，这明显是她触摸了天线的缘故。她还觉得，飞机的运动十分神奇，它就像是一个活物，而天线就是它最敏感的部位。马利亚用一只手抚摩了一下金属棒，它的上端握在手心里。“鹞”跟受了刺激似

^① 米格尔：西班牙人名；廖尼亚：犹太人名；伊万：俄罗斯人名。



的，猛地晃动一下翅膀，又向上爬升了几米。马利亚想，这架飞机很像一个被绑在床上的男人，他无法把她抱在怀里，只能不停地全身抽搐，尤其是因为她刚好坐在两只机翼后面，它们就更像叉开的两条腿，虽然强壮结实，但却动弹不得。

这的确很有趣，可也太过别出心裁了——比起这只巨大的铁鸟来，马利亚宁愿在两座车库之间的空地上找一张再普通不过的简易床。但既然是和施瓦辛格，她想，就不可能是另外的方式。她瞥了一眼驾驶舱，里面看不太清楚，因为玻璃罩反光，好像他坐在椅子上，正随着她的手的动作轻微地摇晃着脑袋。

“有意思，”她把另外一只手也放到天线上，心想，“这个电影里的机器人是用金属做成的，还能随意改变自己的外形，可他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呢？大概，要什么样就什么样吧？”

这时，飞机越飞越高了。那些屋顶被远远地抛在了下面，马利亚眼前展现出雄伟壮丽的莫斯科全景。

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教堂圆顶，它们使城市看起来就像一件巨大的皮夹克，上面打满了毫无用处的补丁。莫斯科上空的烟雾远不如马利亚在河边散步时看上去那么多。有的地方房顶上的确有烟雾，但不是始终清楚是怎么来的——是火灾，是工厂的烟囱排放的废气，抑或只不过是低空的云彩？

尽管城市的局部丑陋不堪，但总体丽貌却非常美，只是这美的来源不得而知。“俄罗斯总是这样，”马利亚双手抚摸着冰冷的金属棒，心想，“你欣赏她，为她哭泣，可一旦你看清了，你欣赏的是什么，你肯定想吐。”

飞机突然在她身下颤动了一下，她感到金属棒的上端在



她的手掌里奇怪地摇摆起来。她急忙缩回手，布满小孔的金属头马上从天线上掉下来，贴着机身滑了下去，刚才还很强大的金属棒变成了一根顶端有一个缺口的短管，露出两条缠在一起的、折断了的电线，一条蓝色，一条红色。

马利亚把目光转向驾驶舱。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施瓦辛格那一动不动的、长着浅色头发的后脑勺。起先马利亚认为，他什么也没发现。后来她又意识到，他已经昏迷不醒了。她惊慌失措地扫视一下四周，发现机头正在缓慢地、有些犹豫不决地改变着方向。她的猜测立刻得到了证实。她几乎连想都没想自己在干什么，就从机身爬到机翼之间的一块平台上（那只断了头的天线划破了她的衣服），然后又向驾驶舱爬去。

驾驶舱盖开着。马利亚趴在机翼上，探头喊道：

“阿尔尼！阿尔尼！”

但没有回答。她提心吊胆地四肢着地撑起身子，看到了施瓦辛格后脑勺上一络随风抖动的头发。

“阿尔尼！”她又喊了一次。

施瓦辛格向她转过头来。

“感谢上帝！”马利亚脱口说道。

施瓦辛格摘下眼镜。

他微微眯起的左眼流露出一连串非常明显同时又极其复杂的表情，在这些表情之中，按照严格的比例混入了乐观、力量、对孩子的健康的爱、对与日本激烈拼杀的美国汽车制造业给予的道义扶持、对性取向弱势群体的权利的承认、对女权主义的轻微嘲弄，以及一种从容的意识：民主和犹太基督教价值观终将战胜世界上的一切邪恶。



可他的右眼完全两样。这甚至很难叫做眼睛。在被击碎了的布满干硬血迹的眼窝里，盯着马利亚的是一颗就像患了白内障的眼珠一样的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固定在一个与皮肤下面伸出的细电线相连接的复杂的金属夹子上。透镜般的玻璃球中央能射出一道耀眼的红光，马利亚是在这道红光照进她的眼中时发现这一点的。

施瓦辛格微微一笑。这时，他的左脸上表现出阿诺德·施瓦辛格在微笑时应该表现出的一种神情——几分难以捉摸的狡黠和几分孩子似的顽皮，见到这种表情，你马上就会明白：此人永远不会干坏事，即使打死几个白痴，也一定是在摄影机反反复复从不同角度令人信服地拍下他们的滔天罪行之后。但微笑只触动了他的左脸，右脸还是一成不变——冷酷、专注而又可怕。

“阿诺德，”马利亚站起身来，惊慌地说道，“阿诺德，你这是干吗？快别这样！”

但施瓦辛格没有回答。紧接着，飞机严重倾斜起来。马利亚顺着机翼滑了下去。滑的过程中她的脸好几次碰在一些突出物上，之后她的身体下面便失去了任何支撑。她料想自己肯定是在往下掉，便闭上眼睛，以免看到向她飞过来的树木和屋顶。可过了一会儿，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马利亚发现，发动机依旧在她身边轰鸣，便微微睁开眼睛。

原来，她被挂在了机翼下面——她上衣的风帽勾住了一个插着羽毛的突出物，她好不容易才认出，这原来是一枚导弹。导弹膨胀的头部让马利亚不由得想起她几分钟前遇到的天线——看到它，她便断定，施瓦辛格还在跟她玩爱情游戏。



可这也太过分了——她的脸上估计已经摔出好几块青斑，嘴唇也摔破了，血流到了嘴里。

“阿诺德，”她喊道，同时用力摆动双手，以便把脸转向驾驶舱，“停下来！我不想这样！听见了吗？我不想这样！”

终于，她看到了驾驶舱和施瓦辛格微笑的脸。

“我不想这样，你听见了没有？你想这样，可我很疼！”

“No？”他反问道。

“不！不！”

“O.K.，”施瓦辛格说道。“You are fired. ①”

接着他的脸向后退，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把马利亚推离了飞机，转眼间，飞机就变成了一只银灰色的、只用一条长长的烟带与她连接在一起的小鸟。马利亚朝前方转过脸，发现奥斯坦基诺电视塔的尖顶向她迎面扑来。塔的中部快速地变粗，就在快要撞上的一刹那，她看见一些穿着白衬衣、系着领带的人，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透过厚厚的玻璃惊讶地望着她。

响起了玻璃杯打碎的声音，随后有个重物扑通一声摔到地板上，并传来哇哇的哭声。

“小心点，小心点，”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说道。“就这样，对了。”

我明白，不会继续进行下去了，便睁开眼睛。我的视力已经恢复了一些——能辨认清楚身边的物体，但稍远的东西则

① 英语：你被解雇了；你被射中了。



模模糊糊，眼前的整个图景让我觉得，仿佛我是呆在一个庆祝新年的大气球里，气球壁上涂抹着周围的世界。就在我的上方，像两座峭壁一样挺立着铁木尔·铁木罗维奇和斯米尔诺夫上校。

“是的，”角落里有人说。“就这样，阿诺德·施瓦辛格和一个就叫马利亚的人认识了。”

“我倒是注意到，”斯米尔诺夫上校咳嗽了几声，对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说，“患者明显表现出一种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特征，因为他经常产生见到鸡巴的幻觉。您发现了么？时而是天线，时而是导弹，时而又像是奥斯坦基诺电视塔。”

“你们军人太片面了，”铁木尔·铁木罗维奇回应道，“没那么简单。常言道，不能用理智理解俄罗斯——但这也不能归结为性神经官能症。因此我们不用着急。重要的是，这里产生了宣泄效应，尽管是通过微弱的形式。”

“对，”上校同意道，“连椅子都折断了。”

“正是，”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说，“当滞留的致病因素进入到意识表层时，它需要克服强大的阻力，所以经常会出现灾难和各种冲撞的幻景，就像现在这样。这给了我们一个最为可靠的信号，说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

“也许，这是震荡引起的创伤导致的结果？”上校说。

“什么震荡？”

“我难道没跟您说过是怎么回事？您明白吗，炮轰白宫时，有几发炮弹射进了窗户，还有一发直接落到了民宅，当时那里正在……”

上校俯身凑到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跟前，对着他的耳朵小



声嘀咕着什么。

“不用说，”一些只言片语传到我的耳朵里，“全都炸成了碎片……我们先是封锁消息，不让外界知道误炸的事，然后去清理现场，进去一看——死者中居然还有一个在动……当然，受到了极为剧烈的震荡。”

“您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老兄？要知道，这件事可是非同小可，”铁木尔·铁木罗维奇抱怨道。“否则我何必费这么大的劲儿……”

他俯下身子，用两根粗胖的手指翻开我的眼皮，查看一下我的眼睛。

“您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说。“这当然是我平生遇到的最有趣的幻觉。不过我……该怎么说呢……我认为这个轻松的梦境很精彩，有好几分钟这些梦呓还变成了现实。”

“看到了吧？”铁木尔·铁木罗维奇向斯米尔诺夫转过身去，说道。

后者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感兴趣的不是您的意见，亲爱的，而是您的自我感觉，”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说道。

“我感觉很好，谢谢您，”我回答说，“只是想睡觉。”

这绝对是老实话。

“那就睡一会儿吧。”

他转过身去。

“明天早上，”他对我看不见的一个护理员说道，“请在水疗前给彼得注射四西西安定剂。”



“可以打开收音机吗？”角落里一个声音轻轻问道。

铁木尔·铁木罗维奇“咔嚓”一声按下墙上的一个按钮，挽起军人的胳膊往门口走去。我闭上眼睛。我明白，闭上容易，想再睁开可就难了。

“有时我觉得，”一个男子伤心地唱道，“没能从血腥的战场上归来的士兵，并非躺在了我们的土地里，而是变成了白鹤……”

最后一句歌词刚从扬声器里飘出来，病房里就立刻传来一阵忙乱的喧闹声。

“抓住谢尔久克！”有个声音在我的耳朵上方喊道。“是谁调到这个台的？你们忘了吗，啊？”

“你自己要打开的嘛，”另一个声音回答说。“我们马上就换一个台。”

又传来了“咔嚓”一声。

“将俄罗斯的流行音乐与土里土气划等号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一个讨好的声音从天花板上问道，“你们自己判断吧。‘垂体发炎’——这是俄罗斯很罕见的一个纯女子组合。她们全套演出装备的重量相当于一辆‘T-90’坦克。此外，她们的成员全都是女同性恋者，其中两人还感染了英国链球菌。尽管有这些超现代特征，但‘垂体发炎’主要还是演奏古典音乐，当然，是按她们自己的诠释。现在请听姑娘们根据莫扎特的作品改编的一首乐曲。对于这位奥地利作曲家，我们的许多听众是从福尔曼的电影和一种同名的奥地利甜酒开始熟悉的。从事莫扎特牌甜酒批发的是我们的赞助商，‘第三只眼睛’公司。”



播放的音乐很古怪，跟监狱的烟囱里狂风的吼叫差不多。感谢上帝，我已经处于微睡状态。起先我还在吃力地想着身边发生的事，后来则做了一个短暂的噩梦，梦见一个戴墨镜的美国人，他仿佛还在继续这个不幸的女人讲述的故事。

这位美国人把飞机停在一个院子里，浇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煤油，将它点着。他把深红色的上衣、墨镜、亮黄色的裤子都丢进了火里，身上只剩一条紧绷绷的游泳裤。他一边炫耀发达的肌肉，一边久久地在灌木丛里寻找什么东西，可怎么也找不着。接着我的梦里出现一阵恍惚，当我再次见到他时，说起来让人心惊肉跳，他已经怀孕了。显然，与马利亚的相会对他来说并非没有成果。这时的他已经变成一个可怕的人，长着一张程式化的脸，胀鼓鼓的肚皮上闪耀着强烈的阳光。



3

传到我耳朵里的旋律起先似乎是在沿着楼梯往上爬,接着,经过一阵短暂的原地踏步之后,开始绝望地向楼梯的拐角处冲击——这时,听得出音符之间出现了短暂的停顿。但钢琴师的手指逮住了旋律,又把它放回到楼梯上,于是,一切重新开始,只不过是低了一个楼层。这很像特维尔街心花园八号的楼梯,只是梦中的这个楼梯上下延伸得很远,一眼望不到头。我突然明白了,任何一支旋律都有其确切的含义。这支旋律就是表明,自杀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是不可能的——不是指它的罪过,而仅仅是指它的不可能。我还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只不过是一些音符,是从一位不为人知的钢琴家手指底下流淌出来的一些短促的三度音、平缓的六度音以及不协调的七度音,它们混入一部宏大的交响乐,而这部交响乐我们谁也不可能完整地听到。想到这,我深感悲哀,正是怀着这种悲哀的心情,我从梦的铅灰色云团中浮了出来。

有一阵子我企图搞清楚,我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二十六年来我每天早晨都会鬼使神差地置身其中的奇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穿着沉重的黑皮夹克、马裤和靴子。什么东西



把我的大腿顶得生疼。我翻过身，在腿下摸到一只装着毛瑟枪的木盒。我扫视一下四周。我的上方是一床天盖形丝绸幔帐，缀着极为漂亮的流苏。窗外是没有一丝云彩的蓝天，远处的屋顶在冬日寒冷的阳光下微微泛着红光。在窗户正对面的街心花园另一侧，看得见一个铁皮包裹着的圆顶，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它就像一个庞大的金属产妇的肚皮。

我突然意识到，音乐并非我的梦境，它分明是从隔壁传过来的。我开始思索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突然，我仿佛被电击了一下——我蓦地想起昨天的情景。我明白了，我是在冯·埃尔年的住宅里。我跳下床，冲到门口，又停了下来。

在隔壁，在放着冯·埃尔年的那个房间，有人在弹钢琴，而且弹的恰好是莫扎特的f小调赋格曲，昨天晚上我在可卡因和伤感情绪的作用下想起过它的主题。我不由得两眼发黑，我仿佛看见一具僵尸，从盖在它身上的大衣下面伸出手指，机械地敲击着琴键。我明白了，昨天的噩梦还没有结束。我的惊慌失措简直难以言表。我打量一下房间，发现墙上挂着一个木头做的大十字架，上面镶嵌着一尊精致的银质基督受难像。见到这个雕像，我心中掠过一丝类似记忆幻觉症的奇怪感觉，仿佛不久前我梦见过这个金属的躯体。我取下十字架，从枪套里掏出毛瑟枪，踮着脚尖来到走廊。支配我的大致是这样一个想法——如果死人能弹钢琴，他也应该害怕十字架。

传出琴声的房子的门虚掩着。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往里瞅了一眼。从门外只能看见钢琴的一端。我一只手握着沉重的十字架，另一只手握着随时准备射击的毛瑟枪，深吸几口气，然后一脚踹开门，冲了进去。我最先看到的是从墙角伸



出来的冯·埃尔年的靴子，他安静地躺在自己那件灰色的英式尸衣下面。

我朝钢琴转过身子。

坐在钢琴旁边的是我昨天在餐馆里见过的那个身穿黑色军便服的人。看样子他有五十岁左右，浓密的小胡子向上髷曲着，两鬓有少许的白发。他好像根本没有发觉我的到来，他闭着眼睛，仿佛整个身心都沉浸在音乐之中。他弹得的确很出色。在琴盖上，我看到一顶极为考究的卡拉库尔羊皮高帽，上面缠着一条红色的波斯绸带，以及一把样式不凡的军刀，插在极为漂亮的刀鞘里。

“早上好，”我放下毛瑟枪，说道。

弹钢琴的人抬起眼皮，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眼。他的双眼乌黑而又犀利，我花了不少力气才顶住它们那近乎生理上的压力。看到我手里的十字架，他微微一笑。

“早上好，”他一边继续弹琴，一边说道。“很高兴看到您一大早就在思考灵魂问题。”

“您在这里干什么？”我问道，小心地把十字架放在琴盖上，紧挨着他的军刀。

“我正在尝试，”他说道，“弹一首难度相当大的曲子。可遗憾的是，它需要四只手来弹奏，现在快要到经过句了，我一个人胜任不了。能否劳驾您帮一下忙？好像您熟悉这支曲子。”

我恍恍惚惚地把毛瑟枪插进枪套，站到他旁边，瞅准机会把手指按到琴键上。我的对位旋律勉强跟得上主题，有几次我还弹错了。后来，我的目光重新落在冯·埃尔年叉开的双腿



上。眼前发生的事情真是荒谬绝伦。我急忙闪到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不速之客。他停下来，静坐了一会儿，似乎在沉思。然后他笑了笑，伸手从琴盖上拿起十字架。

“不像，”他说道。“我始终搞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以丑陋的人形出现。依我看，一支完美的乐曲，一支可以听且听之不尽的乐曲——这样的形态更适合于他。”

“您是谁？”我问。

“我姓夏伯阳，”陌生人回答。

“您的姓对我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说。

“正因为如此我才用它嘛，”他说道。“我名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想，这对您同样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全身关节发出噼啪的响声。我闻到一缕淡淡的名贵的英国香水的气息。

“昨天，”他仔细地端详着我，说道，“您把您的提包忘在‘音乐鼻烟盒’了。这就是。”

我瞥一眼地板，在钢琴的撑脚旁发现了冯·埃尔年的黑色提包。

“谢谢您，”我说。“可您是怎么进来的？”

“我按过门铃，”他说，“但门铃显然是坏了。钥匙就插在门上。我看到您在睡觉，就决定等一等。”

“明白了，”我说。

实际上我什么也没明白。他怎么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他到底来找谁——找我，还是找冯·埃尔年？他是什么人，想干什么？还有，为什么——正是这一点让我苦恼万分——为什么他要弹这首该死的赋格曲？他在怀疑什么吗？（顺便说一



下,我倒不太担心墙角盖着大衣的尸体——这在肃反人员的家里是极为平常的摆设。)

夏伯阳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

“如您所料,”他说,“我来找您并不只是为了您的提包。今天我就要开赴东线,到那里去指挥一个师。我需要一个政委。原来的那个……嗯,这样说吧,辜负了我对他的期望。昨天我见到了您的鼓动宣传,您给我的印象还不坏。况且,巴巴亚辛也很满意。我想由您来主持我部队的政治工作。”

他边说边解开军便服的口袋,掏出一张折成四折的纸递给我。我打开纸,看到上面写着:

法涅尔内伊同志,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命令,现将您调至亚洲骑兵师师长夏伯阳同志麾下,以加强政治工作。巴巴亚辛。

下面是一个我已经很熟悉的模糊的紫色印章。这位巴巴亚辛到底是何许人也,我抬起眼睛,惶恐不安地想道。

“您究竟叫什么名字?”夏伯阳微微皱起眉头问道。“格里戈里还是彼得?”

“彼得,”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说道。“格里戈里——这是我原来的笔名。您知道吗,总是搞乱。有人按老习惯叫我格里戈里,有人叫我彼得……”

他点点头,从钢琴上拿起军刀和羊皮高帽。

“是这样,彼得,”他说,“也许这让您觉得不是很方便,但我们的火车今天就要出发。这也是没有办法。战争嘛。您在



莫斯科还有没有未了结的事情？”

“没有，”我说。

“那么我建议您跟我一起马上出发。我现在要到伊万诺夫纺织工人团的登车现场去，我希望您也能够到场。有可能您要发言。您东西多吗？”

“只有这个，”我朝提包点点头，说道。

“很好。我今天就命令他们把您列入司令部车厢的给养名单。”

他向门口走去。

我拎起提包，跟着他进了走廊。我的头脑里一片混乱，毫无头绪。走在前面的这个人让我害怕。我搞不清楚他是谁。从气质上看，他不太像红军指挥官，但同时又分明是其中的一员；况且，今天的命令上的签名和印章与昨天的一模一样。看得出来，他的影响力很大，只消一个早晨就能从血腥的捷尔任斯基手里和神秘的巴巴亚辛手里弄到他所需要的调令。

夏伯阳在前厅停下来，从衣架上取下胸前饰有三道鲜红的波纹状横杠的蓝色长军大衣。这种军大衣是赤卫军的最新款式，不过说实话，胸前的这些横杠和扣环通常都是用普通的红色呢绒做成的。夏伯阳穿上军大衣，戴上羊皮高帽，束紧挂着毛瑟枪的皮带，然后佩上军刀，向我转过身来。他的胸前挂着一枚闪闪发光的、样式很奇特的勋章——一颗顶端有五个小球的银质五角星。勋章上没有任何图像和文字。夏伯阳发现了我的目光。

“您这副打扮是准备过新年吗？”我问。

夏伯阳善意地笑了起来。



“不，”他说。“这是十月之星勋章。”

“从未听说过。”

“要是走运的话，您也会得一枚，”他说。“准备好了吗？”

“夏伯阳同志，”我决定利用一下我们谈话的非正式气氛，“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也许您会觉得奇怪。”

“我洗耳恭听，”他礼貌地笑着说道，用黄色的长筒手套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刀鞘。

“您说句实话，”我直视着他的眼睛说道，“您为什么要弹钢琴？又为什么偏偏要弹这首曲子？”

夏伯阳微微一笑。

“您知道吗，”他说，“我进入您的房间时，您还在睡觉。您在梦里吹口哨，吹的恰好是——说实话，我不敢完全肯定——这首赋格曲。至于说我，我非常喜欢莫扎特。从前我还在音乐学院学习过，准备日后投身音乐事业。但后来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可这怎么会令您感到不安呢？”

“如此说来，”我说道，“我是多此一举。纯粹是个奇怪的巧合。”

我们走出房门。钥匙果然插在门上。我机械地关上房门，把钥匙塞进口袋里，跟着夏伯阳下楼。我有点纳闷，我平生可是从来没有吹口哨的习惯，更何况是在梦里。

到了寒冷而又阳光明媚的街上，我最先看到的是一辆长长的灰绿色装甲车，也就是昨天我在“音乐鼻烟盒”附近发现的那辆。以前我还从未见过类似的汽车，这无疑是杀人技术的最新成就。它的外壳上布满了半圆形的大铆钉；马达粗钝的圆头向前突出，顶上装有两盏大功率的头灯；挺拔的钢脑门



稍稍后仰，上面两只倾斜的瞭望孔犹如佛祖半睁半闭的眼睛，威严地注视着尼基塔广场。装甲车的顶上是一个圆柱形的机枪塔，正扭头对着特维尔街心花园；机枪枪管的两侧有两块前窄后宽的防护钢板。车身上有一扇不大的门。

周围聚了一群孩子，有的拖着雪橇，有的背着冰鞋。我下意识地想到，当这些白痴一样的成年人在忙于改造他们臆想出来的世界时，孩子们仍然生活在现实中——雪堆，阳光，封冻的黑色镜面般的池塘，充溢着神秘的宁静和覆盖着夜晚的积雪的院子。尽管这些孩子也被席卷俄罗斯的疯狂病毒所感染——这从他们投向夏伯阳闪亮的军刀和我的毛瑟枪的目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但他们纯洁的眼睛里还是闪烁着对我早已忘却的某种东西的记忆。这可能是一切存在的伟大源泉的无意识回忆。毕竟孩子们脱离这一源泉还不是太远，尽管他们在可耻的生活荒漠中越陷越深。

夏伯阳走到装甲车旁，在车身上断断续续地敲了几下。马达发动起来，装甲车的尾部冒出一股瓦灰色的浓烟。夏伯阳打开车门，正在这时，我听到了身后的刹车声。一辆带有顶篷的汽车停在我们旁边。四个穿黑皮夹克的人从车里爬出来，钻进我们刚刚走出来的楼门。我心头一紧——想必他们是来找我的。我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大概是因为这四个人让我想起昨天那四个穿黑披风、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尸体从舞台上抬走的演员。其中一个在门口迟疑了一下，朝我们的方向瞟了一眼。

“快点，”夏伯阳在装甲车里喊道，“您把冷气放进来了。”

我把提包扔到装甲车里，急忙钻进去，砰地关上门。



一见到这辆可怕的装甲车的 Intérieur^①,我马上就被吸引住了。这是一个不大的空间,用隔板与驾驶室隔开,很像北方快车^②的包厢——两张窄小的皮沙发,中间摆着一张小桌子,地上铺着一小块地毯,尽管很局促,却给人以舒适的感觉。顶上有一个圆洞,透过洞口可以看到套着护罩的机枪笨重的枪托;一架镂空的小旋梯连接着上面的机枪塔,梯子顶端安装着一个类似转椅的座位,座位前方还有一个脚踏板。用来照明的是一盏不大的电灯,借助灯光我发现一幅画,画框的四角用螺栓固定在墙上。这是一幅不大的、具有约翰·康斯太布尔^③风格的风景画——河上的一座桥,远处酝酿着大雷雨的乌云,一片具有浪漫气息的废墟。

夏伯阳抓起对讲机的话筒,说道:

“去火车站。”

装甲车平稳地起动,坐在里面的人几乎感觉不到动。夏伯阳坐到沙发上,用手势邀请我在对面坐下。

“车真棒,”我十分诚恳地说。

“是的,”夏伯阳说,“是辆不错的装甲车。不过我不太喜欢车。要是您见到我的马……”

他把手伸到桌底下,拿出一个折叠的棋盘。

“下盘跳棋吗?”

我耸耸肩。他打开棋盘,开始摆放黑白棋子。

① 法语:内部。

② 当时的一种昂贵舒适的列车,往返于彼得堡与巴黎之间。

③ 约翰·康斯太布尔(1776—1837),英国画家,善画普通的自然风景,表现其鲜活多变的特征。代表作有《运干草的大车》等。



“夏伯阳同志，”我说道，“我的工作是什么？负责哪些方面的问题？”

夏伯阳小心地地理了理小胡子。

“您要知道，彼得，我们的师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我想，您会逐渐融入到的生活中去，并自己找到，这么说吧，自己的战壕。现在就谈论到底是什么战壕还为时过早，不过凭您昨天的表现我可以断言，您是个果敢的人，而且还能敏锐地洞察眼前发生的事情的本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该您走了。”

我把骰子掷到棋盘上，考虑着该怎样表现自己。我很难相信，他确实是一名红军指挥员。不知为什么，我认为，他在跟我玩一样的疯狂游戏，只不过玩得更持久，技艺更高超，可能还是自愿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我所有的怀疑都只是建立在他有教养的谈吐和他双目的催眠能力上，而这本身并不说明什么，比如，死去的冯·埃尔年也相当有教养，而肃反委员会的头子捷尔任斯基的催眠术在一些秘密团体里颇为有名。后来我又想，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很愚蠢，因为没有哪个红军指挥员确实就是红军指挥员；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极力充当地狱的标尺，极力伪装自己，就像我昨天那样，只不过更加玩命。至于说到夏伯阳，我并不认为他与他身上的军服名实相符，但别人的看法显然与我不同——这一点巴巴亚辛的命令，以及我们乘坐的这辆装甲车都可以作证。我不知道，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但我还是决定暂时接受他的游戏规则；况且，我对他有一种下意识的信任感。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在那条我今天早上梦见的没有尽头的存在的楼梯上，这个人站得比我高出好几层。



“您有什么心事吗？”夏伯阳一边掷骰子，一边问。“也许，有什么想法在折磨您吧？”

“已经没有了，”我回答说。“请问，巴巴亚辛是不是很快就同意把我调给您指挥？”

“巴巴亚辛恰恰不同意，”夏伯阳说道。“他非常赏识您。我是找捷尔任斯基解决这个问题的。”

“什么，”我问道，“你们认识？”

“是的。”

“您，夏伯阳同志，也许连伊里奇^①也认识吧？”我略带嘲讽地问道。

“我们相当熟，”他回答说。

“请您证明一下，”我说。

“这有什么。要是您愿意，现在就可以。”

这也太离谱了。我怀疑地看了他一眼，可他一本正经。他把棋盘推到一边，缓缓地从刀鞘里抽出军刀，把它放到桌子上。

应当说，军刀相当奇特，长长的银质刀柄上刻着精致的图案——两只鸟，两只鸟之间是一个圆圈，里面坐着一只兔子；余下的地方用一些细腻的花饰做填充。刀柄末端有一个玉质镶头，上面拴着一截短而粗的丝线绳，绳子末端是紫色的穗子。刀柄前面是一个圆形的黑铁护手盘；熠熠生辉的刀身很长，还稍稍有点弯曲。说句实话，这与其说是军刀，不如说东方的，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的一种宝剑。但我还没来得及细

^① 指列宁。



看,夏伯阳就关掉了电灯。

我们周围一片漆黑。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均匀的马达声(顺便说一下,这辆装甲车的隔音效果极佳,马路上的喧闹声一点也传不进来),只感到轻微的摇晃。夏伯阳划燃一根火柴,把它举到桌面上方。

“您看刀刃,”他说。

我看了看刀身上出现的模糊的、有些发红的影像。影像有一种奇怪的纵深感——似乎我是在透过一块蒙着一层薄薄水汽的玻璃,观看一条灯光微弱的长长的走廊。影像上掠过一阵轻微的涟漪,接着我看见一个身穿敞襟军上衣的人在走廊里有气无力地走着。他没有刮脸,秃顶,两颊上铁锈色的胡须与上唇和下巴上邈邈的胡须连在一起。他弯下腰,伸出颤巍巍的双手。我发现走廊的角落里蜷缩着一只小猫,睁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影像相当清晰,只是有些扭曲,似乎我是从一个庆祝新年的气球表面上看到的。突然,我出乎自己意料地咳嗽了一声。这时列宁——毫无疑问,这就是他——哆嗦了一下,转过身来,注视着我这边。我明白了,他能看见我,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但随后他的目光又变得狡猾起来,好像还有些歉疚;他强装笑脸伸出一根手指吓唬我道:

“米修司!你在哪儿?”^①

夏伯阳吹灭火柴,影像消失了;在影像消失前,我发现小猫正沿着走廊往外溜。我突然明白了,我根本不是在军刀上看到这一切的,而是以某种难以理解的方式刚刚到过那里,还

^① 契诃夫小说《带阁楼的房子》里的一句话。



有可能触摸过小猫。

灯亮了。我惊奇地瞥了一眼已经把军刀插入刀鞘的夏伯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通读契诃夫，”他说。

“刚才那是什么？”我问道。

夏伯阳耸了耸肩。

“列宁，”他说。

“他看到我了吗？”

“我不认为他看到了您，”夏伯阳说道。“确切地说，他是感到了某种在场。但这未必会让他特别震惊。他已经习惯了类似的情况。有很多人在看着他。”

“可您是怎么……用什么办法……这是催眠术吧？”

“这与其余的一切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他说着冲墙壁点点头，显然指的是墙外的东西。

“您到底是谁？”我问。

“今天您已经第二次向我提这个问题了，”他说。“我已经回答过，我姓夏伯阳。这就是目前我能告诉您的一切。不要操之过急。顺便说一下，在我们私下谈话时，您可以叫我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夏伯阳同志’听起来过于正式。”

我本来已经张开口，想要他做出解释，突然一个念头阻止了我。我明白，从我这方面来讲，坚持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甚至可能有害处。但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念头不是我自己的，我觉得是夏伯阳通过某种不明的方式传递给我的。

装甲车减慢了速度。对讲机里传出司机失真的声音：

“火车站到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很好，”夏伯阳回应道。

装甲车东拐西拐地慢行几分钟后，终于停了下来。夏伯阳戴上羊皮高帽，从沙发上站起来，打开车门。一股冷气和浅红色的冬日阳光，以及数百个喉咙汇集而成的低沉的喧闹钻了进来。

“带上提包，”夏伯阳说着轻巧地跳到地面上。经历了装甲车中舒适的半明半暗，我的眼睛一下子还适应不了外面的亮堂；我微微眯缝起眼睛，紧跟着夏伯阳下了车。

我们处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广场的正中央。四周是激动的人群，他们装束各异，带着不同的武器，排着不甚规则的方阵。一些级别不高的红军指挥官在队列前走来走去，手握出鞘的军刀。夏伯阳一出现，人群便立刻骚动起来，此起彼伏的叫喊声汇聚在一起，越来越响亮，转眼间就变成了雄浑的“乌拉”，一遍又一遍地回荡在广场上空。

装甲车的旁边是一个铺着木板的演讲台，插着两面交叉成十字的旗帜，好像断头台一样。台上有几个军人在交谈；看到我们，他们马上鼓起掌来。夏伯阳踏着吱咯作响的台阶快速登上演讲台；我紧紧地跟随着他，以免被他拉下。夏伯阳跟两个军人（其中一人穿着海狸皮大衣，腰上扎着皮带）仓促地打个招呼，然后走到断头台的护栏跟前，举起一只戴着长筒黄色手套的手，示意人们安静下来。

“小伙子们！”他提高嗓门喊道。“你们聚在这里干啥，这你们自己知道。没有什么好磨蹭的。你们会碰到各种情况，会经受各种考验。不这样行吗？啊？到了前线——要给那帮狗娘养的点厉害瞧瞧。想啥呢——上前线可不是躺在摇篮里



玩啊……”

我注意到夏伯阳动作和姿态——他一面讲话，一面有节奏地把身体从一个方向转到另一个方向，并用戴着黄皮手套的手掌在胸前有力地砍来砍去。他的语速越来越快，我已经很难理解他的意思了，但从工人们的反应——他们伸长脖子，仔细倾听，频频点头，有时还满意地龇牙笑笑——可以看出，他讲的话他们能接受。

有人拽了一下我的衣袖。我打了个寒战，回过头，见到一个矮个子的年轻人，留着稀稀拉拉的小胡子，脸冻得粉红，敏锐的眼睛的颜色就像冲淡了的茶叶。

“富……富，”^① 他说道。

“什么？”我没听清。

“富……富尔曼诺夫，”他说，向我伸出又粗又短的手掌。

“很荣幸，”我回应道，握了一下他的手。

“我是纺织工人团的政……政委，”他说。“我们将……将在一起工作。您马……马上就要讲话——请尽……尽量简短些。一会儿就要登车了。”

“好吧，”我说。

他疑惑地看了看我的手。

“您是党……党员吗？”

我点了点头。

“入党时……时间长吗？”

① “富……富”是双关语，既表示是“富尔曼诺夫”的第一个字，也有“呸”的意思。



“快两年了，”我回答道。

富尔曼诺夫把目光转向夏伯阳。

“他是雄鹰，”他说，“只是需要看着他。据……说，他经常行踪不定。但是战……战士们喜欢他。理……理解他。”

他冲安静下来的广场点了点头。夏伯阳的话在广场上空回荡：

“只要不给自己的事情抹黑就行——我说的是咱们的大事啊！……前方没有后方不行，后方没有前方也不行……要是你们这里也搞得一塌糊涂，那还打什么仗呢？……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上前线去——这就是我要向你们说的，别忘了，我这个指挥员会给你们撑腰的……现在由政委讲话。”

夏伯阳离开护栏。

“现在该你了，彼得卡，”他大声吩咐说。

我走到护栏跟前。

注视着台下的这些人，想象着他们黯淡的前途，我心情沉重。他们从小受到欺骗，就是现在，他们的情况也没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他们仍旧受到欺骗，只不过欺骗的手段不同而已，但这些原始和粗糙得近乎挖苦的欺骗手段——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实在太缺乏人性。这些站在广场上的人的感情和思想是那么残缺不全，一如他们身上的破衣烂衫，他们甚至要去送死，而给他们送行的就是这些得势小人拙劣的滑稽表演。可是，我想，我的情况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我同样不明白——或者更糟，自以为明白——支配我生活的力量的本质，那么，比起一个被派去为“英特纳雄耐尔”一词而送死的醉醺醺的无产者来，我又好在哪里呢？难道就好在我读过果戈



理、黑格尔还有什么赫尔岑吗？想起来都可笑。

然而，总得说点什么。

“工人同志们！”我喊道。“你们的政委富尔曼诺夫同志让我长话短说，因为很快就要上车了。我想，我们将来还有时间谈话，而现在，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件事，这件事就像一团火，温暖着我的心。今天，同志们，我见到列宁了！乌拉！”

广场上欢声雷动，经久不息。等人群安静下来，我说道：

“现在，同志们，请富尔曼诺夫同志讲话，为你们壮行！”

富尔曼诺夫感激地冲我点点头，走到护栏跟前。夏伯阳摆弄着小胡子，和身穿海狸皮大衣的军人谈论着什么，不时地笑笑。见我走过来，他拍了拍军人的肩膀，向其余的人点点头，往讲台下面走去。富尔曼诺夫开口道：

“同志们！我们在一起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最后一遍铃声一响，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将渡过河去，登上大理石砌成的坚固的堤岸，登上悬崖，筑起自己的堡垒……”

这时的富尔曼诺夫讲话非但不结巴，反而很流利，很激昂。

我们从闪向两旁的工人们中间穿过（在远处见到他们，我差点失去对他们的同情），向火车站走去。夏伯阳走得很快，我吃力地跟在他后面。不停地有人向他问候，他也不时地把戴着黄色长筒手套的手掌举到羊皮高帽边，向他们回敬军礼。我有意无意地模仿起这一动作来，而且马上就掌握了要领，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些往来穿梭于火车站、尚未达到超人标准的人们中的一员。

我们走到月台边上，纵身跳到封冻的地面。再往前，就是



那些停在调度线上、挂着厚厚一层雪的火车车厢构成的迷宫。疲惫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望着我们；他们的脸上流露出一模一样的绝望神情，这使他们结成了某个新的种族。我回忆起索罗维约夫的一首诗，不禁笑了起来。

“您这是干什么？”夏伯阳问。

“没什么，”我说。“我明白什么是泛蒙主义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种学说，”我说道，“它在成吉思汗时代的波兰非常盛行。”

“原来是这样，”夏伯阳说道。“您知道的这些词真有意思。”

“哦，在这方面我比您差远了。顺便问一下，您能不能解释一下，‘撑腰’是什么意思？”

“您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假如我没搞错的话，您自己刚才在讲台上就说过，您这个指挥员会给他们撑腰。”

“啊，”夏伯阳微笑道，“原来您是指这个。您要知道，彼得，当您面向大众讲话时，您自己对所讲的话理解与否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别人理解你的话。只要反映出人群的期望就行了。有的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去研究大众的语言，而我却更喜欢直截了当。因此，假如您想知道‘靠山’是什么意思，您就不应该来问我，而应该去问现在站在广场上的那些人。”

我觉得我明白他在说什么。很久以前我就得出过一些非常类似的结论，只不过它们所涉及的是一些关于艺术的谈话，



这些谈话既单调,又毫无目的,总使我感到压抑和困惑。由于职业的关系,我不得不经常与文学圈里的许多白痴见面,就这样,我在自己身上培养出一种能力,也就是说,我能够在参与他们的谈话时,不用深究他们讲的是是什么,就能得心应手地玩弄一些荒唐的辞藻,比如“现实主义”呀,“巫术”呀,甚至还有“神智学”之类的。按夏伯阳的说法,这就是研究大众的语言。而他自己,照我的理解,甚至懒得去管他讲的是些什么。说实话,我不清楚他是怎么做到这点的。也许,他能进入一种类似于恍惚的状态,从而抓住别人的期望所放出的射线,并以某种方式把这些射线编织成人群能够理解的图案。

在剩下的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夏伯阳领着我越走越远;我们还两三次钻过静静地停在那里的火车。四周鸦雀无声,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火车头的怒吼。最后,我们在一列挂有一节装甲车厢的火车旁停了下来。装甲车厢的烟囱悠闲地冒着轻烟,门口有一个威严的布尔什维克站岗,他长着一副粗糙的亚洲人的面孔,不知为什么,我马上暗自给他取了个绰号——巴什基尔人。

巴什基尔人敬了个军礼,我们从他身旁走过去,上了车,进入一条短走廊。夏伯阳朝其中的一扇门点了点头。

“这是您的包厢,”他说道,从兜里掏出怀表。“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我要发布几条命令。应该把我们的车厢挂在火车头上,把纺织工人的车厢挂在我们后面。”

“我不喜欢他们的政委,”我说,“那个富尔曼诺夫。将来我们可能合不来。”

“不要尽想些跟现在无关的事情,”夏伯阳说。“您得学会



进入您所说的将来。说不准您进入的将来里没有什么富尔曼诺夫。也说不准您进入的将来里没有您呢。”

我没有吭声,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这些奇怪的话。

“去收拾一下,休息休息吧,”他说。“我们晚饭时见。”

包厢里看上去十分祥和,这让我非常惊讶;装了铁甲的壁板上开了一扇窗户,上面挂着严严实实的窗帘;一张小桌上摆着一只花瓶,里面插着几枝石竹花。我感到精疲力竭;坐到沙发上以后,我好长时间都不能动弹。后来我想起,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便走出包厢。奇怪的是,我在走廊里推开的第一扇门就是通向卫生间。

我舒舒服服地冲了个热水澡(显然,水是用煤炉加热的)。回到包厢,我发现床铺已经整理过了,桌子上还放了一杯热茶。我一口气把茶水喝干,然后一头倒在沙发上,在浆洗过的被单的清香的催眠下,我几乎马上就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周围几乎一片漆黑。车厢有节奏地晃动,车厢下面有节奏地传来轮子碾过铁轨接缝发出的响声。刚才我放空茶杯的桌子上,此时摆着一包来路不明的东西。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套考究的黑色西服,一双锃亮的漆皮鞋,一件衬衫,一套用来换洗的内衣,还有几条领带,显然是要让我从中挑选一条。衣服和皮鞋都很合适;经过一番斟酌,我选了一条带黑色圆斑点的领带。我照了一下壁柜门上的镜子,对自己的模样感到十分满意,不过得承认,我下巴上的胡子有好几天都没刮了,这多少有些损害形象。我从花瓶里抽出一枝淡紫色的石竹花,掐掉花茎,插入衣襟。这时我感觉,彼得堡从前的生活真是妙不可言!



我走出包厢，来到走廊尽头，在一扇门上敲了敲。里面无人应答。我推开门，看到一间宽敞的餐厅。餐厅中央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为三个人准备的简单晚餐和两瓶香槟；桌面上方，几支蜡烛的火苗随着火车的摇摆有节奏地跳跃着。空气里有股轻微的雪茄味。壁上糊着金黄色的壁纸；桌子对面是一扇很大的窗户，窗外不时掠过夜晚的灯火。

背后传来一阵响动，我哆嗦了一下，转过身去。后面站着那个我在车厢旁边见到过的巴什基尔人。他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打开放在角落里、喇叭闪着银光的留声机，把唱针放到开始转动的唱片上。响起夏里亚宾^①雄浑的男低音，他好像唱的是瓦格纳的曲子。桌子上的第三份餐具是为谁准备的呢，我琢磨着，从口袋里掏出烟卷。

我还没考虑多久，门便开了，我见到了夏伯阳。他穿着黑色的天鹅绒西服和雪白的衬衫，系着鲜红的领结，领结也是用波纹绸做的，跟他军服上的红杠一样。一个姑娘跟在夏伯阳身后进了车厢。

她的头发剪得很短——甚至很难把这叫做发型。深色的天鹅绒衣服紧裹着她那尚未发育成熟的、挂着一串大珍珠的胸脯；她的肩膀宽而结实，大腿却有些纤瘦。她的眼稍微吊，但这反而增添了她的魅力。

毫无疑问，她绝对称得上美丽，但这种美丽又很难说是女性的。就连像我这样喜欢想人非非的人，也无法把这双眼睛、

^① 夏里亚宾(1873—1938)，著名俄罗斯歌唱家，1918年曾获得过共和国人民演员称号。1921年出国演出，此后再没回国。



这张脸和这副肩膀跟床头的耳鬓厮磨联系起来。啊不，她不适合那些布宁^①式的、易得淋病的干草棚！但她很适合，比方说，在溜冰场上展示风采。在她的美丽中，有一种让人清醒的东西，一种质朴而又略带忧伤的东西；我说的不是早在战前便让所有彼得堡人厌恶到极点的表面贞洁，内里放荡。不，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然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完美，在这种完美面前，任何淫欲都会像宪兵的爱国主义一样自惭形秽。

她瞥了我一眼，朝夏伯阳转过身去，珍珠在她裸露的脖子上闪了一下。

“这就是我们新来的政委？”她问道。

她的嗓音略微有些沙哑，但很悦耳。夏伯阳点了点头。

“认识一下，”他说道，“这是彼得。这是安娜。”

我从桌旁站起身，抓起她有点凉的手，想贴到嘴唇上，但她没有允许我这样做，而是按彼得堡 *émancipé*^② 的方式跟我握了一下手。我把她的手攥在手里，好一会儿都没有松开。

“她是个优秀的机枪手，”夏伯阳说，“因此你要当心，别惹她发火。”

“难道如此娇嫩的手指能给人带来死亡？”我松开她的手，问道。

“这一切都取决于，”夏伯阳说道，“您到底把什么称作

① 伊万·布宁(1870—1953)，俄罗斯作家，1920年后侨居国外。此处指布宁的中篇小说《米佳的爱情》中的情节，主人公米佳爱上用情不专的卡佳，他在痛苦中为了寻求满足，用5卢布找来看林人家的媳妇阿莲娜与自己在干草棚里幽会。

② 法语：追求男女平等的人、女权主义者。



死亡。”

“对此还有不同看法吗？”

“啊，当然，”夏伯阳说。

我们在桌旁坐下。巴什基尔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灵巧动作打开香槟，给每只高脚杯倒上酒。

“我提议，”夏伯阳用他那双具有催眠力的眼睛盯着我，说道，“为我们出生和生活的这个可怕时代，为所有那些至今仍未停止追求自由的人们，干杯。”

我觉得他的逻辑很怪，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可怕，正是由于他所说的“所有那些人”对所谓的自由的追求。谁不知道他们追求的是谁人的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呢。不过我并没有驳斥他，而是喝了一口香槟（每当饭桌上摆着香槟，而话题又扯到政治的时候，我总是沿用这一简单的做法）。几口酒下肚之后，我突然感到饥饿已极，便吃起东西来。

很难说清我的感受。眼前发生的事情是那么不真实，以致它的不真实已经无法察觉；类似的情景经常在梦里，也就是被抛到幻境的漩涡中的理智犹如一块磁铁，吸引着白日世界里某个熟悉的细节，并给予它全部的关注，从而把混乱不堪的噩梦变成一种日复一日的陋习。有一次我梦见，由于某种倒霉的巧合，我变成了彼得保罗教堂尖顶上的天使，为了遮挡刺骨的寒风，我试图扣上西装，可扣子怎么也系不上。当时让我吃惊的并不是我突然居高临下地出现在了彼得堡的夜空中，而是我竟然完成不了系扣子这一习惯性动作。我现在就有这种类似的体验——眼前发生的事情的不真实仿佛处于我的意识之外；这个夜晚本身极为平常，假如没有车厢轻微的摇晃，



完全可以认为，我们是坐在彼得堡的一家小咖啡馆里，窗前还不时地有豪华马车的挂灯闪过。

我闷声不响地吃着东西，只是偶尔瞥一眼安娜。她简短地回答着夏伯阳有关轻便双马敞篷车^①和机枪的问话。我完全被她吸引住了，以致竟没在意他们的话题。她的美丽绝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这让我很是伤心；我深知，向她伸出热情的双手无异于竹篮子打水，毫无意义。

晚饭结束后，巴什基尔人从桌子上收走盘子，端来咖啡。夏伯阳仰身靠在椅背上，抽起烟来。他脸上的表情变得很平和，还微微有些睡意；他看了我一眼，轻轻一笑。

“彼得，”他说道，“您看起来心事重重，甚至，请原谅，心不在焉。而作为一个政委……他应该有魅力，您懂吗？他应该，怎么说呢……雷厉风行，冷酷无情……他应该绝对自信。始终自信。”

“我对自己是完全相信的，”我说。“不过对您却不尽然。”

“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令您不安？”

“我可以开诚布公吗？”

“当然。我，还有安娜都希望您这样。”

“我很难相信您确实是一名红军指挥员。”

夏伯阳扬起左眉。

“真的吗？”他惊讶地问道。我觉得他的语气是诚恳的。“可是为什么呢？”

“不知道，”我说。“这一切很像一场假面舞会。”

① 乌克兰及库班河地区的轻便双马敞篷车，内战时曾用来运载机枪。



“您不相信我同情无产者吗？”

“哪里，我相信。就连我自己今天在那个讲台上也体验过类似的感情。不过还是……”

我突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说什么了。饭桌上鸦雀无声，只隐约听得见安娜用勺子搅动咖啡的声音。

“那么到底谁像红军指挥员呢？”夏伯阳抖落西服前襟上的烟灰，问道。

“富尔曼诺夫，”我说。

“对不起，彼得，您今天可是第二次提到这个名字了。富尔曼诺夫是谁呀？”

“就是那位目光锐利的先生，”我说，“在我后面对纺织工人讲话的那位。”

安娜突然击了一下掌。

“对了，”她说，“我们把那些纺织工人全给忘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早就该去看望他们了。”

夏伯阳点点头。

“对，对，”他说，“您说得很对，安娜。刚才我还惦记这件事呢，可彼得给我出了道难题，搞得我把一切都抛到脑后了。”

他向我转过身。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现在，您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看吗？”

“愿意。”

“那么走吧，”夏伯阳站起来，说道。

我们从司令部车厢出来，向火车尾部走去。眼前的事让我觉得越来越奇怪。我们走过的几节车厢很黑，而且似乎完



全是空的。看不见什么地方有灯光，也听不见门后有什么动静。夏伯阳烟头上的火光映照在打磨得非常光滑的胡桃木隔墙板上。我很难相信，隔墙板的另一边睡着红军战士，但我尽量不去管这件事。

有一节车厢的尽头不是通常的过道，而是一扇木块镶成的门，透过门上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黑沉沉的冬夜。巴什基尔人没花多少力气便打开了门锁；隆隆的车轮声和刺脸的雪粒冲进车厢的走廊。门外是一个不大的围着护栏的平台，平台上方有一个顶篷，就像有轨电车的尾部一样，再往前是一节高大笨重的车厢，没有任何通道通向那里，这让人对夏伯阳究竟如何去看望他的新兵们颇为费解。我跟着夏伯阳等人走上平台。夏伯阳靠着栏杆，深吸一口烟，一阵风从烟头上卷走几颗火星。

“他们在唱歌，”安娜说道，“听见了吗？”

她举起一只手，似乎想要护住被风吹乱的头发，但马上就放下了，她的发型使得这一动作失去了任何意义。我想，她可能是不久前刚换的发型。

“听见了吗？”她朝我转过身，又问了一遍。

的确，透过隆隆的车轮声，传来阵阵相当美妙而又和谐的歌声。我仔细倾听，听出了歌词：

我们是铁匠，我们有蓬勃的莫洛赫^①，

① 莫洛赫：古代腓尼基人等所信奉的太阳、火、战神。常以儿童为祭品祭祀莫洛赫神。



我们在锻造幸福的钥匙。
沉重的铁锤高高地举起，
向钢铁胸膛猛击，猛击，猛击！

“奇怪，”我说，“为什么他们要说他们是铁匠呢？他们不是纺织工人吗？还有，为什么说他们有蓬勃的莫洛赫呢？”

“不是莫洛赫，是铁锤^①，”安娜说道。

“铁锤？”我反问道。“也对，可以理解。因为是铁匠，所以是铁锤。也就是说，是因为他们在歌中说他们是铁匠，尽管他们实际上是纺织工人。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虽然歌词荒诞不经，但这首在冬天的夜色中穿行的歌曲，却有一种难言的魔力和古老的韵味，其中的原因或许并不在于歌曲本身，而在于这众多男人的噪音、凛冽的寒风、雪封的原野和天空中稀疏的星斗的奇怪结合。火车经过一段弯道时，看得见整个由昏暗的车厢连成的长龙——显然，那些乘车的人是在黑暗中唱歌的，这无形中又为画面增添了几分神秘和奇异的色彩。我们静静地听了一会儿。

“这可能来源于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我说。“你们知道吗，那里有一个神，名叫托尔^②，他有一把当武器用的魔锤。好像《老埃达》里就有这样的记载。对，对，其余的地方同样对得上号！我们前面这节挂了霜的黑乎乎的车厢——不正是托尔投向看不见的敌人的一把铁锤吗？它在我们身后穷追不

① 俄语中“莫洛赫”和“铁锤”谐音。

② 托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雷神。



舍,没有什么力量能让它停止飞行!”

“您的想象力真丰富,”安娜说道。“难道一节脏兮兮的车厢就能让您浮想联翩?”

“您说什么呀,当然不是,”我说。“我不过是想做一个令人愉快的谈话伙伴。实际上我在想别的事。”

“在想什么?”夏伯阳问。

“我在想,人有点像这列火车。他同样注定要在身后永远拖着一串来自过去、阴森可怖、不知从哪里继承来的车厢。而他竟把种种希望、见解和恐惧偶然纠结在一起发出的毫无意义的隆隆声叫做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办法摆脱这一命运。”

“怎么会呢,”夏伯阳说道。“办法是有的。”

“您知道?”我问。

“当然。”

“或许,您会不吝赐教?”

“非常乐意,”夏伯阳打了一个响指。

巴什基尔人好像在专等这一信号。他把灯放在地上,熟练地钻到栏杆下面,朝黑黢黢的车厢接头处俯下身子,飞快地用手扒拉起铁链来。随着哗啦一声响动,巴什基尔人又麻利地回到了平台上。

对面模糊的车厢缓慢地脱离了我们。

我抬眼盯着夏伯阳。他坦然地承受着我的目光。

“冷起来了,”他说道,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回餐车去吧。”

“我马上过去,”我回答说。

我独自一人呆在平台上,默默地凝望着远方。还能听到



纺织工人们的歌声,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那些车厢离我们也越来越远;我突然觉得,这串车厢很像一只蜥蜴逃跑时甩掉的尾巴。这是一幅完美的图画。啊,要是真能像夏伯阳摆脱这些人那样,轻松地摆脱由许多虚假的“我”构成的、多年来一直在毁坏我灵魂的阴险的坏蛋,该有多好啊!

很快我就感到冷了。我回到车厢,关上门,摸索着往回走。到了司令部车厢以后,我觉得疲倦已极,连身上的雪花都没有抖掉,就直接钻进自己的包厢,一头倒在床上。

夏伯阳和安娜坐在餐车里,听得见他们的谈笑声,还有开香槟时“砰”的一声。

“彼得!”夏伯阳喊道。“别睡了!到我们这儿来!”

吹过平台上的寒风以后,我感到包厢里暖和的空气特别宜人。我甚至觉得,空气更像是水,我终于洗上了期待多时的热水澡。当这种感觉变得极为真实时,我明白,我快要睡着了。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还有一个迹象,即留声机里传出的已不是夏里亚宾的演唱,而是突如其来的莫扎特的那首赋格曲,我的这一天正是从这支曲子开始的。我感到,我无论如何不该入睡,但又毫无办法。我放弃挣扎,一头坠向今天早上使我惊讶不已的钢琴所奏出小调音符的间歇处——那条楼梯的拐角。



4

“喂！别睡了！”

有人小心地摇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抬起头，睁开眼睛，看到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孔——圆圆的，胖胖的，周围还有一圈保养得很仔细的胡须。尽管这张脸上挂着亲切的微笑，却不能激起我报以微笑的愿望。我马上明白了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他那修剪得很整齐的胡须和剃得溜光的脑袋。这位朝我俯下身子的先生让我想起那些见到什么就倒卖什么的投机倒把分子，这种人在战争刚开始时的彼得堡数不胜数。这些人通常是小俄罗斯^①的移民，他们具有两个主要特征——生存能力惊人，对首都流行的最新通灵术深感兴趣。

“弗拉基米尔·沃洛金，”脸上有胡须的人自我介绍说。“也可以直接叫我沃洛金。由于您已经下定决心再次失去记忆，所以我们只好重新认识。”

“彼得，”我说道。

“您最好别做任何剧烈运动，彼得，”沃洛金说。“在您睡

^① 小俄罗斯系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的蔑称。



觉的时候，给您注射了四西西安定，因此您的这个早晨将会很郁闷。假如周围的人或事让您感到压抑和憎恶，请您不要介意。”

“噢，”我说，“亲爱的，我对此早就见怪不怪了。”

“不，”他说，“我指的是，您可能会觉得，您置身其中的情境讨厌之至，怪异和荒谬之至，与生活水火不相容。”

“那又怎样？”

“别在意它。这都是针药的作用。”

“那我就试试吧。”

“这太好了。”

我突然发现，这个沃洛金一丝不挂。不仅如此，他还全身湿漉漉地蹲在铺着白色瓷砖的地面上，身上的水珠滴滴答答流了一地。这还算不了什么。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他把一只青筋突起的长臂撑在瓷砖上时那种非常放松的、无拘无束的姿势，那副难以觉察的、猴子般懒散随意的神态。同时，这种懒散随意的神态似乎还在表明：周围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对于那些身材高大、汗毛浓密的男人而言，以这样的姿态坐在地上是十分自然和正常的，谁要是有不同看法，谁的日子将不太好过。

显然，有关针药的话并非虚言。我的知觉的确遇到一件怪事。有好一阵，沃洛金独自出现在我的意识里，没有任何背景，仿佛居住证上的照片。等到将他从头到脚细细地打量完毕，我这才突然关注起这一切是在何处发生的。我刚一想到我们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马上就出现了——不管怎么说，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们呆在一个贴满白色瓷砖的大房间里，地上摆着五个铸铁的浴盆。我躺在最边上的一个浴盆里；令我厌恶的是，我突然发现，里面的水冰凉。沃洛金鼓励地最后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原地转过身去，以一个很不雅观的灵巧动作，半蹲着直接跳进我旁边的浴盆，几乎连一滴水花都没有溅起。

除了沃洛金，其余的浴盆里还躺着两个人：一个是蓄着淡黄色长发的男子，蓝色的眼睛，稀稀拉拉的胡子，好像古代的斯拉夫勇士；另一个是深色头发的年轻人，白白净净女性化的脸，长着一身过度发达的肌肉。他们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好像您确实不记得我们了，”片刻的沉寂过后，那个淡黄头发的男子说，“我叫谢苗·谢尔久克。”

“彼得，”我回答道。

“马利亚，”边上的浴盆里的年轻人说。

“什么？”

“马利亚，马利亚，”他用明显不满的口气重复道。“这是我的名字。您知道吗，有个作家叫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①。我取这个名字就是为了纪念他。”

“没听说过，”我回答说。“大概是个新作家吧。”

“还有个叫勒内·马利亚·里尔克^②的。也没听说过吗？”

“怎么会呢，这个人我听说过。甚至还认识。”

“那好，他叫勒内·马利亚，而我呢，就叫马利亚。”

① 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1896—1977)，德国现实主义作家，擅长写战争题材，代表作有《西线无战事》、《凯旋门》等。

② 勒内·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生活与诗歌》、《祈祷书》、《杜伊诺哀歌》等。



“对不起，”我说，“我好像听出了您的声音。那个关于飞机，关于俄罗斯与西方炼金术式的联姻等离奇故事就是您讲的吧？”

“是我，”马利亚回答道，“您认为什么地方离奇？”

“当然，总体上说没有什么离奇的，”我说，“可不知为什么，我以为您是女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马利亚回答说。“正如我们的主人讲的那样，我的伪人格毫无疑问是女人。顺便问一下，您不会是一位变性沙文主义者吧？”

“您说到哪里去了，”我说。“我只是觉得奇怪，您怎么这么容易就同意了您的这一人格是假的。您对此真的相信吗？”

“笼统地说，我什么都不相信，”马利亚说。“我这都是脑震荡引起的。而我被留在这里，是因为主人在写一篇论文。”

“主人是谁呀？”第二次听到这个词，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铁木尔·铁木罗维奇，”马利亚回答道。“主任医生。他研究的恰好是伪人格。”

“不全是这样，”沃洛金插嘴说。“他研究的课题叫‘伪人格的分裂’。如果说，马利亚的情况比较简单，说他伪人格分裂还有些牵强附会的话，那么您，彼得，对铁木尔·铁木罗维奇来讲则是一件极有价值的样品，因为您身上的伪人格发展到了十分完整的地步，几乎完全取代并压倒了您的真人格。至于它是怎样分裂的，简直引人入胜。”

“没这么回事，”一直沉默不语的谢尔久克反驳道。“彼得



的情况并不是很复杂。就结构方面来说,他与马利亚几乎没什么区别。都出现了混淆,只不过马利亚混淆的是名字,彼得混淆的是姓。但彼得的真伪人格之间的相互排斥更为激烈。他甚至连自己的姓都不记得了,一会儿说自己是什么法涅尔内伊,一会儿又说自己是另外什么人。”

“那我到底姓什么呢?”我不安地问道。

“您姓虚空,”沃洛金回答。“您的神经错乱,与您否认自己人格的存在有关。您用另外一个完全是臆想出来的人格取代了自己的人格。”

“尽管从结构方面来说,我再说一遍,他的情况并不复杂,”谢尔久克补充道。

我感到很气愤——一个莫名其妙的疯子竟然认为我的情况并不复杂,这让我觉得十分委屈。

“诸位,你们居然跟医生一样振振有辞,”我说。“你们不认为这有点荒唐吗?”

“有什么荒唐的?”

“假如你们是穿着白大褂站在这里,”我说,“自然另当别论。可你们毕竟是躺在这里,尽管你们自认为头脑清醒。”

沃洛金默默地打量我一阵。

“我是一个不幸事件的受害者,”他说道。

谢尔久克和马利亚大笑起来。

“至于我,”谢尔久克说,“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伪人格。这是一种常见的、酗酒情况下的自杀倾向。而我之所以被留在这里,是因为仅靠你们三人做不出论文来。只是为了统计数字而已。”



“不要紧，不要紧，”马利亚说。“下一个就轮到你上颈箍^①了。那时我们倒要听听，你的酗酒自杀是怎么回事。”

这时，我真的冻僵了，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据沃洛金说会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变得无法忍受的针药，还是因为水的确太凉。

感谢上帝，门开了，进来两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我想起来了，他们中一个姓热尔布诺夫，另一个姓巴尔博林。热尔布诺夫拿着一只大沙漏，巴尔博林抱着一大包内衣。

“咱们出去吧，”热尔布诺夫快活地说道，在自己面前晃了晃沙漏。

他们俩用毛巾挨个替我们擦干身子，帮我们穿上一模一样的、顿时为眼前发生的事增添了些许海军意味的横条子病号服。然后他们俩把我们带出门，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往前走。这条走廊也是似曾相识，确切地说，不是走廊本身，而是里面那股隐隐约约的医院气味。

“请问，”我回过头，悄悄地问走在我身后的热尔布诺夫，“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他惊讶地睁圆了眼睛。

“这你自己还不知道？”他说。

“不知道，”我说，“我已经准备承认我有病，可理由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很久了吗？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有什么问题去找铁木尔·铁木罗维奇，”热尔布诺夫说

① 颈箍：西班牙和葡萄牙中世纪使用的铁制绞刑具，行刑时将螺丝拧紧，使受刑者颈骨断裂而死。



道。“我没工夫跟你扯淡。”

我感到极为沮丧。我们在一扇写着数字“7”的白门旁边停了下来。巴尔博林用钥匙打开门，放我们进去。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房间，靠墙摆着四张床。床已经铺好，装有铁栏杆的窗户旁边放着一张桌子，墙边是一个介于沙发和躺椅之间的东西，上面有用于固定手脚的弹性环扣。尽管有这些环扣，但这个器械并无任何可怕之处。一看它的模样就知道，这显然是一把医用椅子，我的脑子里甚至还迸出一个荒唐的词组：泌尿科用椅。

“请问，”我问沃洛金，“这是什么，是您刚才提到的颈箍吗？”

沃洛金快速扫了我一眼，冲门口点了点头。我扭过头去。门口站着铁木尔·铁木罗维奇。

“颈箍？”他扬起眉毛，反问道。“颈箍，假如我没搞错的话，就是中世纪的西班牙用来施行绞刑的椅子，对吧？您把周围的现实看得多么阴暗，多么压抑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彼得，您今天早上打过针，所以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可是您呢，弗拉基米尔^①？我很吃惊，很吃惊啊。”

铁木尔·铁木罗维奇唠叨完，挥手打发走热尔布诺夫和巴尔博林，自己则走到屋子中间。

“这不是什么颈箍，”他说。“这只是普通的沙发床，用于我们的集体治疗。您，彼得，已经接受过这样一场治疗了，就在您刚从隔离室回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不过，您的状况当时很

^① 指沃洛金。



复杂,您未必有什么印象。”

“哪里,”我说,“我多少有点印象。”

“那更好。我简要地向您提示一下这里的情况。我研究出来并正在采用的这种方法,姑且可以称为涡轮式荣格^① 治疗法。荣格的观点,不用说,您是知道的……”

“对不起,您说谁?”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好吧,我看,您的心理主动性受到了伪人格的严密监控。而由于您的伪人格生活在一九一八年或者一九一九年,因此,就算您不记得他,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有可能,您确实没听说过荣格?”

我郑重其事地耸了耸肩。

“简而言之,有那么一位叫荣格的心理学家。他的治疗方法建立在一条非常简单的原理上。他发现,一些象征可以自由地上升到患者的意识表层,根据它们就能够做出诊断。我指的是在破译了这些象征之后。”

这时,铁木尔·铁木罗维奇狡猾地笑了一下。

“而我的方法稍有不同,”他说,“尽管原理都一样。您要知道,按荣格的做法,应该把您送到瑞士某地的一座山地疗养院,放到一把躺椅上,和您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不知要等上多少时间,这些象征才会出现。我们不能那样做。我们不是把您放到躺椅上,而是放到这里,”铁木尔·铁木罗维奇指了指沙发,“然后给您打上一针,然后观察涌现出来的大量象征。接

^① 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创始人。



下来就是我们的事了——破译并治疗。明白吗？”

“多少明白些，”我说。“您怎样破译它们呢？”

“这您自会见到的，彼得，自会见到。我们的治疗每逢周五进行，因此再过三周……不，再过四周就该轮到您了。顺便说一下，我想告诉您的是，我都已经等不及了，跟您一起工作非常有趣，非常。当然，跟你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的朋友们。”

铁木尔·铁木罗维奇微微一笑，把他热浪般的爱意撒满房间，然后双手抱拳，鞠了一躬。

“现在该去上课了，”他说。

“上什么课？”我问。

“瞧，”他看了一眼手表，“都已经一点半了。审美治疗实习课。”

如果不算唤醒我的心理水疗法，我还从未体验过比这种审美治疗实习课更为烦心的事情，尽管这可能是针药的原因。实习课在我们病房隔壁的房间里进行。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半明半暗；房间的角落里摆着一张长桌子，上面堆放着许多五颜六色的蜡泥块，还有一些模样丑陋的小陶马，仿佛是有艺术天分的孩子捏的，此外还有一些纸船模型、弄坏的洋娃娃和皮球。桌子正中放着一尊很大的亚里士多德石膏胸像，而我们就坐在胸像对面裹着棕色漆布的四把椅子上，膝盖上放着画板。审美治疗要求我们做的就是，用拴在画板上带黑色橡皮的铅笔临摹这尊胸像。

沃洛金和谢尔久克仍然穿着他们的横条子病号服，而马利亚则脱掉了病号服，穿了一件领口一直开到肚脐的汗衫。



他们耐心地用铅笔在纸板上画着,不难看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治疗。我应付地胡乱勾勒了一个草图,然后把画板往旁边一扔,开始东张西望。

毫无疑问,针药还在起作用,我的感觉跟在浴室里一样。我不能充分认识现实。我的目光投向哪里,哪里便会出现周围世界的要素,这使我产生一种眩晕感,觉得正是我的目光在创造这个世界。

我突然发现,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画在小纸片上的图画。其中有些图画还相当有趣。

有一部分显然是马利亚画的。这些画极其拙劣,近乎儿童的涂鸦,以不同形式重复着同一个主题——一架带有强悍的突出物、具有男性生殖器崇拜特征的飞机。这架飞机有时尾部朝下,从而赋予画面一种基督教意味,但这是一种亵渎性的意味。总的来说,马利亚的画没有多大意思。

倒是另一组画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而且不仅仅是因为作者拥有毋庸置疑的艺术才能。这些图画均以日本为题材。这一题材的表现方式有点古怪,风格也不一致,大多数图画——有七八幅——似乎是试图复制在什么地方见过的图画:一个日本武士带着两把宝剑,不知羞耻地裸露着下身,脖子上挂着一块石头,站在悬崖边上。还有两三幅图画描绘的是一些骑手在休息,背景是一些远山。这些山画得颇见功底,是传统的日本风格。画面上,几匹马拴在树上,而下了马的骑手们穿着宽松的、五颜六色的衣服,坐在不远处的草地上,正用陶制的浅口碗喝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色情画——一个神情冷漠、头戴蓝色小帽的男人,在跟一个女子做爱,这个女子



长着一张高颧骨的斯拉夫人的脸。这张脸有些令人不寒而栗。

“对不起，先生们，”我忍不住问道，“这些日本题材的作品是谁的？”

“谢苗，”沃洛金问道，“你这些画是谁的？大概是医院的吧？”

“这是您的吗，谢尔久克先生？”

“是我的，”谢尔久克回答。他蹙起额头，用他那双湛蓝的眼睛看了看我。

“真了不起，”我说。“只是也许稍微灰暗了些。”

他什么也没回答。

第三组图画我猜是沃洛金的，十分抽象，是印象派的画法。这里也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三个模糊的黑影，围着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条光柱自上而下照射在他们身上。从构图上看，有点像那幅画着三个猎人围坐在篝火旁的名画，只不过这堆篝火中刚刚发生过爆破弹爆炸。

我看了看另一堵墙，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这大概是我一生中记忆幻觉症发作得最为严重的一次。这是一块两米长的硬纸板，上面画满了细小的、五颜六色的人物，一看到这幅画，我马上感觉到自己跟这个古怪的东西有着深刻的联系。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它跟前。

我的目光落在纸板的上半部分，上面画的好像是历史教科书中常见的那种作战平面图。平面图的中间有一个涂着细线条的蓝色椭圆，里面写着几个大字：**精神分裂症**。椭圆上方是三个红色的粗箭头——中间的一根直抵椭圆，另外两



根则迂回着，从椭圆两侧包抄过来。箭头上分别写着“胰岛素”、“冬眠灵”和“磺胺嘧啶”。椭圆下方伸出一条蓝色的虚线箭头，下面写着：“疾病败退”。研究完这幅平面图，我把目光转向下面的图画。

画面上人物众多，细节丰富，场面混乱，就像给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作的插图——我指的是能容纳小说的所有人物和情节的那种插图。同时，这幅画就其特点而言，很像出自孩子的手笔，因为画面完全打破了透视法则和内容规范。硬纸板的右面画的是一个大城市。一看到以撒大教堂金色的圆顶，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彼得堡。城市街道的有些地方画得很细腻，有些地方则只用线条表示了一下。跟平面图一样，这些街道上布满了箭头和虚线，它们明显是在描绘某个人的生活轨迹。从彼得堡引出一条虚线，与具有同样特点的不远处的莫斯科相连接。莫斯科里面只有两个地方很显眼——特维尔街心花园和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从火车站伸出两条蛛丝一样纤细的铁轨，一直通到硬纸板的中央，途中越来越粗，越来越宽，变成一幅多少有点符合透视法则的立体图画。铁轨通向地平线上一片金黄色的麦地，上面停着一列笼罩在烟雾和蒸汽中的火车。

火车画得很细致。机车被几发直接命中的炮弹炸毁，圆桶形车身上的几个窟窿冒出团团的蒸汽，被炸死的司机半个身子从驾驶室里伸出来，耷拉在外面。机车后面的站台上停着一辆装甲车（不知该不该讲，此时我的心跳得有多么剧烈），上面的机枪塔对着金黄色的麦浪。机枪塔的盖子敞开着，看得见安娜留着短发的脑袋。夏伯阳站在装甲车旁边；棱条形



的枪管朝着他的军刀指示的方向，也就是朝着麦地，喷吐着火舌。他戴着羊皮高帽，披着一件系在脖子上、拖到脚后跟的毛茸茸的黑色披风。他的姿势显得过于做作。

画面上的火车离车站只差几米远，车站的大部分纸板已经容纳不下；只能见到站台的围墙和一块写着“柳树站”的牌子。

我企图在画面上找到安娜从机枪塔上扫射的敌人，可见到的只是许多大致勾勒出的身影，隐藏在几乎齐肩高的麦丛中。这幅画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作者并不是很清楚这是在和谁打仗，为什么打仗。至于说到这位作者本人，遗憾的是，我对他没有多少怀疑。

画的底下，用印刷体写着几个大字：

柳树站之战。

旁边是用另一种笔迹做的补充：

夏伯阳身着披风，而彼得卡入院发疯。

我迅速朝其余的人转过身子。

“听我说，先生们，你们不觉得这对正派人来说有点出格吗，啊？假如我也这样干，会怎么样？啊？会怎么样？”

沃洛金和谢尔久克把目光移开。马利亚装作没听见。我注视了他们一阵，想要搞清楚是谁干的这件下流事，但谁都没



把自己供出来。不过,说句实话,这并没有让我特别着急,在很大程度上,我的气愤是虚张声势。我更在意的是这幅画,从第一眼看到它,我就感觉到这是一幅未完成之作。我把身子转回去,揣摩着究竟是什么让我心神不宁。好像是作战示意图与火车之间的地带,这个地方按常理应该是天空——很大一块纸板上什么都没画,给人的感觉是一片深陷的虚空。我走到桌子跟前,从一大堆杂物中摸出一截红蜡笔和一条几乎完整的炭精棒。

我用半小时的工夫,给麦地的上空添加了一些榴霰弹爆炸产生的黑烟。我把这些黑烟画成一个样子——先用炭精棒涂一片浓黑的小云朵,再加上一些四散的碎片,碎片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用红蜡笔画的轨迹。

结果这很像凡·高的一幅名画,那幅画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只记得画的是一片麦地,上空有许多乌鸦,看上去就像一个个笔划粗壮的字母“V”。我不由得想,在这个世界上,艺术家的处境真是进退两难。起先,这一想法还给我带来些许苦涩的满足感,但很快又让我觉得虚伪之极。不仅仅因为它俗不可耐,还因为它有一种卑鄙的拉帮结派嫌疑:所有搞艺术的人都在这样或那样地重复着这个想法,把自己划归到某个特殊的、存在主义的帮派之中,可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一个女机枪手,或者比方说,一个护理员的处境还有其他出路吗?或者说,在他们身上,那些难以忍受的荒诞会少一些吗?难道这种生存的巨大悲剧乃是人类在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吗?

我朝身旁的其他人转过身。谢尔久克和马利亚被亚里士多德的胸像吸引住了(马利亚还紧张得伸出了舌头),而沃洛



金则全神贯注地盯着硬纸板上的画在我的笔下如何变化。碰到我的目光，他疑惑地笑了笑。

“沃洛金，”我说道，“向您提个问题行吗？”

“请吧。”

“您的职业是什么？”

“我是一名企业家，”沃洛金说道。“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新俄罗斯人’。至少曾经是。您为什么问这个？”

“您知道我在想什么……常听人说——艺术家的悲剧，艺术家的悲剧。可为什么总是艺术家呢？这有点不公平。您明白其中的原因吧，艺术家毕竟是一些引人注目的人物，因此，他们遭遇的不幸总是尽人皆知，并能引起公众的议论。难道人们会记得一个……不，企业家他们会记得……比如说吧，火车司机？不管他的生活有多么悲惨？”

“您呀，彼得，思路不对头，”沃洛金说。

“什么意思？”

“您在混淆概念。悲剧不是发生在艺术家身上，也不是发生在火车司机身上，而是发生在艺术家或火车司机的头脑里。”

“请原谅，您说什么？”

“我原谅您，原谅您，”沃洛金轻声说罢，埋头作起画来。

沃洛金的话过了好半天才传到我的耳朵里，我明白他想说什么。但由于思维萎靡不振（针药所致），他的话没有引起我的任何回应。

我回到硬纸板前，在田野上方画了几道浓黑的烟柱，用掉了整根炭精棒。这些黑烟与榴霰弹爆炸的黑斑交织在一起，



给画而增添了一种强烈的无望情绪。我感到很不自在，便尽量在地平线上多加一些穿过麦地阻击敌人的骑兵。

“您画战争场而不在行，”沃洛金说道，不时地从自己的画板上抬起头来，扫一眼我的画。

“都这样说，”我回答道。“您是不是经常画篝火中的爆炸？”

“篝火中的爆炸？”

我指了指挂在墙上的那些画。

“既然您认为，这像是篝火中的爆炸，我也就无话可说了，”沃洛金回答。“完全无话可说。”

我觉得他有些懊丧。

“那这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天光下泻，”他回答说。“难道看不出来，它是从上而照下来的吗？那儿还专门作了补画。”

我在脑子里进行了一番连续推理。

“按我的理解，您是躺在这天光下。”

“理解得对，”沃洛金说。

“这没什么，”我礼貌地说。“我一开始就觉得，您不是一般人。可他们到底指控您什么呢？指控您看见了天光？或是您企图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他们指控我就是天光，”沃洛金说。“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是吗，我认为您在开玩笑，”我说。“还是说真格的吧。”

沃洛金耸了耸肩。

“我曾经有两个助手，”他说道，“年龄跟您差不多。他们



就是那类,您知道吧,打扫现实的清洁工。如今的生意场上缺了他们不行。对了,画上也有他们——看见这两个人影没有?对。简单地说,我已经习惯了跟他们高谈阔论。有一次,我们开车进入一片树林,我指给他们看……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实话实说吧。其实我并没有指给他们看,是他们自己发现的。简单地说,我画的就是当时的情景。这件事对他们刺激很大,一周以后,他们跑去报告。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样的白痴,每人身上都欠十条人命,居然敢说,与他们将要报告的相比,这件事简直微不足道。我要告诉您,现在的人一肚子坏水。”

“您说的对,”我回答道,忽然想起自己的事。

巴尔博林把我们领到餐厅吃午饭。餐厅有点像浴室,只不过没有澡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一模一样的塑料桌子,以及一个分发食物的窗口。只有一张桌子铺了桌布。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说话。当我喝完汤准备吃粥时,我突然发现沃洛金推开自己的盘子,神情专注地盯着我。开始我尽量不予理会,后来终于按捺不住抬起眼睛,挑衅地跟他对视着。他友好地微微一笑——意思是,他的目光没有任何恶意——说道:

“您知道吗,彼得,我有一种感觉,我们见过而,在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场合。”

我耸了耸肩。

“您是否认识这样一个人——红脸膛,三只眼,戴一条颅骨做成的项链,在一堆堆篝火中间跳舞,个子挺高的,挥舞着两把弯曲的军刀?”他问道。



“也许认识吧，”我礼貌地说，“但我不明白，您到底指的是谁。要知道，您说的这些特征很粗略。谁都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明白了，”沃洛金说道，然后埋下头，继续吃饭。

我伸手去拿茶壶，想往杯子里倒点茶，但马利亚摇了摇头。

“最好别喝，”他轻声说。“溴。会失去性功能。”

沃洛金和谢尔久克倒是若无其事地喝着这种茶。

午饭后我们回到病房，巴尔博林马上就不见了。显然，我的三个病友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制度，他们躺到自己的床上，一转眼工夫就睡着了。我伸开手脚仰面躺着，久久地凝视着天花板，享受着自己难得一遇的彻底的无思维状态，这可能是早上的针药的最后作用了。

实际上，把这种状态称为无思维不是十分确切，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尽管我的意识完全摆脱了思维，无法对思维做出反应，但对外部刺激仍旧敏感。当我发现自己的脑子里完全没有思维时，这本身已经是思维，是对没有思维的思维。结果是，真正没有思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无法界定。或者说，没有思维意味着虚无状态。

这是一种奇妙的状态，全然不像寻常的理智内部一成不变的滴答声。顺便说一下，我总是对有些人固有的一个特征感到吃惊——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心理过程。这种人能够长期与外部刺激相隔离，体会不到任何现实需求——在他的身上，不需要任何明显的原因，就会突然出现一种不由自主的心理过程，促使他在周围世界中采取一些无法预料的行动。这



对一个旁观者来说,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一个人仰而躺着,躺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然后突然爬起来,慌忙穿上拖鞋,开始毫无目的地漫游,仅仅因为他的思维在毫无目的地漫游,凭着一个模糊的理由(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理由)。要知道,这样的人占了大多数,并且正是这些梦游者决定着我们这个世界的命运。

我的铺位周围的宇宙向四而八方延伸开去,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喧闹声。有的声音我分辨得出来,比如楼上敲榔头的叮当声,远处寒风拍打护窗板的哐啷声,还有乌鸦嘎嘎的叫声,但大多数声音仍然来源不明。真是奇怪,人一旦排空了充塞于意识之中的僵硬渣滓,马上竟会有这么多新事物展现在他的眼前!我们甚至不清楚,我们能听见的声音中大部分来自何方。既然如此,仅凭我们自以为了解的少量事物,焉能对其余的一切妄下断言?为我们的命运和我们的行为寻求解释的企图有何意义?可以尝试用荒唐的社会统计方法来解释别人的内心生活,铁木尔·铁木罗维奇就是这样做的,但未必会取得成功。想到这里,我的记忆中突然浮现出我那本放在他桌子上的厚厚的卷宗。接着我又想到,巴尔博林离开时忘了关门。忽然间,我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我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午休时间已过去至少二十分钟,我的三个病友都在睡觉。整栋大楼似乎都人睡了,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人从我们的病房门口经过。我小心地掀开被子,穿上拖鞋,站起身,偷偷溜到门口。

“上哪儿去?”有人在背后悄声问道。

我回过头去。是马利亚。他头上蒙着被子,一只眼睛正



透过被子上一个狭小的观察孔,从角落里盯着我。

“上厕所,”我悄声答道。

“别充好汉,”他悄声说道,“这儿有便盆。抓住了可要关一天禁闭。”

“与其蹲着尿,不如站着撒,”我悄声答道,一闪身溜进走廊。

走廊里空空荡荡的。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铁木尔·铁木罗维奇的办公室紧挨着一扇高高的半圆形窗户,窗外一棵大树的树冠伸手可及。我所置身的走廊在前面很远的地方转向右首,一片明亮的白昼的光斑投射在拐角的亚麻地毯上。我弓着身子,走到拐角,见到了窗户。办公室的门我也马上认出来了,因为上面有一个考究的镀金手柄。

我把耳朵贴到手柄下面的小孔上,站了一会儿。办公室里鸦雀无声。终于,我鼓足勇气,把门推开一条缝。办公室是空的。桌子上放着几个文件夹,但我的,也就是最厚的那本(我很清楚地记得它的外观),并不在原来的地方。

我绝望地环视一下四周。招贴画上那位被肢解了的先生用一种非人的、乐观的表情望着我;我感觉很不好,很害怕。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马上会有几个护理员闯进办公室。我正准备转身往外跑时,突然发现一本打开的文件夹摆在桌上,上面散乱地放着一些纸。

“确定疗程:每次水疗前注射安定。目的:缓解言语运动功能,同时激活心理动力复合体……”



还有几个拉丁词语。我推开这些纸，把文件夹的纸板封面翻过来，看到上面写着：

卷宗：彼得·虚空

我坐到铁木尔·铁木罗维奇的椅子上。

最早的记录是单独插在文件夹里的一叠纸，时间已经相当久远，紫色的墨迹已经褪色，从而获得一种历史色彩，仿佛档案里记录的人早已不在世上。我埋头阅读起来。

患者幼年没有任何心理异常现象，是个乐观、温和、喜欢交往的男孩。学习成绩很好，迷恋写作一些美学价值不大的诗。最初的病理性异常出现在大约14岁的时候。表现出与外部原因无关的封闭和易怒倾向。按父母的说法是，“脱离了家庭”，处于情感的疏离状态。不再与同学来往——他解释说因为他们取笑他姓“虚空”。据他说，连女地理教师也这样做，不止一次地称他为空人。学习成绩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文献，如休谟、贝克莱、海德格尔的著作以及所有以不同方式对虚空和虚无进行哲学探讨的书籍。结果他开始“形而上”地看待那些最简单的事件，宣称自己在能够“大无畏地建立生活功勋”的勇气方面胜过同龄人。开始经常旷课，此后，家人只得求助于医生。

与精神病医生的交流很容易。容易相信别人。关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患者的声明如下。他有一种“特殊的处世观念”。患者总是对周围的一切事物“突发奇想”。在描述自己的心理



活动时,患者宣称,他的思想“仿佛牙齿咬住各种现象,并直抵现象的本质”。借助其思维的这一特性,他能够“细致入微地分析向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分析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母”,同时,他的头脑中有“一场由许多个彼此争论不休的‘我’所进行的雄壮的大合唱”。患者变得极为优柔寡断,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古人的经验”,其次是因为“难于弄清充满矛盾的内心生活中喧嚣与色彩的漩涡”。另一方面,据患者自己说,他能达到“思绪遗飞”,这使他能够“鹤立鸡群,不同凡俗”。因此,他抱怨孤独,抱怨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他。按患者自己的说法,没有一个人能在思想上与他“产生共鸣”。

患者认为自己能看见并感觉到“凡人”无法理解的东西。譬如,在窗帘或桌布的皱褶中,在壁纸的图案中,他能分辨出那些体现“生活之美”的线条、花纹和形式。他自称这是他的“非凡成就”,也是他日复一日地建立“不由自主的生存功勋”的目的所在。

患者认为自己是以往伟大哲学家的唯一继承者,经常长时间地演练“当众演说”。对于自己身处精神病院,他并不感到苦恼,因为他坚信,无论身在何处,他的“自我发展”都将“沿着正确的道路”进行。

不知是谁用粗蓝铅笔在一些紫色的字句下面划了横线。我翻到下一页。这篇文字的标题为“感官分析适应征候”。字里行间充满了拉丁语。我开始迅速往后翻。一叠用紫色墨水写得密密麻麻的纸,甚至没有装订到文件夹里——很有可能取自另外一个卷宗。下面的一份记录是文件夹中最厚的,前



面夹了一张纸,上面写着:

彼得堡时期

(对梦呓的最稳定特征的校注。重复住院治疗)

但第二部分我一个字也没来得及读。门外传来了铁木尔·铁木罗维奇的声音,他在激动地向一个人解释着什么。我赶紧把文件夹放回原处,将桌面大致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然后冲向窗户。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要藏到窗帘后面。可它挂得靠窗户太近,几乎紧贴着玻璃。

铁木尔·铁木罗维奇嘟嘟囔囔的声音离门不远,似乎他在找碴儿责骂一个护理员。我悄悄走到门口,从锁孔里往外看了看。外面一个人影也没有,好像办公室的主人和他的交谈者站在距拐角处几米远的地方。

我接下来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出自本能。我迅速走出办公室,踮着脚尖跑到对面,推开门,钻进黑咕隆咚的落满灰尘的储藏室。我的行动很及时。拐角那边的说话声静下来了,紧接着,透过狭窄的门缝,我看到了铁木尔·铁木罗维奇的身影。他低声骂着娘,进了办公室。我从一默数到三十五(不知为什么是三十五——我平生与这个数字没有任何联系),然后一闪身进入走廊,悄无声息地溜回自己的病房。

没有人发现我回来,走廊里空空荡荡的,我的病友都在睡觉。我躺到床上,刚过几分钟,走廊里就传来了悦耳的起床铃声;几乎与此同时,巴尔博林走了进来,说病房里要灭蟑螂,因



此今天我们还要上一次审美治疗实习课。

看得出来，疯人院里的气氛正在使人变得驯服。没有人想到要表示不满或者提出异议：这样长时间持续不断地临摹亚里士多德怎么吃得消呢。只有马利亚在鼻子底下含混不清地嘟囔着什么。我发现，他醒来后情绪很坏。也许他梦见了什么，他刚一起床，马上就跑到墙上的镜子跟前，研究起自己的形象来。他似乎很不喜欢自己的模样，足足有好几分钟，他用手指搓揉着眼圈，按摩眼睛下面的皮肤。

他上审美实习课迟到了很久。进屋以后，他连想都没想到要像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一样乖乖地拿起纸笔来画亚里士多德。他先是在墙角坐下，用一条黄带子把脑袋缠起来，像是为了保护他的发型，免得被他精神空间里的狂风吹乱，然后开始直愣愣地端详着我们，那神态就像是初次见到我们一样。

关于风的问题我不太清楚，倒是房间里的乌云显然越来越浓了。沃洛金和谢尔久克根本就没理会马利亚，这让我觉得我有点小题大做。不过沉默的气氛还是让我感到难受，于是我决定打破这一沉默。

“对不起，谢尔久克先生，您不介意我跟您说说话吧？”我问道。

“哪里，”谢尔久克礼貌地回答说，“您请便。”

“看在上帝份上，请恕我冒昧，您是因为什么到这里来的？”

“因为孤僻，”谢尔久克说。

“是吗？难道因为孤僻也要被送进医院？”

谢尔久克久久地打量着我。



“办入院手续时,说我得的是酒狂状态下的自杀及漫游综合症。尽管没人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请您讲得具体一些,”我说。

“没什么可讲的。我独自躺在‘山上大道’的一间地窖里。我得声明,我躺在那儿纯粹是出于很重要的个人原因,头脑完全是清醒的,尽管很痛苦。这时来了一个警察,手里拿着手电筒和冲锋枪。他要检查我的证件。检查就检查吧,我出示了证件。检查完了,他就问我要钱,这也没什么。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大约两万卢布。可他收下钱,还在那里磨磨蹭蹭,死活不肯走开。我真想转过身去把他忘掉,可又不行,只得跟他说起话来。你拿眼睛瞪着我干吗,我说,大概你是嫌上面强盗太少,是吧?这个警察倒是很健谈,后来才明白,原来他哲学系毕业。凭什么说上面强盗多呢,他问。他们毕竟没破坏秩序。我问他——这话怎么讲?就这么讲,他说。一个正常的强盗,他会是什么样的呢?只要打量他一眼,马上就能看出他是不是要抢劫和杀人。被抢的人,他接着说,也没破坏秩序。他头破血流地躺在那里,心想,无非是被抢了。而你躺在这里——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显然是在想别的事……你似乎对周围的一切并不相信。或者说是怀疑。”

“那么您说什么呢?”我问道。

“我还能说什么,”谢尔久克说道。“我真想直接告诉他——没准儿我的确怀疑。东方的智者说过,世界就是幻象。当然,跟他谈论东方智者的时候,我考虑到了他的水平。谈得很粗浅。他脸都红了,说,这成什么了?我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黑格尔,可现在却扛着冲锋枪,而你只不过读了点《科学与



宗教》杂志,就以为自己可以钻到地窖里来怀疑现实世界?简单地说,就是这样,先去了他们那儿,然后就到了这儿。我肚皮上有一条划伤,瓶子碎片割的,就凭这个划伤,他们认为我有自杀倾向,为我办了手续。”

“要是我的话,”马利亚突然插嘴说,“非教训那些怀疑现实的人不可。他们不该呆在疯人院,应该呆在监狱里。或是更糟糕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呢?”谢尔久克问道。

“需要解释吗?”马利亚不友好地问道。“那好,到这儿来,我给你解释。”

他从靠近门的地方站起来,走到窗前,等谢尔久克跟过去,他伸出那只肌肉发达的手臂,指了指窗外。

“看见了吗,那辆‘奔驰 600’?”

“看见了,”谢尔久克说。

“你说这也是幻象?”

“完全可能。”

“知道是谁开这个幻象吗?我们疯人院的商务经理。他叫沃夫奇克·马洛伊,绰号尼采信徒。你见过他吧?”

“见过。”

“对他有什么想法?”

“明摆着,强盗一个。”

“那么想想吧,为了买这样一辆车,这个强盗可能杀了十个人。假如这只是幻象,这十个人不是白白送命了吗?怎么不说话?闻到血腥味了吧?”

“闻到了,”谢尔久克闷闷不乐地说,转身回到自己的椅子上。



看得出,这时马利亚也产生了绘画的兴趣。他从墙角拿起自己的画板,坐到其他人旁边。

“不,”他眯缝起眼睛,凝视着亚里士多德的胸像,说道,“假如你想有朝一日能从这里出去,就应该读读报纸,体验一下情感。而不要去怀疑现实世界。只有苏联时期我们才生活在幻象中。当今的世界已经变得真实而又可知了。明白了吗?”

谢尔久克闷声不响,只管作画。

“怎么,不同意吗?”

“很难说,”谢尔久克阴郁地回答。“说它真实,我不同意。至于说可知,这我自己早就料到了。凭气味。”

“先生们,”我感到,这样下去势必发生争吵,便试图把话题引向某个中间地带,“你们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偏偏要画亚里士多德?”

“原来这是亚里士多德?”马利亚说道。“怪不得样子这么严肃。鬼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在仓库里最先碰到他。”

“别傻了,马利亚,”沃洛金说道。“这里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要知道,你刚才还叫得出所有事物的名称。为什么我们都呆在疯人院里?人家是想把我们送回现实。至于我们为什么要画这位亚里士多德,这是因为那个包括‘奔驰600’在内的‘现实’,那个你,马利亚,出院后想要去的地方,是他想出来的。”

“怎么,在他之前就没有现实吗?”

“在他之前没有,”沃洛金斩钉截铁地说。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会明白的,”沃洛金说道。



“那就请你试着解释一下嘛，”马利亚说道。“也许，我会明白。”

“那么你说，为什么这辆‘奔驰’是真实的？”沃洛金问道。马利亚苦苦地思索了一会儿。

“因为它是铁的，”他说，“就因为这个。而铁是可以接近和触摸的。”

“也就是你想说，它是由某种实体构成的，所以它是真实的。”

马利亚陷入了沉思。

“大体上是这样的，”他说。

“所以我们才画亚里士多德呀。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任何实体，”沃洛金说道。

“那么，有什么呢？”

“有一辆最重要的、天上的汽车，”沃洛金说道，“与它相比，你的那辆‘奔驰 600’完全是一堆狗屎。这辆天上的汽车完美无缺，所有跟汽车有关的概念和形象都尽在其中。而那些奔跑在古希腊路面上的所谓真实的汽车，只不过是它并不完美的影子而已。就像投影图一样。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么后来呢？”

“后来亚里士多德就说，最重要的、天上的汽车当然是有的。毫无疑问，所有地上的汽车只是它投射于暗淡而又扭曲的存在之镜上的影像。这在当时是无可辩驳的。但除了这个原型和它的影像之外，亚里士多德说，还有另外一种东西。这就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实体，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铁。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实体，世界才变得现实。整个狗娘养的市场经济就



是从这个实体开始的。因为此前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只是影像，而影像，请问，又有什么真实性呢？只有那个创造影像的东西才具真实性。”

“知道吗，”我轻声说道，“这还是个大问题呢。”

沃洛金故意不理睬我的话。

“明白吗？”他问马利亚。

“明白，”马利亚回答说。

“明白什么？”

“明白你是个十足的疯子。古希腊怎么会有汽车呢？”

“嘿，”沃洛金说道。“还挺严谨的。你真的很快就能出院了。”

“但愿如此，”马利亚说。

谢尔久克抬起头，认真地看了一眼马利亚。

“你呀，马利亚，”他说道，“最近一段时间够较劲的。我是指精神上。”

“我需要从这里出去，你知道不？我不想在这里过一辈子。十年后谁还要我呢？”

“你真是个傻瓜，马利亚，”谢尔久克轻蔑地说。“难道你还不明白，你和阿诺德的爱情只有在这里才能实现？”

“你说话注意点！否则我用这个胸像砸烂你的狗头，你这白鹤脸^①。”

① 日本在二战中曾遭受原子弹袭击，每到纪念日，日本的小孩子们就叠纸鹤，以祈求和平。精神病患者谢尔久克与日本有很深的渊源，马利亚用“白鹤”咒骂谢尔久克，一方面指他尖嘴猴腮，另一方面也是故意揭他的伤疤。



“那就试试看，你这头公羊，”谢尔久克从椅子上站起来，铁青着脸说道，“试试看！”

“我根本就不用试，”马利亚也站起来，答道，“我直接干就行了。冲你这句话，打死也活该。”

他窜到桌旁，抓起胸像。

接下来的事顶多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我和沃洛金起身冲过去。沃洛金双手抱住扑向马利亚的谢尔久克。马利亚的脸气得变了形，他把胸像举到头顶，抡起来，冲向谢尔久克。我一把推开马利亚，这才发现，沃洛金把谢尔久克的双手也一起给抱住了，使他动弹不得，假如马利亚仍旧用胸像朝谢尔久克砸过去的话，他甚至无法伸出手来抵挡一下。谢尔久克闭上眼睛，傻笑着。我企图掰开沃洛金抱在谢尔久克胸前的双手，突然发现沃洛金正恐惧地望着我的身后。我回过头，只见一张僵死的、翻着两只挂满灰尘的白眼的石膏脸，从沾满苍蝇屎、抹着灰泥的天上朝我缓慢地落下来。



5

恢复知觉以后,我唯一记得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胸像。不过我不敢肯定,“恢复知觉”这一说法是否十分贴切。^①我从小就觉得,这一说法后面隐含着某种暧昧的歧义:到底是谁来了?到什么地方来了?还有,最有意思的是,从哪里来?——总之,这纯粹是偷换概念,就像在伏尔加河游船的牌桌上偷换扑克牌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明白了,“恢复知觉”这几个字实际上指的就是“到别人那里来”,因为从你出生那天起,正是这些别人在向你解释,你应该在自己身上做出哪些努力,才能使他们满意。

但问题不在这里。我之所以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我现在的状态,是因为虽然我的神智清醒过来了,但我的梦并未完全消失,我似乎意识到我还处于某种捉摸不定的浅睡状态,处于那种每个人都熟悉的梦与醒的临界地带,处于一个非物质的世界,在这里,周围的一切都成了瞬间产生并消融于意识之中的幻象和思想,而这些幻象和思想所包围的人本身又绝对不

^① 俄文中,“恢复知觉”是一个固定词组,其字面意思为“来到自己之中”。



在场。通常人们都会瞬间飞越这一状态,但我不知为何却在其中滞留了一会儿;我的思想涉及的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它们之间没有联系,也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我对这位布尔什维主义意识形态的老祖宗并没产生多少好感,但也没为昨天发生的事情而对他产生个人怨恨;显然,他所发明的“实体”这一概念的实体性还不够,还不足以给我带来太严重的伤害。有趣的是,关于这一点我在半醒半睡之间得到一个极有力的证据——直到胸像砸得粉碎的时候,才知道它的内里原来是空的。

假如砸在我脑袋上的是柏拉图的胸像,我想,结果也许会严重得多。当我想起我有脑袋时,梦的最后碎片就彻底消失了,一切又恢复到了人在苏醒过程中的正常状态——我明白了,所有这些想法正是存在于脑袋里,而脑袋此时却疼得要命。

我小心地睁开眼睛。

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安娜,她坐在离我的床头不远的地方。她没有发现我醒来,可能是因为正专心致志地读书,她双手捧着一本翻开的汉默生^①的作品。我眯缝起眼睛仔细端详了她一会儿。我无法给自己第一次见到她时的印象增添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况且也用不着增添。也许是她冷漠的完美使然,我觉得她的美丽更加折磨人。我伤感地想到,像她这样

① 克努特·汉默生(1859—1952),挪威作家。提倡心理文学,主张描写精神世界和思想活动。代表作有小说《饥饿》、《大地的成长》等。他崇拜德国纳粹主义,二战后曾被判以叛国罪。



的女人万一爱上某个男人,那个男人很可能要么是个长着小胡子的推销员,要么是个红脸膛的炮兵少校,这与那些漂亮的女中学生总是为自己挑选丑陋的女朋友是同一个道理。当然,这并不是有意通过反衬来突出自己的美貌(依照伊万·布宁层次上的解释^①),而是出于仁慈之心。

不过,她还是有了一些变化。大概由于光线的原因,我觉得她的头发更短了,颜色也略微浅了一点儿。她已经换掉了昨天的深色连衣裙,穿着一套有点奇怪的半军装——黑色的短裙加上宽大的军上衣。一束阳光穿过长颈玻璃瓶,把一团抖动的光斑投射在她的衣袖上;玻璃瓶放在一张桌子上,而桌子在一间我从未见过的屋子里。但最让人吃惊的是,这间屋子的窗外是一派夏天的景象——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白杨树仿佛落满灰尘的绿色树冠,在烈日炎炎的正午蒸发着热气。

我所在的这个房间就像一家便宜的外省旅馆的客房——一张小桌子,两把软座硬靠背椅子,墙上还有一个洗脸池和一个带灯罩的壁灯。昨晚我是在一列冬天的夜行火车上睡着的,可眼前的这个房间全然不像火车上的那间包厢。

我用胳膊肘撑起身子。看得出来,我的动作令安娜感到十分意外,她惊慌失措地望着我,手里的书掉到了地板上。

“我这是在哪里?”我坐起来,问道。

“看在上帝份上,快躺下,”她朝我弯下身子,说道。“一切都好。您没事了。”

她双手轻柔地按着我,让我躺下。

^① 指布宁的短篇小说《一声轻叹》。



“可我总该知道我究竟是在哪儿吧？还有，为什么现在是夏天？”

“对，”她回到椅子上，说道，“是夏天。您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说道。“我只是不明白，我好端端地坐在火车上，怎么突然就到这间屋子里来了。”

“您经常翻来覆去地说梦话，”她说道，“可没有一次醒过来。大部分时间您都不省人事。”

“什么不省人事？我记得，我们在喝香槟，还有夏里亚宾在唱歌……或是那些纺织工人唱的……后来，这位古怪的先生……同志……一句话，夏伯阳。夏伯阳突然摘掉车厢挂钩。”

安娜怀疑地盯着我的眼睛，足足有一分钟。

“真是奇怪，”她终于说道。

“奇怪什么？”

“您偏偏记得这些。而后来呢？”

“后来？”

“是呀，后来。嗯，比如说——柳树站的战斗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我说道。

“那么以前呢？”

“以前？”

“对，以前。要知道，您在柳树站就已经开始指挥一个骑兵连了。”

“什么骑兵连？”

“您，彼佳，在柳树站表现相当出色。要不是您带领自己



的骑兵连从左翼包抄过来的话,大家都得被打死。”

“今天几号?”

“六月三号,”她说道。“我知道,头部受伤后一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可是……假如您完全失去了记忆,这还可以理解,而您偏偏又记得一些事情,真是奇怪。尽管我并不是医生。也有可能这是正常的。”

我把双手举起来,放在头上,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我觉得,我的手掌碰到的似乎是一个长满短刺的台球。我的头跟伤寒病患者一样剪得精光。头上还有一个希奇古怪、毫发不生的突出物。我用手指摸了摸,这才知道原来是一条很长的、斜穿过整个头顶的伤疤。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头皮上贴了一条阿拉伯树胶皮。

“榴霰弹炸的,”安娜说道。“虽然伤疤很显眼,但不要紧。只是弹片的划伤。幸好没有伤到骨头。但脑震荡似乎有点严重。”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四月二号。”

“什么,从那时起我就没有苏醒过?”

“有过几次。准确地说,是有过几个瞬间,仅此而已。”

我闭上眼睛,试图从自己的记忆中搜寻出哪怕一丁点安娜讲到的东西。但我眼前一片漆黑,除了一些闪烁的条纹和斑点,什么都看不见。

“我一点也不记得了,”我说道,再次摸了摸脑袋。“一点儿不记得。只记得我做了一个梦,好像在彼得堡的什么地方,在一个昏暗的厅堂里,有人用亚里士多德的胸像砸我的头,明



明每次胸像都砸得粉碎，可过一阵还会重新开始……有点哥特色彩……不过现在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您的梦吃真奇怪，”安娜说。“昨天您大半天都在回忆一个叫马利亚的人，说她中了炮弹。当然，听不出什么头绪，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这个姑娘到底是您的什么人。您想必是在赶赴战场的路上遇见她的吧？”

“我从来不认识什么马利亚。当然，如果不算不久前做的一个噩梦……”

“您放心，”安娜说道，“我没打算吃醋。”

“那就太遗憾了，”我回答道，然后坐起来，把双脚放到地板上。“请原谅我不成体统，竟然穿着内衣跟您说话。”

“您不能起床。”

“但我感觉好极了，”我回答说。“我很想洗个澡，换身衣服。”

“不可能，提都别提。”

“安娜，”我说道，“既然我是一个骑兵连的指挥官，那么我应该有个勤务兵吧。”

“您当然有。”

“趁我和您说话的工夫，他大概又醉得像头猪了吧。您能不能把他给我叫来？还有，夏伯阳在哪儿？”



最有趣的是，我的勤务兵（这是个沉默寡言、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黄头发，上身高，下身短，长着两条骑兵特有的罗圈腿，这种不匀称的体型使他看起来好像一把张开的钳子）果然喝醉了。他给我拿来了衣服——一件没有肩章（但袖子上有



一个授予伤残军人的荣誉袖章)的灰绿色制服,一条裤缝上饰有两道红色镶条的蓝色马裤,还有一双气派的软皮短筒靴。此外,床上还放了一顶毛茸茸的黑色羊皮高帽,一把刻有“奖给英勇的彼得·虚空”字样的军刀,一支装在枪套里的勃郎宁手枪,还有冯·埃尔年的提包,见到提包我差点昏过去。

提包里的东西一样也没丢,只是铁罐里的可卡因少了一些。此外,我在提包里还发现一副小巧的双筒望远镜和一个已经用了三分之一的笔记本,毫无疑问,上面的字是我写的。大部分记录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它们涉及马、干草,还有一些连名字我都未听说过的人。不过,除了这些,我还看到另外几句话,与我的行文习惯很相仿:

“可以把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看作是在不同历史阶段能够放射出一定能量的事物的总和。受难的上帝的身躯闪耀着多么夺目的光芒啊!把基督教称为原始体系,真是愚蠢之至!只要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把俄罗斯推进革命风暴的并不是拉斯普京^①,而是他的遇害。”

下面还有两页纸:

“需要将生活中的所有‘成就’与其耗费的时间长短

① 格·耶·拉斯普京(1864或1865—1916):俄罗斯托博尔省的一个农民,据说具有预言和治病的能力。他因医治好了亚历山大二世的血友病而深受亚历山大二世及后来的尼古拉二世宠幸。很多人认为他左右了政局,后来被人谋杀。



进行一番对照；假如耗时过长，则大部分成就都会或多或少地失去意义；任何成就（至少是实践方面的）实际上都会等于零，假如它耗费的时间长度相当于整个一生；因为人死之后，任何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不要忘记天花板上写的字。”

天花板上的字我似乎忘得一干二净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平均每个月都要写整整一本这样的笔记，并且自以为每本都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对将来必有大用。可是当这个将来真正降临的时候，这些笔记本却不知去向，窗外又开始了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结果，我就出现在了潮湿的特维尔街心花园，大衣的口袋里揣着一把左轮手枪。还好，我想，遇到了那位老朋友。

穿上衣服之后（勤务兵没有送包脚布来，我只得撕开一张床单），我犹豫了一会儿，后来还是戴上了羊皮高帽，帽子有点臭烘烘的，但剃光了的脑袋似乎是我身上比较脆弱的地方。我把军刀扔到床上，从枪套里取出手枪，藏在了口袋里，我不能容忍把武器露在外面惊扰他人，况且这样掏枪也更快一些。我照了照洗脸池上方的镜子，感到很满意，羊皮高帽配上我胡子拉碴的脸颊，为我平添几分粗犷的豪气。

安娜在下面的楼梯脚下等着。我踩着宽敞的半圆形楼梯走下楼去。

“这是什么房子？”我问道。“好像废弃的庄园。”

“本来就是嘛，”她说道。“这儿是我们的司令部。还不只是司令部，我们就住在这里。从您当上骑兵连的指挥官以后，



彼得,很多事都发生了变化。”

“那么夏伯阳在哪儿呢?”

“目前他不在城里,”安娜说道,“不过他很快就该回来了。”

“这是什么城市?”我问道。

“它叫阿尔泰—维德尼扬斯克。四周都是山。我甚至搞不懂,这种地方怎么会出现在城市。整个社交圈里就几名军官、两个从彼得堡来的怪人和一些当地知识分子。居民们顶多只是听说过战争和革命而已。这不,布尔什维克正在郊区煽风点火。总之,是穷乡僻壤。”

“那我们呆在这里干啥?”

“等夏伯阳回来吧,”安娜说道。“他会给您解释的。”

“那么,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在城里散散步。”

“千万不要,”安娜坚决地说。“您自己想想吧,您刚刚才苏醒过来。您有可能突然犯病,或者发生其他什么事情。要是您昏倒在大街上,那可怎么办呢?”

“您的关心令我十分感动,”我说道,“但假如您的关心是真诚的,您就应该陪我一起去才对。”

“您让我别无选择,”她叹了口气,说道。“您到底想去哪里?”

“要是这里有一个餐馆就好了,”我说。“您知道吗,外省的餐馆里通常会有一棵栽在木桶里的干枯的棕榈树,还有放在长颈玻璃瓶里的温热的核列斯酒^①。要是赶巧碰到就好

① 一种烈性白葡萄酒。



了。还可以要杯咖啡。”

“这里倒是有个地方，”安娜说道，“但那儿没有棕榈树。核列斯酒恐怕也没有。”

阿尔泰—维德尼扬斯克这座城市主要是由一些木头房子组成的，房子都不大，只有一两层高，相互之间还离得很远。房子周围是高高的板墙，大多刷成了棕色，墙内是废弃的旧花园，草木茂盛，浓密的枝叶几乎挡住了房子。我和安娜沿着陡峭的石板路往下走，前面路两边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开始有了一些石头房子——依旧不超过两层高；我注意到两排漂亮的铁栏杆和一座消防瞭望塔，瞭望塔似乎具有某种难以觉察的德国风格。从总体来看，这是一座典型的外省小城，尚未失去其原始的魅力，既安静又明亮，整个隐没在遍地盛开的丁香花丛之中。城市周围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它们仿佛构成一只大碗，而城市就位于碗底，竖立着一座简陋的亚历山大二世纪念像的市中心广场就是它的最低处。安娜带我去的“亚洲之心”餐馆的窗户刚好正对着这座纪念像。我想，这一切简直要令人产生写诗的冲动。

餐馆里凉爽而又安静；木桶里面没有棕榈树，然而餐厅的角落里却站立着一只熊的标本，爪子里还握着一把斧子。餐厅里几乎是空的。两个军官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喝酒，模样相当散漫，我和安娜从他们身旁走过时，他们只是抬头瞟了我一眼，便马上冷漠地把目光移开了。应当承认，我不是太清楚，凭我现在的官职，我是否有必要掏出我的勃郎宁，给他们一人一枪，但从安娜平静的反应来看，并没有这个必要；况且，



他们制服上的肩章都扯掉了。我和安娜在挨着他们的桌子旁边坐下，我点了香槟。

“您本来想喝咖啡的，”安娜说道。

“不错，”我说道。“我通常白天不喝酒。”

“那今天是为了什么？”

“仅仅是为了您。”

安娜哼了一声。

“您太客气了，彼得。可我想现在就请您帮个忙。看在上帝份上，别再向我献殷勤了。在一个水和煤油都难以为继的城市里，与一个受伤的骑兵发生罗曼史，这样的事对我没有丝毫的吸引力。”

我本来就没有期待什么好结果。

“那好吧，”等服务员把酒瓶摆到桌上，我说道，“假如您愿意把我当成一个受伤的骑兵，那就请便吧。但是，这样一来，我该把您看作什么人呢？”

“女机枪手，”安娜说道。“要是您愿意，还可以更准确一点——路易斯女郎。我更喜欢‘路易斯’机枪。”

“您要知道，作为一名骑兵，我讨厌您的职业。没有比骑在马上迎着机枪冲锋更糟糕的了。不过既然这里讲的是您，我还是要为机枪事业举杯。”

我们碰了一下杯。

“请问，安娜，”我问道，“我们邻桌的军官是什么人？到底是谁控制着这座城市？”

“笼统地讲，”安娜说道，“城市是被红军占领，但里面也有白军。或许也可以说，城市是被白军占领，但里面也有红军。”



因此,衣服最好穿得中性一点。大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可我们的部队在哪儿?”我问。

“您是想说我们的师吧。我们师经过多次战斗被打散了。现在我们人很少,不超过一个骑兵连的三分之一。但由于这里的敌人力量也不强大,可以认为,我们是安全的。这里人烟稀少,很安静。当你走在街上,见到过去的敌人时,你就会想,就在几天前,我们还企图杀死对方,难道促使我们杀死对方的理由是真实的吗?”

“我懂您的意思,”我说道。“在战场上,人的心会变硬,可是,只要看一眼盛开的丁香花,你就会觉得,炮弹的呼啸、骑兵的狂吼、夹杂着血腥味的硝烟——所有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都是幻影,是梦。”

“确实是这样,”安娜说道。“问题是,盛开的丁香花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呢?也许,这同样是梦吧。”

我有些不以为然,但我没有展开这个话题。

“请问,安娜,前线的情况现在怎样?我是指总的战局。”

“说实话,我不清楚。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不在行。这里没有报纸,而传言又是五花八门。再说,后来对这一切也感到厌烦了。一会儿占领,一会儿又放弃,尽是一些莫名其妙、名称古怪的城市——什么布古鲁斯兰啦,布古里马啦,还有……叫什么来着……别列别伊。而这一切到底是在哪里,是谁占领,谁放弃,都不太清楚,最主要的是,没啥意思。仗当然还在打,可要谈论它却成了一种 *mauvai genre*^①。总之,我的看法

① 法语:不好的类型,不合适的种类。



是,空气中都能感受到厌倦。普遍情绪消沉。”

我琢磨着她的话,陷入了沉默。从街上的某个地方,远远地传来了马的嘶鸣,随后又听到马车夫拖长了的吆喝。邻桌的一个军官终于把针头插入了静脉。为这件事,他使劲往后仰着身体,以便能看见自己藏在桌子下面的双手,毫无成效地折腾了足足有五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椅子仅靠两条后腿支撑着,有时我觉得,他肯定会跌倒。完事后他把注射器藏入一只镀镍的小盒子,再把小盒子收进枪套。他的双眼立刻变得神采飞扬,由此可以断定,注射器里装的是吗啡。他在椅子上摇摆了一两分钟,然后扑通一声双肘撑在桌上,抓起自己同伴的一只手,以真挚得无以言表的声音说道:

“我现在想通了,尼古拉……你知道吗,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总能取胜?”

“为什么?”

“因为在他们的学说中,有一种鲜活的、滚烫的,”他闭上眼睛,痛苦地微微活动着手指,搜寻着合适的词语,“充满了迷醉和愉悦的对人的爱。布尔什维主义,只要彻底接受它,它就能激活昏睡于心中的一种崇高的希望,难道不是吗?”

另一名军官朝地上啐了一口。

“知道吗,若尔什,”他阴沉着脸说道,“要是他们把你萨马拉的姨妈给绞死了,你照样会跟我谈崇高的希望的。”

那名军官闭上眼睛,沉默片刻。然后他突然说道:

“听说,不久前有人在城里见到过荣格伦男爵。他骑在马上,身穿红袍,胸前挂着金色的十字架,并且谁都不怕……”

安娜这时正要点烟,听到这句话,她抖了一下,手里的火



柴差点掉到地上。我想,应该跟她说说话。

“安娜,请您告诉我,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我是指我们离开莫斯科那天以后。”

“我们一直都在打仗,”安娜说道。“您在战斗中表现得很出色,和夏伯阳变得非常亲密。跟他通宵达旦地谈话。后来您就受伤了。”

“真有意思,我们究竟谈了些什么?”

安娜朝天花板吐出一缕细细的烟雾。

“为什么您不等到他本人回来?我能大致猜到你们谈话的内容,但我并不关心详情。这是你们俩的事。”

“那就大致讲讲也行,安娜,”我说道。

“夏伯阳,”她说道,“是我所知道的最高深的神秘主义者之一。我认为,他把您当成了一个理想的听众,也许还是一个理想的信徒。另外我还怀疑,在某种程度上,您的这次不幸与你们的谈话有关。”

“我一点儿也听不明白。”

“这并不奇怪,”安娜说道。“他有几次试图跟我谈话,我也是稀里糊涂。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出几个小时,他就能把一个信任他的交谈者引入如痴如狂的境地。我叔叔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原来他是您叔叔,”我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而我还以为,您跟他有什么特殊关系呢。”

“您怎么能……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看在上帝份上,原谅我吧,”我说道,“不过,听了您关于受伤骑兵的话,我还以为您可能是对健康的骑兵感兴趣呢。”



“您再说一句下流话,我就对您彻底失去兴趣了,彼得。”

“也就是说,您现在还对我感兴趣。这真是令人欣慰。”

“别纠缠字眼儿。”

“如果是我喜欢的字眼儿,我为什么不能纠缠呢?”

“只是为您的安全着想,”安娜说道。“在您昏迷的这段时间里,您发福得厉害,这些字眼儿恐怕承受不了您的体重。”

她显然很会自卫,但毕竟有点过头。

“我亲爱的安娜,”我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您总是这样想方设法羞辱我。我敢说,您这是假装的。实际上您对我并不是毫不在乎,当我恢复知觉,见到您坐在我床边时,我马上就明白了这一点。您都想象不到,我当时是多么感动。”

“要是我告诉您我为什么会坐在那里,恐怕您会失望的。”

“这怎么会呢?什么样的动机能让您坐在一名伤员的床边,除了真诚的……嗯,怎么说呢——关心?”

“说实话,我很为难。可这是您自找的。这里的生活很无聊,而您的呓语又活灵活现,绘声绘色。应该承认,我有时就是想来听听,只是由于无聊才来的。您现在所讲的这些东西,反倒让我觉得乏味。”

我大失所望。为了让自己镇静下来,我慢慢地从一默数到十。接着又数了一遍。还是不管用,我对她简直恨之人骨。

“您能给我一支烟吗?”

安娜把打开的烟盒递给我。

“谢谢,”我说道。“跟您谈话非常有趣。”

“您这样认为?”

“是的,”我说,感到香烟在我的手指间颤抖,这使我更为



恼火。“您的话发人深思。”

“怎么个发人深思法？”

“比如说，就在几分钟前，您还在怀疑城里铺天盖地的丁香花的真实性。这有些出乎意料，同时也颇具俄罗斯特色。”

“您从这里发现了什么俄罗斯特色？”

“俄罗斯民族早就明白了，生活就是一场梦。您知道‘苏库波’一词的意思吗？”

“知道，”安娜微笑着说，“好像是一个魔鬼的名字，它经常变成女人的模样，引诱熟睡的男人。可跟这里有什么关系呢？”

我再次从一默数到十。我的感觉还是没有变化。

“关系太直接了。古罗斯有一种说法，说所有的娘们儿都是母狗，这里的‘母狗’一词就是‘苏库波’的指小形式^①。这是从天主教来的。您大概记得——伪德米特里二世，马琳娜·穆尼舍克，遍地的波兰人，一句话，混乱时期。这种说法就是从那时流传开来的。对了，泛蒙主义也是这么来的，我不久前恰好想过这个问题……是的……不过我扯远了。我想说的就是，‘所有的娘们儿都是母狗’，”我以欣赏的口吻重复道，“这一说法本身就意味着，生活实际上就是一场梦，还有丁香花，如您所说，只是我们梦见的东西。包括所有的母狗。也就是我想说的——娘们儿。”

安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她的颧骨上现出一片淡淡的红晕，我得承认，这与她白净的脸庞倒很是相称。

^① 俄语中“苏库波”与“母狗”这两个词近似。



“我在想，”她说道，“是不是该把香槟泼到您的狗脸上？”

“连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说。“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我们还没亲密到那种程度。”

话音未落，一片扇状的水花已经浇到我的脸上。她杯子几乎是满的，并且她泼香槟时使了很大的劲，以致我的眼睛失明了片刻。

“对不起，”安娜惊慌失措地说，“不过，谁叫您自己……”

“没什么，”我回答说。

香槟酒有一个很实用的特点：只要把瓶子抓在手里，用大拇指封住瓶口，使劲摇晃几下，大拇指下面就会源源不断地溢出泡沫，甚至整瓶酒都会跑光。我觉得，这一方法莱蒙托夫也很熟悉。他有一句话，明显地反映出类似的个人经验：“犹如布满青苔的古老酒瓶，里面保存着翻腾的酒流。”当然，要想猜度莱蒙托夫的内心世界是很困难的，他决心关注恶，结果写了一首长诗，讲述一个骑着马跑来跑去的骑兵团长的故事。我虽然不敢肯定莱蒙托夫用香槟酒浇过女人，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大，如果考虑到他一贯关注两性问题，尤其是每当面对年轻漂亮的女人，这一行为难免会引发一些有失体面、但又绝对无法遏止的联想。应该承认，我就是这些联想的十足受害者。

大部分香槟都喷到了安娜的军衣和短裙上。我本来瞄准了她的脸，但最后关头，一种奇怪的贞洁感迫使我把酒泼向了下方。

她仔细察看一下胸前颜色变暗的军衣，耸了耸肩。

“您真是个白痴，”她平静地说道。“您应该呆在精神病院。”



“不只您一个人这样想，”我一面把空瓶子放到桌上，一面说道。

接下来是令人压抑的沉闷。继续拉扯相互之间的关系显然是荒唐的；面对面默不作声地干坐着则更加荒唐。我估计安娜也有同感。一只肥硕的黑苍蝇有条不紊地碰撞着沾满灰尘的窗玻璃，在这个餐馆里，似乎只有它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打破僵局的是邻桌的一名军官（这之前我完全忘记了他们的存在，但我可以肯定，广义地说，他们同样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也就是给自己打针的那位。

“先生，”我听到他用动情的声音说道，“先生，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请吧，”我向他转过身去，说道。

他手里拿着一个打开的黑钱包，说话时眼睛盯着它，仿佛里面放着发言稿。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他说道，“我是奥维奇金上尉。是这样，我偶尔听到了你们的部分谈话。当然，我没有偷听。只是你们说话声音太大。”

“那又怎样？”

“您真的认为，所有女人都是幻影吗？”

“您要知道，”我尽量保持礼貌地回答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只要您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幻影——顺便提一下，请您注意‘世界’和‘幻影’这两个词深刻的同源性^①——您就没有任何理由把女人划入某个特殊的范畴。”

^① 俄语中“世界”和“幻影”有相同的词根。



“如此说来，终究还是幻影，”他忧伤地说道，“我也这样想过。我这里有张照片。您瞧瞧吧。”

他递给我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姑娘，坐在一个种着老鹳草的花盆旁边。我发现，安娜也用眼睛的余光瞟了一下照片。

“这是我的未婚妻纽拉，”上尉说道。“我是说，曾经是。她目前在哪里，我一点也不清楚。回想过去的日子，一切都历历在目。牧首塘的溜冰场，还有夏季的庄园……而实际上一切都消失了，一去不复返了。假如这一切从未存在过，世界就会有所改变吗？您明白可怕在什么地方吗？可怕在没有任何区别。”

“我明白，”我说道，“我明白，请您相信。”

“结论是，连她也是幻影？”

“结论是这样，”我回答道。

“就是嘛，”他心满意足地说道，回头瞥了一眼自己的同伴，后者在满脸堆笑地抽烟。“也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您的意思，先生，我的未婚妻纽拉是一条母狗？”

“什么？”

“这样说吧，”奥维奇金上尉说道，又回头瞥了一眼同伴。“假如生活是一场梦，那么所有的女人就只是我们梦见的。我的未婚妻纽拉是一个女人，理所当然，她也只是我梦见的。”

“就算是吧。那又怎样呢？”

“是不是您刚才说过，母狗就是‘苏库波’一词的指小形式？假定让我牵肠挂肚的纽拉是一个女人，同时也是幻影——难道不能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纽拉是母狗吗？可



您知道吗,先生,当众说出类似的话来,会有什么后果?”

我定睛望着他。他约摸三十岁上下,长着淡黄色的小胡子,高高的前额两边已光秃,眼睛是淡蓝色的,这一切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外省恶魔的浓缩。我不禁愤怒了。

“您听着,”我悄悄地把手伸进口袋,握住手枪的枪柄,说道,“您的确是夸大其词了。我无缘结识您的未婚妻。对于她我不可能有任何看法。”

“没有人胆敢做出那样的假定,”上尉说道,“说什么我的未婚妻纽拉是母狗。我很难过,但要解决现在的问题,我看只有一个办法。”

他一边牢牢地盯着我的眼睛,一边把手放到枪套上,慢慢地解开它。就在我要扣动扳机的当口,我突然想起他的枪套里面放的是装着注射器的小盒子。这可真让人啼笑皆非。

“您想给我打一针吗?”我问道。“谢谢,不过我受不了吗啡。依我看,它容易使人犯糊涂。”

上尉把手从枪套上缩了回来,回头瞥了一眼自己的同伴。后者是一个肥胖的年轻人,由于天热,脸孔涨得通红。他一直认真地关注着我们的谈话。

“让开,若尔什,”他笨重地从桌子后面走出来,抽出刀鞘里的军刀,说道,“让我亲自来给这位先生打针。”

上帝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说不准我会心一横,一枪毙了他,反正他的脸上已经明显地有了中风的征兆,未必能有几天活头了。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门口传来一声大喝:

“都站着别动! 动一动我就开枪!”



我回过头去。门口站着一个人高大魁梧的人，穿着灰色的套装和深红色的斜领衬衫。他脸上的表情刚毅而有力，假如不是他窄小的下巴向后歪斜，这张脸简直就像古希腊的浮雕。他的头剪得精光，两只手各握一把左轮手枪。两个军官呆若木鸡；光头先生快步走到我们桌旁，用左轮手枪顶住他们的脑袋。上尉很快地眨巴起眼睛来。

“站好，”这位先生说道，“站好……放松点……”

他的脸出人意料地愤怒得变了形，紧接着，他连续扣了两下扳机。手枪咔嚓咔嚓地空响了两下。

“你们听说过俄罗斯轮盘赌吗，先生们？”他问道。“回答！”

“听说过，”那个红脸军官回答说。

“权当你们俩现在是在玩轮盘赌，而我就权当是庄家。我毫不隐瞒地告诉你们，手枪转轮里面，每隔两个弹巢才有一颗子弹。假如你们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就尽快让我知道。”

“怎样让您知道？”上尉问道。

“举起手来，”光头先生说道。

两个军官举起手来，军刀“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我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

“给我滚蛋，”陌生人说道，“路上不准回头。我的耐心不好。”

两个军官没有让他说第二遍，一溜烟儿逃离餐厅，留下没有喝完的葡萄酒和烟缸里还在冒烟的烟卷。等他们出去以后，这位先生把手枪放到我们桌上，俯下身来，脸冲着安娜，安娜注视着他，我觉得，她的目光里充满了好感。



“安娜，”他把她的手掌贴到嘴唇上，说道，“真高兴在这里见到您。”

“您好，格里戈里，”安娜说道。“您进城很久了吗？”

“刚到，”光头先生说。

“窗外的大走马是您的吗？”

“是我的。”

“那么您带我去兜兜风好吗？”

他微微一笑。

“格里戈里，”安娜说道，“我爱您。”

光头先生向我转过身，伸出一只手。

“格里戈里·科托夫斯基。”

“彼得·虚空，”我握了握他的手，回答说。

“啊，您就是夏伯阳的政委？那个在柳树站受伤的人？久闻大名。看见您身体很好，我由衷地高兴。”

“他还没有完全康复，”安娜扫了我一眼，说道。

科托夫斯基在桌旁坐下。

“您跟这两位先生究竟怎么了？”

“我们争论了一下梦的形而上学问题，”我说道。

科托夫斯基哈哈大笑起来。

“您喜欢在外省的餐馆里谈论这类问题。我听说，柳树站的那些事其实也是起因于车站小吃部里的一次谈话？”

我耸了耸肩。

“这些事他一点也不记得了，”安娜说道。“他丧失了部分记忆。通常这都是强烈脑震荡的结果。”

“希望您很快就能彻底康复，”科托夫斯基说，从桌上拿起



一支手枪。他把转轮推到一旁，扣了几下扳机，低声骂了一句，不相信地摇了摇头。我惊讶地发现，转轮所有的弹巢里都装着子弹。

“这些图拉造的手枪真见鬼，”他抬眼看了看我，说道。“永远不要指望它们。类似的麻烦我已经遇到过一次了……”

他把手枪扔回桌上，晃了几下脑袋，似乎要赶走这些不快的想法。

“夏伯阳好吧？”

安娜摆了摆手。

“成天都在喝酒，”她说道。“鬼知道出了什么事，简直叫人害怕。昨天，他只穿了一件衬衫，就拎着毛瑟枪跑到外面，朝天开了三枪，然后思忖了一阵，又朝地开了三枪，这才回去睡觉。”

“高，真高，”科托夫斯基喃喃地说道。“您就不怕，他在这种状态下可能会用上黏土机枪吗？”

安娜瞟了我一眼，我马上感到，在这张桌子旁边，自己完全是个多余的人。显然，我的同伴们也有同感——拉长了的停顿让人难以忍受。

“对了，彼得，那两位先生对梦的形而上学有什么想法？”科托夫斯基终于问道。

“没什么，”我回答说，“他们很笨，没什么想法。对不起，我想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头痛得厉害。”

“好吧，格里戈里，”安娜说道，“我们先把彼得送回去，然后再来决定晚上干什么。”

“非常感谢，”我说道，“不过我一个人能走回去。路不远，



我记得怎么走。”

“那好，咱们待会儿见，”科托夫斯基说道。

安娜连看都没看我一眼。还没等我从桌旁站起来，他们就已经热烈地交谈起来。我走到门口，回头望了一下，安娜正响亮地哈哈大笑，还不停地拍打着科托夫斯基的手，似乎在央求他再也不要讲那些让人笑破肚皮的话了。

我从餐馆出来，见到一辆轻便的弹簧底座四轮马车，车前套着两匹灰色的大走马。这显然是科托夫斯基的马车。我拐过墙角，沿着我和安娜刚才来时走过的路往上走。

估计有三点钟了，天热得难受。我不停地想，从我醒来的那一刻起，事情变化得多么快啊，我轻松平静的心情已经荡然无存；最讨厌的是，我头脑里始终浮现出科托夫斯基的大走马。这样一件小事竟能令我心情如此沉重，我觉得好笑，确切地说，我是希望回到自己的正常状态，让这些事情显得好笑，但做不到。事实上，我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原因当然并不在于科托夫斯基和他的大走马。原因在于安娜，在于她那难以捉摸而又无以言表的美丽，从我第一眼见到她，这美丽就使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应该有一颗深沉而又细腻的心。简直不可思议，在她的眼中，区区两匹大走马竟能为它们的主人平添这么多的魅力。可情况恰好就是如此。总而言之，我想，最奇怪的是，我认为女人需要的似乎是另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是某些精神财富吗？

我放声大笑起来，两只在路边踱步的母鸡被我吓得赶紧窜到一旁。

这就很有意思了，我心想，要知道，我就是这样认为的，除



非我是在欺骗自己。如果深究起来,我认为,我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能够吸引这个女人,能够让我在她的心目中远远高于任何一位两匹大走马的拥有者。可是,这样的对比本身就包含着极为庸俗的成分,因为在进行对比时,我实际上是把那种我认为对她来说应该无比高尚的东西降格到了两匹大走马的水平上。假如对我来说这都是同一类东西,那么她又有什么理由将之区别对待呢?还有,对她来说,更为高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是我的内心世界吗?是我所想、所感的那些东西吗?由于对自己感到厌恶,我不禁呻吟起来。完全是自欺欺人,我想道。多年来,我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应该如何摆脱掉所有这些思想和情绪,把自己所谓的内心世界扔到一个污水坑里。就算可以暂时假定我的内心世界具有某种价值,哪怕是审美价值,这也丝毫改变不了什么,所有可能存在于人身上的美的东西,都是别人无法领悟的,因为就连他本人也无法真正领悟。难道可以用内心的目光注视着它说,这就是它,它从前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会存在吗?难道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拥有它,说它属于某个人吗?我怎么能把与我毫不相干的东西,把我在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所见过的东西,拿来同科托夫斯基的大走马相提并论呢?我怎么能责怪安娜呢,假如她对我身上连我自己都早已看不到的东西视而不见?不,这实在太荒唐了,要知道,即使是在那些少有的、我可能体味到了这一重要东西的时候,我也明显地感到,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它表达出来,无论如何。当然,不是没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望着窗外的晚霞,说出一句准确的话来,不过仅此而已。而我自己面对日出日落时所说的那些话,早就令我不堪回首



了。我的心灵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美,我想,而是完全相反,我是在安娜身上寻找我自己从未有过的东西。当我见到她时,我剩下的唯一的東西就是一片具有引力的虚空,能够填补它的只有她的在场、她的嗓音、她的面容。那么,我到底能向她提供什么,来代替她和科托夫斯基驾着马车兜风呢?是我这个人本身?换句话说,是我的希望同她接近,从而为一个朦胧的、困扰我心灵的问题寻找答案吗?荒诞。还不如我自己跟科托夫斯基驾着大走马去兜风。

我停下来,坐在路边一块光滑的石板上。天气酷热难当。我感到筋疲力尽,没精打采;在我的记忆中,我对自己还从未如此厌恶过。我的羊皮高帽浸透了香槟酒,发出一股酸臭味,我觉得这股酸臭味正是我此时此刻的精神的真实名片。四周是冷漠麻木的夏天,不知什么地方有几条狗在懒洋洋地吠叫,火辣辣的太阳放射着灼人的光芒,犹如一挺机枪从天上不停地向下扫射。脑子里刚冒出这个比喻,我马上想起安娜曾把自己称作女机枪手;我感到自己的眼眶里涌出了泪水,于是赶紧用双手捂住脸。

几分钟后,我站起来,继续往山上走。我感到轻松多了;不仅如此,所有刚才充塞在我心中、似乎已经把我彻底压垮的想法,突然变成了微妙的快感的源泉。笼罩在我心间的忧伤甜蜜得难以言喻,我知道,再过一小时,我会试图在心中重新找回这忧伤,但它却不会回来了。

很快我就到了庄园。我发现,院子里拴着几匹没有见过的马。此外,一间厢房的烟囱里升起了烟柱。我在大门口停了下来。街道继续往上延伸,然后消失在拐弯处浓密的绿荫



中；上面见不到任何房子，所以根本搞不清楚，街道究竟通往何处。我不想见到任何人，因此，进了院子后，便慢慢地从房子的一侧绕了过去。

“快出，”二楼上一个男子低沉的声音喊道，“等着送死吧，傻瓜！”

大概那里在打牌。我走到房子的尽头，拐过墙角，进入后院。真没想到，这里风景如画，离墙几米远的地方，地面下陷，形成一道天然的深沟，沟的两侧绿树成荫。这里有一条潺潺的小溪，还能见到两三座民房的屋顶，再往前是一块不大的空地，地上耸立着一个很大的干草垛，这简直就像《田地》^①杂志上刊登的那些田园风景画。我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到干草堆上躺一会儿，于是便向草垛走去。就在我离草垛只有十步之遥时，突然从树后窜出一个人来，他手握步枪，闷声不响地挡住了我的去路。

站在我面前的就是那个曾在司令部车厢的餐厅里为我们服务、而后又从火车上摘掉纺织工人乘坐的车厢的巴什基尔人，只不过现在他的脸上长了一圈稀稀拉拉的黑胡子。

“喂，”我说道，“我们是熟人，对吧？我只想干草堆上躺一会儿，没别的。我保证不抽烟。”

巴什基尔人对我的话毫无反应，只是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我企图绕过他，他后退一步，举起步枪，用刺刀对准我的喉咙。

我转过身去，慢慢往回走。应当承认，对这个脾气倔强的

^① 1870—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文艺科普画报。



巴什基尔人,我还真有几分惧怕。当他把刺刀对准我时,那架势就像他手里握的不是步枪而是标枪,仿佛他根本不知道步枪还可以用来射击,同时,这个动作还透出一股野蛮的、草原上的震慑力,让我不由得感到,我口袋里的勃郎宁不过是儿童玩耍的鞭炮罢了。其实,这都是神经作用。我走到小溪边,回头望了一眼。巴什基尔人已经不见了。我蹲在溪边,在溪水里洗了半天羊皮高帽。

我突然发觉,伴着如同一种奇特的乐器发出的淙淙水声,传来一阵轻微而又相当悦耳的歌声。在离我最近的一间板棚(从棚顶上的烟囱可以看出,从前这是一间浴室)里,有个人在低声哼唱:

“我穿着白衬衫,静静走在田野上……井边的压水杆,跟钟楼的十字架一样……”

歌词里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我决定去看一看,是谁在唱歌。我拧干羊皮高帽,把它塞到腰间,然后走到板棚跟前,没有敲门便直接闯了进去。

里面放着一张用新刨光的木板做的宽大的桌子和两条长凳。桌子上摆着一个装着有些浑浊的液体的大瓶子、一只玻璃杯和几个洋葱头。在离我最近的那条长凳上,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人。他背对着我,衬衫的下摆没有扎进裤腰。

“对不起,”我说道,“您的瓶子里装的是伏特加吧?”

“不是,”这个人转过身来,说道,“这是家酿酒。”

原来他是夏伯阳。

我惊讶得哆嗦了一下。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你好哇，彼得卡，”他笑逐颜开地说道。“看来，你已经好了。”

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什么时候我们之间的称呼改成了“你”。不过，还有很多其它的事情我同样也不记得。夏伯阳有点狡猾地看着我；一绺湿漉漉的头发垂下来，贴在他的额头上，他的衬衣敞开着，肚皮裸露在外。他完全一副家常打扮，与我记忆中的形象大相径庭，我甚至迟疑了一阵，以为自己认错人了。

“坐吧，彼得卡，坐，”夏伯阳说着，冲旁边的凳子点点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您不是出去了吗？”我一边坐下，一边问道。

“一小时前刚回来，”他说道，“马上就到浴室来了。这是大热天最要紧的事。你干吗老问我的事，讲讲你自己。你感觉如何？”

“还行，”我说道。

“否则也不会爬起来，戴上羊皮高帽进城了。你可别断送了英雄的名声。传说你失掉了记忆，这是怎么回事？”

“确实是这样，”我说道，尽量不理睬他的插科打诨和那些并不地道的土话。“是谁这么快就告诉您了？”

“当然是谢苗啦，还会有谁？你的勤务兵。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我们在莫斯科上的火车，”我说道，“其余的事情好像一刀切掉了似的。我甚至不记得，您在什么情况下开始用‘你’称呼我的。”

夏伯阳眯缝起眼睛，盯着我的脸端详了好几分钟，似乎要



把我看穿。

“不错，”他终于说道，“我看得出来。情况不妙。我想，彼得卡，你只不过是想把水搅浑。”

“什么水？”

“想搅就搅吧，”夏伯阳神秘地说，“年轻人的事。而我们之间改称‘你’是在柳树站，在战斗开始前不久。”

“战斗是怎么回事？”我眯缝起眼睛问道。“我都听说很多次了，可什么也想不起来。一想头就疼。”

“既然头疼，就别想了。你不是想喝酒吗？那就喝吧！”

夏伯阳把瓶口对着玻璃杯，倒了满满一杯酒，推到我面前。

“多谢，”我嘲讽地说，然后一饮而尽。尽管倒出来的时候，酒看起来浑得吓人，但这种家酿酒其实很好喝，好像里面泡了些什么草药。

“要洋葱头吗？”

“现在不要。但不排除过一会儿我会进入状态，到时候不仅能够，甚至还会要求就着洋葱头喝家酿酒。”

“干吗那么忧伤呢？”

“没什么，”我回答说，“只是有一些想法。”

“什么想法？”

“难道您，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真的对我想什么感兴趣吗？”

“这有什么，”夏伯阳说，“当然啦。”

“我在想，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漂亮女人的爱情实际上始终是一种低就。因为谁也不可能配得上这种爱情。”



“啥？”夏伯阳眯缝起眼睛问道。

“别装傻了，”我说道。“我可是认真的。”

“认真的？”夏伯阳问道。“好吧。那么请注意，低就总是一方针对另一方的。好比外面沟里的水，总是从高处往低处流。你的这个低就是哪儿跟哪儿呀？”

我陷入了沉思。很清楚他用意何在。如果我告诉他，我说的是美对丑陋和缺陷的低就，他马上就会问我，美能意识到自身吗？还有，美一旦意识到自身的这一品质时，它还能成其为美吗？在彼得堡的那些漫漫长夜里，这个问题几乎让我发疯，但我始终找不到它的答案。就算这里所说的是童识不到自身的美，那么，它又有何低就可言呢？夏伯阳显然不简单。

“我们这样说吧，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是什么针对什么的低就，而是一种自发自生的低就行为。我甚至想说，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低就。”

“而本体论意义上的低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夏伯阳弯腰从桌子底下又拿出一个杯子，问道。

“我不准备用这种腔调说话。”

“那咱们就再干一杯吧，”夏伯阳说道。

我们干了一杯。我迟疑地端详了一阵洋葱头。

“不行，”夏伯阳擦干小胡子，说道，“你得告诉我，你说的低就是从哪儿来的？”

“假如您，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能够认真地谈话，我就说。”

“说吧，说吧。”

“准确地说，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低就。只不过这样的爱



情被理解成了低就罢了。”

“那么它是在哪里被理解的？”

“在意识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在意识里，”我尖刻地说道。

“也就是，简单地讲，是在脑袋里，对吧？”

“粗略地说，是的。”

“而爱情又是在哪里产生的呢？”

“还是那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粗略地说。”

“哦，”夏伯阳满意地说，“也就是说，你问的是，怎么说的……爱情是否永远是低就，对吧？”

“对。”

“爱情，就是说，是在你头脑里产生的，对吧？”

“对。”

“这个低就也是？”

“照理说，是这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那又如何？”

“你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彼得卡，竟然来问我，问自己的军事指挥官，你头脑中产生的东西是否始终就是你头脑中产生的东西？”

“诡辩，”我说道，又喝了一口酒。“十足的诡辩。总的说来，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要折磨自己？要知道，这一切我在彼得堡已经经历过了，一个身穿深红色丝绒连衣裙的年轻貌美的女子也是这样把空高脚杯放到桌布上的，我也是这样伸手到口袋里掏手帕的……”

夏伯阳大声咳嗽起来，他的咳嗽声淹没了我的说话声。我低声地把话说完，也不知道在说给谁听：



“我究竟想从这个姑娘身上得到什么呢？难道我不明白，返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尽管可以出色地仿造出它的外部环境，但无论如何也复原不了从前的自我，无论如何……”

“啊哟，你可真能吹，彼得卡，”夏伯阳讥笑道。“又是高脚杯，又是连衣裙的。”

“您怎么啦，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极力克制住自己，问道，“托尔斯泰读多了吧？决心平民化了吗？”

“我们用不着多读托尔斯泰，”夏伯阳说。“不过，假如你的痛苦是因为安娜，那么我告诉你，对任何一个娘们儿都要有自己的立场。为安娜害了相思病，对吧？我猜对了吗？”

他的双眼变成了两条狡黠的细缝。然后，他突然一拳砸在桌子上。

“你给我回答，师长在向你问话！”

我显然无法改变他今天的情绪。

“不要紧，”我说道，“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咱们再干一杯吧。”

夏伯阳轻轻地笑了起来，给两个杯子都倒上了酒。

接下来几小时的事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我醉得很厉害。好像话题又扯到了战争，夏伯阳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讲得活灵活现：讲德国的骑兵，讲河边的阵地，讲毒气战和机枪手们坐的磨盘。讲到其中一个地方时，他甚至两眼放光，兴奋得大叫起来：

“嘿，彼得卡！你知道我是怎么打仗的吗？你不可能知道！总共有三种夏伯阳式的攻击，明白吗？”

我机械地点着头，但听得心不在焉。



“第一种攻击——看地点！”

他用拳头使劲捶了一下桌子，差点打翻酒瓶。

“第二种——看时间！”

他又一拳砸在桌面上。

“第三种——看人！”

要是在别的情况下，我也许会很欣赏他的表演，但炎热的天气和家酿酒的作用使我极端困乏，尽管他又是大喊大叫，又是捶桌子，我还是坐在凳子上很快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窗外已经黑了，听得见远处绵羊咩咩的叫声。

我抬起头，扫视了一下房间。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我是呆在彼得堡的一间马车夫小酒馆里。桌上点起了一盏煤油灯。夏伯阳还是那样坐在对面，手里拿着杯子，自顾自地用鼻音低声哼唱着什么，眼睛盯着墙壁。他的眼睛很浑浊，几乎就像酒瓶里只剩下了一半的家酿酒。我想，也许该用他的腔调跟他谈一谈，于是便很夸张和放肆地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

“请您告诉我，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但一定要说实话。您是红还是白？”

“我？”夏伯阳扭头看着我，问道。“要说吗？”

他从桌上拿起两个洋葱头，开始默不做声地剥皮。他把一个葱头红皮全剥光，只剩下白色的葱肉，而另一个葱头则只去除了表面上的一层干皮，里面紫红色的厚皮还保留着。

“看着，彼得卡，”他把葱头摆到眼前的桌面上，说道。“你面前有两个葱头。一个白，一个红。”

“嗯，”我说。

“看看白的。”



“看了。”

“现在再看看红的。”

“又怎样？”

“现在两个都看看。”

“看着呢，”我说道。

“那么你本人是什么样的——红的还是白的？”

“我？什么意思？”

“当你看着红葱头时，你会变成红的吗？”

“不会。”

“而当你看着白葱头时，你就会变成白的吗？”

“不，”我说道，“不会的。”

“那我们继续，”夏伯阳说道。“有各种各样的地形图。而这个桌子就像是一张简易的意识地图。这是红军。而这是白军。然而，难道由于我们意识到了红的和白的，我们就能获得相应的颜色吗？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获得这些颜色呢？”

“您可真能绕圈子，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还不如直说，既非红，也非白。那我们究竟是谁呢？”

“你，彼得卡，在谈论复杂问题之前，先要弄清简单的问题。要知道，‘我们’——这比‘我’更复杂，对吧？”

“对，”我说道。

“你把什么称作‘我’？”

“显然是自己啦。”

“能否告诉我，你是谁？”

“彼得·虚空。”



“这是你的名字。而使用这个名字的人是谁呢？”

“嗯，”我说道，“可以说，我是一个心理个性。是诸多习惯、经验……还有知识、趣味的总和。”

“这是谁的习惯，彼得卡？”夏伯阳热切地问道。

“我的，”我耸了耸肩。

“可你刚刚才说过，彼得卡，你就是诸多习惯的总和。既然这些习惯是你的，那么就是说，这是诸多习惯总和的习惯？”

“听起来很可笑，”我说道，“不过，实际上正是如此。”

“而习惯又会有什么习惯呢？”

我感到我要发火了。

“我们这番谈话相当粗浅。要知道，我们刚开始讲的是，就自己的本质而言，我是谁。假如可以的话，我认为自己是……嗯，比方说，是单子。这是莱布尼茨^①的术语。”

“而那个认为自己是单子的人又是谁呢？”

“还是单子，”我下定决心控制住自己，回答道。

“好吧，”夏伯阳狡猾地微微眯缝起眼睛说道，“关于‘谁’的问题我们过会儿再谈。而现在，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探究一下‘哪里’这个问题。请你告诉我，这个单子在哪里？”

“在我的意识里。”

“而你的意识在哪里？”

“就在这里，”我拍拍自己的脑袋，说道。

“而你的脑袋在哪里？”

①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哲学家，认为世界是由无数的、相互协调的单子构成的。



“在肩膀上。”

“而肩膀在哪里？”

“在房间里。”

“而房间在哪里？”

“在房子里。”

“而房子呢？”

“在俄罗斯。”

“而俄罗斯又在哪里？”

“在灾难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别来这一套，”他严厉地呵斥道。“开玩笑要得到长官的命令才行。说。”

“还会在哪里？在地球上。”

我们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

“而地球在哪里？”

“在宇宙里。”

“而宇宙在哪里？”

我想了一下。

“在自身里。”

“而这个‘在自身里’又在哪里？”

“在我的意识里。”

“这么说，彼得卡，结论是，你的意识在你的意识里？”

“结论是这样。”

“好吧，”夏伯阳捋了捋小胡子，说道。“而现在，你仔细地听着。你的意识在什么地方？”

“我不明白，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地方这一概念也是一



个意识范畴,因此……”

“这个地方在哪里?地方这一概念在什么地方?”

“嗯,这样说吧,这根本不是地方。可以说,这是现……”

我突然打住了。是的,我心想,他就是要把话题往这方面引导。假如我使用“现实”这个词,他又会重新把一切都归结于我的思想。然后就会问,这些思想在哪里。我会说,在我的头脑里,接着……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当然,我也可以作一些引证,但是,我突然惊讶地意识到,我所能够援引的任何一个理论体系,要么从一旁绕开了这个思维的缺口,要么用几个语焉不详的拉丁词语来堵住这个缺口。是的,夏伯阳确实不简单。当然,任何争论都可以用一个不算输的办法来了结,只要把交谈者划归另类就行了,没有必要宣称什么对他的意图了如指掌,不过是如此这般而已,而人类的思维早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了。但我羞于去模仿一个孤芳自赏的、在淫乱放荡之余稍微翻阅一下哲学教科书的高等女校学生。更何况不久前别尔嘉耶夫^①醉醺醺地谈论俄罗斯共产主义的希腊根源时,不正是我对他说,哲学与其叫做“热爱智慧”,不如叫做“奸污智慧”更确切吗?^②

夏伯阳哼了一声。

“而人类思维又能进步到哪里去呢?”他问道。

“啊?”我惊慌失措地说道。

① 别尔嘉耶夫(1874—1948),俄罗斯宗教哲学家。

② “哲学”一词在古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热爱智慧”,是由热爱和智慧两个古希腊的词构成,而“奸污智慧”一说是作者生造的。



“进步到了哪里？相对于什么？”

我想，一定是我漫不经心地说出了声。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们说点清醒话吧。我可不是哲学家。咱们还不如干一杯。”

“如果你是哲学家，”夏伯阳说道，“我不会给你比打扫马厩更高的职位。而你现在却在我手下指挥骑兵连。在柳树站近郊时，你什么都明白，现在是怎么了？是受了惊吓？还是高兴过度？”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说道，猛然感到全身的神经异常紧张。“不记得了。”

“唉，彼得卡，”夏伯阳把两个杯子倒满，叹了口气。“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才好。你先弄懂你自己吧。”

我们干了杯。我下意识地 from 桌子上拿起一个洋葱头，咬了一大口。

“睡觉前我们是不是该去透透气？”夏伯阳掏出一支烟，问道。

“可以，”我把洋葱头放到桌子上，回答道。

我刚才睡觉时，下了一阵雨，从深沟通向庄园的那道斜坡又湿又滑。显然，我醉得很厉害，几乎快要到达坡顶时，我脚下一滑，摔了一跤。我仰面朝天地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这反而让我有机会领略到璀璨的星空。它是那么美丽，望着它，我不由得默默地躺了一会儿。夏伯阳伸出一只手，把我拉起来。当我们好不容易走到平地上时，我再次抬头朝天上望了望。我突然想到，鬼才知道我最后一次见到星空是什么时候，尽管



它一直都在头顶上方，只需抬起头来，就能见到。我笑了起来。

“你怎么了？”夏伯阳问道。

“没什么，”我说道，用一根指头指了指上空。“真美。”

夏伯阳往天上扫了一眼，摇了摇头。

“美？”他若有所思地反问道。“美是什么？”

“怎么，”我说道。“怎么能这么问呢？美就是意志在其可知性的最高层次上的最完美体现。”

夏伯阳仰望一会儿天空，然后把目光转向我们脚下的一个大水洼，把烟头吐到里面。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的世界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惨剧——所有的星座顿时颤抖起来，转眼间变成一片模糊的粼波。

“让我始终感到惊奇的是，”他说道，“星空在我们脚下，而伊曼纽尔·康德^① 在我们心中。”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一点也不明白，怎么可以把一个师交给一个将康德和叔本华^② 混为一谈的人去指挥呢。”

夏伯阳阴沉地瞥了我一眼，张开嘴巴，想要说什么，但就在这时，传来了车轮滚过路面的声音和马的嘶鸣。有辆马车正驶近我们住的房子。

“这可能是科托夫斯基和安娜，”我说道。“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您的女机枪手似乎喜欢那些穿斜领衬衫的强者。”

“什么，科托夫斯基在城里？那你干吗不早说！”

① 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② 叔本华(1788—1860)，德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的代表人物。



他转过身，快步往前走去，完全把我忘记了。我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跟在后面，走到墙角时，我停了下来。大门口停着科托夫斯基的马车，而科托夫斯基本人正在扶安娜下车。看到夏伯阳走来，科托夫斯基行了一个军礼，迎了过去，接着他们拥抱在一起。随后就是响亮的惊叹声和拍打声，正如那种常见的场面，两个人见面时，都想表明自己在艰难地穿越生活这座沙漠的同时，并没有失掉旺盛的斗志。他们就这样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慢步走向房子，而安娜则在马车旁停留了一会儿。在一阵突如其来的冲动的支配下，我朝她走了过去，路上我被一个空弹药箱绊了一下，差点又一次摔倒，于是我隐约地预感到，我将会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后悔。

“安娜，求求您！请等一下！”

她停下来，转过头。上帝呀，此时此刻，她多美啊！

“安娜，”我前言不搭后语地说道，不知为什么把双手捂在了胸口上，“请您相信，我……我为自己在餐馆里的行为感到难过。但您也要承认，这也是您自找的。我明白，这种一贯自我肯定的女权主义绝对不是您的真正品质，这只不过是某种美学观点的追随而已，还有那种时常出现的……”

她突然双手推开我。

“走开，彼得，看在上帝份上，”她皱起眉头说道。“您身上一股洋葱味。我什么都能原谅，唯独这个不能。”

我转身冲进房子。我的脸颊大概都能点烟了。在回自己房间的一路上——说不清楚我是怎么在黑暗中找到路的——我不停地用极端粗俗的字眼咒骂夏伯阳，咒骂他的家酿酒和洋葱头。一头倒在床上后，我陷入一种近乎昏迷的状态，大概



就像我今天早晨苏醒前的那种状态。

过了一阵,有人敲门。

“彼得卡!”夏伯阳从门外喊道,“你在哪里?”

“哪里也不在!”我咕哝着回答。

“嘿!”夏伯阳出人意外地大叫道。“好样的!明天我要在队列前宣布对你嘉奖。你可是什么都明白!干吗整晚都在装疯卖傻?”

“您什么意思?”

“你自己想想。此时此刻,你在自己面前看见了什么?”

“枕头,”我说道,“不过很糟糕。用不着又跟我解释说,它在我的意识里。”

“我们所见到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意识里,彼得卡。因此无法说我们的意识在哪里。我们哪里也不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说,我们就在那里。正因为如此,我们哪里也不在。想起来了吗?”

“夏伯阳,”我说道,“我最好一个人呆一会儿。”

“随你便吧。只要明天能活蹦乱跳地到我这儿来就行。我们中午要发言。”

他踩着吱嘎作响的木地板,顺着走廊远去了。我考虑了一下他的话,先是这个“哪里也不在”,而后又是那个他定于明天中午的莫名其妙的发言。当然,我本来可以走出房间跟他解释说,我无论如何也发不了言,因为我“哪里也不在”。但我没能这样做,一阵强烈的睡意向我袭来,使得一切看上去都不重要了,都是无聊的了。我睡着了,梦见安娜用她纤细的手指,久久地抚摸着棱条形的机枪枪管。



又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

“夏伯阳，我可是请求过您别来烦我！让我在打仗之前休息一下！”

“我不是夏伯阳，”门外的声音说道。“我是科托夫斯基。”

我用胳膊肘撑起身子。

“您有什么事？”

“我必须跟您谈谈。”

我掏出手枪，放到床上，用被子盖起来。鬼才知道他想干什么。我有一种预感，这与安娜有关。

“请进，请。”

门开了，科托夫斯基走了进来。他上身穿一件缀有流苏的长衫，下身穿一条花格子睡裤，跟白天判若两人。他一只手举着插有三根点着的蜡烛的烛台，另一只手握着一瓶香槟和两个高脚杯。一见到香槟，我更加确信自己的猜测，肯定是安娜向他告我的状了。

“请坐，”我指了指椅子。

他把香槟和烛台放到桌上，坐了下来。

“您这里可以抽烟吗？”

“请便吧。”

科托夫斯基点着烟，然后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他张开五指，在头顶上抹了一下，似乎想把一绺看不见的头发从额头上擦开。我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动作。对，想起来了，是在夏伯阳的装甲列车上。安娜差不多是用同样的动作整理自己剪短了的头发的。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觉得他们俩同属于一个以夏伯阳为首的奇怪的教派，而且，这种剃得



溜光的发型与他们的宗教仪式有关,但我随即又意识到,我们全都属于这个教派,我们尽享了又一次降临到俄罗斯头上的自由的滋味,也饱尝了不可避免地与之相伴相随的虱子带来的苦恼。我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您这是怎么了?”科托夫斯基扬起眉毛问道。

“我想了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剃头,是为了不长虱子。大约五年前谁会想到这一点呢?简直不可思议。”

“真奇怪,”科托夫斯基说道,“我也刚好在想这件事。在想俄罗斯发生的事。于是就顺便拐到您这儿来了。有种冲动。想聊一聊。”

“聊俄罗斯吗?”

“正是,”他说道。

“这有什么可聊的,”我说道,“一切都清楚明了。”

“不,我指的是——是谁的错?”

“不知道,”我说道,“而您认为呢?”

“知识分子。还会有谁?”

他把满满一杯酒递给我。

“知识分子,”他面色忧郁地说,“特别是只能靠别人供养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有一种丑恶的、半大孩子般的特征。他从来不怕侵害那些他潜意识里认为是公正合理的东西。这就好比一个孩子,他并不怎么害怕在父母面前做坏事,因为他知道,大不了被罚站墙角。他害怕的是外人。这个可恶的阶层就是这样。”

“我不太懂您的意思。”

“知识分子无论怎样挖苦生育他的这个帝国的基础,他还



是清楚地知道，帝国的道德法则毕竟还活着。”

“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

“因为，假如帝国的道德法则死了，他就任何时候都不敢用双脚去践踏帝国的基础。我不久前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您知道我有什么感想吗？”

我的面颊不由得抽搐了一下。

“什么？”我问道。

“善就其本性而言就是宽恕一切。您想想吧，所有现在这些刽子手以前都是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乡村去的，他们在那里成天打野兔和松鸡。不，知识分子不怕作践圣物。知识分子只害怕一件事——触及恶及其根源问题，因为他有自知之明，一触及这个问题，他马上就会被人用电线杆子插个半死。”

“强有力的形象。”

“与恶嬉戏是件很愉快的事，”科托夫斯基热烈地接着说道，“没有任何风险，而好处却显而易见。由无耻之徒组成的志愿者大军就是这么来的，他们故意颠倒上下，混淆左右，您明白吗？所有这些精明的精神皮条客，这些骨瘦如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遍体鳞伤的拉赫美托夫，这些道德败坏的佩罗夫斯基，这些贪恋可卡因的花花公子，所有这些……”

“我明白。”

科托夫斯基喝了一口香槟。

“顺便提一下，彼得，”他漫不经心地说道，“既然我们的话头扯到这儿了。我听说您有可卡因。”

“不错，”我说道，“确实有。既然它自己从谈话里冒出来了。”



我把手伸进提包，掏出洋铁罐，放到桌上。

“请用吧。”

科托夫斯基根本就用不着劝。他在桌面上撒出来的两条白色小道，很像两条没有修好的公路。完成了所有必要的程序之后，他仰面靠在椅背上。我礼貌地等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您经常思考俄罗斯问题吗？”

“我住在敖德萨的时候，每天至少思考三遍，”他闷声闷气地说道。“到了流鼻血的程度。后来放弃了。不想受什么约束。”

“那么现在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搅的吧？”

“不是，”他说道，“是内心的悲剧。”

我的脑子里忽然产生一个出人意料的念头。

“请问，格里戈里，您是否非常爱惜您的大走马？”

“那又怎样？”

“我们可以做个交换。用半罐子可卡因换您的马车。”

科托夫斯基用锐利的目光打量我一番，然后从桌上拿起罐子，往里边看了看，说道：

“您可真能诱人。您要我的马车有什么用？”

“坐呗。还会有什么用。”

“那好吧，”科托夫斯基说道，“我同意。我行李里面正好有一杆药房用的秤……”

“用眼睛估计吧，”我说道，“这东西我得来容易。”

他从长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银烟盒，倒出里面的烟卷，然后拿出一把刀，用刀尖把粉末铲到烟盒里。



“不会漏掉吧？”

“您放心，这个烟盒是我从敖德萨带来的。专用的。大走马是您的了。”

“谢谢您。”

“为我们的交易干一杯？”

“很乐意，”我说道，举起高脚杯。

喝完香槟，科托夫斯基站起来，把烟盒藏到口袋里，拿起烛台。

“那好，谢谢您跟我谈话。还有，看在上帝份上，原谅我这么晚了还来打扰。”

“晚安。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您刚才提到的内心悲剧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求助于可卡因？”

“同俄罗斯的悲剧相比，它不值一提，”科托夫斯基说道，按军人的方式短促地点一下头，然后走出门去。

有一阵子我试图入睡，但没有睡着。起先我在想科托夫斯基，应当说，他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他身上，可以感觉到某种派头。后来，我的思绪又回到我和夏伯阳的谈话上来。我开始思索他的这个“哪里也不在”以及我们的谈话。初看起来一切都很简单。他要我回答一个问题，我是否因为有了这个世界而存在，或者说，这个世界是否因为有了我而存在。当然，这一切可以归结为毫无新意的辩证法，但这里有令人恐惧的一面，而他正是用一连串看似愚蠢的追问——这一切究竟发生在哪里——巧妙地指出了这令人恐惧的一面。假如整个世界存在于我之中，那么我又在哪里呢？假如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那么我的意识又在哪里，在这个世界的什么



地方呢？是的，我可以这样说，一方面，世界在我之中，而另一方面，我在世界之中，这只不过是同一块意义磁石的两极，可问题的关键是这块磁石，这个辩证的二分体找不到自己的落脚点。

它无处可在！

因为它的存在离不开它赖以产生的人的意识。而人的意识同样无处可在，因为任何的“在哪里”都只能出现在意识之中，而对于意识而言，除了它自己创造的地方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地方……然而，在为自己创造出这个地方之前，它又在哪儿呢？自身在自身之中？可这又是在哪儿呢？

我突然感到害怕独处。我披上制服，走进走廊。借助于窗外照射进来的浅蓝色月光，我看到了通到楼下的楼梯护栏，于是我向楼梯口走去。

离大门不远的地方，停放着一驾卸了马的马车。我绕着它转了两圈，欣赏着它匀整的线条，月光似乎为这些线条平添了不少魅力。附近有匹马打了一声响鼻。我回过头，见到了夏伯阳，他拿着一把刷子站在马旁边，正在给马梳理鬃毛。我走到他跟前，在他身旁站住。他看了我一眼。真有意思，我想知道，假如我问他，他的这个“哪里也不在”在什么地方，他会怎么回答呢？他必然要用这句话本身来说明这句话，如此，他在谈话中就会陷人与我同样尴尬的境地。

“睡不着吗？”夏伯阳问道。

“是啊，”我说道，“不自在。”

“怎么，以前没见过虚空吗？”

我知道，他的“虚空”一词指的正是那个“哪里也不在”，那



个几分钟之前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的东西。

“对，”我回答说，“从未见过。”

“那么你见过什么呢，彼得卡？”夏伯阳恳切地问道。

“我们换个话题吧，”我说道。“我的大走马在哪里？”

“在马厩里，”夏伯阳说道。“它们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了？不是科托夫斯基的吗？”

“已经有将近一刻钟了。”

夏伯阳哼了一声。

“你对格里沙要当心点儿，”他说道。“他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我已经明白了，”我回答说。“您要知道，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您的话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您很善于把人赶进死胡同。”

“对，”夏伯阳一边用力梳理着马头上乱蓬蓬的鬃毛，一边说道，“我是有这个特长。然后我还会像用机枪扫射一样……”

“但是我觉得，”我说道，“我也做得到。”

“试试看。”

“好吧，”我说道。“我也给您提一连串有关地点的问题。”

“提吧，提吧，”夏伯阳含混地说。

“我们按次序来。此刻您在给马梳理鬃毛。而这匹马在哪里呢？”

夏伯阳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你怎么啦，彼得卡，完全疯了吗？”

“对不起，您说什么？”



“它就在这里嘛。”

我无言以对。这样的转折让我猝不及防。夏伯阳疑惑地摇了摇头。

“你呀，彼得卡，”他说道，“最好去睡觉。”

我傻乎乎地笑了笑，转身往回走。我的脚跟灌了铅一样，好不容易才走到床边。我一头倒在床上，开始缓慢地坠入又一场噩梦之中。还在楼梯上时我就预感到，这场噩梦是不可避免的。

它没有让我久等。我开始梦见一个蓝眼睛、浅色头发的人，他被捆绑在一把古怪的、像是牙科诊室里用的椅子上。在梦中，我清楚地知道，他姓谢尔久克，我还知道，现在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很快就会轮到我自己。一些五颜六色的导线将谢尔久克的双手连接到摆在地板上的一台模样可怖的发电机上；我的清醒程度还够让我猜度到，调试这台机器的就是我的头脑。两个身穿白色长衫的人弯下腰，开始摇发电机的手柄。起初他们摇得很慢，椅子上的人只是咬着嘴唇，不时地抖动一下，但随着他们动作的逐渐加快，被捆绑在椅子上的人的全身开始出现一波高过一波的强烈震颤。他终于坚持不住了。

“停下来！”他请求道。

但他的两个折磨者摇得越发快了。

“关掉发电机，”他使出浑身力气大喊道，“关掉发电机！
发电机！发一电一机！！发—电—机！！！”



6

“下一站——‘迪纳莫’^①，”电动式扬声器里的一个声音说。

坐在对面的乘客是一个样子很怪的男子，圆圆的麻子脸，穿一件脏兮兮的棉布长衫，头上裹着带有绿色颜料印迹的阿拉伯头巾。当他发现谢尔久克已经盯着他看了好几分钟，他挠了挠耳朵，将两个手指紧贴在头巾上大声说：

“嗨，希特勒！”

“希特勒，嗨，”谢尔久克礼貌地回答，随即把目光移开。

真不明白，这到底是个什么人，为什么会来乘地铁，长着这样一副嘴脸，至少可以乘德国产的汽车了。

穿长袍的人头顶上挂着一幅宣传画，上书：“粮食是您的宝贵财富。”粮食一词的前两个字母已经磨掉^②，句子结尾还补上了一个感叹号。谢尔久克满怀同情地叹了口气，眼睛瞟向右边，开始读邻座乘客放在膝盖上的书。这是一本陈旧的

① 俄语中“迪纳莫”即“发电机”的意思。

② 俄语中“粮食”一词去掉前两个字母就变成一句粗话、意思是“操”。



小册子，用报纸包了皮，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日本军国主义》。看得出来，这是一本半保密性质的苏联资料。书页由于年久而发黄了，铅字很怪；字里行间夹杂着不少日文斜体字。

“社会义务，”谢尔久克读到，“在他们那里是跟人的自然的义务感交织在一起的，从而能够产生一种强烈的悲剧性的感染力。这种义务对于日本人来说表现在两个完全没有过时的概念‘他’和‘哑铃’上。‘他’是指孩子对父母、附属国对宗主国、公民对国家有‘感激的义务’。‘哑铃’则是一种责任，要求每个人依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状况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也是对自我负责：捍卫个人的尊严和名誉。要时刻准备为‘他’和‘哑铃’，为社会、职业和人类的行为准则牺牲自己。”

显然邻座的人发现了谢尔久克在读他的书，他把书端到眼皮底下，还半遮半掩着，生怕谢尔久克看见内容。谢尔久克只好闭上眼睛。

“他们之所以过着正常的生活，”他想，“是因为他们总是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像我们这样没完没了地喝酒。”

不知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的脑子又想到了什么，当地铁在“普希金站”停下来时，谢尔久克怀着一种强烈的愿望走出车厢。他想喝酒，不是一般地喝，而是一醉方休。但这种愿望起初是不成形的，无意识的，也可以说是对一种无法实现或似乎失落的东西的朦胧渴念，而它真正成形是在谢尔久克出现在一大排饮料专卖亭前面的时候。他发现，透过售货亭的窗口毫无表情地望着外面敌方地界的，是清一色的高加索人的脸孔。



很难选择某种具体饮料。品种倒是很多，但质量都不怎么样，跟大选情况差不多。谢尔久克犹豫了很久，直到他在一个售货亭里看到一瓶名为“利瓦吉亚”的波尔图葡萄酒。

一看到这瓶酒，谢尔久克马上清晰地想起年轻时代一个已被忘却的早晨：在大学校园一个堆满纸箱子的角落里，灿烂的阳光照耀在金黄色的树叶上，一群嘻嘻哈哈的同年级同学聚在一起，轮流喝着同一瓶酒，也就是这种波尔图葡萄酒（当然，酒瓶上贴的商标稍有区别——那时用的还是俄语）。谢尔久克还想起，这个角落很隐蔽，不容易被人发现，他们是从生锈的铁栅栏的夹缝中钻过去的，还弄脏了衣服。但这里重要的不是波尔图葡萄酒，也不是铁栅栏，而是那些在记忆中一闪而过、随即又在心中勾起一丝惆怅的无限的机会与路线，它们能超越这个用铁栅栏围起来的角落，包容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的整个世界。

紧接着他的脑子里又出现一个非常难堪的想法，那就是其实世界本身从那时起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只不过要像从前那样通过一个角度毫不费力地看清世界，已经不可能了：现在的铁栅栏无论如何是钻不进去的，即便能钻进去也无处可去，因为铁栅栏里面的空地早已经被那些老谋深算的镀锌棺材占据。

不过，如果说用从前的角度看世界是不可能的，那么，用从前的醉眼看世界，无疑是可以的。谢尔久克把钱塞进售货亭的窗口，抓起从里面推出来的一瓶绿色“手榴弹”，穿过马路，小心翼翼地绕过倒映着傍晚的天空的水洼，在“绿色普希金”对面的一条长凳上坐下，用牙齿拔掉酒瓶上的塑料软塞。



葡萄酒的味道跟从前完全一样，这充分证明，改革并未触及俄罗斯生活的根本，只是表面轰轰烈烈而已。

咕嘟咕嘟几大口把酒喝干以后，谢尔久克很仔细地将酒瓶丢到花岗石路沿边上的灌木丛里。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老太太走了过去，在此之前，她假装在看报纸。谢尔久克倚到长椅的靠背上。

醉酒就其本质而言不具有个性色彩，而具有一种世界主义意味。在几分钟之后到来的快感中，没有出现任何那张印有柏树、古希腊罗马风格的拱门和满天繁星的商标所承诺和暗示的东西。无论如何感觉不到这葡萄酒是左岸的，他的脑子里甚至闪过一种推测，假如葡萄酒是右岸的，或者干脆是摩尔达维亚的，周围的世界肯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这个世界发生了变化，而且是相当明显的变化，它看上去不再充满敌意，而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竟会在一夜之间从世界之恶的信徒变成了世界之恶的牺牲品。过了一会儿，世界之恶自身又发生了变化——它要么是失去了踪影，要么是停止了存在。醉意达到了快感的顶峰，在最高点静止了几分钟，然后，昏昏沉沉的思绪又将谢尔久克拉回现实。

有三个中学生从谢尔久克身边经过，他们正在变声的嗓音有力地重复着“集市”这个词。他们逐渐缩小的背影朝停在人行道旁的一辆头部装有一台大卷扬机的日产水陆两用吉普车走去。就在吉普车的上方，特维尔大街的对面，竖立着“麦当劳”的标志，犹如看不见的城墙上黄色的雉堞。谢尔久克想，远去的中学生的背影、吉普车以及红底黄字的“麦当劳”，



这一切集中在一起有点像杰伊涅卡那幅名为《未来飞行员》的画。就连在主人公的命运方面，二者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未来的强盗已经钻进地下通道，而谢尔久克还在思考着刚才的问题。他想起美国电影《追杀荷兰人》。影片是在当今的莫斯科拍摄的，讲的却是三十年代的纽约，片中一个匪徒家的墙上，就挂着一幅“未来飞行员”的复制品，这无形中为影片增添了不少阴森恐怖而又耐人寻味的内涵。

不过，谢尔久克对政治并没有多加思考，他的思想很快又回到在地铁里读到的片断上来。

“日本人，”谢尔久克想道，“真是个伟大的民族！请想想看，给他们投了两颗原子弹，占了他们四个岛，他们居然活下来了……我们为何只盯着美国呢？美国对我们有个屁用？应该向日本学习，我们毕竟是近邻。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们也应该跟我们友好，我们可以合力搞垮美国……他们不能忘记原子弹，我们不能忘记别洛维日森林^①……”

这些想法以难以捉摸但又并不矛盾的方式转化为一个决定——再来一瓶。他考虑了一会儿该买什么。波尔图葡萄酒再也不想要了。在一阵欢快的左岸的柔板之后来一段平缓而悠长的行板似乎比较合适——他想来点儿普通的，无岸的，比如“旅游俱乐部”里的海洋或是他用自己的私有化债券换来的股票上的麦田。考虑了几分钟后，他决定要荷兰酒，直到在去

^① 别洛维日森林位于白俄罗斯西南部，离明斯克 340 公里。199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1 年 12 月 8 日，白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三国首脑在该地的维斯库利别墅签署协议，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停止存在。



售货亭的路上他才明白，他的选择起因于刚才想起的那部电影。

当然，这并不重要。重新回到那条长椅上之后，谢尔久克打开瓶子，倒了半塑料杯，一饮而尽。他一边张开被酒精烧得火辣辣的嘴呼吸空气，一边撕开包着下酒用的汉堡包的报纸。这时一个奇怪的图标映入他的眼帘，那是一朵画成椭圆形的、花瓣不对称的红花。图标下面有一段广告：

“日本‘平清盛集团公司’莫斯科分公司招聘职员。需懂英语并能熟练操作电脑。对符合条件者将择优录取。”

谢尔久克晃了晃脑袋。他感觉广告旁边好像还印着一份饰有类似图标的广告。他仔细察看报纸，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的确有两个椭圆——在环绕着一条线的花瓣旁边，有一个血红的圆圆，这是从汉堡包带刀痕的死灰色肉夹层上流下来的一滴番茄酱。谢尔久克满意地发现，现实的不同层面已经开始混淆不清了，他细心地从报纸上撕下招聘广告，舔净上面的那滴蕃茄酱，然后将它折叠起来，藏进口袋里。

接下来一切都跟平常一样。

恶心以及早晨灰白的光线催醒了谢尔久克。当然，刺激他的主要是光线，跟平常一样，它给人的感觉是，里面掺了消毒用的漂白粉。谢尔久克环顾一下四周，发觉他是在自己的家里，而昨天晚上，显然是来过客人（到底是谁，他不记得了）。他吃力地从地板上爬起来，脱下弄脏的上衣和帽子，走到走廊，将它们挂到钩子上。此后他猛然想到，冰箱里可能有啤酒，生活中这种事的确发生过几次。可当他走到离冰箱还剩



总共几米远的时候，墙上的电话响了。谢尔久克拿起话筒想要说“喂”，但就连开口说话的企图也让他难受不已，以致出口的不是“喂”，而是类似“噢哈哟”这样的呻吟。

“噢哈哟翟伊玛斯^①，”电话那边精神抖擞地重复道，“是谢尔久克先生吗？”

“是我，”谢尔久克回答。

“您好，我是织田信长，我昨天晚上跟您谈过。确切地说，是今天深夜。您太客气了，还给我打电话。”

“是的，”谢尔久克一边用闲着的手抓头发，一边说道。

“我跟川端义恒先生讨论过您的建议，他准备今天下午三点接受您的访谈。”

电话里的声音很陌生。很快便清楚了，这是一个外国人，虽然一点也感觉不到对方的口音，但他说话有停顿，似乎在选择恰当的词语。

“非常感谢，”谢尔久克说道。“不过是什么建议呢？”

“就是昨天您提出的。或者说是今天，如果说得准确一些。”

“啊—啊！”谢尔久克说道。“啊—啊—啊！”

“请记下地址，”织田信长说道。

“好，”谢尔久克说道，“请稍等，我拿支笔。”

“为什么您的电话机旁没有纸和笔呢？”信长的口气里明显带着愠怒，“生意人应该有。”

“好了，请讲。”

^① 日语：您好。



“在‘山上’地铁站下车，从右边的出站口出来后，马上会看到一道铁栅栏。那里有幢房子，入口在院子里。确切地址是——五粮胡同五号。那里有……标牌。”

“谢谢。”

“好了，就这些，萨尤那拉^①。”信长说完便挂了电话。

冰箱里没有啤酒。

谢尔久克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很久便出了“山上”地铁站。他确实马上看到一道已经严重锈蚀的铁栅栏，但他不相信这就是信长先生说的铁栅栏，因为太寒酸、太肮脏了。他在周围徘徊了一阵，然后拦住几个难得一见的过路人，向他们打听五粮胡同在哪儿。好像谁都不知道，也可能是谁都不肯说：谢尔久克遇到的基本上都是身穿黑衣、步履缓慢的老太婆。

这一带很荒凉，周围杂草丛生，像是很久以前被炸毁的一个工业区。草丛里竖着一块块废铁，天地开阔，远处是一片黑压压的森林。尽管这里破败不堪，但却是个不同寻常的地方。朝西看，也就是朝生锈的铁栅栏那边看，展现在眼前的是平淡无奇的城市全景。但要朝东看，进入眼帘的则是一大片光秃秃的田野，上面竖立着几个灯笼架似的东西，仿佛谢尔久克到了后工业化的俄罗斯与原始罗斯之间的秘密边界。

这不是那些正经外国公司开办事处的地方。谢尔久克由此断定，这肯定是一家小公司，在里面工作的肯定是几个不适应生活的日本人（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七个日本武士》中的

^① 日语：再见。



那几个农民)。他开始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对他酒后的电话如此感兴趣,他甚至同情和关心起这几个并不遥远的人,他们跟他一样,不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本来他一路上都在为自己没有刮胡子而烦恼,可一想到这些日本人,不用说,他的烦恼立刻烟消云散了。

信长先生说的那个地方有几十幢建筑。谢尔久克不知为什么竟敢断定,他要找的就是那幢灰色的、底楼是装着玻璃橱窗的食品店的八层楼。在它的院子里兜了约莫有三分钟后,他的确在墙上发现一块写着“平清盛商场”的铜牌和一只小小的、在凹凸不平的墙面上很不显眼的门铃按钮。距铜牌大约一米远的地方是一扇漆成绿色的粗糙的铁门,挂在几只很大的合页上。谢尔久克不知所措地朝四处张望一下。除了这扇门,这个铜牌可能也跟柏油马路上那个铸铁的窨井盖有关系。等到差两分钟三点的时候,谢尔久克按响了门铃。

门马上开了。里面站着一个人身穿迷彩服、手持黑色警棍的傻大个儿。谢尔久克向他点点头,想要解释一下自己来访的原因,但却张着嘴巴惊呆了。

门内是一个不大的前厅,里面摆着一张放电话的桌子和一把椅子,而前厅的墙上镶着一块很大的装饰板,装饰板上画了一条没有尽头的走廊。等到仔细端详一番,谢尔久克才明白,这根本不是装饰板,而是一扇玻璃门,门后是一条真正的走廊。走廊很古怪,墙上挂着灯笼,薄薄的稻草纸透出颤巍巍的亮光,地上撒了一层厚厚的黄沙,黄沙上面铺着用一块块狭窄的竹席拼接起来的“地毯”。灯笼上画着一个跟报纸广告上一样的标记,一朵有四个菱形花瓣(两侧的要长一些)的椭圆



形红花。走廊并非像一开始给人的感觉那样没有尽头，而只不过是一直平缓地向右弯曲（谢尔久克第一次在莫斯科的建筑中看到这样的设计），所以看不到尽头。

“您有什么事？”保安打破沉静。

“我跟川端先生约好了，”谢尔久克清醒过来便说道，“一点钟见面。”

“那您快点去吧。他们不喜欢门开得太久。”

谢尔久克走进去，保安随即关上门，锁上那把笨重的大锁。

“请脱鞋，”他说道。“木屐在那里。”

“什么？”谢尔久克没听明白。

“木屐，也就是他们的拖鞋。里面只能穿这个。这是规矩。”

谢尔久克见地板上有几双木鞋，看上去很笨重，也不方便，像是高高的鞋楦，上面钉着一根分叉的细绳，而且只能光着脚穿，因为绳子要夹在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他以为保安是在开玩笑，但随即又发现墙角放着几双黑色的漆皮鞋，鞋里还塞着袜子。于是他坐到凳子上，开始脱鞋。穿好木屐后，他站起来，发现木屐使他的身高增加了十公分。

“现在可以了吧？”他问道。

“可以了。拎着灯笼，沿着走廊一直向前走。三号房间。”

“为什么要拎灯笼？”谢尔久克觉得很奇怪。

“这是传统，”保安说着从墙上拿下一个灯笼，递给谢尔久克。“您系领带也不是因为冷吧。”

谢尔久克认为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他已经好多年没系



领带了,直到今天早晨才破例。拎就拎吧,他正好可以顺便瞧瞧灯笼里的灯是真的还是假的。

“三号房间,”保安重复道,“只是那里的数字是日文的,知道吗,三根横线,就像三个减号叠加在一起。”

“哦,”谢尔久克说道,“明白了。”

“无论如何不要敲门,只要让他明白您在门外就行了,比如您咳嗽一下或者说点什么。然后就等着他们跟您说话。”

谢尔久克手里紧紧地拎着灯笼,像鹤一样高抬着脚向前走。穿这样的鞋走路很不方便,脚下的竹席气得吱吱作响,弄得谢尔久克满脸通红,他心里想,那个保安可能正在后面看他的笑话呢。转过一道弯,谢尔久克面前出现一个不太大的半明半暗的客厅,客厅的天花板下是一道道黑色的横梁。开始谢尔久克并没有看到周围有什么门,后来他才明白,那高高的墙板就是门,可以向旁边移动。有块墙板上贴着一张纸,谢尔久克举着灯笼凑到近前,见上面有三根用墨汁画的横线。他明白了,这就是三号房间。

门里传出低沉婉转的乐曲,是用一种陌生的弦乐器演奏的,音色很特别,而旋律,不知为什么谢尔久克觉得,是由一组奇特而古老的和音构成的,给人以缠绵悱恻之感。谢尔久克咳嗽一声,门里没有回话。他又咳嗽一声,比刚才响一些,心想,要是再咳嗽一声的话,他可要吐了。

“请进,”门里有个声音说。

谢尔久克将门板向左推开,看见一个房间,地板上铺着普通的深色竹席。房间的角落里,一个身穿深色礼服的人光着脚盘腿坐在一个花坐垫上。他在演奏一种古怪的乐器,那乐



器有点像带小鸣声器的长诗琴。对谢尔久克的出现，他没有任何反应。他的脸很难说是蒙古人的脸，确切地说，倒有几分南方人的特征（谢尔久克的思绪顺着一条具体的路线飘到很远——他想起自己去年的顿河畔罗斯托夫之行）。房间的地板上摆着一只放着一口大锅的单炉盘电炉，还有一部黑色的流线型传真机，传真机的导线是从墙上的一个小洞穿出去的。谢尔久克走进房间，将灯笼放到地板上，随手关上门。

那个穿礼服的人最后拨弄一次琴弦，送走那个永远离开这个世界的音符，然后抬起红肿的双眼，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琴放到地板上。他的动作缓慢而谨慎，似乎生怕自己笨拙或剧烈的手势怠慢了房间里的某个人，而这个人谢尔久克又看不见。他上衣口袋里拿出手帕，擦去眼里的泪水，朝谢尔久克转过身来。他们互相打量了一阵。

“您好，我姓谢尔久克。”

“川端，”那个人说道。

他站起来，快速走到谢尔久克面前，向他伸出手。他的手掌冰冷而干枯。

“请，”他直接将谢尔久克拉到坐垫上，说道。“请，请坐。”

谢尔久克坐下。

“我……”谢尔久克刚要开口说话，就被川端打断了。

“我什么都不想听。我们日本有一个传统，非常古老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有人手里提着灯笼，脚上穿着木屐来到您的家里，这说明，外面已经是深夜了，而且天气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倒上一壶热酒。”

说着川端便从锅里拎出一个短颈的粗瓶子。瓶子是用软



塞封的口，瓶颈上拴着一根长线，川端就是捏着这根长线，把瓶子拎出来的。他不知从哪里又弄来两个瓷酒杯，上面画着很不雅观的图画——几个眉毛高挑得很不自然的美女在令人费解地跟几个头戴蓝色小帽、面部表情严肃的男子做爱。川端斟上酒。

“请，”他说着将一个酒杯递给谢尔久克。

谢尔久克将酒杯里的东西倒进嘴里。那液体很像用米汤稀释过的伏特加。此外，还很烫，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谢尔久克在吞下它之后又马上把它吐到了席子上。一股强烈的羞耻感和对自己的厌恶感攫住谢尔久克，使他不由得闭上了眼睛。

“哦，”川端礼貌地说道，“外面，大概雨下得很大吧。”

他拍了拍手。

谢尔久克微微睁开眼睛。房间里出现两个姑娘，穿着打扮很像酒杯上画的那几个女人，眉毛也是高挑的，谢尔久克仔细一看才知道，她们的眉毛原来是用墨汁画在额头上的。总之，她们简直太像了，以致谢尔久克的思想还无法从刚才所经受的耻辱中转过弯来。姑娘们迅速卷起弄脏的席子，又在原地铺上一块新的，旋即消失在门外，但不是谢尔久克走进来的那扇门，而是另一扇；显然还有一块墙板可以活动。

“请，”川端说道。

谢尔久克抬起头。日本人递给他一个新的酒杯。谢尔久克抱歉地笑了笑，耸了耸肩膀。

“这次，”川端说道，“一切都会好的。”

谢尔久克一饮而尽。的确，这次一切都不一样了，米酒平



滑地从口中流入体内，同时一股热流传遍全身。

“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他说道，“我……”

“先再来一杯再说，”川端说道。

地板上的传真机响了，机器里爬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象形文字。等传真纸停止不动了，川端把它从机器上撕下来，埋头研读，全然忘记了谢尔久克的存在。

谢尔久克环顾一下四周。房间的四壁都包着一模一样的木质墙板，此时此刻，米酒已经消除了昨天开始发作的怀旧情绪，于是谢尔久克开始觉得，每块墙板都是一扇通向未知世界的门。不过，挂着版画的那块墙板显然不是门。

跟川端办事处里所有的东西一样，这幅版画也很奇特。这是很大的一张纸，越往中间色彩越稠密，像是由一些潦草但精确的线条勾勒而成的画面。画面上是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裸体男子（他的形体经过了明显的加工，但从画得很逼真的性器官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男人）。他的脖子上挂着几个沉重的大小不一的哑铃，双手各握一把宝剑；他的眼睛用一块白色的布条蒙着，而脚下是陡峭的悬崖。还有几个小小的细节——太阳隐没到雾里，小鸟在天空飞翔，远处的塔尖高耸入云，然而，尽管这些插笔富于浪漫色彩，但给观赏者留下的主要印象还是身陷绝境、无路可走。

“这是我们的民族画家赤地光英的作品，”川端说道，“就是不久前吃鱼中毒的那个。您怎么看这幅版画的主体？”

谢尔久克上下打量着画面上的人物，从他裸露的生殖器一直打量到他胸前挂着的哑铃。

“是啊，当然，”他出乎自己意料地说道，“他和哑铃。也就



是‘他’和‘哑铃’。”

川端拍手笑了。

“再来一杯米酒，”他说道。

“您知道吗，”谢尔久克回答，“我倒是乐意从命，但也许还是先采访为好吧？我很快就会醉的。”

“采访已经结束了，”川端说着将杯子斟满。“您看明白了吧，我们的公司历史悠久，久到什么程度，如果我告诉您，您恐怕都不会相信。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传统。打个比方来说吧，只有穿过一扇非常狭窄的门，才能进到我们这里，而您刚才是迈着自信胸步穿过这扇门的。祝贺您。”

“哪扇门？”谢尔久克问道。

川端指了指那幅版画。

“就是这扇门，”他说道。“唯一一扇进入‘平清盛集团公司’的门。”

“我不太明白，”谢尔久克说道。“据我所知，您是经商的，所以对于您……”

川端抬起一只手。

“我时常发现，”他说道，“半个俄罗斯都感染上了令人厌恶的西方实用主义，真是触目惊心啊。当然，我不是指您，但我说的话都是有根据的。”

“实用主义有什么不好？”谢尔久克问道。

“古时候，”川端说道，“我们国家是通过考试来选拔重要官员的，应考者必须在考试时当场写出一篇美文。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原则。要知道，一个人的理解力如果能远远超出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他在官场上无疑就会应付自如。既然您的



智慧闪电般地悟出了这幅画所蕴含的古老秘密，那么，所有这些外在和附加的东西对您难道还会成为问题吗？不会的。要紧的是，听了您的回答之后，我更要敬您一杯。请您不要拒绝。”

又一杯酒下肚后，谢尔久克出乎自己意料地陷入了对昨天的回忆。原来，他是从普希金广场乘车到清水塘的。说实话，也不太清楚为了什么来这里，他的记忆中只剩下那个格里鲍耶陀夫纪念像，而且是从奇怪的角度看到的，好像他是从长椅下面看到的。

“是的，”川端若有所思地说道，“要知道，实际上，这幅画挺可怕的。只有那些我们共同约定的规矩和仪式才能把我们和动物区别开来。如果破坏了它们，那还不如死，因为只有它们才能把我们同胸下的深渊分隔开来，当然，前提是摘掉眼睛上的遮布。”

他用手指了指那幅版画。

“但在我们日本还有另外一个传统——有时我们会在内心深处暂时背离一切传统，像人们说的那样，摒弃佛祖和摩罗，为了体验一下现实那无法言传的滋味。而这暂时的背离有时会诞生出惊人的艺术作品……”

川端又看了一眼那个提着宝剑站在悬崖边上的人，并叹了口气。

“是的，”谢尔久克说道，“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这样，人们在背离一切。而传统……怎么说呢，有些人会去教堂，但基本上，当然还是看电视，再就是琢磨着赚钱。”

他突然觉得自己把谈话的标准放得太低了，得赶快说点



有水平的话。

“也许，”他将一只空酒杯递给川端，接着说道，“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就本性而言，俄罗斯人不喜欢做形而上学的探索，只是满足于跟酗酒混杂在一起的无神论，老实说，这便是我们主要的精神传统。”

川端给谢尔久克和自己斟满酒。

“在这个问题上恕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他说道。“原因是，不久前我的收藏中，又添了一件俄罗斯宗教艺术作品。”

“您搞收藏？”谢尔久克问道。

“是的，”川端说着从地板上站起来，走到一个置物架跟前。“这也是我们公司的原则之一。对我们要与之打交道的民族，我们总是努力潜入其灵魂深处。应该说明，我们并不是为了获取额外的利润，才执意要搞清楚……用俄语怎么说的？民族精神，对吧？”

谢尔久克点了点头。

“不是，”川端打开一个大文件夹，继续说道。“确切地说，我们是希望将远离艺术的活动提到艺术的高度。不知您能否理解，假如您将一批机枪卖给了虚空，并从虚空那儿得到一笔来路不明的汇款，那就说明您跟出纳员没多大区别。但假如您将这批机枪卖给您了解的一些人，知道他们每次杀人的时候，都要在造物主的三个身份面前忏悔一番，那么，这一普通的买卖行为便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并完全获得了另外一种性质。当然，这不是对他们而言，而是对您。您处于和谐之中，您与您所处的宇宙是统一的，您在合同上的签字从而也就获



得了同样的存在地位……我的俄语表达得对吗？”

谢尔久克点点头。

“这种存在地位，就跟日出、海潮和风中摇摆的小草所拥有的地位一样……我刚开始时说什么来着？”

“您的收藏。”

“哦，对了，能赏脸看一看吗？”

他递给谢尔久克一大张纸，上面遮着一层透明的保护膜。

“只是请您小心点儿。”

谢尔久克接过那张纸。这是一块尘封已久的浅灰色硬纸板，看上去相当古老。上面是用镂花模板和黑色颜料印的两个斜体字：“上帝”。

“这是什么？”

“这是世纪初的俄罗斯观念主义圣像画，”川端说道。“是大卫·布尔柳克的作品。听说过他吗？”

“好像听说过。”

“真是奇怪，他在俄罗斯不太有名，”川端说道。“但这并不重要。您仔细看看！”

谢尔久克又看了看那张纸：笔画上有白色线条状划痕，显然是固定镂花模版用的纸条留下的痕迹。字印得很粗糙，周围凝结了一些颜料斑点，看上去很古怪，像一只鞋印。

谢尔久克捕捉到了川端的目光，并用拉长的声音说了句什么，有点像“是-是-是的”。

“这里有几层涵义，”川端继续说道。“请您等等，不要说话，让我试着说说我的看法，如有遗漏，您再补充。好吗？”

谢尔久克点了点头。



“首先，”川端说道，“‘上帝’一词是透过镂花模板印上去的，这是事实。这个词正是作为一种镂空的印迹，以亿万人心目中的形象，进入人们儿时的意识中去的。另外，纸的质地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要是纸质粗糙，上面的印迹就不可能清晰，要是纸上已经有了别的字，最终留下的到底是什么就会没有办法搞清楚。所以人们才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帝。此外，请看看这几个粗糙得令人叫绝的笔画，它们的棱角很引人注目。很难相信会有人意识到这两个字就是永恒之爱与仁慈的源泉，正是这永恒之爱与仁慈的光辉使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可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个更像是给牲畜打的烙印的印迹，也是人们在生活中唯一能期待的东西。您同意吗？”

“同意，”谢尔久克说道。

“但是，如果一切仅局限于此，那么您手里的作品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因为所有这些内容在乡村俱乐部里的任何一次无神论讲座上都能听到。但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它使这个圣像变得确实不同凡响，使它超过了——我不忌讳这样的字眼——鲁布廖夫的“三位一体”。您当然明白我要说什么，但请您让我自己说出来。”

川端郑重地作了一个停顿。

“我当然指的是镂花模板留下的空白。要给这些空白涂上颜色并不难，但真要涂上颜料的话，这部作品也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正因为如此，人才会注意这两个字，并将注意力从可见的内容转向可见的形式。这时他会突然发现一片一无所有的空白，在这片‘空白’里，唯一可以见到的便是这些硕大而



朴拙的笔画所极力指示的东西，因为‘上帝’一词所指示的正是无法喻指的东西。这几乎是根据埃克哈特^①所说的或者……不过，这不重要。许多人都试图用语言来表达这一点，包括老子。还记得他是怎么谈论车轮和辐条的吗？或是容器，说它的价值取决于中空的大小？如果我说，任何一个词都是一只这样的容器，且一切都取决于它中空的大小，难道您会有异议吗？”

“不会，”谢尔久克说道。

川端揩去额头上感激的汗滴。

“现在请您再看看墙上的这幅版画，”他说道。

“好吧，”谢尔久克说道。

“您看到它是怎么构成的吗？‘他’和‘哑铃’所在的真实部分位于作品的最中心，而周围都是空白，可谓生于空白又归于空白。在日本，我们不会就宇宙成因问题用种种不必要的想法打搅宇宙。我们不会用‘上帝’的概念来给上帝增添负担。但是，尽管如此，版画上的‘空白’——正是您在布尔柳克的神像中看到的‘空白’。这一巧合着实耐人寻味吧？”

“当然，”谢尔久克将空酒杯递给川端，说道。

“但是，在西方的宗教画中您绝对找不到这样的‘空白’，”川端一边倒酒，一边说。“那里充斥着物体，什么窗帘啊，皱褶啊，带血的盆子啊，以及一些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这两部艺术作品在反映真实方面的独具匠心把我们联结在了

^① 埃克哈特(约1260—1327)，德国思想家，西欧中世纪晚期神秘主义哲学的著名代表。



一起。因此我认为，实际上，俄罗斯最需要的是与东方进行炼金术式的联姻。”

“不错，”谢尔久克说道，“昨天晚上谈的正是这个……”

“与东方联姻，”川端打断他，“而不是与西方。您明白吗？在俄罗斯人灵魂深处出现的虚空与日本人灵魂深处出现的虚空是一样的。世界正是从这片虚空中诞生的，每一秒钟都在诞生。祝您健康。”

川端紧跟着谢尔久克一饮而尽，然后晃了晃手里的空瓶子。

“不错，”他说道，“容器的价值当然在于它是中空的。可这个容器的价值在最后一分钟里涨幅过高。价值与无价值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这是不堪忍受的。没有什么比失去平衡更可怕。”

“是的，”谢尔久克说道，“千真万确。怎么，酒没了？”

“我们不妨走一趟，”川端看了看表回答道。“只是我们会错过一场足球比赛……”

“您是球迷？”

“我喜欢‘迪纳莫’队，”川端说道，并很有特点地眨了眨眼睛。

穿上破旧的短上衣，戴上风帽，再加上一双胶皮靴子，这身打扮的川端已经完全不像一个日本人，倒是活像一个从顿河畔罗斯托夫来的人，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不能不让人顿生疑窦，深究起来简直毛骨悚然。

实际上，谢尔久克早就知道，在莫斯科马路上遇到的大多



数外国人,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外国人,而只不过是一些在“卡林卡-斯托克曼”商店里提货、到处坑蒙拐骗的小商贩。而莫斯科那些数量惊人的真正的外国人,为了安全起见,多年以来,故意使自己的穿着打扮接近普通人。莫斯科马路上的普通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此,人们头脑中的概念显然大都是从 CNN 那里得到的。而 CNN 为了极力展示在烧得精光的改革的荒漠上踉踉跄跄地追逐着民主幽灵的莫斯科人,十之八九是将特写镜头给了美国大使馆里莫斯科人打扮的外交官,因为他们看上去比那些打扮成外国人模样的莫斯科人要自然得多。因此,尽管川端像个从罗斯托夫来的外地人,确切地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尤其是因为他长得不太像日本人,才可以马上断言,这位在莫斯科的黄昏时分离开自己办公室片刻的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

不仅如此,川端还带着谢尔久克走了一条只有外国人才走的路线,他们神出鬼没地穿过一个个昏暗的院子和门洞,穿过一道道铁丝网,搞得谢尔久克几分钟后便彻底迷失了方向,只好完全依靠自己这位健步如飞的同伴了。他们很快来到一条昏暗而弯曲的街道上,那里有好几个售货亭,谢尔久克明白,他们已经到了目的地。

“我们要点什么?”他问道。

“我想,来一升日本米酒吧,”川端说道。“够喝了。再要点吃的。”

“米酒?”谢尔久克惊讶地问道。“难道这里有米酒?”

“这里正巧有,”川端说道。“在莫斯科总共只有三家售货亭可以买到合格的日本米酒。想想看,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



开办事处？”

“他在开玩笑，”谢尔久克心想。他扫了一眼橱窗：上面摆放的酒都很普通，只有夹在中间的几瓶酒不认识，是一升装的，商标上写满了象形文字。

“黑米酒，”川端对着售货亭的窗口说道。“两瓶。对。”

谢尔久克拿了一瓶放进口袋，另一瓶则留给了川端。

“现在还有一件事，”川端说道，“稍等片刻。”

他们贴着一排售货亭往前走，很快来到一个不太大的包着洋铁皮的售货亭旁边。售货亭的门上布满了洞眼——要么是子弹打的，要么是钉子钉的，也可能既是子弹打的，也是钉子钉的，这种事并不少见。售货亭的两扇窗户安装了传统的装饰性护栏；护栏是钢筋做的，已经生锈，造型由右下角的一个半圆和一个放射状扇面构成，仿佛一轮初升的太阳放射出的万道光芒。门上挂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装黄用品”，也可能是“装潢用品”，第二个字没写清楚，不知是“黄”还是“潢”。

从内部看，这个售货亭跟其他类似的售货亭没什么两样，货架子上摆着油漆桶，墙上挂着瓷砖样品，还有一个摆满各式各样锁具的专柜。角落里一个倒置的塑料浴盆上，放着一个谢尔久克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这是一副灰色铠甲，上面的清漆和金色的饰物熠熠生辉。它的旁边放着一个带角的钢盔，下面连着一圈扇状的护领片，也漆着黑色的清漆。而在钢盔的额上则嵌着一颗银色的五角星。

铠甲旁边的墙上挂着几把长短不一的剑和一张很大的不对称的弓。



当谢尔久克观赏着这个“武器库”的时候，川端正专心跟售货员小声交谈着。他们可能在说箭的事。过了一会，川端要看看墙上的那把插在饰有白色菱形章剑鞘中的剑。他将剑从剑鞘里拔出一半，用指甲试了试剑刃（谢尔久克发现，川端拿剑时非常小心，甚至在检查剑锋时都尽量不让手指碰到它）。谢尔久克觉得川端好像全然忘了他的存在，便决定提醒他一下。

“请问，”他对川端说道，“这钢盔上的五角星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是某种标志。”

“哦，是的，”川端说道。“是标志，而且是一种古老的标志。这是十月之星勋章的标志之一。”

谢尔久克怀疑地哼了一声。

“这是什么勋章？”他问道。“是给古代挤奶员的吗？”

川端打量他一阵，翘起嘴角，报以一丝嘲讽的微笑。

“不是，”他说道。“这个勋章从未给过任何人。只是有些人突然以为，他们已经可以戴它了。确切地说，他们什么时候都可以戴。”

“而它表彰的是什么呢？”

“什么都不表彰。”

“世界上总是有白痴，”谢尔久克深有感触地说道。

川端猛地将剑推入鞘中。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您真能开玩笑，”谢尔久克本能地想缓和一下气氛，说道。“您怎么不说这是劳动红旗勋章呢。”

“我没听到过这样的勋章，”川端说道。“黄旗勋章倒是有，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为什么您认为我是在开玩笑呢？”



我很少开玩笑的。即便开玩笑,也会用轻声一笑提示对方。”

“请您原谅,如果我说了什么不对的,”谢尔久克说道。“我喝多了。”

川端耸了耸肩膀,把剑还给售货员。

“您要吗?”售货员问道。

“不要这个,”川端说道。“请把那把小的包上吧。”

趁川端付钱的工夫,谢尔久克走到外面。他有一种不好的感觉,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不可挽回的蠢事,但当他几次抬起头来,仰望已经现出春天莹润的星斗的天空,他又平静下来了。过了一会,当窗户护栏的造型再次映入他的眼帘时,他又伤感地意识到,俄罗斯这个国家实际上就是一轮初升的太阳,尽管太阳从未真正地彻底地升起在俄罗斯的上空。他决定与川端一起分享这个发现,然而,当川端腋下夹着一个细长的纸包从售货亭里走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又把这个想法忘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可遏制的要喝酒的冲动。

川端似乎明察秋毫,他走到离门几米远的地方,将纸包放在路旁一棵湿漉漉的发黑的树下,说道:

“您当然知道,在日本我们喝米酒是要加热的。也就是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直接对着瓶子喝,这不成体统。而在马路上喝酒——简直是耻辱。不过有一种古老的办法允许这么做,不会丢脸,叫做‘休息的骑士’,也可以翻译成‘骑士的休息’。”

川端一边目不转睛盯着谢尔久克,一边从衣袋里掏出酒瓶子。

“传说,”他继续说道,“大诗人在原业平当年受狩猎大臣



委派前往伊势郡^①。由于路途遥远,再加上那时候都是骑马,路上走了很多天。时值盛夏。在原与朋友们结伴而行,他那崇高的心灵充满了忧伤和爱意。每当骑士们走累了,他们便下马随便吃点什么并喝几口米酒,以补充体力。为了避免引来强盗,他们没有生火热酒,而是直接喝的冷酒。他们一边喝酒一边朗诵精彩的诗篇,抒发对周围景致的赞美以及内心的感受。然后,他们又继续赶路了……”

川端拧开瓶塞。

“这个传统就是这么来的。在您以这种方式喝米酒的时候,脑子里应该想着古代的勇士,然后,当您一方面意识到了这个世界的捉摸不定,另一方面又无法抗拒它的美时,您的思绪应该化为一种发自心底的淡淡忧伤。让我们一起来吧……”

“好的。”谢尔久克说着伸手去拿酒瓶子。

“别急,”川端拉掉瓶塞说道。“您是第一次参与这种仪式,所以我得给您讲讲构成这个仪式的一整套动作及其意义。来,像我这么做,我会给您讲解动作的象征性含义。”

川端将酒瓶放到纸包旁边。

“首先应该将马拴好,”他说道。

他伸手拉了几下最低的一根树杈,检查它是否结实,然后用手在上面绕了几圈,好像在系绳子。谢尔久克明白,他也应该这么做,于是将手放到树杈上方,在川端的严密注视下大致地重复了一下他的动作。

^① 在日本本州岛南部。



“不对，”川端说道，“这样它不方便。”

“谁不方便？”谢尔久克问道。

“您的马。您把它拴得太高了。它怎么吃草呢？要知道，这不只是您在休息，也是您忠实的旅伴在休息。”

谢尔久克的脸上现出迷惑不解的神情。川端叹了口气。

“您要明白，”他耐着性子说，“进行这个仪式时，我们仿佛回到了平安时代^①。现在我们是去伊势郡，而且正逢夏天。我请求您把马拴好。”

谢尔久克知道，明智的做法是不跟他争吵。他伸出手，先在树杈上面绕了几圈，又在树杈下面做个打结的动作。

“这就对了，”川端说道。“现在该做诗了，抒发您对周围景物的感受。”

他闭上眼睛，沉吟片刻，然后吐出一个很长的，喉音很重而又莫名其妙的句子，谢尔久克既没有听出节奏，也没有听出韵脚。

“这里讲的大体上是我们说过的事情，”他解释道。“那些看不见的马如何吃看不见的草，还有那些比这条柏油马路真实得多但实际上又不存在的东西。总的说来，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文字游戏上。现在该您了。”

谢尔久克感到有些为难。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用抱歉的口吻说道。“我不写诗也不喜欢诗。当星星挂在天上，语言还用得着吗？”

“啊，”川端感叹道，“妙！妙！您说得太对了！一共只有

^① 日本历史上以文艺兴旺发展著称的时期，时在794—1185年。



三十二个音节，却抵得上整整一本书！”

他向后退一步，鞠了两个躬。

“多亏我是第一个朗诵的！”他说道。“要不然，在您后面我是无论如何不敢献丑的！您是在哪里学会做短歌的呢？”

“这个嘛，”谢尔久克含糊其词地说。

川端把酒瓶子递给他。谢尔久克喝了几大口又还给日本人。川端也将嘴对准瓶口，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同时将空着的那只手放到背后，显然，这里也蕴含着某种宗教仪式意义，但谢尔久克怕丢面子，没有提问。趁着川端喝酒的工夫，他抽起烟来。吸了两三口以后，他又恢复了自信，他甚至开始有点为自己刚才如此怯懦感到羞愧。

“对了，说到马，”他说道。“我并没有把它拴得过高。只不过是最近很容易疲倦，一休息就得三天。所以给它的缰绳加长了。否则它第一天就会饿死……”

川端大惊失色。他又向谢尔久克鞠了个躬，然后走到一旁，解开肚子上的短上衣。

“您要干什么？”谢尔久克问道。

“惭愧啊，惭愧。”川端说道。“我简直无地自容。经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我还有何颜面活在世上。”

他坐到马路上，打开纸包，抽出宝剑。雪亮的剑刃在霓虹灯的照耀下，闪射出一道紫色的寒光。谢尔久克终于明白川端想要做什么了，他立即抓住了川端的双手。

“求求您，别这样，”他不安地说道。“为一件小事值得这样吗？”

“您能原谅我吗？”川端站了起来，紧张地问道。



“您千万别把这个愚蠢的误会放在心上。再说，爱护动物，这是一种崇高的情感。怎么能为它感到惭愧呢？”

川端思索片刻，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

“您说得对，”他说道。“我之所以如此冲动，的确不是因为想跟您比试学识，而是因为同情疲惫的动物。这里的确没什么可惭愧的，即便我说了什么蠢话，也不算丢脸。”

他将剑插进鞘中，身体晃了晃，又将嘴对准瓶口。

“就算两个高贵的男人之间发生了什么小误会，只要他们能运用智慧的剑锋，共同应对，这误会岂有不烟消云散之理？”他将酒瓶子递给谢尔久克，问道。

谢尔久克喝完剩下的酒。

“那是自然，”他说道。“不言而喻。”

川端抬起头，充满幻想地望了望天空。

“当星星挂在天空，语言还用得着吗？”他吟诵道。“啊，太好了。您知道吗，我真想用一个小手势来纪念这一令人惊叹的时刻。我们放了我们的马吧？让它们在这美妙的原野上尽情驰骋，到了夜里就退隐山林。它们毕竟赢得了自由，对吧？”

“您真是个好人的好人，”谢尔久克说道。

川端踉踉跄跄地走到树下，拔出剑，用一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动作朝下面的树杈砍去。树杈落到了马路上。川端挥起手，含混不清地大声喊着什么，谢尔久克明白，他这是在赶马。过了一会，川端又返回来，举起酒瓶子，失望地将残存的几滴酒倒在地上。

“天凉了，”谢尔久克说。他环顾一下四周，本能地感觉到，再过一会，莫斯科这潮湿的空气中就会冒出一支巡警队。



“我们是不是该回办事处了？”

“当然，”川端说道，“当然，我们得回去填饱肚子。”

谢尔久克完全不记得回来的路了。只是在回到川端的房间之后，他才回过神来。他和川端坐在地板上，吃起大碗面条。尽管新买的酒已经喝掉一半，可谢尔久克发觉自己非但一点也没醉，反而处于亢奋之中。川端的心情显然也不错，因为他竟轻声哼起小调儿来：

“啊，人们抬走被打破头的年轻的指挥员……”

他一边哼唱一边用筷子敲打着节拍，弄得蛇一样的细面条飞得满屋子都是，有的还落到了谢尔久克身上，但这似乎并不令人难堪。

吃完以后，川端推开饭碗，朝谢尔久克转过身子。

“您说说看，”他挑起话头，“一个历险归来的人，在吃饱喝足之后，他最想干什么？”

“不知道，”谢尔久克说道。“我们一般是打开电视。”

“不对，”川端说道。“我们日本生产了世界上最好的电视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电视的认识。电视只不过是精神的垃圾管道上的一个透明窗口。我不是指那些不幸的人，那些陷入泥淖不能自拔、只有在见到熟悉的罐头瓶时才感到自己还活着的人。我说的是那些值得我们在谈话中提及的人。”

谢尔久克耸了耸肩膀。

“我有点糊涂了，”他说道。

川端眯缝起眼睛，向谢尔久克挪了挪身子，莞尔一笑。此时此刻，他的确像一个狡猾的日本人。



“还记得吗，就在刚才，在我们放走马，渡过太子河，跌跌撞撞地走向罗生门的时候，您提到过躺在身边的另一个温暖的 身体？难道这不是您的内心当时所向往的吗？”

谢尔久克打了个寒战。

“同性恋，”他想到，“刚才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

川端又挪了挪身子。

“其实，这是人类至今仍然可以体验到的为数不多的自然情感之一。再说，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俄罗斯必须与东方进行炼金术式的联姻，难道不是这样吗？啊？”

“是这样，”谢尔久克盘起腿，说道。“当然。昨天我正好想过这个问题。”

“好，”川端说道。“但要知道，凡是国家和民族的事情，都会在该国的国民和构成该民族的个人身上象征性地体现出来。俄罗斯就是您。所以，如果您的话是真诚的——当然，也不可能不是真诚的——那就让我们赶快完成这一仪式吧。让我们用两种因素的象征性融合来巩固我们所说的和所想的……”

川端俯下身子，挤了挤眼睛。

“此外，我们还必须一起工作，没有什么能让我们男人如此接近，像……”

他又挤了挤眼睛，莞尔一笑。谢尔久克也咧开嘴，生硬地笑了笑。他发现，川端的嘴里少了一颗牙齿。而更重要的是：首先，谢尔久克想起艾滋病的威胁；其次，他估计川端身上的内衣不太干净。川端站起来，走到柜子前，从里面翻出一块烂布扔给谢尔久克。这是一顶蓝色小帽，跟酒杯上画的那些男



人头上戴的一样。川端又找出一顶，给自己戴上，然后打手势示意谢尔久克也照着做，并拍了拍手。

这时，一块墙板滑向一边，谢尔久克听到一种非常古怪的音乐声。在移门后面一个更像储藏室的小房间里，站着四五个姑娘，她们穿着五颜六色的和服，手里拿着乐器。起初，谢尔久克以为她们穿的不是和服，而是裁剪得不太合身的长袍，腰上仿照和服缠一条毛巾，但随后又断定，这种长袍实际上就是和服。姑娘们面带微笑摇头晃脑地演奏起来——一个在弹奏巴拉莱卡琴，一个在用两把饰有彩绘的帕列赫^①汤匙互相敲击，另外两个则在拉小小的塑料手风琴。手风琴的声音很刺耳，这很自然，因为这种手风琴根本不是用来演奏，而是专门用来给儿童早场戏助兴的。

姑娘们的微笑中透出一丝倦意，脸颊上的胭脂也似乎过于厚重，而且，她们的相貌根本不像日本人，而是非常普通的俄罗斯人的脸，甚至不怎么漂亮。其中的一个姑娘很像谢尔久克的大学同学玛莎。

“女人嘛，谢苗，”川端若有所思地说道，“根本不是用来给我们做牺牲品的。当她们用自己的身体贴住我们的身体的时候，真是妙不可言，我们仿佛进入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极乐国度。我喜欢女人，也不耻于承认这一点。每当我与她们中的某一个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似乎……”

他没有说完，而是拍了拍手。姑娘们应声而至。她们迅速排列整齐，两眼平视前方，径直朝谢尔久克走去。

^① 俄罗斯伊万诺沃州的小镇，以出产精致绘制品而著称。



“六道街，五道街，四道街，我们策马向左拐，迷雾中浮现出向往已久的朱雀宫，”川端一边系裤子一边盯着谢尔久克说道。

谢尔久克从垫子上抬起头。他好像做了一个短暂的梦。川端显然还在继续讲故事，故事的开头谢尔久克已经不记得了。他打量一下自己，发现身上只有一件洗旧的带有奥林匹克标志的汗背心，其余的衣服都胡乱地丢在了四周。而那几个头发散乱、身体半裸、缺乏热情的姑娘则正在角落里一只烧开的电水壶旁边忙碌着。谢尔久克赶紧穿衣服。

“往下走，到达宫殿左翼，”川端继续说道，“再向右拐，迎面看到的便是朝阳门……接下去怎么走，完全取决于此时此刻哪种诗歌格调更契合您的心灵。如果您内心的音符简单而欢快，您就会直接奔过去。如果您的思想远离速朽的事物，您就会向左拐，您的面前将出现长安门。最后，如果您年少气盛且您的内心渴望享乐，您就会向右拐，进入永乐门。”

谢尔久克在川端的注视下瑟缩着身子穿上裤子、衬衫和上衣，然后开始系领带，但却忘了怎么系，于是索性把它揣到口袋里。

“然而，”川端郑重其事地举起一根手指继续说道（他讲得那么专注，以至谢尔久克觉得用不着难为情或着急），“然而，不管您从哪个门进去，都不能直接进入皇宫，而是进到同一个院子里！好好想想吧，对于习惯了阅读比喻语言的人来说，这是多好的启示啊！要知道，无论您的内心走的是哪一条路，无论您的灵魂勾出的是哪一条线，您最后总要回到同一个地方！”



您还记得是怎么说的吗——万物归一，而一归何处呢？啊？”

谢尔久克抬起盯着地板的眼睛。

“一归何处？”川端追问道，眼睛眯成了两条缝儿。

“此处，此处，”谢尔久克疲倦地答道。

“啊，”川端说道，“总是这么深刻和精辟。正是为了少数明白这一真理的骑士，才将皇宫第一个院子里休耕地上的酸橙跟……如果是您，您会把酸橙跟什么栽在一起呢？”

谢尔久克叹了口气。日本的植物他只知道一种。

“应该是……樱花吧，”他说道。“盛开的樱花。”

川端后退一步，上帝知道今晚他这是第几次鞠躬了。似乎，他的眼里还含着泪水。

“对，对，”川端说道。“千真万确。第一个院子里栽的是酸橙跟樱桃，而接下去，飘香阁旁栽的是紫藤，凝花阁旁栽的是李树，射光阁旁栽的是梨树。唉，真是惭愧，我竟给您提这样低级的问题！不过，请相信我，这不是我的过错，而是……”

他回头瞟了一眼坐在水壶旁边的姑娘们并拍了两下手。姑娘们立刻拎起水壶，收拾起她们丢在地板上的衣服，回到她们原来呆的房间，随手关上墙板。也许，除了传真机上的几滴白色的水珠，丝毫看不出就在几分钟之前，这里还燃烧着一团情欲的烈焰。

“是我们公司的规矩，”川端接着刚才的话说道。“我已经说过，当我说‘公司’二字时，我的翻译并不十分准确。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会社。但如果马上使用这个术语，可能会引起猜疑和恐慌。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先搞清楚，我们面对的是怎样一些人，然后再进入细枝末节。就您的情况而言，自从听了您



那首神奇的诗，答案就已经清楚了。”

川端屏住气息，眼睛微闭，嘴唇嚅动了一会。谢尔久克猜想，川端肯定是在默诵他那句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的关于天上星星的话。

“精妙的语言。是的，从那一刻起，我就全明白了。但是，我们有规矩，严格的规矩，我必须按规定向您提出这些问题。现在我要告诉您的是，”川端继续说道，“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的公司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会社，因而我们的职员更确切地说也不是职员，而是社员。他们的职责也不同于一般的雇员。简单地说，我们欢迎您加入‘平清盛’这个日本最古老的会社。给您空出来的职位是‘北方野蛮人业务部经理助理’。当然，对您来说这是大才小用，但请理解，这是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比莫斯科还古老。顺便提一句，莫斯科是个美丽的城市，尤其是夏天。这是日本武士的职位，普通人是没有资格担任的。因此，如果您同意就任，我将授予您日本武士称号。”

“都要做些什么工作呢？”

“哦，一点不复杂，”川端说道。“就是接触文件、客户。表面上跟其他公司一样。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您内心的态度必须与宇宙的和谐保持一致。”

“薪水是多少呢？”谢尔久克问道。

“年薪是二百五十担稻米，”川端眯缝起眼睛，计算着说道。“给您换成美金，大约四万。”

“付美金？”

“看您怎么方便，”川端耸了耸肩膀说道。

“我同意，”谢尔久克说道。



“不出所料。现在请您告诉我，您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是平清盛会社的武士？”

“那还用说。”

“您是否愿意跟我们的会社同生死，共存亡？”

“他们的仪式可真复杂，”谢尔久克心想。“他们还有时间做电视吗？”

“愿意，”他说道。

“您是否愿意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将您转瞬即逝的生命之花投向悬崖下边的万丈深渊，如果您的哑铃要求您这么做？”川端指了指版画，问道。

谢尔久克又朝那边看了一眼。

“愿意，”他漫不经心地说道，“当然。将花儿从悬崖上丢下去——那还不简单。”

“您发誓？”

“我发誓。”

“好极了，”川端说道，“好极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手续，便大功告成了。我们需要取得日本方面的批准。不过这只占用几分钟的时间。”

他坐到传真机旁，从一打纸里抽出一张白纸，然后又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支毛笔。

谢尔久克换个姿势。由于长时间坐在地板上，他的腿已经发麻了，于是他想，应该问问川端，是否可以带一个凳子上班。他扫视一下四周，希望能找到剩下的那点米酒，可酒瓶子已经不见了。川端正忙着写字，谢尔久克不敢问，生怕因此而打乱了仪式。他想起自己刚才发下的那个冠冕堂皇的



誓言。“上帝啊，”他想，“我都不知发过多少回誓了！保证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吧？大概不下五次，如果从小算起的话。保证过要娶玛莎为妻吧？保证过。就在昨天，在离开清水塘以后跟这些白痴喝酒的时候，还保证过要自己掏钱再买一瓶呢。看吧，现在都到了什么地步。要将花儿从悬崖上丢下去。”

这时，川端写完了，他朝纸面上吹了吹，然后拿给谢尔久克看。上面是用墨汁画的一朵大大的菊花。

“这是什么？”谢尔久克问道。

“哦，”川端说道。“这是菊花。您明白吗，每当我们的家族增添新成员，整个平清盛会社都会欢欣鼓舞，而将这一喜事诉诸文字是不合适的。所以，为了向领导报告喜讯，我们一般是在纸上画一朵花。这同时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那朵花。它象征着您的生命如今已属于平清盛会社，同时也似乎证明您已彻底意识到生命的转瞬即逝。”

“明白了，”谢尔久克说道。

川端又朝纸面上吹了吹，然后将它放入传真机的夹缝，并拨了一个特别长的号码。

他拨了三次才拨通。传真机发出一阵蜂鸣声，上面的绿色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纸慢慢地钻进黑缝里。

川端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盯着机器。漫长难挨的几分钟过去后，传真机又发出一阵蜂鸣声，下面的黑缝里又不知从何处爬出来另外一张纸。谢尔久克明白，这是答复。

等到答复全部爬出以后，川端便从机器上将它撕下来，浏览一遍，然后将目光慢慢转向谢尔久克。



“祝贺您，”他说道，“由衷地祝贺您！答复中明确表示肯定。”

他将纸递给谢尔久克。谢尔久克接过来又看到另一幅图画——这次是一根略微弯曲的长棍子，上面饰有图案，一端带有突出物。

“这是什么？”他问道。

“这是一把剑，”川端郑重地说道，“象征您生活的新阶段。既然通过会谈我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那么请允许我将证件颁发给您。”

川端说着将那把在售货亭买的短剑递给了谢尔久克。

不知是因为川端目不转睛的注视，还是由于过多的酒精在体内引起了化学反应，谢尔久克突然意识到，这一时刻是如此隆重。他想跪下，但又及时地想起，这么做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世纪的欧洲骑士，其实仔细琢磨一下也不是骑士本人，而是在一部令人无法忍受的苏联影片中扮演他们的敖德萨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们。因此他只是向前伸出双手并小心翼翼地接过这件冷冰冰的夺命工具。剑鞘上有一幅他以前不曾发现的图画。这是三只飞翔中的仙鹤，在剑鞘黑色的清漆上的一条金线勾勒出它们异常优美的、轻盈流畅的轮廓。

“这剑鞘里装的是您的灵魂，”川端依然直视着谢尔久克说道。

“多美的图面，”谢尔久克说道。“您知道吗，我甚至想起了一首关于仙鹤的歌儿。怎么唱来着……‘它们的队列中有一个空隙，也许，这是为我准备的地方……’”

“对，对，”川端接过话题说道。“那么人是否需要一个更



大的间隙呢？佛祖释迦牟尼啊，两只仙鹤之间的空隙容得下这整个世界及其所有的问题，任何一只仙鹤翅膀的羽毛里都能淹没世界……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夜晚啊！我们是否再喝点？为了您终于在仙鹤的队列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川端的话令谢尔久克感到一丝惆怅，但他并未太在意，心想，川端未必知道这首歌儿是为悼念阵亡战士而写的。

“好啊，”谢尔久克说道，“只是稍等一下，我……”

突然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川端回过头去用日语喊了句什么，移门打开了，探进来一张男人的脸，也是那种南方人的脸型。那人说了句什么，川端点点头。

“我不得不失陪几分钟，”川端对谢尔久克说道。“大概来了很重要的消息。如果您愿意的话，就先看看这些画册吧，”他指了指书架，“或者随便在这里呆一会儿。”

谢尔久克点头表示同意。川端迅速走出去并随手关上移门。谢尔久克走到书架跟前，扫了一眼长长的一排五颜六色的书脊，然后走到墙角，头倚着墙坐在竹席上。对这些版画他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

大楼里鸦雀无声。听得见楼上某个地方有人在凿墙，那里肯定是在装铁门。墙板后面勉强听得到姑娘们悄悄的对骂，她们近在咫尺，但搞不清她们在骂什么，几个压低的嗓音搅和在一起，汇成一股轻柔的声音，仿佛墙外有个花园，开花的樱桃树的叶子在风中飒飒作响。

谢尔久克被一种轻微的含混不清的声音吵醒了。他睡了多久，不清楚，但从种种迹象来看，睡了很长时间。坐在屋子



中间的川端已经换了衣服，刮了脸。现在他穿着一件白衬衫，而不久前还乱蓬蓬的头发，现在已经整齐地梳到了脑后。含混不清的声音正是他在叫唤谢尔久克时发出的，这是一种忧郁的音调，听上去更像绵长的呻吟。川端的手里拿着一把用白布揩净的长剑。谢尔久克发现，川端的衬衫没有系扣子，裸露出没有汗毛的胸部和肚子。

发现谢尔久克醒了，川端转过脸冲他咧嘴笑起来。

“睡得怎么样？”他问道。

“我没有睡，”谢尔久克说道，“我只是……”

“打了个盹，”川端说道，“明白了。我们一生都在打盹，醒过来的时候人生已到尽头。您还记得我们返回办事处的时候穿过的那条小河吗？”

“记得，”谢尔久克说道，“这条小河是从管子里流出来的。”

“是不是管子并不重要。您还记得小河里的气泡吗？”

“记得。很大的气泡。”

“其实，”川端将剑举到跟眼睛一样的高度，仔细地端详着说道，“其实这个世界就像水里的气泡。不是吗？”

谢尔久克想，川端的话是对的，他很想对川端说点什么，以便这个日本人能够体会到，他的感觉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得到了赞同。

“哪里……”他拄着胳膊肘说道，“它是像……现在……它是像五斗橱后边那张被大老鼠吃掉的这些气泡的照片。”

川端又笑了起来。

“您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说道。“我毫不怀疑。”



“而且，”谢尔久克精神振奋地继续说道，“完全有可能，老鼠在照片冲洗出来之前就把照片吃下去了。”

“很好，”川端说道，“很好。但这是语言之诗，还有一种行为之诗。我希望，您最后一首行为之诗跟今天您所作的其他诗一样令我欣喜。”

“您说什么？”谢尔久克问道。

川端小心翼翼地将剑放在竹席上。

“生活是瞬息万变的，”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早上谁都不知道，晚上等待他的是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吗？”

“哦，是的。您要知道，商场如战场啊。平清盛会社有了敌人，强大的敌人，就是源赖朝。”

“源赖朝？”谢尔久克问道，他感到有点冷。“怎么了？”

“今天得到消息，由于公司内部哗变，‘源赖朝集团’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大举收购‘平清盛集团公司’的股票，并已获得控股权。此事涉及到一家英国银行和新加坡黑手党，但这并不重要。我们一败涂地，而敌人在欢庆胜利。”

谢尔久克沉默片刻，心里琢磨着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然而我们俩，”川端说道，“我们俩，作为平清盛会社的两名武士，绝不会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生活气泡抛出的变幻莫测的鬼影面前垂头丧气，一蹶不振，对吧？”

“对，”谢尔久克说道。

川端令人胆寒地狂笑起来，眼睛里射出一道凶光。

“不，”他说道，“源赖朝不会看到我们的耻辱。我们要像



白鹤消失在云层里一样告别生命。在这美好的时刻，愿我们的内心没有丝毫猥琐的感觉。”

他猛地连同坐在屁股下面的竹席一道转过身来，向谢尔久克鞠了一躬。

“劳驾您，”他说道。“在我剖腹完毕的时候，砍下我的头！”

“什么？”

“头，砍头。我们把这叫做最后的效劳。作为武士，为了不令自己蒙羞，是不能拒绝这种请求的。”

“可我从来没……就是说以前……”

“这很简单，只一下就行，唰！”

川端用两手飞快地做了一个挥砍的动作。

“可我怕是不行，”谢尔久克说道。“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川端陷入了沉思，他的脸色突然变得忧郁起来，似乎脑子里有了一个沉重的想法。他用手掌拍了一下榻榻米。

“还好，我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了，”他抬起眼睛，内疚地望着谢尔久克说道。“我无知和粗鲁到了什么程度啊！”

他双手掩面，身体开始晃动起来。

谢尔久克悄悄站起来，蹑手蹑脚走到隔板跟前，轻轻拉开门，走到走廊里。混凝土地面冰凉，令谢尔久克光着的脚很不舒服。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他跟川端在那些阴暗而可疑的胡同里钻来钻去找米酒的时候，他的皮鞋和袜子还在入口处的走廊里，也就是他白天放鞋袜的地方。而他出门时脚上穿的是什么，他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正如他既想不起来他们是



怎么出去的，也想不起来他们是怎么回来的。

“溜吧，赶紧开溜，”他想到，跑进一个拐角。“要紧的是先溜掉，然后再想别的。”

保安迎着谢尔久克从凳子上站起来。

“你这个时候是要去哪儿啊？”他打着哈欠问道。“都凌晨三点半了。”

“一坐下什么都忘了，”谢尔久克说道。“我们谈得很投机。”

“那好吧，”守卫说道。“通行证。”

“什么通行证？”

“出去的通行证。”

“可您放我进来时可没要什么通行证啊。”

“不错，”保安说道，“但出去是要通行证的。”

桌子上的照明灯朦胧地照在墙角谢尔久克的皮鞋上。离鞋一米处是门，门外就是自由世界。谢尔久克朝皮鞋挪了一小步，然后又挪了一小步。保安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他赤裸的双脚。

“再说，”保安一边掂着手里的警棍，一边说道，“我们这儿也有规定，还装了监视器。八点钟之前不能开门，要是开了门，警察立马会到。又是盘问，又是记录的。所以，这门我不能开，除非着火或是发大水。”

“要知道，这个世界，”谢尔久克讨好地说道，“就像水里的气泡。”

保安撇嘴笑了笑，摇了摇头。

“有什么办法，”他说道。“我知道我是在哪儿工作。可你



得理解我。你想啊，跟这些气泡在水上一起漂游的还有规定呢，现在它正映照在一个气泡上——十点关门，八点开门，就是这样。”

谢尔久克感觉保安的语气并不十分坚决，便小心翼翼地又朝鞋子稍微挪了挪脚。

“您的行为会令川端先生大吃一惊的，”他说道。“保安看上去倒是一本正经，可这么简单的小事还需要反复解释。明摆着的嘛，周围的一切都是幻影。”

“幻影，幻影，”保安看了看显然是位于墙外很远处的某个地方，若有所思地说道。“我知道。我又不是第一天上岗。我们这里每周都有新指示。不过我可没说这道门是真实的。要告诉您我对它的想法吗？”

“请吧。”

“我认为，不存在任何实体意义上的门，存在的只是知觉的诸多要素的总和，而这些要素就本质而言又属于虚乌有。”

“对！”谢尔久克高兴地附和着，并朝自己的皮鞋又挪了一小步。

“但是，不到八点我是不会打开这个总和的，”保安说着用警棍敲了一下自己的手心。

“为什么？”谢尔久克问道。

保安耸了耸肩膀。

“对你来说这是因果报应，”他说道，“对我来说这是忠于职守，而实际上全都是一回事。都是空。实际上连空也不存在。”

“是啊，”谢尔久克说道。“你们的制度很严格。”



“你以为怎么样，这可是日本的安全部制订的。”

“那我怎么办？”谢尔久克问道。

“什么怎么办？等到八点钟再去申请一张通行证。”

谢尔久克又瞥了一眼保安那结实的肩膀和他手里的警棍，然后慢慢地转过身去，脚步沉重地往回走。让他无法忍受的是，能够说服保安开门的话还是存在的，只是他没能找到。“要是读过佛经，就知道该怎么跟他周旋了，”他悻悻地想。

“听见没有，”背后传来保安的声音，“不要光脚走路，这地面是混凝土的，小心得肾炎。”

回到川端的办公室后，谢尔久克轻手轻脚地拉上门板。他发现房间里散发着浓烈的酒气和女人的味道。川端仍然坐在地板上，用手捂着脸，身体晃来晃去。他似乎没有察觉到谢尔久克出去过。

“川端先生，”谢尔久克轻轻地叫了一声。

川端把手放下来。

“您不舒服吗？”

“我很不舒服，”川端回答道。“非常不舒服。如果我有一百个肚子的话，我会立刻将它们全部剖开。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经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

“到底是怎么回事？”谢尔久克一边问，一边同情地在日本人的对面跪下来。

“我只愿斗胆请求您为我效劳最后一次，却完全没有想到，如果我先剖了腹，就没有人能为您效劳了。真是奇耻大辱。”



“为我效劳？”谢尔久克站起来问道。“为我效劳？”

“是的，”川端说着也站了起来，用灼热的目光注视着谢尔久克。“谁将砍下您的头呢？莫非是格里沙？”

“哪个格里沙？”

“就是那个保安，您刚才还跟他说话来着。他只会用自己的警棍打碎人家的脑壳。可按规定，应该砍，而且不是简单的砍断，还要让头连着皮不掉下来。您想啊，如果脑袋滚了下来，多不雅观？您坐，过来，坐过来。”

川端的目光似乎有一股魔力，令谢尔久克不由自主地坐到了席子上，他浑身瘫软，只剩下把眼睛从川端脸上移开的力气了。

“笼统地说，我觉得您还不知道，剖腹学说讲的其实就是直接而勇敢地回归永恒，”川端说道。

“什么？”

“就是如何切开肚子，明白吗？”

“不明白，”谢尔久克呆呆地盯着墙壁，答道。

“方法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是横着切开。但这没有什么。正如我们日本人所说的，五分钟耻辱一过，你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了。这跟开着‘查波罗什’牌小轿车去净土是一样的。竖着切开要稍好些，但这种方法只能算 lower-middle class^①，还有点土气。要想优雅一点，可以切成十字形。十字形切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十字，一种是斜十字。这种方法我不想推荐。您知道，如果上下左右切的话，就有了基督教意味，

① 英语：中低层次，中低档水平。



而如果斜着切呢，就成了圣安德烈旗^①。说不准还有人以为您是黑海舰队的呢。您毕竟不是海军军官，对吧？”

“对，”谢尔久克毫无表情地确认道。

“我没有别的意思。两年前很流行平行双切口，但难度较大。因此我建议采用斜长切法，从下到上，从左到右，最后再朝中心转个小弯。从纯美学的角度讲这是无懈可击的，我将跟在您后面如法炮制。”

谢尔久克试图站起来，但川端把手放到他肩上又把他按了下去。

“遗憾的是，时间紧迫，一切必须尽快完成，”川端叹息道。“没有白色的屏风，没有合适的焚香。也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院子里把守……虽然有格里沙，可他算不上什么士兵。当然，实际上也不需要。只有当一个武士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拒绝剖腹的时候，才用得上他们。他会像狗一样被打死。在我的记忆中，这种事还没有发生过，但毕竟很壮观——院子的四周站满荷枪实弹的士兵，钢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总之……您希望我叫上格里沙吗？或是把二楼的谢苗也叫来，好让我们离原始仪式更近些？”

“不用了，”谢尔久克说道。

“对，”川端说道，“对，您当然明白对任何一种仪式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它的表面形式，而是它的内容。”

“我明白，明白，我全明白，”谢尔久克愤恨地望着川端说道。

^① 俄国海军的舰尾旗，白底上有蓝色的斜十字图案。



“因此我绝对相信，一切都将进行得非常顺利。”

川端从地板上拾起那把从售货亭买来的短剑，把它从剑鞘里抽出来并在空中挥砍了两下。

“还可以，”他说道。“现在还有两个问题——剖腹以后不能仰面躺下，这很不雅观，很不雅观，不过我会帮您的。还有，不能碰到脊柱。所以刀口不能太深。让我们动手吧……”

他拿起几张传真纸——谢尔久克发现其中一张画着菊花——把它们整齐地摺在一块再对折起来，小心翼翼地包住剑刃，前端露出七到十厘米。

“就这样，右手握住剑柄，左手握住这里。往里刺时，不要太用力，否则，您知道，会卡住的……然后向右上方。现在，您大概想集中一下精神吧。我们时间不多了，但还够用。”

谢尔久克呆呆地坐着，直勾勾地盯着墙壁。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没精打采的念头：推开川端，夺路而逃……可走廊里的门锁着，还有个拿着警棍的格里沙。据说二楼还有个什么谢苗。原则上可以打电话报警，但川端手里有剑，而且警察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最糟糕的是，任何一种行为方式都预示着将出现这样的一刻：川端的脸上现出惊讶的神情，继而是鄙视。但今天晚上似乎有一种东西，令谢尔久克不愿背叛川端，他甚至还记得他们把马拴到树枝上，然后彼此朗诵诗歌时的情景。尽管仔细推敲一下，实际上既不曾有马，也不曾有诗，可那一刻毕竟是真实的，还有从南方吹来的、预示着夏天将至的风，以及天上的星星——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应该是真实的。而那个八点钟以后才能看到的门外的世界……



谢尔久克的思绪出现了短暂的停顿，他马上听到有轻微的声响从四下传来。坐在传真机旁边的川端双眼紧闭，肚子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谢尔久克想，这个人肯定会从容不迫地完成所有的程序。要知道，这个日本人即将离开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可以归结为人在生活中能够感觉和体验到的一切——要比谢尔久克每天早晨都要经过的、弥漫着菲利普·基尔科罗夫的歌声和臭气的莫斯科街道迷人得多。

谢尔久克明白了，他为什么会突然想到基尔科罗夫——从隔壁姑娘们坐的地方，传来的正是他的一首歌。过一会儿又传来短暂的争吵声、沙哑的哭泣声、转换电视频道的咔嚓声。看不见的电视开始播放新闻了，可谢尔久克觉得，实际上频道并没有换，只不过是基尔科罗夫停止了歌唱，改成了小声说话而已。再过一会儿又传来一个姑娘激动的耳语：“没错，快看！又醉了！看，晃晃悠悠的！我说的没错吧，醉得一塌糊涂！”

谢尔久克又思索了片刻。

“我豁出去了，”他毅然决然地说道。“给我剑。”

川端赶紧走到他跟前，单腿跪地，柄朝前，将剑呈上。

“等等，”谢尔久克说着解开上衣里面的衬衫，“可不可以隔着背心？”

川端陷入沉思。

“有过这种情况。一四五四年竹田藤在桶狭间战役中失败后就是直接隔着衣服剖腹的。这是正常的。”

谢尔久克接过剑。



“不对，”川端说道。“我不是说了嘛，右手握柄，左手握在包纸的地方。就这样。”

“只要刺就行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这就来。”

川端在房间里兜了一圈，取出自己的一把长剑，站到谢尔久克身后。

“不要刺得太深。我自己只好深点儿了。我没有助手。您运气好。大概不枉此生。”

谢尔久克微微一笑。

“平平常常吧，”他说道。“跟别人一样。”

“但您的死将像战士一样壮烈，”川端说道。“怎么样，我全都准备好了。让我们数到三吧。”

“好吧，”谢尔久克说道。

“深呼吸，”川端说道，“开始吧，一——二——”

谢尔久克忽然想起，他还没有看保安在门口给他的那个灯笼里的灯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可现在，显然已经晚了。

“二点五——三！”

谢尔久克将剑刺进腹中。

纸被背心挡住了。不是特别疼，倒是剑刃给人的凉嗖嗖的感觉更明显。

地板上的传真机响了起来。

“嗯，”川端说道。“现在向上再向右，勇敢点，勇敢点……对，就是这样。”

谢尔久克的双腿支持不住了。

“现在快转向中心，要用两只手。嗯，就这样……对……”



还差两厘米……”

“我不行了，”谢尔久克几乎说不出话来，“火烧的一样！”

“你以为呢，”川端说道。“我马上回来。”

他跑到传真机旁，拿起电话听筒。

“喂！是！对，是这里。是，九型，跑了两千公里。”

谢尔久克把剑丢到地板上，双手捂住流血不止的肚子。

“快！”他声音嘶哑地说道。“快！”

川端双眉紧蹙，用手势示意谢尔久克等一下。

“什么？”他冲着话筒大喊起来。“三千五还嫌贵？一年前我可是花五千买的！”

就像影剧院里马上就要开演一样，谢尔久克眼睛里的灯光渐渐地黑了下來。开始他还坐在地板上，但过了一会儿他的身体就开始慢慢向一侧倾斜，在他的右肩触到地板之前，他的身体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只剩下吞噬一切的疼痛。

“什么坑？哪里有坑儿？”红与黑周期性交替的地方传来话音。“保险杠上有两处划痕，这叫坑吗？什么？什么？你才是公羊呢！臭狗屎，王八蛋！什么？你自己滚鸡巴蛋去吧！”

电话咣啷一声挂断了，随即传真机又响起来。

谢尔久克发现，那个传出电话铃声、川端的漫骂声和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地方离他很遥远，只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片断，而且那么渺小，以致必须竭尽全力，才能注意到里面发生的事情。然而这种痛苦的付出——谢尔久克已经知道，这种付出就是生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原来，他整个漫长的、充满了痛苦、希望与恐惧的人生只不过是吸引他一时的一个稍纵



即逝的念头罢了。而此时的谢尔久克(实际上又不是什么谢尔久克)正飘游在无质的虚空之中,并感到自己正向一个能放射出无法忍受的热量的庞然大物移动。最可怕的是,那个熊熊燃烧的庞然大物是从他背后逼近的,这使他无法看到这到底是什么。谢尔久克坚持不住了,他开始急切地寻找还留存着整个他熟悉的世界的那个点。他奇迹般地成功了,他的脑海里响起川端洪钟般的声音:

“岛上的人开始都不相信您能挺得住。但我知道。现在请允许我最后一次为您效劳。甯希!”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什么都不存在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就连时间也不存在了。后来听到了咳嗽声、地板的吱嘎声以及铁木尔·铁木罗维奇的说话声:

“是的,谢尼亚^①。就是这样在暖气炉旁找到你的,当时你手里还握着一枝玫瑰花。你还记得你其实是跟谁一起喝酒的吗?”

没有回答。

“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说道,“请给我两西西。是的。”

“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角落里的沃洛金忽然说道,“要知道,这都是些鬼魂。”

“是吗?”铁木尔·铁木罗维奇客气地问道。“什么鬼魂?”

^① 谢尔久克的名字“谢苗”的昵称。



“是从平清盛家族^①来的。我发誓。从他们对他们的态度来看,他似乎在寻找死亡。对,他找的好像正是它。”

“那他为什么活了下来?”铁木尔·铁木罗维奇问道。

“他身上的背心带有奥林匹克标志。您还记得吗,莫斯科奥运会,对吧?许许多多的小标志,对吧?他可是隔着背心剖腹的。”

“那又怎么了?”

“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神秘的象形符号。我在书上看到过,古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人给一个和尚的全身都画了护身的符号,就是忘了画他的耳朵。当平清盛的鬼魂们来到和尚跟前时,他们拿走的正是他的耳朵,因为其余的部分他们是看不见的。”

“可为什么他们要来找他呢?我是说——找那个和尚?”

“因为他笛子吹得好。”

“哦,吹笛子,”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说道。“非常合理。可你不觉得奇怪吗,这些幽灵竟然是‘迪纳莫’队的球迷?”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沃洛金答道。“有些幽灵拥护‘斯巴达克’队,有些拥护‘中央军体俱乐部’队,为什么就不能有拥护‘迪纳莫’队的呢?”

^① 日本10—12世纪的一个家族,1185年与源赖朝家族发生争斗,结果后者取胜,并于1192年确立了镰仓幕府的统治。



7

“迪纳马^①！迪纳马！你跑哪儿去了？操你妈的！”

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一个小伙子光着身子，披一件破旧的燕尾服，正在院子里追赶一匹马。他边追边喊：

“迪纳马！站住，傻瓜！你往哪儿跑？”

窗下的马不停地打着响鼻，猛然间聚集起了大量的红军战士，昨天这里还不曾见到他们的身影。说实在的，单凭他们极不规整的穿着就可以看出，这是红军。他们的装束主要是便服，由此可见，他们的装备是抢来的。人群中有一人，戴着布琼尼军帽，帽子上粘着一颗歪歪扭扭的红色五角星。他挥舞着双手，好像在下达什么命令。他特别像伊万诺沃纺织工人的政委富尔曼诺夫，我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的群众集会上见过他。只是眼前的这个人，脸上有一道深红色的刀疤。

不过我的目光并未在这群形形色色的人身上停留太久，停在院子中间的一辆马车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车上正好套着

① 此处“迪纳马”是一匹马的名字，与前文中的“发电机”、“迪纳莫”球队谐音。



四匹黑马。这是一辆敞篷加长四座马车，充气轮胎，带弹簧底座，软皮座椅，车身由带有镀金痕迹的名贵木材制成，豪华精美之中透出一股令人难以言传的怀旧情绪。这是一个永远消失在虚无中的世界的碎片，这个世界的居民曾天真地希望乘坐这样的交通工具进入未来。结果，进入未来的只有这交通工具本身，而且还付出了被当作匈奴战车使用的代价。想必正是这些联想催生出了固定在马车尾部的三挺用软管联在一起的“刘易斯”机枪。

我离开窗口，坐到床上，忽然想起战士们管这样的双轮马车叫“轻便双马敞篷车”，真是令人费解。这个专有名词的来源扑朔迷离，我趁穿皮靴的工夫，在脑子里将这个词所有可能的来源翻了个遍，可一个适当的也没找到。老实说，我倒是想起一个有趣的双关语：“轻便双马敞篷车——touch Anka”^①。可惜无人可以分享这个笑话了，因为每当想起昨天跟安娜表白时的情景，我就不由得面红耳赤，情绪沮丧。

我正是大致带着这样的想法跑下楼梯到了院子里的。有人告诉我，科托夫斯基让我去一趟司令部的仓库，于是我便毫不耽误地赶去了。入口处有两个穿黑色军服的士兵在站岗，见我走过去，他们赶紧立正敬礼。从他们紧张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我很熟悉，遗憾的是，脑震荡已经将他们的名字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

科托夫斯基穿着一件褐色的军上衣，风纪严整地坐在桌

^① 轻便双马敞篷车在俄文中的读音与英文 touch Anka 相近，而后者译成汉语是摸摸安卡。



子上。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我发觉他脸色惨白，像是抹了一层厚厚的脂粉。显然他一大早就吸了很多可卡因。他旁边放着一个透明的玻璃圆筒，里面缭绕着一缕缕由一种融化的白色物质形成的轻雾。这是一盏由酒精和玻璃烧瓶构成的照明灯，染了色的甘油里浮动着一小块一小块的蜡。五年前这种照明灯在彼得格勒非常流行。

科托夫斯基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发现他的手有点发抖。

“不知为什么，”他抬起头，用明亮的眼睛望着我说道，“从一大早我就在琢磨，是什么在棺材板里面等待着我们。”

“那您认为是什么呢？”我问道。

“可能我表达得不准确，”科托夫斯基说道。“简单地说，我在思考死亡和永生的问题。”

“您怎么会有这种情绪？”

“哼，”科托斯基冷笑道，“实际上，自从在敖德萨发生了一件难忘的事情以后，这种情绪就未离开过我……不过这没什么。”

他把双手放在胸前，用下巴指了指照明灯。

“请看这里的蜡，”他说道。“注意它在发生什么变化。蜡经过酒精灯加热以后，会融化成一些奇形怪状的蜡滴，并向上浮升。在浮升的过程中，它们会逐渐冷却，而且升得越高，速度就越慢。最后它们会在某一点停住并落回原处，这样周而复始，到头来还是碰不到液面。”

“这里含有某种柏拉图式的悲剧意味，”我若有所思地说道。

“可能是吧。但我说的不是这个。请想象一下，在灯里向



上浮升的蜡滴被赋予了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会立刻产生自我身份的确认问题。”

“毫无疑问。”

“最有趣的事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有一块蜡认为，它就是它所获得的形态，那么它就必有一死，因为它的形态会遭到破坏。但如果它能认识到，它就是蜡，那它会发生什么事呢？”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答道。

“对，”科托夫斯基说道。“它就获得了永生。但关键是，蜡很难明白自己是蜡。要认识到自己最初的本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何能发现时间伊始时出现在眼前的事物呢？尤其是在眼睛还不存在的时候？所以蜡唯一能发现的便是自己暂时的形态。它以为，它就是这一形态，您明白吗？而它的形态又是千变万化的，每一次都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真是精彩的比喻。可从这里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问道，不由得想起昨天我们在一起谈论俄罗斯的命运以及他轻松地将话题引向可卡因时的情景。很有可能，他只不过是为了得到剩下的白粉才将话题不知不觉地引向这里的。

“得出的结论是，对于蜡滴来说，获得永生的唯一途径便是不再认为它是蜡滴，而是要意识到它就是蜡。不过，由于我们的蜡滴本身能够发现的只有自己的形态，故而它整个短暂的一生都在祈求蜡神拯救它的形态，尽管这一形态，仔细想想便知，跟它毫无关系。与此同时，任何一个蜡滴又都具有整个蜡所具有的特性。您明白吗？存在的汪洋大海之一滴就是于瞬间缩成一滴的整个汪洋大海。然而请问，如何将这个道理



讲给那些为自己转瞬即逝的形态而忧心忡忡的小蜡块呢？怎样才能让这一思想的火花照亮它们呢？要知道，正是思想将它们引向拯救或毁灭，因为不论是拯救还是毁灭，从实质上来说，都是思想。好像奥义书^①里说过，智慧是套在四轮马车上的一匹马……”

说到这，他打了个响指，用冷峻的目光望着我，仿佛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想法。

“顺便问问，既然我们谈到了四轮马车和马，您不认为，半罐可卡因换两匹奥尔洛夫大走马……”

突然我的耳边响起“砰”的一声，我下意识地闪到一边儿。放在科托夫斯基身边的照明灯爆炸了，甘油瀑布般溅到桌子上、地图上。科托夫斯基腾地从桌子上跳下来，像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儿掏出一把左轮手枪。

夏伯阳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把镀镍的毛瑟枪。他上身穿一件用武装带勒得紧紧的灰色制服，下身穿一条皮子包边、裤线上饰有三根镶条的黑色马裤，头上戴一顶斜系着一条皱纹绸带的羊皮高帽，胸前佩一枚银色的五角星（我想起来了，他称之为“十月之星勋章”），旁边还挂着一只小型的黑色望远镜。

“你对蜡滴挺有见解嘛，格里沙，”他用略带沙哑的男高音说道，“只是现在你怎么说？你的存在的‘汪洋大海’如今哪儿去了？”

科托夫斯基尴尬地将目光移向刚才放照明灯的地方。地

^① 印度最古老的哲学著作。



图上洒出一块大大的油渍。感谢上帝，酒精灯的灯芯在爆炸时熄灭了，要不然屋子里非起火不可。

“形态，蜡——这都是谁创造的？”夏伯阳厉声问道。“回答！”

“智慧，”科托夫斯基答道。

“它在哪儿？指给我看。”

“智慧就是照明灯，”科托夫斯基说道。“刚才还在。”

“如果智慧是照明灯，而这盏灯又碎了，你还有地方可去吗？”

“那么智慧又会怎么样呢？”科托夫斯基惊慌失措地问道。

夏伯阳又开了一枪，子弹将桌子上的墨水瓶打得粉碎，蓝色的墨水溅得到处都是。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感到一阵晕眩。

科托夫斯基苍白的脸颊上现出两朵鲜艳的红云。

“是的，”他说道，“现在我明白了。您纠正了我的想法，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纠正得好。”

“唉，格里沙，”夏伯阳神情忧郁地说道，“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明明知道，你现在是不许犯错误的。不许。因为你要是走到那个地步，就没有人能纠正你了。你说的话可是会应验的。”

科托夫斯基低着头，转身从仓库里走了出去。

“等会儿我们要讲话，”夏伯阳将冒着烟的毛瑟枪放进枪套，说道。“我们坐你昨天从格里沙那儿赢来的马车去怎么样？还可以顺便谈谈。”

“好啊，”我说道。



“我已经命令套马，”夏伯阳说道。“让格里什卡和安卡坐双马敞篷车去。”

可以想见，我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快的神色，因为夏伯阳大声地笑起来并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后背。

我们走进院子，从一群红军战士中间穿过去，来到马厩。所有的骑兵都在紧张而快活地忙碌着，为即将投入的战斗做着准备。他们一边系马鞍，检查马掌，一边愉快地交谈着，但这愉快的背后能感觉得到一种清醒的专心致志和内心的高度紧张。那些战马似乎也被人的情绪所感染，瞪着黝黑而富有磁性的异常兴奋的眼睛，昂首奋蹄，嘶吼不断，似乎想要挣脱马嚼子的束缚。

我感觉到，一种近在咫尺的危险催眠似的向我袭来。夏伯阳开始向两名士兵解释什么，而我则走到离我最近的一匹拴在墙环上的马跟前，抚摸着它的鬃毛。我清楚地记得这一时刻——手指下浓密的毛发，新做的皮马鞍散发出的有点发酸的气味，面前的墙壁上的光斑，令人惊讶和无与伦比的充实感，以及这一瞬间彻底的真实感。大概这就是人们试图用“深呼吸”和“活得充实”这类字眼来形容的那种感觉。尽管它只持续了短暂的一瞬间，可我这次还是及时地领悟到，这种充实的和真正的生活永远不可能持续更长时间，这是其自身的性质使然。

“彼得卡！”夏伯阳在后面喊起来，“该走了！”

我拍了拍马脖子，一边朝马车走去，一边斜眼瞟着安娜和科托夫斯基乘坐的那辆双马敞篷车。安娜戴一顶缠着红帽箍的白色制帽，穿一件普通的军便服，扎一条挂着鹿皮枪套的细



皮带。饰有红色镶条的蓝色紧身裤的裤腿掖在系带的高筒皮靴里。这身打扮使她显得特别年轻，简直像个女中学生。发现我在看她，她立刻把脸扭了过去。

夏伯阳已经坐在四轮马车里了。坐在前面的是沉默寡言、绰号“拔都”的巴什基尔人，也就是那个在火车上给大家倒香槟酒、在干草垛旁站岗时差点用刺刀捅死我的人。我刚挨着夏伯阳坐下，巴什基尔人就猛地一拉缰绳，吧嗒一下嘴，车便驶出了大门。

科托夫斯基和安娜的马车紧跟在我们后面，再后面就是骑兵了。我们向右转了个弯，沿着大街向上驶去。说实话，这已经不能算是大街了，只能说是一条路，因为我们的庄园是大街上的最后一幢房子。爬上一个陡坡后，路向右边弯去，随即碰到一道绿叶的屏障。

我们驶入一条由树枝在道路上方编织起来的隧道。这些树长得特别古怪，很像长得过于茂盛的灌木。隧道很长，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走得太慢，才有这种感觉。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映照在清晨最后的露珠上；绿叶是那么葱茏欲滴，赏心悦目，以致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迷失了方向，我觉得我们正缓慢地坠入一口无底的绿色之井。我眯缝起眼睛，这种感觉才消失。

周边的树丛是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我们上了一条通往山顶的土路。土路左边是平缓的山崖，右边是风化了的淡紫色石墙，非常漂亮，裂缝里长出一些小树。我们在这条路上又走了大约一刻钟。

夏伯阳双手拄着军刀，闭着眼睛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像是



在沉思，又像是在打盹。突然他睁开眼睛，朝我转过脸。

“你抱怨过的那些噩梦还来折磨你吗？”

“还跟从前一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答道。

“怎么，又梦见那座医院了？”

“唉，如果只是梦见就好了，”我说道。“您知道，跟所有的梦一样，我梦里的一切总是变化多端。比如说，今天我梦见了日本。可昨天我确实梦见了医院，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在梦里到处乱搅和的刽子手竟然请求我把在这里经历的一切都详细地写在纸上。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您能想象得到吗？”

“我能，”夏伯阳说道。“可为什么你没有听他的呢？”

我惊讶地望着他。

“您怎么，真的建议我这么做吗？”

他点了点头。

“为什么？”

“你自己不是说过，你的噩梦总是变化多端嘛。你在梦中反复从事的任何一项单调的活动都可以让你在梦中创造出一种类似于固定中心的东西。这样的话，梦就会变得比较真实。没有比在梦里做记录更美妙的事了，你简直无法想象。”

我陷入沉思。

“可是，我要那些噩梦的记录有什么用呢，如果事实上我想挣脱它们？”

“正是为了挣脱它们。因为可以挣脱的只能是某种真实的东西。”

“就算是这样吧。那么，我可以把这里发生的一切的一切



都写下来吗？”

“当然可以。”

“那么在我的记录里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夏伯阳笑了起来。

“不，彼得卡，你不会白白地梦见精神病院的。你在你梦中做的记录里如何称呼我有什么区别吗？”

“确实有，”我说道，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白痴。“我不过是担心……不，我的脑子确实有点问题。”

“随便怎么称呼我都行，”夏伯阳说道。“哪怕叫我夏伯阳也行啊。”

“夏伯阳？”我反问道。

“为什么不可以，你甚至可以写，”他得意地笑着说道，“写我留着小胡子，然后再写我把胡子捋整齐了。”

他认认真真地用手指把胡子捋整齐。

“不过我认为，别人给你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现实的，”他说道。“你该着手记录自己的梦了，而且要尽可能趁你还记得详细的时候。”

“我不可能忘记，”我说道。“只有当你醒来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这是一场噩梦，可你在做梦的时候……甚至无法理解，什么实际上是真实的。是我们现在乘的四轮马车呢，还是那个镶着瓷砖、每天晚上都有穿白大褂的魔鬼来折磨我的地狱？”

“什么实际上是真实的呢？”夏伯阳反问道，随即又合上眼睛。“这个问题你未必能找到答案，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实际上’。”



“此话怎讲？”我问道。

“唉，彼得卡呀，彼得卡，”夏伯阳说道，“我认识中国的一个共产党员，名叫庄杰。他经常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一只草丛中飞来飞去的红蝴蝶。^①每次他醒来的时候，他都弄不清楚，到底是蝴蝶梦见自己在从事革命工作呢，还是这个地下工作者梦见自己在花丛中飞舞。就这样，这位庄杰在蒙古因怠工而被捕，审讯时，他说自己实际上就是梦见这一切的那只蝴蝶。由于是荣格伦男爵亲自审问，而他又是个理解力很强的人，所以下一个问题自然便是，为什么这只蝴蝶拥护共产党。庄杰说，蝴蝶根本就不拥护共产党。于是又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蝴蝶还要从事破坏活动。庄杰回答，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如此不成体统，以致你站在哪一边并没有什么区别。”

“把他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把他放到墙角，叫醒了。”

“他呢？”

夏伯阳耸了耸肩膀。

“想必是飞到更远的地方了吧。”

“我明白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明白了，”我若有所思地说道。

路又转了个弯，左边已经可以俯瞰城市的全景了。我看到了只是一个黄点的我们的庄园，还有我们穿行了很久的绿色林荫道。四面围拢的平缓的山坡构成一个碗状的盆地，而

^① 此处系借用中国道教掌故“庄周梦蝶”。



阿尔泰 - 维德尼扬斯克就坐落在盆地的底部。

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城市本身的景观,而是由山坡组成的盆地的全景;小城很不整洁,极像一个被雨水冲进大坑的垃圾堆。城中看不到人影,房子在还没有散尽的炊烟中时隐时现。我猛然惊讶地意识到,我是坐落在这庞大的臭水沟底部的世界的一部分,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稀里糊涂的国内战争,为了能在这存在的底层站稳脚跟,有人正贪婪地分割着那些破烂不堪的房舍、参差不齐的菜园、晾着五颜六色的内衣的绳子。我想起夏伯阳讲的那个中国做梦者,于是又朝下而看了看。而对凝然不动地呈现在周围的世界,而对探询世界的天空平静的目光,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坑底的这个小城跟世界上的其他城市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我想,它们全都处在这样一些即便是肉眼看不见的盆地的底部。它们全都在地狱的大锅里煎熬着,而锅下的火就是人们所说的在地心汹涌澎湃的岩浆。它们全都是同一噩梦的不同版本。这噩梦无法改善,只能通过苏醒来摆脱它。

“如果像对待那个中国人那样把你从噩梦中唤醒,彼得卡,”夏伯阳闭着眼睛说道,“那你充其量也就是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你永远都是这样摇摆不定。但是,如果你能明白,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那么,你梦见的是什么就根本不重要了。这样的话,你的苏醒才是真正的苏醒,永远的苏醒。当然,要是你愿意的话。”

“为什么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梦?”

“因为,彼得卡,”夏伯阳说道,“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啊。”



我们爬上了山坡,进入一片开阔的山地。远处的地平线上,连绵不断的低矮的山丘后面,耸立着一座座蓝色的、藕荷色的、淡紫色的山峰,而它们的前方是一大片花团锦簇的草地。花儿有些枯萎,色彩也有些暗淡,但由于实在太多,还是使得整个草地的基调看上去与其说是绿色,不如说是淡黄色。这景观如此优美,以致我有好几分钟竟然忘却了夏伯阳的话,忘却了世上的一切。

然而奇怪,我就是忘不了那个中国人。

凝视着马车旁边掠过的点点花丛,我在想象他是如何在花丛中飞舞的,是如何有时凭着陈旧的记忆一心要把反政府传单贴到麻黄树细小的嫩枝上的,又是如何每当想起自己早已没有什么传单就浑身发抖的。即便他有,又有谁会去读呢?

但没过多久,赏花就变得不可能了。

显然是夏伯阳给我们的马车夫发了信号。我们开始加速,马车周围的一切开始汇成一条条的彩带。巴什基尔人欠起身来,狠命地抽打着马,喉咙里还不时地喊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我们走的这条路纯粹是象征性的。路上生长的花也许比田野上少一些,而且路中央还看得出古老的辙印,但从整体上讲,要想断定它是存在的并不容易。尽管如此,我们几乎没受到什么颠簸之苦,田野平坦极了。穿着黑色制服、为我们不长的队伍担任殿后的骑兵们离开路而,追上我们的马车,在两侧列成两个分队。他们蜿蜒成一个长长的弧形,犹如我们的马车生出的两只狭长的黑翼,在草地上与我们并辔前进。

安娜和科托夫斯基乘坐的带机枪的敞篷马车也加快了速



度,几乎追上我们。我发现,科托夫斯基在用手杖戳马车夫的后背并点头示意我们的马车。他们显然在跟我们比赛。他们一度险些超过我们。至少可以说是一度跟我们并驾齐驱。我发现他们的车身上有一个标记——一个用波浪线分成黑白两半的圆,两个半圆中又各有一个与其颜色相反的小圆。这好像是东方的一种符号^①。旁边是用白色油漆涂抹的两行粗糙的大字:

黑夜的力量,白昼的力量 都是一个鸡巴样

我们的巴什基尔人抽了一鞭子,敞篷马车随即被抛在了后而。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安娜竟然同意坐在这样一辆涂着污言秽语的马车里。转眼间我就猜到了其中的原委,并且确信,在车身上写这句话的就是她。实际上,我对这个女人实在太缺乏了解!

伴随着骑兵狂野的口哨声和吆喝声,我们的队伍马不停蹄地奔驰在原野上。这样走了大约有五六俄里,远处的山丘已经离我们很近,能看得清山上突出的岩石和生长的树木。脚下的原野也变得远不如开始时那么平坦了,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被连人带车抛到半空,我已经开始担心我们当中会有人被颠断脖子了。这时,夏伯阳终于从枪套里拔出自己的毛瑟枪,朝天上开了一枪。

“行了!”他吼道。“齐步走!”

^① 即道教的主要标志阴阳鱼太极图。



我们的马车开始刹车。骑兵们像是生怕跨越了那条看不见的马车后轮的中轴线，猛然放慢速度，并开始逐个消失在我们身后。安娜和科托夫斯基的马车也落在了后面，几分钟后我们又跟刚开始时一样，远远地走在前面了。

突然我发现一根从山后升起的垂直烟柱，又白又浓，只有将成捆的草和湿树叶扔到火堆里，才会冒出这样的烟柱。最奇怪的是，它不扩散，就像一根高耸入云的白色圆柱。我们距离这根柱子不足一俄里；火堆本身被山岗遮住了。我们又向前走了几分钟，然后停下来。

前方横亘着两座不高但却陡峭的山丘，中间是一条狭窄的过道。两座山丘构成一道浑然天成的大门，而且相当对称，俨然两座耸立了许多世纪的古塔。它们犹如一条分界线，过了这条线地形与这边的就不一样，尽是连绵起伏的山岗。好像不一样的不只是地形。一方面，我分明感觉到有风扑而吹来，另一方面，却又分明看到显然离我们已经很近的篝火升起的烟柱是笔直笔直的，这让我困惑不已。

“我们干吗站在这里？”我问夏伯阳。

“我们在等，”他说道。

“等谁呢？敌人吗？”

夏伯阳沉默不语。我忽然发现我忘了带军刀，身上只有一把勃郎宁手枪，要是赶巧与骑兵交手的话，那我可就惨了。但从夏伯阳仍旧不动声色地坐在车上的样子来看，我们还没遇上直接的危险。我回头扫了一眼。科托夫斯基和安娜的敞篷马车停在我们旁边。我见到了科托夫斯基苍白的脸，他把两手放在胸前，一动不动地坐在后面的位子上。此时的他有



点儿像出场前的歌剧演员。而背对着我的安娜正在摆弄机枪，我觉得，她摆弄那东西不是因为准备开火，而是因为坐在过分得意的科托夫斯基旁边让她难受。跟在我们身后的骑兵站得远远的，好像很害怕接近这道“土门”，我只能看到他们模糊的身影。

“我们到底在等谁呢？”我又问道。

“我们要见黑男爵，”夏伯阳答道。“我想，彼得，您一定会记住这次会面的。”

“这绰号怎么这么奇怪？我想，他总该有名字吧？”

“有的，”夏伯阳说道，“他的真名叫荣格伦·冯·斯坦伯格。”

“荣格伦？”我反问道。“荣格……伦，我好像听说过……他是不是跟精神病学有关系？是不是搞过符号阐释？”

夏伯阳用惊异的目光打量了我一眼。

“不是，”他说道。“据我判断，他蔑视一切符号，不管是哪一类的。”

“哦，”我说道，“我现在想起来了。就是他枪毙了您说的那个中国人。”

“不错，”夏伯阳说道。“他是内蒙古的保护者。人们都说，他是战神的宠儿。以前他指挥亚洲骑兵师，现在指挥西藏哥萨克特种兵团。”

“从未听说过这些部队，”我说道。“为什么叫他‘黑男爵’呢？”

夏伯阳沉思片刻。

“的确，”他说道，“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为什么不问



问他呢？他已经到了。”

我哆嗦了一下，转过头去。

两座山丘之间的狭窄过道上出现了一个古怪的东西。仔细一看我才明白，这是非常古老而奇特的轿子，由一间轿厢、一个圆顶、四只长长的把手构成。圆顶和把手像是由年久发绿的青铜制成的，上面镶嵌着许多小巧的玉扣，好似黑暗中的猫眼，闪烁着神秘的光芒。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是谁不声不响地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的呢——只能认为是那些用自己的手掌将长长的把手打磨得溜光锃亮的不为人知的轿夫，他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到土门后而去了。

轿子立在四个弯曲的支脚上，这使得它不知是像祭祀用的器皿呢，还是像立在四个短木桩上的小屋。不过给人的感觉更像小屋，这从它印有花格的绸布帘子可以看出来。帘子里面隐约现出一个正襟危坐的人影。

夏伯阳从马车上跳下来，向轿子走去。

“您好，男爵，”他说道。

“您好，”帘子后面传来低沉的声音。

“我还有一个请求，”夏伯阳说道。

“我料想，您这次又不是为自己来的吧。”

“对，”夏伯阳说道，“您还记得格里戈里·科托夫斯基吗？”

“记得，”轿子里的人说道。“他怎么了？”

“我没法跟他解释清楚，究竟什么是智慧。今天早上他竟逼得我动用了手枪。凡是可以说的，我已经跟他说过很多次了，因此需要演示一下，男爵，让他开开眼界。”



“您的问题，亲爱的夏伯阳，太单调乏味了。您要庇护的人在哪里？”

夏伯阳转过身子朝科托夫斯基的马车招了招手。

轿子的帘子撩开了，我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淡黄的头发，挺拔的额头，冷酷而又无神的眼睛。尽管他留着两撇鞑靼人的唇髭，已有好几天没刮脸，但模样却很斯文；他的衣着看上去很古怪，不知是黑色的教袍呢，还是军大衣，式样很像半圆形领口的蒙古长袍。说实在的，若不是看见了将军肩章，我是永远也不会想到这是军大衣的。他的腰间挂着一把军刀，跟夏伯阳的一模一样，只是系在刀把上的穗子不是浅紫色的，而是黑色的。他的胸前并排挂着三颗银色五角星。他快速从轿子里走出来（原来，他几乎比我高一头），并打量了我一下。

“这是谁？”

“这是我的政委彼得·虚空，”夏伯阳回答道。“他在柳树站那一仗里表现不俗。”

“听说过一些，”男爵说道。“他是为同一件事来的？”

夏伯阳点点头。荣格伦向我伸出手。

“很高兴认识您，彼得。”

“彼此彼此，将军先生，”我握着他那有力而干枯的手答道。

“就叫我男爵吧，”荣格伦说完转向走过来的科托夫斯基。“格里戈里，好久不见……”

“您好，男爵，”科托夫斯基回答道。“见到您我打心底感到高兴。”



“从您苍白的脸色来看，您见到我确实高兴，高兴得浑身的血液都流到心脏去了。”

“才不是呢，男爵，这是忧国忧民的结果。”

“哦，您又捍卫起旧的东西了。我不赞成。不过，我们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去走走怎么样？”

荣格伦朝土门方向指了指。科托夫斯基咽了一口唾沫。

“我捍卫的是荣誉，”他回答道。

荣格伦用探寻的眼光看着夏伯阳。夏伯阳递给他一个纸包。

“这是两份？”男爵问道。

“是的。”

荣格伦将纸包揣进衣服上的一个大口袋里，搂着科托夫斯基的肩膀，可以说是将他拖向土门的；等他们消失在门洞里，我转身问夏伯阳。

“土门后面是什么？”

夏伯阳笑了笑。

“我不想破坏您的印象。”

土门后面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过了片刻，男爵一个人出现在门口。

“现在该您了，彼得，”他说道。

我疑惑地望了望夏伯阳。夏伯阳眯缝着眼，肯定地点点头，且特别用力，好像是要用下巴将一只看不见的钉子钉进自己的胸膛。

我慢慢地向男爵走去。

我得承认，我开始害怕了。倒不是因为我感觉到了大祸



临头。确切地说,这是对大祸临头的感觉本身,但不是那种决斗前或战斗前的感觉,毕竟那时你知道,最可怕的事情一旦发生,肯定就是发生在你身上。此时此刻,我的感觉是,大祸临头的不是我自身,而是我对自我的认知;我并没有预料到什么可怕的事情,但那个没有预料到什么可怕事情的我却突然让我觉得像是一个在深渊上方走钢丝的演员突然遇到了越刮越大的风。

“我给您看看我的营地,”等我走到近前,男爵说道。

“听我说,男爵,如果您准备像枪毙那个中国人一样枪毙我……”

“您说哪儿去了,”男爵说着笑了起来。“夏伯阳一定是给您讲了许多可怕的事。我不是这样的人。”

他拉住我的胳膊肘,向土门走去。

“我们在篝火中间走走,”他说道,“看看我们的战士怎么样。”

“我可没看见什么篝火,”我说道。

“没看见?”他说道。“您再仔细看看。”

我又看了一眼两座山丘之间的亮处。这时男爵猛地在背后推了我一下,我打了个趔趄,扑倒在地上。他的动作是那么突然,以致有那么一刹那我还以为自己是被他一脚踢倒的篱笆门。接着,我感觉到一阵视觉上的痉挛;我眯缝起眼睛,面前的黑暗中迸射出明亮的斑点,有种用手指挤压眼睛或头部剧烈晃动时产生的眼冒金星的感觉。当我睁开眼睛站起来的时候,这些火花还是没有消失。

我不知道我们身在何处。连绵的山岗,夏天的傍晚——



所有这一切都不见了；周围一片漆黑，在目力所及的地方，闪耀着星星点点篝火。它们按照人为的次序严格排列，仿佛纵横交错的无形栅栏，将世界分割成无数个方块。篝火之间的距离大约有五十步，因此，坐在一堆篝火旁的人无法看清坐在另一堆篝火旁的人，只能分辨出一个个模糊的身影，但要确切地说出那里究竟有多少人，或是坐在那里的究竟是不是人，是不可能的。然而，最奇怪的是，我们所在的原野也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变化，此时此刻，我们的脚下是一块极其平坦的平地，上面好像覆盖着一层低矮的枯草，找不出一处凸凹不平的地方，这从周围的火堆构成的极其平整而端正的图案不难看出。

“这到底是什么？”我不知所措地问道。

“哦，”男爵说道，“现在，我估计，您能看见了。”

“是能看见了，”我说道。

“这是阴间的一个分部，”荣格伦说道，“是我的领地，进入这里的人大多生前是行伍出身。您大概听说过瓦尔哈拉宫^①吧？”

“听说过，”我回答，同时感到内心生出一种荒唐而又幼稚的冲动，恨不得冲过去揪住男爵的衣领。

“这里就是。遗憾的是，到这里来的不只是军人，还有生前杀人如麻的暴徒。强盗啦，杀手啦，什么样的社会渣滓都有。因此，必须经常巡视。有时甚至会觉得，我在这里简直就是个护林员。”

^①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奥丁神之殿堂，阵亡将士灵魂游憩地。



男爵叹了一口气。

“尽管我还记得，”他用略带忧郁的声音说道，“小时候我就想做一个护林员……彼得，注意，您得抓住我的衣袖。否则在这儿走动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不太明白，”我轻松地说道，“不过，愿意从命。”

我抓住他的呢绒衣袖，一起向前走去。很快我又发现了一件怪事，男爵走得不是特别快，至少没有在世界发生可怕的变形之前快，可我们从一旁经过的那些篝火却以一种极可怕的速度向后退去。给人的感觉是，我们从容不迫地走在站台上，一辆隐形火车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拖拽着站台，而火车的运行方向又取决于男爵朝哪个方向拐弯。前面出现了一豆篝火，它朝我们飞奔过来，随即又在男爵停下的时候，在我们脚下停住。

篝火旁坐着两个人，浑身湿漉漉的，身体半裸着，像是古罗马人，裹在他们身上的唯一衣物就是一截短被单。两人都带着枪，一个带的是左轮手枪，另一个带的是双筒枪。此外，两人都遍体枪伤，惨不忍睹。一见到男爵，他们扑通一声瘫倒在地，吓得浑身跟筛糠似的抖个不停。

“你们是什么人？”男爵低声问道。

“谢廖扎·蒙古洛伊德手下的士兵，”其中一个弓着身子说道。

“是怎么到这儿来的？”男爵问道。

“我们是被错杀的，长官。”

“我不是你们的长官，”男爵说道。“没有人会被错杀。”

“确实是搞错了，”第二个人冤枉地说。“在桑拿浴室里。”



他们以为蒙古洛伊德要在那里签合同。”

“什么合同？”荣格伦迷惑不解地扬起眉毛问道。

“我们应该还他们贷款。‘石化公司’开出了不可撤销的信用证，可贷款却提不出来。于是乎，‘大岛公司’派来两头公牛……”

“不可撤销的信用证？”男爵打断他的话。“‘大岛公司’？”

他弯下腰，冲火焰吹了口气，那火焰立即缩小了好几倍，从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一下子变成一条只有几厘米高的火舌。这口气对两个半裸的男子产生的效果同样是惊人的，他们一动不动地凝住了，后背转眼间结了一层霜。

“这也叫士兵？”男爵说道。“啊？如今什么人都能进瓦尔哈拉宫。谢廖扎·蒙古洛伊德……都怪对手中的剑做出的愚蠢规定。”^①

“他们这是怎么了？”我问道。

“这是罪有应得，”男爵说道。“具体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不过可以看看。”

他又冲即将熄灭的淡蓝色火苗吹了口气，火苗猛地蹿了起来，恢复到了原样。男爵眯起眼睛聚精会神地观察了一会儿。

“看来，他们要变成肉联厂的公牛了。如今经常这样从轻发落。一方面是因为佛祖大慈大悲，另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肉制品一直短缺。”

^① 按规定，手里拿着剑的人死后就该升入天堂，比如瓦尔哈拉宫。这里指像谢廖扎·蒙古洛伊德这样的人是不该进入瓦尔哈拉宫的。



直到现在我才看清楚这堆篝火，它让我大吃一惊。其实这不能叫篝火。火焰里既没有木头，也没有树枝，它是从地下的一个熔洞里冒出来的，这个熔洞的形状很像一个平整而又闪光的五角星。

“请问男爵，为什么这火焰在五角星上面燃烧？”

“什么为什么，”男爵说道。“这可是佛祖永不熄灭的仁慈之火。你说的那个五角星实际上是十月之星勋章的标志。永不熄灭的仁慈之火如果不在这个标志上燃烧，那该在何处燃烧呢？”

“可十月之星勋章又是什么呢？”我瞟了一眼他的胸部问道。“我在很多场合都听说过这种说法，但没有一个人肯向我解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十月之星吗？”荣格伦问道。“很简单。跟圣诞节的情况差不多。天主教的圣诞节在十月份，东正教的圣诞节在一月份，可庆贺的都是同一个生日。这里也一样。日历改革，抄写错误，简单地说，尽管人们认为圣诞节是在一月份，但实际上是在十月份。”

“真是这样的吗？”

“您令我吃惊，彼得。这可是地球上最著名的历史事件之一。从前有一个人，他无法像别人那样生活。他试图弄明白，日复一日地发生在他身上的究竟是什么事，日复一日地经受这件事的他自己究竟是什么人。一个十月的夜晚，他坐在树下仰望天空，看到一颗璀璨的星星。顷刻间他全明白了，而且明白得如此深刻，以至那一瞬间的回声至今……”

男爵停下来，搜索着合适的词语，但显然没找到。



“最好跟夏伯阳谈谈，”他总结道。“他喜欢说这些。重要的是，这造福众生的仁慈之火，即使工作需要也无法彻底熄灭的仁慈之火，是从那一瞬间开始燃烧的。”

我环顾一下四周。周围的景象实在是壮观。我突然感觉到，我目睹的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图画之一：在野外宿营的鞑靼军队点燃一堆堆的篝火，每一堆篝火旁都坐着士兵，他们怀着贪婪的梦想凝视着火苗，似乎透过跳跃的火苗，看到了从前面的泥土中出来的金子、牲畜和女人。只是不知道，我与荣格伦穿行其间的鞑靼军队要开赴何方？这些坐在篝火旁边的人们在梦想什么？我朝荣格伦转过身子。

“请问男爵，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分开坐着而不互相走动呢？”

“那您就试着走一趟嘛，”荣格伦说道。

我们距离最近的一堆篝火不超过五十步远。旁边坐着的人看上去有五六个。我迟疑地瞥了一眼荣格伦。

“去吧，”他重复道。

我耸了耸肩膀，向前走去。我没有丝毫异样的感觉。走了一两分钟我才突然明白过来，在这段时间里，我根本就没有接近我要去的那个亮点。我回头看了看。荣格伦站在火堆旁，离我有三四步之遥，正嘲讽地望着我。

“这个地方很像您所了解的那个世界，”他说道，“但绝不可由此断言，这就是那个世界。”

我发现，火堆旁那两个冻僵的身躯不见了，他们呆过的地方只剩下两个模糊的椭圆形斑点。

“我们走吧，”荣格伦说道，“最后，我们还要看望一下我的



部下们。”

我抓紧他的衣袖，星星点点的火光又一次从我们身边疾速掠过。我们移动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它们被拉长，延伸成一条条闪电形和波浪形的曲线。不过，我几乎敢肯定，这是某种幻觉：这么快的速度我的脸上竟然感觉不到风，仿佛男爵开始移动的时候，移动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周围的世界。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搞不清楚我们在奔向何处。有时我们会稍停片刻，这时我才有机会仔细打量围坐在最近一堆篝火旁的人。他们大多是些蓄着大胡子、带着步枪的农民，彼此长得很像。我们刚到他们身边，他们就立刻瘫倒在漆黑的地上。有一次我还以为，他们手里拿的不是步枪，而是长矛，不过我无法肯定，毕竟我们停留的时间太短。我明白了，我们的位移在提示我，蝙蝠就是以这样疯狂而又不可思议的曲线在夜幕中飞行的。

“我希望您，彼得，能明白，”耳边传来男爵雷鸣般的声音，“我们现在不是处在一个可以撒谎，甚或可以不太诚实的地方。”

“我明白，”我说道，从身旁疾速掠过的黄白相间的长条和曲线让我眼花缭乱，头晕目眩。

“请回答我一个问题，”男爵说道。“一生中您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我？”我反问道，并陷入沉思。

如果不撒谎，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我考虑了很久，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突然答案冒了出来。

“我想得到非凡的成功，”我说道。



男爵哈哈大笑起来。

“好极了，”他说道。“可这‘非凡的成功’对您来说究竟是什么呢？”

“非凡的成功，”我答道，“就是思绪遑飞，使您能够目睹生活之美的时候。我说得明白吗？”

“哦，是的，”男爵说道。“要是所有的人都这么言简意赅就好了。您的语言是如何达到这种境界的呢？”

“这来自我的一个梦，”我答道，“确切地说，是一个噩梦。这些希奇古怪的话我记得很清楚。它们写在一个精神病院的大本子上，我在梦里翻阅过。我之所以翻阅，是因为那上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话是讲我的。”

“是的，”男爵一边说一边向右拐（这时我们周围火焰的木马也跟着向右侧倾斜起来），“您能自己提起这件事，很好。之所以让您到这里来，是因为夏伯阳请求我向您解释一件事。说实话，这并不等于说这件事有什么特别，他自己解释不了。他已经跟您说过许多次了，最后一次是在来这里的路上。可不知为什么您至今仍然认为，您梦里的世界不如您与夏伯阳在浴室里畅饮时所置身的空间真实。”

“您说得对，”我说道。

男爵来了个急停，周围的火焰也随之停止了跃动。我发觉，篝火似乎一下子变成了紧张不安的浅红色。

“但您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他问道。

“至少是因为我终归要回到真实世界的，”我说道。“在那里，如您所说，我可以在浴室里与夏伯阳畅饮。不，在理智层面上，我很清楚您的意思。不仅如此，我甚至发现噩梦在降临



的那一刻是那么真实,以至无法相信这不过是一场梦。同样可以触摸东西,掐自己一把……”

“但您是如何区分梦与醒的呢?”男爵问道。

“醒的时候,我对正在发生的事会有一种清晰而明确的真实感。比如说现在。”

“就是说现在,您有这种感觉?”男爵问道。

“差不多吧,”我有点慌乱地说道。“虽然情境,应该承认,不同寻常。”

“夏伯阳要我带上您,让您置身于一个跟您那些有关精神病院和夏伯阳的噩梦毫无关系的所在,哪怕一次也行,”男爵说道。“请您仔细观察周围。在这里,您那两个纠缠不休的噩梦全都是幻觉。我要是把您单独丢在一堆篝火旁边,您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男爵不说话了,似乎在给我时间体会一下这可怕的前景。我缓慢地扫一眼黑暗中的那些无法接近、不计其数的亮点。他是对的。夏伯阳和安娜在哪里?那个有着瓷砖墙和砸碎的亚里士多德胸像的飘忽不定的夜晚世界在哪里?现在他们哪儿都不在,不仅如此,我还知道,确切地知道,他们也无处可在,因为正是我,跟这个莫名其妙的人(他是人吗?)站在一起的我,才为这些精神病院和国内战争进入世界提供了可能性和唯一的方式。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这种忧郁的地狱的边境及其战战兢兢的子民和高大威严的哨兵,只是因为我存在,他们才存在。

“我觉得,”我说道,“我明白。”

荣格伦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我。



“您究竟明白什么？”

忽然我们背后传来一声吼叫：

“我！我！我！我！”

我们不约而同地扭过头去。

不远处，离我们大约有三四十米，燃烧着一堆篝火。但它看上去跟其余的篝火完全两样。首先，火焰的颜色两样，它是暗淡的，而且冒着烟。其次，篝火里面劈啪作响，火星四溅。再次，这堆篝火处于其余的篝火所构成的严格的线性格局之外，它显然不是在规定的地点燃烧。

“那好吧，就让我们去看看，”荣格伦说着拉起我的衣袖。

坐在篝火旁的人们完全不像其他受到男爵保护的人。他们一共有四个人。最为心神不定的是一个穿着粉红色上衣、留着栗色平头、脑袋像炮弹的胖子。他坐在地上，双手抱住自己，好像自己的身体唤起了他的淫欲似的，嘴里还不停地吼着：

“我！我！我！”

他的音调在变化，我跟男爵刚听见时，他的叫声里有种野兽般的得意，而当我们走近时，这个“我”又变得像是询问。吼叫者的旁边坐着一个梳着鸡冠头、穿着好像是水兵穿的短呢衣、麻木地望着火光的瘦子。他一动不动，要不是他的嘴唇会偶尔嚅动一下的话，完全可以认为他没有知觉。似乎只有那个剃着光头、胡子修得特别齐整的胖子是完全清醒的，他正使劲推自己的两个同伴，好像在试图使他们苏醒过来。他成功了一半，那个身材较瘦的淡黄色头发的男子开始哭诉并像作祷告似的摇晃起来。剃着光头的胖子正要推醒第二个同伴



时,突然抬头看见了我們。他的脸顿时吓得变了形,他对自己的同伴喊了句什么,赶紧站起来。

男爵轻声骂了一句。他手里出现一只手雷;他摘下保险栓,将它扔进距离我们脚下约有五米远的火堆。我条件反射地卧倒在地,用双手捂住头,可过了好几秒钟,还是没有听见爆炸声。

“起来吧,”男爵说道。

我睁开眼睛,看见男爵正在弯腰扶我。正面对着我的男爵似乎是在一个特写镜头里,伸出来的手几乎碰到了我的脸,而那双注视着我的眼睛汇聚和辉映着大量的篝火,仿佛是镶嵌在此地天空中仅有的两颗星星。

“谢谢!”我站起来,“我自己行。没爆炸?”

“怎么会呢,”男爵说道,“一切正常。”

我扫一眼刚才燃烧着篝火的地方,结果大吃一惊:篝火不见了,坐在篝火旁边的人也不见了,我面前连一点燃烧过的痕迹也没有。

“刚才在这里的是什么?”我问道。

“哦,”男爵说道,“一些无赖。偷吃了许多萨满的蘑菇^①。也不想想他们是在什么地方。”

“您把他们……”

“没有,”男爵说道。“瞧您说的,我不过是令他们恢复了知觉。”

“我差不多敢肯定,”我说道,“我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个留

① 一种生长在树林或草地上的毒蕈,有毒的菌类。



胡子的胖子。甚至不是差不多,而是绝对敢肯定。”

“您可能在梦里见过他。”

“也许是吧,”我回答道,心想应该是这样,这个剃光头的先生使我联想到白色的瓷砖墙和针触到皮肉时那种凉飕飕的感觉,这些都是我的噩梦的一般表征。有那么一刻我还以为我甚至能想起他的名字,但很快我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其他想法上去了。与此同时,荣格伦闷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好像在掂量着想要对我说的话。

“请告诉我,彼得,”他终于开口了,“您的政治成分是什么?依我看,是保皇党吧?”

“当然,”我答道,“怎么,我给人的印象不像吗?”

“像,”男爵打断我的话,“我只不过是想举一个您能明白的例子。请想象一下,有这么一间不通风的屋子,里面挤了好多好多人。他们全都坐在歪歪扭扭的凳子上,摇摇晃晃的椅子上,横七竖八的包袱上。也就是说,见到什么坐什么。而那些捷足先登的人,总想一个人占用两把椅子,或是把别人赶走,将别人的位置据为己有。这就是你生活的世界。同时,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王位,气势雄伟,富丽堂皇,凌驾于这整个世界和所有其他世界之上。王位是名符其实的王位,谁登上它,谁就会君临一切。最重要的是,这王位是绝对合法的,任何人都有资格拥有它。但要登上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在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您明白吗?它在虚无处。”

“是的,”我若有所思地答道,“我昨天正好想过这个问题,男爵先生。我知道‘虚无’是什么意思。”

“那就想一想吧,”男爵说道。“在这里,我已经说过了,您



那两种纠缠不休的状态——一个与夏伯阳有关,一个与他无关——全都是幻觉。为了进入‘虚无’,登上无限自由与幸福的王位,只要拿掉那个唯一还存在的空间,也就是您看见我和您自己的那个地方就行了。这也是那些受我保护的人企图做到的。但他们机会很少,过一段时间他们将不得不重复没精打采的生活。既然如此,您何苦不在有生之年进入‘虚无’呢?我向您发誓,这是一生中可以做的最美好的一件事。您大概喜欢隐喻,其实,这跟从疯人院里出院是同样的道理。”

“请相信我,男爵,”我将一只手放在胸前,动情地开口道,可他没让我说完。

“还有,这件事要抢在夏伯阳开始使用自己的黏土机枪之前做。然后,正如您知道的,一切都将荡然无存,甚至包括‘虚无’。”

“黏土机枪?”我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夏伯阳没对您说过吗?”

“没有。”

荣格伦皱了皱眉头。

“既然这样我们就不深究了。就让您的记忆中只保留从疯人院出院获得自由这个隐喻吧。或许有一天,您会在自己的某个噩梦里回想起我们的谈话。现在我们该走了。小伙子们等急了。”

男爵拉起我的衣袖便走,于是我们周围又有许多不规则的光带开始时隐时现。我已经适应了这个世界,也不头晕目眩了。男爵走在前面,聚精会神地盯着暗处;我瞥了一眼他向后倾斜的下巴、棕黄色的唇髭和嘴角上痛苦的皱纹,心想,他



的外表其实并不怎么吓人。

“请问，男爵，为什么周围的人都那么怕您呢？”我还是忍不住问道。“我不是想冒犯您，但您的外表，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呀。”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您这么看，”男爵回答道。“在我的朋友们面前，我一般是以彼得堡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我也的确曾经是。可这并不等于说，我看上去确实如此。”

“那么别人到底是怎么看您的呢？”

“我不想细说，”男爵说道。“我只说一句，我的六只手里都握着锋利的马刀。”

“那么您的真实面目是怎样的呢？”

“真实面目，很遗憾，我没有，”男爵答道。

应该承认，男爵的话给我留下了些许印象，尽管只要稍加思索，我自己都能猜到。

“马上就到了，”男爵以一种放松的语调说道。

“请问，”我瞟了他一眼，开口问道，“为什么人们都叫您‘黑男爵’呢？”

“啊，”荣格伦笑了。“大概是因为我在蒙古打仗的时候，图图赫图活佛曾经赐给我一台黑轿子吧。”

“那为什么您这次坐的是绿色的？”

“因为同样还赐了我坐绿轿子的权利嘛。”

“好，可为什么不叫您‘绿男爵’？”

荣格伦皱起眉头。

“您不觉得，您问得多了点儿吗？”他说道。“您最好环顾一下四周，好好记住这个地方。您再也见不到它了。也就是



说,您当然可以重新见到它,但我真诚地希望,这样的事不要发生在您身上。”

我接受了男爵的建议。

远处出现一团火光,看上去比别处的大。它没有像别的篝火那样朝我们疾驰过来,而是缓慢地向我们靠拢,好像我们是以平常的步伐朝它走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猜想,这肯定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了。

“您的朋友们就在这一大堆篝火旁吗?”我问道。

“是的,”男爵答道。“我是不会把他们称作‘朋友’的,确切地说,他们是我过去的战友。我曾经是他们的指挥员。”

“怎么,你们一起打过仗?”

“不错,”男爵说道,“这是原因之一。还有更重要的。当年我们是一起在伊尔库茨克被枪决的,我不能说是由于我的过错,但毕竟……所以,我觉得我对他们负有特殊的责任。”

“我明白,”我说道。“要是我突然到了一个黑暗和荒凉的地方,我肯定会非常希望有人来搭救我的。”

“要知道,”男爵说道,“不要忘了,您现在还活着。您周围的黑暗和荒凉事实上是绝无仅有的最明亮的所在。好了,请站住吧。”

我机械地停住了脚步,而男爵没有给我时间想他要做什么,就猛地在背后推了我一把。

但这次他没有令我措手不及。当我的身体倒在地上的时候,我似乎马上意识到了回归平凡世界的这一稍纵即逝的瞬间,换句话说,由于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意识的,我是马上明白了这种回归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该如何对此进行描述。



就好像一个舞台布景已经撤下，而另一个还没来得及换上，就在这刹那间，我见到了两个布景之间明亮的空隙。这一刹那足够使我看清我一直信以为真的东西背后的骗局，看清宇宙简单而又愚蠢的构造，而对这一构造的认识没有带来任何收获，除了惊慌、懊丧和些许的羞愧。

男爵推得如此用力，以致我还没来得及做出自我保护的动作，便一头撞在地上。

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我的面前又出现了平凡的世界——草原、夜空、山岗。男爵的背影在前面晃动，他正朝升腾着一条白色烟柱的原野上唯一一堆篝火走去。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尘土，但没有跟着男爵过去。他走到火堆旁边，一些留着大胡子、穿着迷彩服、戴着羊皮高帽的男子，迎着他站了起来。

“你们好，小伙子们！”荣格伦以指挥员特有的热情奔放的男低音响亮地喊道。“怎么样了？”

“我们正在尽力，尊敬的指挥员！没什么，我们还活着！感谢上帝！”大家七嘴八舌地回答。男爵被团团围住，全然不见了他的身影。看得出来，战士们爱戴他。

我发现，火堆那边有一个戴着黄色羊皮高帽的哥萨克人向我走来。他有一张凶神恶煞般的脸，吓了我一跳，但看到他手里拿的是一个蓝绿色的玻璃杯，我又放心了。

“怎么，老爷，”他走到我跟前，齜着牙说道，“大概吓着你了吧？”

“是的，”我说道，“有一点。”

“压压惊吧，”哥萨克人说着将杯子递给我。



我一饮而尽。这是伏特加。我的确一下子轻松多了。

“非常感谢。真是雪中送炭。”

“怎么，”哥萨克人接过杯子问道，“你跟男爵先生是朋友？”

“哦，”我闪烁其词地说道，“认识。”

“他是个严格的人，”哥萨克人说道。“一切按规矩办。现在他们要唱歌了，过一会将回答问题。也就是他们将回答问题。而我要离队，今天就走。不回来了。”

我打量了他一眼，从近处看，他的脸并不凶恶，只不过是因风吹日晒变得粗糙了而已。另外，尽管这张脸很粗糙，但却生就一副耽于沉思乃至富于幻想的表情。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伊格纳特，”他答道。“你是叫彼得吧？”

“是的，”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伊格纳特微微一笑。

“我是从顿河地区来的。而你，看得出，是从首都来的。”

“对，”我说道，“我是彼得堡人。”

“这样吧，彼得，你先别去篝火那边。男爵先生不喜欢别人打扰他们唱歌。我们俩在这里坐一会儿，听听歌吧。你有什么不明白的，我给你解释。”

我耸了耸肩，坐到地上，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起腿。

篝火旁边的确发生了一桩怪事。戴黄色羊皮高帽的哥萨克人围坐成一个半圆，而男爵俨然一位合唱团的指挥，在他们面前站定，抬起双手。

“啊，那不是夜晚啊不是夜晚，”男人的嗓音严肃地唱了起



来，“我难以入眠啊难以入眠……”

“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说道。

“怎么可能呢，老爷，既然你从来没听过？”伊格纳特坐到我身边问道。

“怎么没听过？这是一首哥萨克老歌儿。”

“不是，”伊格纳特说道。“你弄混了。这首歌是男爵先生特意为我们写的，他要我们一边唱歌一边思考。为了方便我们记忆，他采用了你说的那首歌的歌词和曲调。”

“那么他的创作体现在哪里呢？”我问道。“我是说，如何区分以前那首歌和男爵写的这首歌，如果它们的词和曲都一样？”

“男爵先生写的歌含义完全两样。你听着，我给你解释。听见没有，他们唱的是：‘我稍微打了一个盹儿，于是就做了一个梦。’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意思是说，尽管没有睡着，但还是像做梦一样，明白吗？也就是说，睡与没睡没有区别，都是一回事。”

“明白，”我说道。“接下来呢？”

伊格纳特等他们唱完下一段。

“来了，”他说道。“听，‘我梦见我胯下的黑马，仿佛在欢腾跳跃，尽情玩耍’。这里面蕴藏着一种智慧。你是有文化的人，肯定知道印度有一本古书——《奥义书》吧。”

“知道，”我说道，马上想起不久前跟科托夫斯基的一次交谈。

“那上面说，人的智慧好比哥萨克人的马，总是把我们往前拉。只有男爵先生说，如今的情况大不一样了。没有人能



驾驭自己的马,因此不妨说,尽管马戴着嚼子,却不是骑士控制着马,而是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结果骑士也就忘了考虑他本来是要去哪儿。马去哪儿,他便去哪儿。男爵先生甚至还答应给我们带一本书来,叫《无头骑士》,这本书好像是专门写这方面的。可他总是忘记。忙得要命。就这样还是非常感谢他……”

“再往下是什么?”我打断他的话问道。

“再往下?再往下是,‘我们的大尉很机智,他能破解我的梦……你那狂暴的脑袋啊,他对我说,很快会消失得无踪无影’。对了,这里的大尉显然说的是男爵先生自己,他在我们这儿的确很机智。至于脑袋,显然也是直接借用了《奥义书》的说法。既然智慧欢腾跳跃得连自己要去哪儿都不知道了,显而易见,它也就只能消失了。这里还有一个涵义。这是不久前男爵先生才悄悄告诉我的。就是说,在这里,不得不抛弃人的整个智慧。但用不着可惜,男爵先生说,因为这无关紧要。所以歌里才说,消失的不是你本人,而只是你那狂暴的脑袋。反正它也只能这样。”

伊格纳特不再说话。他双手托着下巴,仔细听歌:

哦,来自东方的风
狠命地吹,狠命地嚎;
从我狂暴的脑袋上
卷走了黄色的棉帽。

我等了一会,但他没有继续给我解释。于是我决定率先



打破沉默。

“关于从东方吹来的风,我还能够理解,”我说道,“正所谓 *ex oriente lux*^①。但为什么要卷走帽子呢?”

“为了让人无所留恋。”

“为什么帽子是黄色的?”

“我们是黄帽宗嘛,帽子自然是黄色的。要是红帽宗,帽子就是红色的。要是黑帽宗,比如在顿河地区,帽子就是黑色的。但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脑袋都要没了,脑袋上的帽子是什么颜色还有区别吗?换一个角度来说,在自由开始的地方,任何颜色都是毫无意义的。”

“对,”我说道,“不愧是男爵先生的弟子。问题是,究竟什么东西最重要,如果狂暴的脑袋不见了,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伊格纳特沉重地叹了口气。

“关键就在这里,”他说道。“男爵先生每天晚上都在提这个问题,虽然大家都很努力,可谁也回答不上来。你知道,要是有人答上来了,会发生什么事吗?”

“我怎么会知道,”我说道。

“男爵先生会立即将他送往西藏哥萨克特别团。这是一支非常特殊的部队。可以说,它代表整个亚洲骑兵师的荣誉。尽管细想一下,这支部队其实并不适合骑兵师,因为他们骑的不是马,而是大象。”

我认为,坐在我面前的更像是一位天生的撒谎大王,不假思索就能编造出任何等级的荒唐故事,而且还能在故事里添

① 拉丁语:来自东方的光明。



加大量真实的细节,让你不得不相信,哪怕只是相信一时。

“骑在大象背上怎么使用军刀呢?”我问道。“会很很不方便的。”

“是不方便,正因如此才叫服役嘛,”伊格纳特抬眼看着我,嘲笑道。“你不相信,老爷?那就别相信好了。从前回答不出男爵先生的问题时,我也不相信。现在也用不着相信了,因为我什么都知道。”

“这么说,你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伊格纳特严肃地点了点头。

“所以我才可以四处走动,而不是蜷缩在火堆旁。”

“你对男爵说了什么?”

“我说的话对你没有用,”伊格纳特答道。“回答这个问题不能用嘴,也不能用头脑。”

我们沉默了一阵。伊格纳特若有所思。忽然他抬起了头。

“瞧,男爵先生过来了。我们也该分手了。”

我回过头,见到了男爵高挑而又瘦削的身影。伊格纳特站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

“怎么样,”男爵走到伊格纳特跟前,问道,“准备好了吗?”

“是的,”伊格纳特回答道,“准备好了。”

男爵将两个手指放在嘴里,像土匪似的打了个口哨。这时,发生了一件绝对出人意料而又不可思议的事。

在我们背后,突然长出一片低矮而狭长的灌木丛,而从灌木丛里,又突然窜出一头白色的大象。这头大象确实是从灌木丛里而冒出来的,尽管它比灌木丛高十倍。世上竟有这等



怪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并非大象刚出现时是小的,只是后来在靠近我们的过程中长大了几倍。也并非它是从与灌木丛位置相重叠的一面无形的墙后而出来的。在大象尚未走出灌木丛的时候,它的形体已经异常巨大,然而它又确实是从低矮得连一只绵羊也未必能藏下的灌木里钻出来的。

我又回到了几分钟之前的状态,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领悟到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马上就要看到隐藏在真实帷幔后面、能让周围的一切运动起来的操纵杆。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而那头白色的大象还在我面前。

它有六颗门牙,一边三颗。我以为这是我的幻觉,可又一想,如果我看到的是幻象的话,那么从本质上讲这幻象同别的东西未必有多大区别。

伊格纳特走到大象跟前,敏捷地顺着排列成梯子状的门牙爬到大象身上。他的举止给人的感觉是,在这令人向往的平坦的山地上,他一辈子都在骑这种长着六颗门牙的白象。他朝篝火转过身子,向穿着军装戴着黄帽子的战友们挥了挥手,然后又把身子转回来,用脚后跟磕了一下大象。大象向前挪了几步,接着我看到一道闪光——大象不见了。那道闪光如此耀眼,以致差不多有一分钟的光景,我什么都看不见,除了它留在我视网膜上的紫黄色印迹。

“我忘了提醒你,”荣格伦说道。“这对视力很不好。我们亚洲骑兵师每逢这种情况都要用黑布带蒙上眼睛。”

“怎么,这种事情经常有?”

“以前是的,”男爵说道。“一天好几次的时候也有过。这么频繁会晃瞎眼睛。现在的人有些退化了。怎么样,好了吗?”



视力恢复了吧？”

我已经能看清周围的事物了。

“好了，”我说道。

“想不想让我给您演示一下以前是什么样的？”

“可您准备怎么做呢？”

男爵没有回答，而是从刀鞘里抽出了马刀。

我瞥了一眼刀身，雪亮的钢刀像银幕一样映照出活动的影像。这是一个新月形的沙丘，上面站着一群军官。他们大约有十来个人，大都穿着极普通的军装，只有两三人戴着羊皮高帽，穿着肥大的哥萨克便服，胸前挂着一个子弹夹一样的东西。他们全都用黑布带蒙着眼睛，而且头都朝着一个方向。我一下子在他们中间认出了夏伯阳，尽管他的眼睛蒙着布带。他看上去非常年轻，鬓角上也没有白发。他一只手将不大的战地望远镜扣在眼布上，另一只手握着马鞭，并用马鞭敲打着皮靴。我觉得，离夏伯阳不远的那个穿哥萨克军装的人是荣格伦男爵，但我没来得及看清楚，因为刀身转了一而，站在沙丘上的人也跟着不见了。这时我看到的是无边无际一马平川的荒漠。远处的地平线上，有两个影子在蠕动。仔细一看才知道，那是两头大象的轮廓。它们是那么遥远，以致大象背上的两个骑士看上去就像两个微小的驼峰。突然，地平线上迸射出一道耀眼的光芒，等这道光芒消失的时候，只剩下了一头大象。沙丘上响起一阵掌声。接下来我又看到了同样的一幕。

“男爵，我要失明了，”我说着将目光从刀身上移开。

荣格伦把马刀收进刀鞘。



“草地上那个黄色的东西是什么？”我问道。“莫非是我眼前的斑点？”

“不，不是斑点，”男爵说道。“这是伊格纳特的帽子。”

“啊，是狂风刮掉的吧？从东方吹来的风？”

“跟你谈话实在愉快，彼得，”男爵说道，“您无所不知。想留它作纪念吗？”

我弯下腰，把帽子从地上捡起来。帽子对我正合适。有一阵我还发愁怎么处置自己的帽子，由于没有更好的主意，我只好干脆把它扔了。

“事实上我远非无所不知，”我说道。“比如，我一点也搞不明白，这么荒凉的地方你怎么能弄到大象呢？”

“亲爱的彼得，”男爵说道，“我们周围到处是大象，只是肉眼看不见罢了，请相信我。它们在俄罗斯比乌鸦还多。不过我想换个话题。瞧，您该回去了，因此，临了请允许我告诉您一件事。也许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什么事？”

“凡是能够登上存在于‘虚无’中的王位者，您知道最终会去什么地方吗？我们管这个地方叫内蒙古。”

“‘我们’是谁？”

“您姑且认为是夏伯阳和我吧，”男爵微笑着说道。“尽管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我们’也会包括您。”

“那么这个地方在哪儿呢？”

“问题就在于，这个地方哪儿都不在。无法从地理意义上说它在哪儿。之所以叫内蒙古并不是因为它在蒙古的内部。它在能看见虚空的人的体内，尽管‘体内’这个词用在这里根



本不恰当。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蒙古，只不过是人们这么说而已。要是我试图给您描述清楚这究竟是什么，那才愚蠢透顶呢。请相信我，哪怕只相信这一句话——这是一个值得您毕生去追求的地方。一生之中再无比能到达那个地方更美好的事了。

“如何才能看到‘虚空’呢？”

“首先要看到自我，”男爵说道。“请原谅我不由自主地使用了双关语。”

我思索片刻。

“我能跟您开诚布公吗？”

“当然，”荣格伦回答道。

“我觉得，我们刚才到过的地方——我是指那个燃烧着篝火的漆黑原野——够阴森恐怖的。要是您说的内蒙古跟那儿差不多，我还真未必愿意去。”

“知道吗，彼得，”荣格伦讥笑道，“要是您在‘音乐鼻烟盒’这样的酒馆里组织一次聚会，那么可以断言，您看到的東西会与周围的人相差无几。尽管这同样是个大问题。可是，我们刚刚去过的地方是独一无二的。那里其实什么都没有，无论有名的东西，还是无名的东西。一切取决于看的人。比如对我来说，周围的一切都淹没在耀眼的光芒中。而对我的战友们来说，”荣格伦朝那些戴着黄帽子、在篝火旁蠕动的身影点了点头，“周围的一切就是您所看到的東西。确切地讲，对您来说，周围的一切就是他们所看到的東西。”

“为什么？”

“您知道什么是视觉化吗？”男爵问道。“当众多的信徒开



始向某个神灵祷告时,这个神灵就真的会出现,而且是以人们设想的形象出现。”

“我知道,”我说。

“这同样适用于其余的一切。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我们在生下来就开始学习制造的集体视觉化。说实话,这也是唯一能代代相传的东西。当足够多的人能够看见这原野、花草和夏夜时,我们就有可能跟他们一起看到这一切。但无论前人给我们预设了什么样的形式,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所看到的其实都不过是自己精神的投影。如果您发现周围一片黑暗,那只能说明您自己的内心世界如同黑夜。还好,您是个不可知论者。否则您就会知道,有多少形形色色的鬼神在这黑暗中游荡啊。”

“男爵先生……”我刚要开口说话,荣格伦就打断了我。

“千万不要认为,这里有什么冒犯您的地方。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坐在黑暗中被某人的仁慈点燃的篝火旁等待救助——难道这不是人的常态吗?”

“也许您是对的,”我说道。“可这内蒙古到底是什么地方?”

“内蒙古恰好就是一个能给人救助的地方。”

“这么说,”我问道,“您到过那里?”

“是的,”男爵说道。

“为什么又回来了?”

男爵没有做声,只是朝那些蜷缩在篝火旁的沉默不语的哥萨克点点头。

“以后再告诉您,”他说道,“实际上我并没有回来,我现在



仍在那里。而您，彼得，的确该回去了。”

我环顾一下四周。

“可说实在的，该去哪儿呢？”

“我指给您看，”男爵说道。

我发现他的手上握着一把很沉的烧蓝手枪，不禁打了个寒战。男爵笑起来。

“瞧把您紧张的，彼得。您不该这么不信任别人嘛。”

他把另一只手伸进大衣口袋，掏出夏伯阳给他的小纸包。他把纸包打开，给我看一只带黑色瓶塞的特别普通的墨水瓶。

“请仔细看着它，”他说道，“目不转睛地看。”

说着他将墨水瓶抛向空中，等它上升到距离我们约有两米高的时候，他冲它开了一枪。

墨水瓶砰的一声炸得粉碎，四下飞溅的蓝墨水和玻璃碎片在空中停留了一秒钟后，落在了桌子上。

我的身体晃了一下，为了不至于突然晕倒，我用一只手扶住墙。我面前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铺着一张破损得无法补救的地图，旁边则站着目瞪口呆的科托夫斯基。而从碎裂的照明灯里淌出来的甘油正从桌面流到地上。

“怎么样，”夏伯阳摆弄着冒着烟的毛瑟枪，说道，“明白什么是智慧了吧，格里沙？”

科托夫斯基用手捂住脸，转身跑了出去。他显然是受到了特别强烈的刺激。不过也可以这样说我。

夏伯阳转过身来仔细端详我一阵。突然他皱起眉头说：

“张开嘴巴！”

我听从了他的命令。



“瞧瞧，”夏伯阳说道。“一眨眼的工夫就喝多了。为什么帽子是黄色的？为什么帽子是黄色的，啊？怎么，狗杂种，想上军事法庭吗？”

“我只喝了一杯……”

“闭嘴！我跟你说，闭嘴！纺织工人团马上就来了，需要安排，而你却醉成这个样子！想让我在富尔曼诺夫面前出丑吗？快去睡觉！要是再被我发现一次，立即送军事法庭！想领教我的军事法庭什么样吗？”

夏伯阳举起自己那支镀镍的毛瑟枪。

“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说道，“我不想领教。”

“去睡觉！”夏伯阳重复道。“到自己的床位上去，路上别让任何人闻出你的酒气。”

我转身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我又转了回来。夏伯阳正站在桌子旁怒气冲冲地望着我。

“我只有一个问题，”我说道。

“什么问题？”

“我想说……我早就知道，就时间而言，唯一真实的瞬间就是‘现在’。但我不明白，怎么能将如此密集的一连串感受都纳入到这一瞬间呢？这是否意味着，只要严格地置身于此刻当中，既不滑向过去，也不滑向未来，就可以将此刻拉长到相当的程度，从而使我刚才经历的这类现象成为可能呢？”

“你准备将此刻拉向哪儿？”

“我表达得不对。这是否意味着，作为过去与未来的分界线，此刻就是通向永恒的大门？”

夏伯阳晃了晃枪管，我只好不再做声。他疑惑地打量我



一阵。

“此刻，彼得卡，就是永恒，而不是什么大门，”他说道，“因此，怎么能说此刻是发生在某个时候呢？你何时才能苏醒啊……”

“我永远不会苏醒，”我回答道。

夏伯阳的眼睛瞪得溜圆。

“你瞧，彼得卡，”他惊讶地说道，“莫非你真的领悟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我开始琢磨做点什么，好让自己平静下来。我想起夏伯阳曾建议我把自己的噩梦记录下来，于是我考虑了一下不久前做的那个有关日本的梦。里面有许多莫名其妙、含混不清的地方，但我还是记得几乎所有的细节。这个梦是在一辆奇怪的地下火车报下一个站名时开始的。这个站名我不仅记得，甚至还知道它的来历：毫无疑问，这是我的意识遵循复杂的梦境规则，在我醒来之前的一瞬间用一个士兵在我窗下喊出来的一匹马的名字创造出来的。他的叫喊同时反映在两面镜子上，除了变成一个站名外，还变成了一个足球队的名字，我的梦就是在关于这支足球队的谈话中结束的。这说明，让我感到极其拖沓冗长的梦，实际上只持续了不足一秒钟，但在今天跟荣格伦男爵见过面和与夏伯阳谈过话以后，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到惊奇的了。我坐到桌子旁，拿出一沓纸，将笔尖插进墨水瓶里蘸了一下，在一页纸的上方写下一行大字：“关门，请当心！下一站‘迪纳莫’！”

我写了很久，有好几个小时，可记下的东西还是不足我记忆中的一半。我文思如泉涌，笔锋所至，种种细节跃然纸上。



这些细节带有如此浓厚的颓废派色彩,以致到末了我自己都糊涂了,我的确是在记述自己的梦呢,还是在即兴借题发挥。我想抽烟;我拿起桌子上的烟卷,下楼来到院子里。

下面忙得热火朝天;部分已经抵达的士兵排成一行纵队;空气中散发着一股难闻的焦油味和马汗味。我发现纵队后面有一支小型军乐队——几只压扁的小号和一面挂在一个高个小伙子皮带上的大鼓。这个小伙子很像年轻时的彼得大帝。不知为什么,看到这支乐队,一种莫名的惆怅油然而生。

指挥这个队伍的正是我在窗口看到过的脸上有刀疤的人。我的眼前浮现出覆盖着积雪的站前广场,铺着大红布的演讲台,用黄色的长筒手套在空中砍来砍去的夏伯阳,还有这个站在护栏旁,一边听着夏伯阳对那些浑身是雪的士兵毫无意义的喊话,一边会意地频频点头的人。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富尔曼诺夫。他朝我这边转过脸,趁他还没有来得及认出我,我赶紧钻进庄园的门里。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我仰面躺在床上,痴痴地盯着天花板。我想起了那个坐在彼岸世界的篝火旁、剃着光头、留着大胡子的胖子,我还想起了他的姓——沃洛金。我的记忆深处浮现出那间贴着瓷砖、浴盆固定在地上的大屋子,还有这个赤条条、湿漉漉地靠着浴盆坐在地上的沃洛金。我觉得,我马上还会想起什么,可就在这时,院子里传来嘹亮的小号声,沉闷的军鼓声,以及纺织工人雄壮的大合唱,这大合唱让我想起很久以前我在铁路上度过的那个夜晚。

白卫军,黑男爵



重新为我们准备皇位。
但从泰加林到不列颠诸海
还是红军最勇猛无畏!!!

“一群白痴，”我自言自语着脸朝墙壁翻过身去，对这个世界无可奈何的痛恨的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我的上帝，这是怎样的白痴啊……甚至不是白痴，而是白痴的影子……迷雾中的影子……”



8

“可为什么，说实话，您觉得他们像影子呢？”铁木尔·铁木罗维奇问道。

沃洛金紧张地挣扎了一下，但皮带将他的手脚紧紧固定在颈箍上，使他无法动弹。他的额头上闪着豆大的汗珠。

“我不知道，”他说道，“您问的是我当时在想什么。我想的是，要是有个旁观者就好了，他大概能证明，我们都是不真实的，我们不过是一些游弋的影子和火光的反照。我说了，那里有一堆篝火。不过，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这取决于这个旁观者怎么看……”

林中空地上的篝火刚刚烧起来，火光还不足以驱散四周的昏暗和照亮周围的人。他们看上去简直就像火堆旁的木块和土团投射到一个隐形屏幕上的模糊不清的影子。或许，从某种至高意义上来说，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然而，由于最后一位当地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早在第二十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前很久就已经不再为自己拥有身体而感到羞耻了，故方圆一百公里以内恐怕也就没有人会得出如此结论。



因此最好说得简单些——在篝火周围的半明半暗中坐着的是三个额头。而且，看上去，假如我们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能够活到高瞻远瞩的二十大并从森林里走出来，与这几位外地人围着篝火谈论一番新柏拉图主义，他很可能会在“新柏拉图主义”一词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之后大病一场。这可以从许多迹象看出来。

最重要的一个迹象便是停在篝火不远处的一辆昂贵的日产水陆两用吉普车“珍珠港”。另一个迹象是装在吉普车车头上一台大卷扬机，这玩意儿在日常生活中根本用不着，但在匪徒的汽车上却很常见。（研究新俄罗斯人的人类学家们认为，这种装置可以在拆房平地时派上用场，而一些学者则在它的普及中看到了人们盼望已久的民族精神的复兴，在他们看来，卷扬机的神秘功能跟斯拉夫古代船头上的装饰图案有异曲同工之处。）总之很清楚，开吉普车来的这几人不可小觑，在他们面前最好别多嘴多舌，免得惹麻烦。他们正小声地交谈着。

“每次吃几粒，啊，沃洛金？”其中一个问道。

“因人而异，”沃洛金打开膝盖上的纸包，答道。“比如我，已经每次都吃一百粒了。建议你开始时吃三十粒。”

“够吗？”

“够了，舒里克，”沃洛金说着将纸包里一小堆又干又脆的黑色宝物分成大小不等的三份。“你会跑遍整个林子，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而你，科利扬，也这样。”

“我？”坐在篝火旁的第三个人用男低音问道。“我这是要逃避谁呢？”

“逃避自己，科利扬，正是你自己，”沃洛金答道。



“在生活中我没逃避过任何人，”科利扬说着伸出玩具翻斗车车厢般的手，接过自己的一份。“你说话要注意。我干吗要逃避自己？这怎么可能呢？”

“这只能举例说明，”沃洛金说道。

“那就请举例吧。”

沃洛金稍作思索。

“比如说，有一个恶棍闯进我们的办事处，伸开扇子一样的巴掌，说要好处大家分，你怎么办？”

“干掉这个家伙，”科利扬说道。

“你胡说什么？就在办事处下手？”舒里克问道。

“我才不在乎呢。大家看我的手势行事。”

舒里克拍了拍科利扬的肩膀，然后转向沃洛金，用缓和的口气说道：

“当然不是在办事处。我们约个地点。”

“好吧，”沃洛金说道。“那就约个地点。可接下来呢？让科利扬说。”

“说就说，”科利扬回应道。“接下来我们赶到。等这个家伙靠近，我说：‘老弟，哪条道儿上的呀？’他开始解释，我会等一会儿，还不时地点点头，突然我扣动扳机……然后再干掉剩下的人。”

他瞥一眼手心里那撮黑色的颗粒，问道：

“怎么，就这么吞下去？”

“先嚼一嚼，”沃洛金说道。

科利扬将手里的东西塞到嘴里。

“一股蘑菇汤味儿，”他说道。



“吞下去，”舒里克说道。“我的已经吃完了，很正常。”

“就是说，你开了枪，”沃洛金若有所思地说道。“如果他们先用家伙对准你们呢？”

科利扬思索片刻，动了动嘴巴，吞下东西，然后自信地说道：

“不会的，不会有这种情况。”

“好吧，”沃洛金说道，“那你怎么朝他开枪呢，是趁他还在车里的时候直接从远处把他干掉，还是等他下了车以后再动手？”

“等他下车，”科利扬说道，“只有傻瓜才会不等他下车就动手。会把汽车打坏的，还会溅得到处是血。干嘛要损坏东西呢。最佳方案是等他靠近我们的车。”

“好吧，就按最佳方案办。你想象一下，他从自己的车上下来，走近你的车，你刚要开枪，忽然……”

沃洛金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

“忽然，你一瞧，这不是他，而是你自己。而你却必须开枪。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不会发疯？”

“会发疯。”

“你在发疯的时候拔腿就跑不丢分吗？”

“不丢分。”

“既然不丢分，你就会跑，对吧？”

“当然，既然不丢分。”

“这不正好说明，你是在逃避自己。明白吗？”

“不，”科利扬顿了一下，说道，“不明白。如果这不是他，而是我，那么我在哪儿呢？”



“你就是他。”

“那他呢？”

“他就是你。”

“我怎么也搞不明白，”科利扬说道。

“你看，”沃洛金说道。“你能想象周围什么也没有，只有你自己吗？”

“能，”科利扬说道。“我遇到过两次这样的事，是因为吸鸦片，也可能是大麻，我不记得了。”

“如果周围只有你一个人，你还会向他开枪吗？再怎么也会给自己身上打出一个洞来。疯了吧？疯了。于是，为了避免开枪，你撒腿便跑。现在想想，按道理该得出什么结论？结论是，你会逃避自己。”

科利扬思索了好久。

“让舒里克开枪，”他终于说道。

“可他打中的是你，要知道只有你一个人在场。”

“为什么，”舒里克插话道。“我又没疯。该朝谁开枪我就朝谁开枪。”

这回是沃洛金思索了好久。

“不对，”他说道，“这样解释不成。这个例子不成功。小蘑菇快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谈。”

接下来的几分钟是在寂静中度过的；坐在篝火旁边的人们打开几瓶罐头，切开香肠，喝起伏特加。这一切做得闷声不响，似乎有了那种难以名状的、能将在场的人联合起来的東西，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不恰当的。

喝完了酒，他们开始闷声不响地吸烟。



“我们干吗要谈这些？”舒里克突然问道。“我指的是开枪和发疯之类的。”

“可沃洛金说，等小蘑菇来了，我们就会在林子里东奔西跑，逃避自己。”

“啊，明白了。听着，为什么要说‘来’呢？它们从哪里来？”

“你这是问我吗？”沃洛金问。

“问你也行，”舒里克回答。

“要我说，是从身体里面来，”沃洛金答道。

“这么说，它们一直在那儿呆着？”

“好像是的。也可以这么说。不光它们，顺便说一句。世界上的所有快感都在我们的体内。当你吞吃或是注射什么时，你释放的不过是所有快感的一部分。麻醉品里并不含有快感，这不过是一些粉末儿或小蘑菇……好比保险箱的钥匙。明白吗？”

“有劲儿，”舒里克神情专注地说道。不知为什么，他的脑袋顺时针摇起来。

“的确有劲儿，”科利扬确认道。谈话随即中断了几分钟。

“听着，”舒里克又挑起话头，“身体里面这样的快感多吗？”

“多得无穷无尽，”沃洛金很权威地说道。“无穷无尽，难以想象，甚至还有那种你在这里永远体验不到的快感。”

“操……就是说，体内类似保险箱，而这个保险箱里装的是快感？”

“粗略地说，是这样。”

“可不可以把这个保险箱拿走，让人体验一下飘飘欲仙的



感觉？”

“可以。”

“怎么拿？”

“这要付出你的一生。知道人们为何要出家在修道院里过一辈子吗？你以为他们是为了在那儿烧香磕头？他们在那儿腾云驾雾。那才叫名副其实的飘飘欲仙呢。在这儿就是花一千美元给自己扎一针，也无法跟那儿相比。而且始终这么舒服，明白吗？早晨，白天，晚上。有些人甚至睡觉的时候也这样。”

“是什么东西让他们飘飘欲仙的？这东西叫什么？”科利扬问道。

“叫法不一。笼统地说，这叫慈悲，或者是爱。”

“谁的爱？”

“就是爱。一旦你感受到它，你就顾不上去问是谁的，为什么了。你什么都不会去问的。”

“你感受过爱吗？”

“是的，”沃洛金说道，“感受过。”

“那它是怎样的？像什么？”

“不好说。”

“哪怕大致说说也行啊。像鸦片吗？”

“瞧你说的，”沃洛金皱起眉头说道。“鸦片跟它比起来简直就是臭狗屎。”

“那是什么呢，像海洛因？或者拍飞丁^①？”

① 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



“当然不是，舒里克。不是，不要比了。假设你服了拍飞丁，飘飘欲仙了——一整天都是这样。你肯定会想要个娘们儿，且满脑子都是这个念头，对吧？”

舒里克嘿嘿一笑。

“你会折腾一夜。临了难免会想，我干嘛要这个呢？”

“有这种时候，”舒里克说道。

“看人家那儿多好——一劳永逸。什么娘们儿都不需要，什么吃的都不用买。既没有脱瘾，也没有禁断。只需祷告，为了腾云驾雾，飘飘欲仙。明白吗？”

“比鸦片劲儿还大？”

“大多了。”

沃洛金弯下腰，动了动火堆里的树枝。火苗立刻蹿了上来，而且蹿得很高，像是往火里倒了汽油似的。火焰有些奇特，迸出的火星五颜六色，异常绚丽，还有映照在周围的人脸上的光，也是异常绚丽，柔和而又深邃。

围坐在篝火旁边的人现在可以看清楚了。沃洛金四十岁左右，胖墩墩的，剃着光头，留着整齐的胡须，总的来说颇像一个有教养的巴斯马奇分子^①。舒里克是一个清瘦的小伙子，淡黄色的头发，活泼好动，不断地做着各种毫无意义的小动作。他看上去没什么力气，但他经常发作的神经痉挛着实可怕，能把轮到挨着他的科利扬吓得活像一只小狼崽。总之，如果把舒里克比作彼得堡土匪的典型，那么科利扬就是典型的

^① 指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中亚一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他们曾掀起巴斯马奇运动，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离间中亚和苏维埃俄罗斯。



莫斯科恶棍，他的出现恰好应验了世纪初未来派的预言。他整个就像是由一些简单的几何体——球体、立方体和锥体交叉构成的，而他那小小的流线型脑袋则令人想起一块石头，根据福音书作者的说法，这是一块被建筑师丢弃的石头，然而有意思的是，它却居然成了俄罗斯国家新大厦的基石。

“瞧，”沃洛金说道，“小蘑菇起作用了。”

“可不，”科利扬确认道。“我简直全身都变蓝了。”

“是的，”舒里克说道。“劲儿是不小。听着，沃洛金，你是认真的吗？”

“你指什么？”

“就是那件事——可以一直舒服，一辈子飘飘然。”

“我没说一辈子，我指的是别的意思。”

“是你亲口说的，可以一直舒服。”

“这话我也没说过。”

“科尔^①，是他说的吧？”

“我不记得了，”科利扬嘟哝道，他似乎脱离了话题，在忙别的事。

“那你说了什么？”舒里克问道。

“我没说‘一直’，”沃洛金说道。“我说的是‘永久’，注意你的措词。”

“有什么区别？”

“区别是，在快感开始的地方，不存在所谓的时间。”

“那存在什么？”

① 科利扬的昵称。



“慈悲。”

“还有什么？”

“没有了。”

“不太明白，”舒里克说道。“如此说来，这慈悲是悬在虚空中喽？”

“虚空也不存在。”

“那到底存在什么呢？”

“我不是说了嘛，慈悲。”

“我又不明白了。”

“你别难过，”沃洛金说道。“要是这么容易就弄明白了，还不得半个莫斯科都飘起来，而且不用花一分钱。你想想看，一克可卡因本来不下二百，可突然间变成了白给。”

“是二百五，”舒里克说道。“不对，有点不对头。就是再难明白，人们横竖也会知道并去享用的。他们可是琢磨出了用索氯丹^①做拍飞丁啊。”

“开开窍吧，舒里克，”沃洛金说道。“假设你在贩卖可卡因。一克卖二百五十块美金，每卖一克你可以赚十块。假设你一个月卖了五百克。能赚多少？”

“五千美金，”舒里克说道。

“现在假设一个贱货使你没卖上五百克，而只是卖了五克。我们能赚多少？”

舒里克动了动嘴唇，咕哝出一些数字。

“赚个鸟，”他答道。

^① 一种止咳药，有麻醉感。



“就是嘛。跟婊子去趟‘麦当劳’还可以，可自己吸就不够了。那么你会如何处置这个害你不浅的贱货呢？”

“干掉她，”舒里克说道。“明摆着的。”

“现在明白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吧？”

“你的意思是，那些制造毒品的人在盯着？”

“问题不在毒品，”沃洛金说道。“这里的钞票脏得很。要知道，一旦你得到了极乐，你就不需要小汽车了，什么汽油呀，广告呀，淫秽书刊呀，新闻呀，统统都用不着了。别人也是这样。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一切都会完鸡巴蛋，”舒里克说着环顾一下四周。“整个文化与文明都会完鸡巴蛋。明摆着的。”

“正因如此才没人知道极乐。”

“是谁在操纵这一切呢？”舒里克稍加思索，问道。

“是自动的。市场。”

“千万别跟我谈什么市场，”舒里克皱起眉头说道。“我们知道。自动的。需要自动就自动，需要单干就单干。还要拎着机枪，打开保险栓。有人掌握着所有的牌，如此而已。也许，终有一天我们会知道这是谁的，四十年后吧，不会更早。”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的，”科利扬闭着眼睛说道。“你怎么了？好好琢磨琢磨。当一个人有了一百万美金的时候，他根本不会张扬，只要有人敢对他说三道四，立刻就会被干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能量大着呢！可我们呢，除了把某个笨蛋痛打一顿或者放火烧掉人家的办事处，再没别的本事了。不过是丛林的护理员。而那些大人物，只要还没给除掉，他们能发动坦克。要是这还不够，就开飞机。哪怕是原子弹他们都敢放。”



瞧，杜达耶夫刚松口气，不就惹上了麻烦？要不是最后关头他们失手的话，他谁也甭想摆平。或者回想一下白宫。难道我们敢得罪‘石化公司’？”

“你的脑子里怎么尽是白宫，”舒里克说道。“醒了。我们不要谈政治了。我们的话题是极乐……听着……确实……电视上说，哈斯布拉托夫一直心事重重。莫不是他跟鲁茨科依对极乐已经有所领悟？他们要攻占电视塔，通过电视告诉所有的人，可贩毒集团不让……不，这简直是发疯。”

舒里克双手抱头不再吭声了。

周围的树林抖动着性质不明的、均匀而又绚丽的火光，而林中空地上方的天空则闪烁着点点繁星，犹如精美绝伦的马赛克镶嵌画，与人们在繁重的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东西全然不同。周围的世界变了，变得更有活力和理性，它似乎终于明白为什么地上会长草，为什么空中会刮风，为什么天上有星星。然而变的不只是世界，还有坐在篝火旁的人。

科利扬闭上眼睛，似乎缩成了一团。平常总是神色抑郁的小方脸，现在已经没了表情，好像一块不新鲜的肥肉。刻板的褐色小平头也有了压痕，犹如一顶怪诞不经的帽子上的皮滚边。那件钉着双排扣的粉红色上衣，在跳跃的火光中仿佛古代鞑靼人的军服，而金色的纽扣则像古墓里出土的金属牌。

舒里克愈发清瘦、好动和可怕了。他就像一个用破木板钉起来的空架子，上面挂着晾了好几年还没取下的破衣烂衫，而生命竟然就在这破衣烂衫下面不可思议地萌动了，并且如此有力地确定了自己的地位，以至周围的许多东西都不得不挤在一起。总之他不像个活物，他穿的那件开司米短上衣使



他更像一个电动的水兵稻草人。

沃洛金没有什么大变化。似乎有一把看不见的刀砍掉了他所有的棱角和外形上不平整的地方，只留下了柔和而平滑的、难分彼此的线条。他的脸变得有些苍白，眼镜片里反射出的火星要比火堆里迸出来的略多一些。他的动作也变得流畅、平稳和准确了。总之，从许多特征可以看出，此人远非第一次吃蘑菇。

“嚯，劲儿大，”舒里克打破沉默道，“劲儿大！科尔，你怎么样？”

“我倒没什么，”科利扬仍旧闭着双眼，说道。“就是眼里有火星。”

舒里克朝沃洛金转过身子。等乙醚引起的剧烈摇晃停止以后，他说道：

“听我说，沃洛金，你知道如何才能得到这极乐，对吧？”

沃洛金默不做声。

“别这样，我全明白，”舒里克说道。“我明白为什么没人知道，为什么不准谈论这件事。但你总该告诉我吧，啊？我可不是笨蛋，我会在别墅悄悄享用的。绝不惹是生非。”

“你得了吧，”沃洛金说道。

“不，怎么，你不相信我？你担心出问题？”

“不是，”沃洛金说道，“我不担心，只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快说吧，”舒里克说道，“别让人不痛快。”

沃洛金摘下眼镜，用衣角仔细擦了擦又戴上。

“最重要的是，你得明白，”他说道，“真不知道该怎么解



释……还记得我们谈论过内心的检察官吗？”

“记得。他能抓走无法无天的人。比如拉斯柯尔尼科夫，他杀死了老太婆，却以为自己内心的律师能为自己辩护，可没成功。”

“对。那么你认为这个内心的检察官是谁呢？”

舒里克陷入了沉思。

“不知道……大概，是我自己，是我身体里的某一部分。还能有谁呢。”

“而那个为你辩护的内心的律师呢？”

“大概，也是我自己。不过结论有些奇怪，我自己给自己惹了麻烦又要自己为自己辩护。”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常有的事。现在来想象一下，你内心的检察官把你逮捕了，而你所有内心的律师全都胡说八道，于是你进了自己内心的局子。现在再来想象一下，这时还有第四个人，没谁会把他往任何地方拖，他既不是检察官，不是被告，也不是律师。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永远都不能绕开他——属于既不是刑事犯，不是劳改犯，也不是警察那类。”

“想象好了。”

“这第四个人也就是沉浸在极乐中的人。而且用不着跟他解释什么极乐，明白吗？”

“可这第四个人是谁呢？”

“谁也不是。”

“能见到他吗？”

“不行。”

“看不见也罢，哪怕感觉一下呢？”



“也不行。”

“这么说，他实际上不存在？”

“实际上，如果你想知道，”沃洛金说道，“这些检察官和律师并不存在，就连你，从实质上来说也不存在。要是真有什么人存在的话，那就是他。”

“听不懂你的话，你最好解释一下，怎么做才能进入极乐？”

“什么都不需要，”沃洛金说道。“问题就出在什么都不需要做。你一开始做什么的时候，麻烦马上就来了，对吧？不是吗？”

“按道理似乎是这样。”

“这就是了。麻烦一来，检察官、律师这些人也就跟着来了。”

舒里克不做声了，也不动了。他那旺盛的精力一下子转向了科利扬，这时的科利扬好像突然醒了，他睁开眼睛，专注且不友好地看了看沃洛金，然后咧嘴笑了，露出一颗金牙来。

“你呀，沃洛金，没必要把这个内心的检察官搞得那么复杂，”他说道。

“这是为什么？”沃洛金惊讶地问道。

“听我说。沃夫奇克·马洛伊后来给了我一本书，里面说的就是这个，说的还真不赖。尼采写的。狗杂种，写得文绉绉的，让正常人看不懂，但又中规中矩，合情合理。沃夫奇克特意雇了一个吃不饱饭的教授，还派了一个自认为懂尼采的小男孩帮他，两个人合力在一个月之内拿下了这本书。翻译成了正常的语言，弟兄们都能读得懂。长话短说，把你内心的这



个警察干掉,完事大吉。那时就没人来抓你了。明白吗?”

“你说什么呀,科利扬?”沃洛金亲切甚至有些怜悯地问道。“想过你在说什么吗?知道杀警察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吗?”

科利扬哈哈大笑起来。

“让谁付出代价?其他内心的警察?所以才说要将所有内心的警察都干掉嘛。”

“好吧,”沃洛金说道,“就算你将所有内心的警察都干掉了,到时候还会有内心的特警队来收拾你。”

“我早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了,”科利扬说道。“过会儿该是你的内心的国家安全局,再过一会儿该是内心的阿尔法特别行动小组了,等等。可我还是要对你说,该把他们全都干掉,然后自己做自己内心的总统。”

“好吧,”沃洛金说道。“就算你成了自己内心的总统。要是你的内心产生了怀疑,你怎么办?”

“没什么,”科利扬说道,“镇压,然后前进。”

“就是说,为了镇压怀疑,你还是需要内心的警察的?可要是怀疑很强大,不就需要内心的国家安全局了吗?”

“现在他们是为我效命,”科利扬说道。“我可是自己的总统。我是庄家。”

“是啊,沃夫奇克·马洛伊把你历练得不错。那好吧,假设你成了自己内心的总统,有自己内心的警察,甚至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内心安全局,局里有形形色色的西藏星相学家。”

“不错,”科利扬说道。“就是要这样,不能让任何人接近我。”



“那么你干什么呢？”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科利扬说道。

“比方说呢？”

“比方说，找个娘们儿，去加那利群岛。”

“到那里干什么？”

“我不是说过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洗澡就去洗澡，想操娘们儿就操娘们儿，想吸毒就吸毒。”

“对，”沃洛金说道，他的眼镜片里闪烁着红色的火舌，“吸毒。吸了毒你的头脑还管用吗？”

“管用。”

“可如果你是总统，你的思想也应该是国家的吧？”

“是的。”

“那么我告诉你，接下来会怎样。只要你第一次吸了毒，你的国家的思想就会觉醒，你内心的总统就会遭到内心的弹劾。”

“那就冲进去，”科利扬说道，“发动内心的坦克冲进去。”

“你怎么发动它？要知道是谁的思想觉醒了？是你。就是说，是你自己要弹劾这个内心的总统。到时候谁去发动坦克？”

科利扬默不做声了。

“很快将有新的总统，”沃洛金说道。“到那时，为了巴结新总统，还不知道内心的国家安全局会怎样对待旧总统呢，想起来真是可怕。”

科利扬陷入了沉思。

“那又怎么样，”他不相信地说道。“新总统就新总统。”



“可你自己就是那个前任，对吧？如此说来，在内心的卢比扬卡，被高压水龙头冲洗肾脏的是谁呢？怎么不说话了？是你。现在想想哪样更好，是让内心的警察把你当作老太婆带走好呢，还是把你作为前任内心的总统送往内心的国家安全局好？”

科利扬眉头紧皱，伸出张开成扇状的五指，似乎要说点什么，然而看得出，他的脑子里出人意料地产生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想法，因为他突然脸色阴沉地垂下头来。

“唉，对……”他说。“还是少管闲事为好，太复杂了……”

“瞧，内心的警察把你绑了吧，”沃洛金确认道。“而你却在说什么尼采，尼采……你知道你的尼采怎么了么？”

科利扬清了清嗓子，将一小口痰吐进篝火里。

“你这个混蛋，沃洛金，”他说道。“又来了，狗杂种，什么都给你搞得一团漆黑。不久前我看了个录像片，《黑色追杀令》，是讲美国朋友的。看完后我轻松极了！好像明白了以后该怎么活。可跟你就不一样了，不管怎么谈，都是死路一条……我跟你说，我永远也不会碰上你的内心的警察。万一碰上了，我要么干掉他，要么装精神病。”

“可何必要干掉这些内心的警察呢？”舒里克插嘴道。“何必多此一举，如果可以收买他们？”

“怎么，内心的警察也受贿？”科利扬问道。

“当然受贿，”舒里克说道。“你看过第三集《教父》吗？你还记得那个科莱恩先生吗？他为了将内心的警察拉下水，往梵蒂冈汇了六亿美金，于是这个有污点的人得到了内心的假释。”



他把身子转向沃洛金。

“怎么，你大概要说内心的警察不受贿吧？”

“受不受贿有什么区别。”

“对，”舒里克说道，“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是科利扬先开的头。现在让我们回忆一下，我跟你说的是极乐。对。说的是你跟内心的检察官和律师摊牌的时候，还有第四个人因极乐而飘飘欲仙。”

“正是。问题不在你怎么对待这些内心的警察——把他们拖下水，收买他们，还是自首。要知道，不管是警察，还是那个给他行贿的人或者是认罪的人，他们实际上都不存在。要知道，这都是你挨个冒充的。这一点你好像是明白的。”

“其实不太明白。”

“回忆一下吧，在实行民主以前，你跟科利扬在国家百货商场门口是怎么干的。每当他要将外汇出手的时候，你就带着警察的工作证凑过去，把他和顾客一起抓走。还记得吗？你可是说过的，要是你自己都不相信你是警察，顾客也就不会相信你，也就不会跟你走了。这么说，你当时觉得自己是警察喽？”

“对，不错。”

“也许你真的成了警察？”

“沃洛金，”舒里克说道，“我拿你当朋友，但我真心请求你，说话注意点。”

“我会为我说的话负责的，你听我往下说。你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吗？你自己可以暂且相信你是警察。可现在设想一下，你一辈子都在这么做，只不过你欺骗的不是顾客，而是你



自己,而且要一直相信自己的欺骗。忽而是警察,忽而是被他抓走的人。忽而是检察官,忽而是律师。知道我为什么说他们实际上都不存在吗?因为,当你是检察官的时候,律师在哪儿呢?而当你是律师的时候,检察官又在哪儿呢?他们哪儿都不在。所以结论不言自明,你是相当于梦见了他们。明白了吗?”

“就算明白了吧。”

“除了做警察,你还有好多的丽包师、公子哥儿和狗杂种等着轮流做呢,可还没等你把这些人全都做遍,你这辈子也就过去了。你内心里排起的这条长队,就连共产党掌权时买香肠排的队都比不了。你真要想弄明白什么是极乐的话,就应该将这个长队抹掉,明白吗?什么人也不做,就这样。既不做检察官,也不做律师。”

“用什么方式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不是说了嘛,什么方式都不用。当你以某种方式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始终要么是检察官,要么是律师。而这里不需要以任何方式做任何事情,明白吗?”

舒里克思索了一会儿。

“去他的吧,”他终于开口说道。“我宁可吸五克可卡因,也比疯掉强。说不准我还享受不了这个极乐呢,大麻就对我没用嘛。”

“之所以谁都不知道极乐的奥秘,”沃洛金说。“原因就在这里。”

又是沉默,这次持续了很长时间。沃洛金开始折干树枝并将折断的树枝扔到火堆里。舒里克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扁平



的、刻有自由女神浮雕的军用水壶，对着壶嘴喝了几大口之后递给科利扬。科利扬喝了几口之后还给舒里克。过了一会，科利扬开始向炭火中吐口水。

火堆里的树枝静静地燃烧着，火苗忽而细长，忽而短粗，似乎这篝火就是一个小小的宇宙，一些抽搐成一团的微小物质——它们依稀可见的影子在火舌中间忽隐忽现——为在科利扬的口水旁边争得一席之地以便哪怕是暂时摆脱那难忍的灼热而斗得不可开交。这些物质的命运是悲惨的，就算有谁意识到了它们幽灵般的存在，难道他能向它们解释清楚，它们本来不是生活在这个火堆里，而是生活在充满夜的清凉的森林中，只要停止靠拢在炭火中蒸发的匪徒的口水，它们所有的痛苦就会得到永久的解脱？大概有人能。说不准，从前住在附近的那位新柏拉图主义者就能做到，但不幸的是，他死了，这个可怜的人，到底还是没能活到二十岁。

“其实，”沃洛金忧郁地说道，“这个世界就好像一座起火的房子。”

“什么起火的房子，”舒里克有所准备地回应道。“是发大水时闹市失火。”

“那可怎么办？总得活着吧，”科利扬说道。“请问，沃洛金，你相信世界末日吗？”

“这纯粹是个人的事，”沃洛金说道。“比如一个车臣人向你开一枪，你的世界末日就到了。”

“又是谁向谁开枪，”科利扬说道。“你是怎么想的，所有的东正教徒真的会获得大赦吗？”

“什么时候？”



“末日审判的时候，”科利扬小声而又匆促地说道。

“怎么，你竟然相信这些胡说八道？”舒里克用怀疑的口吻问道。

“我连我相不相信都不清楚，”科利扬说道。“有一次我杀完人往回走，突然感到胸口堵得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是怀疑，长话短说，就是精神脆弱。路上碰到一个卖圣像和各种小册子的售货亭。我就随便买了一本，书名叫《阴间生活》。我读了读人死后是什么样的。说实话，内容全是熟悉的。我马上就认出来了。什么拘留啦，审判啦，赦免啦，刑期啦，法律条文啦，诸如此类。死亡就好比是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灵魂被遣送到天上的转押站，叫颠沛流离。一切都照规矩办，两个押送员，就是这样，下面是囚室，上面还凑合。在这个转押站里，你将受到诬告——被自己人，还有别人诬告，而你可以根据法律条文为自己辩护。最重要的是熟悉法典。但是，只要教父愿意，他随时可以把你关进囚室。因为他的法典要求你一出生就得学会其中一半的条文。比如说，那里有这样一条规定：你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不止为你不该说的话，还要为你在生活中说过的任何一句话负责。明白吗？不管你如何谨小慎微，要想把你关进囚室，他们总找得到理由。只要有灵魂，你就难免颠沛流离。不过教父可以给你减刑，特别是他听到你管自己叫最后一堆狗屎的时候。他喜欢听这个。还喜欢别人怕他。既怕他又觉得自己是臭狗屎。而他全身闪闪发光，长着两只扇子般的翅膀，带着保镖，就这样。他居高临下那么一看，怎么样，是臭狗屎吧？都明白了吗？我读着读着，不由得想起很久以前，还是在我练习举重和改革正在进行的



时候,《星火杂志》上刊登过类似的东西。我想起来了,可刚一想起来,就浑身直冒虚汗。也就是说,生活在斯大林时代的人,跟现在死了的人没什么两样!”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舒里克说道。

“你看,在斯大林时代死后是无神论,可现如今宗教又回来了。而按照宗教的说法,人死后完全跟活在斯大林时代一样。你掂量掂量,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人人都知道,每当夜幕降临,克林姆林宫里的一扇小窗户便亮起了灯光,而窗内就是他。他像慈父一般爱你,你也似乎应该全心全意地爱他,尽管你对他怕得要命。跟信仰宗教一样。我之所以会想起斯大林,是因为我在琢磨,怎么可能对一个人既怕得要命又爱得全心全意呢?”

“可如果你不怕他呢?”舒里克问道。

“这就等于说,你对上帝没有恐惧感。单凭这一条,就该把你关起来。”

“囚室是什么样的?”

“里面稍微介绍了一些。最主要的一点,那里黑咕隆咚的,还不断传出咯吱咯吱的咬牙切齿声。看完这一段以后,足足有半个小时,我都在琢磨鬼魂的牙齿是什么样的。我差点发疯。接着我继续往下看。我明白了,只要你在适当的时候说自己是一堆臭狗屎,甚至不用说,只要真心认为你永远是一堆十足的臭狗屎,大赦就会降临在你头上——允许你进入天堂,到他那里去。他们最重要的快感,根据我的理解,是始终凝望着教父,就像他在台上接受检阅似的。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需要,因为在那里,要么是这样,要么是在禁闭室的马



桶边上咬牙切齿,没别的。要命的是,狗杂种,要命的是这里也不可能有别的出路,要么到上面去睡床板,要么到下面去关禁闭。长话短说,全都要按规矩来。只是我不明白,是谁想出来的这么狠的招儿?沃洛金,你认为呢?”

“你记得格洛布斯吗?”沃洛金问道。

“成了银行家的那位?记得,”科利扬答道。

“我也记得,”舒里克说着举起带雕像的军用水壶,喝了几口能让人放松下来的液体。“临死前发起来了。开着‘保时捷’,身上挂的链子每根值五千美金。上电视了,是个什么赞助商,挺鸡巴风光的。”

“是的,”沃洛金说道,“知道他是怎么到巴黎搞贷款的吗?知道他都干了什么吗?他跟他们的银行家去了饭店,想在酒桌上套套近乎。没想到自己却烂醉如泥,就像是在‘斯拉夫集市’,还大吼大叫:‘服务员,来两个兔崽子^①,一壶浓茶^②!’他本来并不是同性恋,只是在里边儿^③的时候……”

“不用给我解释。接下来怎么了?”

“没什么。茶给送来了。人给带来了。还好,那儿有个市场。”

“可贷款给了吗?”

“问题不在给没给。你想想,既然他的思维方式到死都是这样,这说明他实际上从来没有从里边儿出来过。他的发达

① 鸡奸者。

② 此茶有特殊功效,喝后感觉兴奋。

③ 指监狱。



不过就是开开‘保时捷’，在电视上露露脸而已。后来在里边儿他甚至找到了自己的巴黎。不知这个格洛布斯和兔崽子们喝浓茶时要是想到了阴间生活，会有什么感想？”

“他可是生来就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

“可万一他考虑了呢？万一除了里边儿他一无所知，而对上面的光明又跟别人一样向往，他的头脑里会出现什么东西？”

“真搞不懂你，”科利扬说道，“你扯到哪儿去了。什么上面的光明？是不是普加乔娃跟基尔科罗夫？他从来不向往什么上面的光明，可瞭望塔上的探照灯还不是照到了他。”

“我不这么看，”舒里克说道。“格洛布斯要是想到了阴间生活，他的脑子里肯定会出现你的那本小册子。而且不只是格洛布斯。你，科尔，自己好好想想吧，我们的国家生来就是监狱，将来还是监狱。因此，就连上帝都是这样的，带着警灯。在这里，有谁会相信别人呢？”

“怎么，你不喜欢我们的国家？”科利扬严肃地问道。

“怎么会呢，喜欢。有的地方喜欢。”

科利扬把身子转向沃洛金。

“我问你格洛布斯在巴黎拿到贷款了没有？”

“好像拿到了，”沃洛金说道。“这位银行家很满意格洛布斯的安排。他们那儿对兔崽子向来习以为常，只是没有福气享受浓茶。这种茶在当地很时兴，叫仿新俄罗斯茶。”

“听着，”舒里克突然说道，“我来说说我的想法……嗯……这件事……”

“什么？”科利扬问道。



“也许实际上一切并非如此。也许并非因为我们生活在监狱里，我们的上帝才像个带着警灯的教父，而是相反，因为我们给自己选择了一个好像是带着警灯的教父，所以我们才生活在监狱里。要知道，所有这些关于灵魂的牙齿、关于冶炼共产党人的熔炉、关于天上的押送队之类的屁话，统统都是人们在几个世纪以前想出来的！而我们只不过是决定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还居然建成了！确实是按图纸建成的！只是建成了才知道，离开了地狱这个天堂就玩不转，因为天堂要是离开了地狱，那还能叫天堂吗？这不是天堂，而是扯鸡巴蛋……就是说……不，我简直不敢往下想。”

“也许，在人们坏事干得比较少的地方，上帝也会比较善良。比如在美国或是日本，”科利扬说道。

“你怎么说，沃洛金？”舒里克问道。

“我怎么说？上面怎么样，下面就怎么样。而下面怎么样，上面就怎么样。当一切都颠倒过来，如何能解释清楚既没有上也没有下呢？所以古罗斯人才说，夜里一关灯，所有的娘们儿都漂亮。”

“哇，这个家伙进入状态了，”科利扬说道。“真令人羡慕。你吃了多少？”

“难道你没进入状态？”舒里克问道。“你刚刚逛了一圈阴曹地府，还来挖苦我们。我看你的体内，不光有警察和律师，还有一个教会呢。”

科利扬抬起一只手，仔细端详了一阵。

“哇，”他说道，“又变蓝了。为什么我一吃小蘑菇就会变蓝呢？”



“你会很快就堕落的，”舒里克说着朝沃洛金转过身去。“听我说，得谈正经事儿。我们的谈话得理智些。我们开始谈的不是极乐嘛，可你看，都扯到哪儿去了。”

“扯到哪儿去了？”沃洛金问道，“依我看，我们刚才怎么坐着，现在还怎么坐着。篝火在燃烧，公鸡在歌唱。”

“什么公鸡？这是科利扬的传呼机在响。”

“啊……没关系，还会再唱的。”

舒里克冷笑一声，举起军用水壶喝了一口。

“沃洛金，”他说道，“我还是想弄明白，这第四个人是谁。”

“谁？”

“第四个人。你忘了吗？我们不是说过人的内心有检察官，有律师，还有一个享受极乐的人嘛。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是第四个人？他可是第三个出场的。”

“你怎么忘了被告？”沃洛金问道，“他们审判的那个人？你不可能从自己的检察官一下子就变成自己的律师。被告还是要当的，哪怕是一小会儿。这就是第三个人。而第四个人对所有这些分工甚至都不怀疑。除了极乐，他什么都不需要。”

“可他是从哪里知道极乐的？”

“谁对你说过他知道？”

“你自己说的。”

“我没这么说过。我说的是，对极乐不需要向他做任何解释。这并不等于说，他对此有所了解。要是他知道什么，”沃洛金加重了“知道”这个词的语气，“他就会像证人一样对你内心的事情了如指掌。”



“就是说，我内心还有一个证人？说清楚点。”

“我们不妨假设你做了一件坏事。你内心的检察官会说你是个下流胚，被告会面壁不语，而你内心的律师则会编造童年不幸的谎话。”

“往下说。”

“但为了开庭，你是不是应该回忆一下你做的那件坏事？”

“那还用说。”

“于是当你回忆的时候，你就成了证人。”

“听你这么说，”舒里克说道，“我的内心是有一个完整的法庭。”

“你以为呢？”

舒里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拍了拍大腿。

“啊！”他猛然大声喊道。“全明白了！我明白怎么才能得到极乐了！为此要变成第四个人，对吗？类似于检察官或律师。”

“对。但你怎么变成他呢？”

“不知道。大概，应该有这个愿望吧。”

“一旦你想成为第四个人，你变成的就不是他，而是那个想变成他的人。这是有很大区别的。要知道，你成为检察官不是在你想成为他的时候，而是在你暗自对自己说‘舒里克，你是臭狗屎’的时候。然后你内心的律师才会发现，你刚才是检察官。”

“好吧，”舒里克说道。“那么你告诉我，怎么才能成为这第四个人呢，如果你不愿意？”

“问题不在于你愿意不愿意。问题在于只要你想要什么，



你就肯定已经不是这第四个人了，而是另外一个人。因为第四个人一般是无欲无求的。他还有什么要求呢，当他沉浸在极乐中？”

“听着，你干嘛总是含糊其词？你能不能说句正常话，告诉我第四个人究竟是谁？”

“说嘛，随便说什么都可以，只是没有意义。”

“你总得试试嘛。”

“比如可以说，是上帝之子。”

话音未落，坐在篝火周围的人便突然听到了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公鸡的啼叫。仔细想想便知，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自从开了二十大，这一带的母鸡和公鸡就绝迹了。而且，叫了一遍又一遍。这古老的声音不能不令人产生可怕的联想——不知是妖魔鬼怪出没，还是携带着“毒刺”导弹在草原上策马奔向莫斯科的杜达耶夫分子为迷惑对方侦察而学鸡叫。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总是连叫三声，接着来个短暂的停顿。这非常神秘，非常。有一段时间所有的人都在入迷地倾听着这被人遗忘的音乐，后来这叫声不知是停息了呢，还是与这里的背景融合到了不再让人感兴趣的程度。坐在篝火旁的人肯定会以为，在小蘑菇的作用下什么事不会发生啊？于是谈话又重新开始了。

“你总是糊弄我，糊弄我，”舒里克说道。“难道你就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究竟怎么才能成为他吗？”

“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要是能变成他，大家早就趋之若鹜了。问题就在这里，成为这第四个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停止成为所有其余的人。”



“这就是说，什么人都不会做？”

“什么人都不会做也要停止。既什么人都不会做又停止什么人都不会做，明白吗？这样你马上会有腾云驾雾之感！你只消‘噢’一声。一劳永逸。”

科利扬轻轻地“噢”了一声。舒里克斜眼看了他一下。科利扬化石一般纹丝不动地坐着。他的嘴变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洞口，而眼睛似乎往里眈着。

“你说的实在太复杂，”舒里克说道。“我简直要发疯了。”

“发疯就发疯嘛，”沃洛金柔声说道。“你干嘛要这理智呢？”

“不行，这不行，”舒里克说道。“如果我发疯了，你也会发疯。”

“这怎么讲？”沃洛金问道。

“你好好想想，谁是你的理智。我跟科利扬。对吧，科利扬？”

科利扬没有回答。

“喂，科利扬！”舒里克喊道。

科利扬还是没有回答。他坐在篝火旁，挺直腰板，直勾勾地望着面前。然而，尽管面前就坐着舒里克，稍稍往左一点就是沃洛金，可他看的显然不是他们，而是一个虚无的所在。但最耐人寻味的还不是这一点，而是他的头顶上出现了一条顶天立地的光柱。

乍一看这条光柱似乎是一根细线，但等到舒里克和沃洛金注意到它时，它突然开始扩大并变得越来越亮，与此同时又很奇怪，它照亮的不是林中的空地和坐在篝火旁的人，而只是



自身。开始它的宽度相当于科利扬的脑袋，后来它把篝火和坐在旁边的四个人都装进去了。再后来，突然间周围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这条光柱。

“小心，”舒里克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其实，已经不存在什么四面八方了，包括人的声音也不存在。取代人的声音的是某种在场，它以一种清楚的方式表明，这是舒里克。而此时用“小心”这个词来表明自我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要小心，沃洛金，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听见了，”沃洛金从各个地方回应道。

“这就是极乐吗？”

“你干吗问我？你自己看嘛。你马上就会知道一切，看到一切的。”

“好吧。这周围是什么东西？啊，是的……当然。其余的一切都哪儿去了？”

“哪儿也没去。都在原地。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哦，可不是嘛。科利扬，你在哪儿？你怎么样？”

“我！”闪光的虚空中回应道。“我！”

“哎，科利扬，回答我！”

“我!!! 我!!!”

“一切原来是这样的啊！有谁能想得到呢？”舒里克激动而又幸福地继续说道。“永远不会有人想得到。听见没有，沃洛金，你就是什么都不回答，我自己也会明白的……没有谁能想得到……我现在告诉你。就因为这一点是不可能想到的！无论如何不可能想到！无论如何不可能想到！”



“我!!!”科利扬回应道。

“原来,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舒里克继续说道。“绝对没有。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得见。我连你想看见什么都知道。哪怕是……好吧,好吧……听见没有,科利扬,我们当时不该干掉人家科索伊。他确实没拿钱。是……是你拿的,科利扬!”

“我!!! 我!!! 我!!! 我!!!”

“别说了,”沃洛金插嘴道,“否则他会出卖大家!”

“他是条狗,”舒里克喊道,“他谁都出卖!”

“我说,别说了。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你最好看看自己。”

“看哪个自己?”

“谁在说话就看谁。”

“看自己? 哦……对……哦……”

“这就对了。你不是说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嘛。”

“是的……不错……我操! 听见没有,沃洛金,真是可怕。非常可怕。实在可怕。沃洛金,听见没有,怎么一点亮光也没有了? 沃洛金? 太可怕啦!”

“你不是说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嘛,”沃洛金说道。他抬起头,瞪大眼睛朝虚空看了看,好像看见了什么。

“是的,”他猛推舒里克和科利扬,用变了调的嗓音说道,“跑。快跑!”

“沃洛金! 我几乎听不见你的声音!”舒里克剧烈地摇晃着身体,喊道。“沃洛金,好可怕啊! 哎,科利扬! 回答我,科利扬!”



“我。我。我。”

“哎，科利扬！你能看见我吗？千万别看自己，否则眼前会一片漆黑。你能看见我吗，科利扬？”

“我？我？”

“往树林里跑，快！”沃洛金说着猛地站起来。

“什么树林？要知道，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树林！”

“你只要跑，树林自会有的。跑吧！还有你，科利扬，快跑，我们在篝火旁会合。”

“我?! 我?! 我?!”

“什么鸡巴脑袋。我是说，都往树林里跑！危险！”

如果说，几个小时以前在林中空地上燃烧的篝火确实是一个小宇宙，那么现在，这个宇宙则已经停止了存在，它的居民及其所有的痛苦也一并烟消云散了。旷地变得黑暗、冷清和狼藉，只有一缕轻烟在熄灭的炭火上方缓缓升腾。

吉普车里的无线电话突然响了，惊跑了灌木丛里的小动物，引发一阵飒飒的响声。电话响了很久，大约在响到第二十下的时候它的耐心终于得到了补偿。树林里传来簌簌的树枝声和急速接近的脚步声，一个模糊的人影穿过空地窜到车前，随即传来说话声：

“喂！‘大岛’股份公司！当然，听出来了，当然。对！对！不对！告诉谢廖扎·蒙古洛伊德，别跟我玩横的。没收到任何汇款。要不用缴增值税的现金，否则我们就撕毁合同。明天十点在办事处……不，不是十点，是十二点。就这样。”

这是沃洛金。他放下话筒，打开车子的行李箱，从里面摸



出一个油桶，然后将桶里的油倒在残存的柴火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显然炭火已经熄灭了。沃洛金擦着一根火柴，将它扔到地上，于是一团橙色的火苗唿地蹿了起来。

他把油桶藏到行李箱里，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在空地上拾树枝，然后再把树枝扔到火里。等舒里克与科利扬从树林里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时，篝火在原地又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他们是依次出现的。首先是科利扬，在走到空地上之前，他不知为何在空地边上的灌木丛里坐了很久，用手遮着额头朝篝火这边张望。后来他还是鼓起勇气走到篝火旁边，默默地在自己原来的位置坐下。十分钟以后舒里克到了，手里拎着一把带消音器的“TT”型手枪。他踉踉跄跄地走到空地上，打量一眼科利扬和沃洛金，然后把手枪藏到自己的开司米短上衣里。

“为了有朝一日能再尝尝这些毒蘑菇，”他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不花一分钱。我打了两夹子弹，可就是不知道打谁。”

“不喜欢吗？”沃洛金问道。

“一开始还没什么，”舒里克回答道，“可后来……听我说，在爆炸前我们谈什么来着？”

“什么爆炸？”沃洛金惊讶地问道。

“就是……或许该换种叫法……”

舒里克抬头看了看沃洛金，似乎希望沃洛金能给他一些提示，可沃洛金却一言不发。

“怎么回事呢，”舒里克说道，“一开始我们在谈极乐，这我记得。说着说着就跑题了，啧啧，后来眼睛里好像进了火似的……你自己还大声喊叫，让我们往林子里跑呢。恢复知觉



以后,我还以为是汽车爆炸了。以为是‘石化公司’的这些王八羔子偷放了炸弹。可转念一想,好像不是这么回事。有火光,这是真的,但没有汽油味。就是说,这是心理作用。”

“没错,”沃洛金说道,“这是事实。是心理作用。”

“这就是你说的极乐?”舒里克问道。

“你可以这么认为,”沃洛金答道。

“可你是怎么让我们看到它的呢?”舒里克问道。

“不是我让你们看到的,”沃洛金回答道,“是科利扬。是他把我们带到那里去的。”

舒里克看了看科利扬。科利扬迷惑不解地耸了耸肩膀。

“是的,”沃洛金一边收拾篝火旁的东西,将它们扔进敞开的车门,一边继续说道,“就是这样。舒里克,好好瞧瞧你的好朋友。按理说他从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人家就是运气好。都说精神贫乏的人有福,千真万确。”

“你怎么,准备走吗?”舒里克问道。

“对,”沃洛金说道。“该走了,我们十二点要跟‘石化公司’的人碰头。我们现在就走,得抓紧时间……”

“总之,我什么都记不清楚了,”舒里克总结道。“只是自我感觉很奇怪。有生以来第一次想要做点好事儿。想帮助别人。或者说是救苦救难。我恨不得把所有的人一下子全都救出来……”

他抬起闪烁着理想和崇高的脸,仰望一下星空,轻轻叹了口气。然后——他显然是回过神儿来了——走到篝火跟前,背对着自己的两个同伴解开裤带,用一大泡尿迅速浇灭了火苗。



几分钟后吉普车已经行驶在林中一条堑壕一般的乡间土路上。科利扬在后排座位上打着呼噜，开车的沃洛金盯着被汽车前灯照亮的暗处，而舒里克则咬着下嘴唇在思考什么。

“听着，”他终于说道。“我还是有些不明白。你不是说，一旦进入极乐，永远都不会结束吗？”

“是永远不会结束，”沃洛金皱着眉头，猛力扭转方向盘，答道，“如果你能正常地进去，走门。而我们现在，你可以认为是从天窗钻进去的。你瞧，报警器响了。”

“好酷的报警器，”舒里克说道。“好酷。”

“这玩意儿，”沃洛金说道。“可以包起来。有过这种情况。科利扬说过的那个尼采有一次就赶巧成功了。”

“要是给抓住了，会送到什么地方？”舒里克用一种奇怪的敬重语气问道。

“从身体层面讲，是送到疯人院，而从细微层面讲，连我也不知道。这是个谜。”

“听我说，”舒里克问道，“你怎么样，是不是可以随便进去？想什么时候进去就什么时候进去？”

“不是的，”沃洛金说道。“我……怎么跟你解释呢……我钻不进去，一生中我积累了很多精神财富。要摆脱它们比从带波纹的鞋底上擦去狗屎还难。因此，我通常会派精神贫乏的人冲在前面，让他从针眼里钻进去再从里面把门打开，就像现在。可谁知道，一旦两个精神贫乏的人凑到一起，他们就会用自己的贫乏制造如此严重的危险。”

“什么危险？”



沃洛金没有回答，他正忙于开过一段难走的路。车颠簸了一下，随后又颠簸了一下。汽车在马达紧张的突突声中爬上一个陡坡，随即拐到一条柏油马路上，车速加快了。迎面驶过一辆破旧“日古利”，接着是一支由若干辆军用卡车组成的车队。沃洛金打开收音机，转眼间，坐在车里的四个人又置身于从前那个熟悉的、琐屑而又可以理解的世界了。

“你说的是什么危险？”舒里克重复一遍自己的问题。

“算了，”沃洛金说道，“我们以后再谈。你的活儿将在家里做。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该向‘石化公司’提些什么要求。”

“那你就考虑吧，”舒里克说道。“我们算老几呀，我们是房顶，你可是阁楼。”

他又沉默片刻。

“我无论如何还是弄不明白，”他说道，“这第四个人到底是谁呢？”



9

的确,这第四个人到底是谁呢?有谁知道呢?可能是魔鬼吧,从永暗里爬出来,想再夺走几个堕落的灵魂。也可能是上帝吧,像人们说的那样,在众所周知的大事发生之后总喜欢用化名降临人世,并且尽量避免让周围的人察觉到他与众不同,而结交的通常是些收税人或有罪的人。不过也可能——而且最有可能——这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某个比坐在篝火旁的那些人更真实的人,因为,如果不能也不可能保证沃洛金、科利扬和舒里克、所有这些公鸡、上帝、魔鬼、新柏拉图主义者和二十大都曾经存在过,那么你,刚才还坐在篝火旁的你,实际上可是存在的呀,难道这不是现时存在的和曾经存在的最首要的东西吗?

夏伯阳把手稿放在写字台上,抬头朝自己办公室半圆形的窗户外面望了一会儿。

“我觉得,彼得卡,你身上文人气太重,”他终于说道。“这种面向其实并不存在的读者的叙述方法是很廉价的一招。要知道,就算除我之外还会有人读完你这篇费解的故事,我也敢



向你打保票，他要考虑的决不会是自己的存在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他更可能会想象一下写这些话的你。我就怕……”

“我可什么都不怕，”我猛吸一口烟，不耐烦地打断他。“我早就不在乎了。我只是尽我所能记下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恶梦。这一段是这么来的……怎么说呢……全凭惯性。紧跟在我和男爵先生的谈话之后。”

“那顺便问一下，男爵都对你说了什么？”夏伯阳问。“看你回来时戴着黄色的羊皮高帽，想必你们的谈话很热烈吧。”

“是啊，”我说。“总的就一句话，他建议我出院。他把这个惶恐不安、物欲横流、毫无思想、毫无出路的世界比作精神病院。然后——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解释说，其实既不存在精神病院，也不存在他自己，甚至您，我亲爱的夏伯阳，也不存在。存在的只有我。”

夏伯阳哼了一声。

“就是说，你是这么理解他的。有意思。这事我们以后再谈，我答应你。至于他建议你从疯人院里出院，这是最好不过的了。不知我自己为何没有想到这一点。确实，为了使你免受狂热的意识产生的噩梦给你带来的夜复一夜的恐怖……”

“对不起，我不明白，”我又打断他，“是我狂热的意识产生的噩梦呢，还是意识本身是噩梦的产物？”

“这都是一回事，”夏伯阳把手一挥。“所有这些理论的唯一用处就是要让人们永远地摆脱它们。不管你在哪里，都要按你所在的那个世界的规则去生活，同时还要利用这些规则以使自己不受它们的约束。出院吧，彼得卡。”

“我觉得，我明白这个隐喻，”我说。“但然后会怎么样呢？”



我还能再见到您吗？”

夏伯阳微微一笑，两手交叉放在胸前。

“保证能，”他说。

突然传来“哗啦”一声，窗户顶上的一块玻璃掉了下来。打碎玻璃的石头砸在墙上，落在桌子旁边。夏伯阳走到窗前，小心地向院子里张望了一下。

“是纺织工人吧？”我问。

夏伯阳点了点头。

“他们喝得烂醉，”他说。

“你为何不跟富尔曼诺夫谈谈呢？”我又问。

“我看他对付不了他们，”他答道。“他之所以还是他们的指挥员，是因为他只会下达他们愿意听到的命令。一旦他有一次严重闪失，他们马上就会另找他人。”

“说实话，我对他们很不放心，”我说。“我觉得，局面已经完全失控了。您别以为我是危言耸听，但万一我们……您想想，最近几天都出过什么事。”

“今天晚上就见分晓了，”夏伯阳凝视着我说。“对了，既然你对这个的确很让人头疼的问题不放心，那你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帮忙招呼一下观众吧。要制造一个纵酒狂欢的假象。要让他们感觉这里一切正常。”

“怎么做呢？”

“今晚有一场特别的音乐会，知道吧，就是战士们自娱自乐的小节目。你能不能上台给他们朗诵一首革命诗？就像你在‘音乐鼻烟盒’里念的那首。”

我觉得这有伤我的自尊。



“您看，我没把握能融入这种晚会的格调。我怕……”

“你刚才还说什么也不怕呢，”夏伯阳打断我的话。“再说也要把事情看得开一点。归根结底，你也是我的一个兵，叫你做的无非是向别人露两手。”

初听这话，我觉得夏伯阳是在挖苦我；我头脑中甚至闪过一个想法，认为他是以此来反击他刚刚读过的那篇东西。但不久我就明白了，可能是另有原因。他可能只是想提醒我，从可见的未来的角度看，人们的分工不再有什么尊卑之分，一个彼得堡大名鼎鼎的诗人跟一些师团长之类的军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既然如此，”我答应了他，“我就试试吧。”

“太好了，”夏伯阳说，“晚上见。”

他把身子转向写字台，俯身研究起铺在上面的地图来。地图上放着一摞文件，里面有几份电报和两三个用红色火漆封缄的公文。我跺了一下鞋跟（夏伯阳一点也没注意到我赋予这个动作的讽刺意味），走出他的办公室，跑下楼梯时，我正好在门口跟刚从外面进来的安娜撞了个满怀。她穿着领口很高、遮住了胸脯和脖子的黑色丝绒连衣裙，裙摆很低，几乎拖到了地上；这是她所有衣服中对她最合适的一件。

我确实撞在了安娜身上，有一秒钟，我本能地向前伸出的手竟然搂住了她，虽然并无预谋，而且非常尴尬，但同样夺人心魄。紧接着，我又像被电击一样反弹回来，仰面倒在楼梯上；这个动作一定很滑稽。但安娜没有笑，相反，她的脸上现出惊恐的神情。

“您没撞到头吧？”她关切地俯下身把手伸给我，问道。



“没有，”我拉着她的手站起来，“谢谢您。”

我站起来后，她没有马上把手抽回去。出现了短暂的尴尬。突然，我连自己都感到意外地说：

“难道您不明白吗，我并不是这样的，这是您，安娜，让我变成了世界上最可笑的人。”

“我？为什么？”

“似乎您自己并不知情……我不知道是谁，是上帝还是魔鬼派您来专门惩罚我的。在见到您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丑陋。不，不是说我本身这样，而是跟您所代表的那种对我来说高不可及的美相比而言……您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同这个世界上我所热爱、我所珍重、并且具有某种意义的东西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只有您，安娜，只有您才能把我第一次在火车上见到您之后失去的生活的光彩和意义还给我！只有您能救得了我，”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我当然是在撒谎，因为安娜的出现并未让我的生活失去什么特别的光彩和意义，因为我的生活本来就没有什么光彩和意义。不过在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每一个从我口中吐出的词我都觉得像神圣的真理。安娜静静地听着，脸上渐渐流露出怪诞的表情，看来，她没有料到我会说出这些话。

“可我怎么能救您呢？”她皱着眉头问。“请相信我，我很乐意救您，但到底要我做什么呢？”

她的手还放在我的手里，突然，我感到自己的胸中涌起一股疯狂的希望的热浪。

“这样吧，安娜，”我急促地说，“您不是喜欢骑马吗？我从科托夫斯基那里赢了两匹大走马。庄园这里不太方便，干脆



咱们今晚天黑时去城外吧！”

“怎么去？”她问。“干什么去？”

“什么叫‘干什么’？我以为……”

她的脸上流露出疲惫和厌烦的神情。

“我的上帝啊，”她收回自己的手，说道。“多庸俗啊！还不如像上次那样闻到您嘴里的葱味。”

她丢开我，沿着楼梯跑上去，没敲门就进了夏伯阳的办公室。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等自己恢复了对面部肌肉的控制后才走进院子里。没费多少功夫我就找到了富尔曼诺夫，他在司令部里；看起来他在那儿住得很习惯。桌子上，靠近一大滩墨迹的地方，如今放着一个茶炊，茶炊的通风管上挂着一只喜剧道具式的靴子。看来，靴子是给人们当扇火的风箱用的。茶炊旁的一块破布上放着一条切开的鲱鱼。我告诉富尔曼诺夫，我要在今天的晚会上朗诵革命诗歌，然后任由他跟两个纺织工人喝茶（我确信桌子底下藏着伏特加）。出了大门后，我慢悠悠地朝树林方向走去。

真怪，我几乎没有想过刚才对安娜的表白。甚至也没感到特别懊恼。不错，我脑子里闪过这样的想法，觉得她是在故意戏弄我，每次都先给一点和解的机会，等我快要抓住时，再把我推进狼狈不堪的境地，但就是这点想法也稍纵即逝了。

我左顾右盼地在街上溜达。不一会儿柏油马路就到了尽头；我又朝前面走了走，然后离开泥土路面，顺着路边的斜坡下去，找到一棵树，背靠着树干坐下。

我把一张对折的纸放在膝上，很快便写好了一首颇对纺织工人口味的十四行诗——根据夏伯阳的要求，照“音乐鼻烟



盒”的风格,也就是说,节奏和韵律完全被打破,像被军刀斩断了一般。写完了,我才突然发现里面还没有加进象征革命的内容,只好重写最后几行。终于全写完了,我把那张纸片藏在制服的口袋里,正想回去时,突然感觉到,为纺织工人写首小诗这件微不足道的事竟唤醒了我沉睡已久的创作欲;一只看不见的翅膀罩在我的头上,使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我想起沙皇的死(这个恐怖的消息是富尔曼诺夫告诉我的),于是,在纸的空白处,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一首纯净的交叉押韵的抑抑扬格,现在看来这似乎是过去的一切的不可能的回声:

两个水兵在树林中
迎着暮色,迎着风,
用黝黑健壮的臂膀
劈开挡在前面的树丛。
他们的心深藏在
皮带和子弹袋的下面,
他们的脚像树桩
沉重地扎进湍急的溪流。
皇帝累了。
要知道,从树林到城市
这条如此凶险的路
可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灌木丛中不知何人的脸,
吐口水的大胡子护理员,
还有俄罗斯灵魂解体



带来的其他果实。
他听不见铮铮的誓言，
让他闭上眼睛的虚伪规劝，
也听不见他们粗鲁的骂娘，
以及枪托砸在地上的声响——
皇帝告别了
森林，落日和街道，
他才不在乎
关于他的种种传言。
他站在树墩上向他们高喊：
“In the midst of this stillness and sorrow,
In these days of distrust
May be all can be changed — who can tell?
Who can tell what will come
To replace our visions tomorrow
And to judge our past?”^①
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皇帝竟然讲英语，对此我丝毫不感到惊诧。面对死亡（或

① 英语：“在这静止与悲痛之中，
在这些疑虑重重的日子里，
或许一切都会改变——谁知道呢？
谁知道什么将会
代替我们的信仰，
评判我们的过去？”



许还有别的什么——这一点我自己至今没弄明白)岂能使用被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法令玷污的语言。让我惊诧的是这些护理员,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他们意味着什么。不过,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的诗有什么了不起的,相反,我早就开始觉得写作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了;对于一个与笔墨打交道的伏案者来说,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将散落在心灵各个角落里的众多锁孔排成一条线,以便阳光能够一下子透过这些锁孔,豁然照亮稿纸。

我回到庄园时表演正进入高潮。院子的一角是纺织工人用从篱笆上拆下来的木板搭建起来的临时舞台。战士们坐在从四处拖来的长凳和椅子上,聚精会神地盯着舞台。我走到跟前时,正赶上一匹马在大家的哄笑声中被拉下舞台。显然,这只可怜的牲畜身怀绝技,致使人们非让它展示一下不可。随后舞台边上出现一个身材瘦削的人,腰挎军刀,长得像农村的无神论者。我知道,他肯定是晚会的报幕员。等喧闹的声音静了下来,他郑重其事地说道:

“长着两个生殖器的马,这还不算什么。现在出场的是列兵斯特拉明斯基,他会用屁股说俄语,解放前是马戏团的演员。他说话声音很轻,所以希望大家保持安静,不要大声喧哗。”

舞台上出现了一个秃头的戴眼镜的青年;我惊奇地发现,他跟富尔曼诺夫手下的大多数人不同,完全是一副书生模样,看上去一点也不凶恶。这是那种常见的典型的乐天派,脸上由于经常做痛苦状而生出些许皱纹。他示意递给他一张凳子,然后侧对观众,倒立在凳子上。他把头转过来,问道:



“伟大的诺斯特拉达穆斯^①，告诉我，流血的多头蛇敌人还能在红军面前顽抗多久？”

他的“红”字说得很清晰，给人的印象是，这个字的后面有着含糊的无产阶级神话里某个受苦受难的英雄的影子。看不见的诺斯特拉达穆斯回答：

“顽抗不了多久了。”

“那为什么流血的多头蛇敌人还要顽抗呢？”他的嘴巴问。

“是因为有协约国撑腰，”看不见的对话者回答。

回答时表演者的嘴唇一动不动，但他撅起的屁股却在紧张地活动着。话题涉及到政治和领导人的健康（有传言说列宁因为又一次中风而被送到哥尔克，只有卫队长才能见他），观众着了魔似地屏住呼吸。

我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很久以前，在佛罗伦萨的街头，我见过一个腹语者，当时他正在为但丁招魂。倒立在舞台上的这个人玩的是类似的把戏，唯一的区别是，“魂”做出的回答让人不由自主地推断诺斯特拉达穆斯就是欧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应答者低沉含糊，有如鸽叫的发声特点可以断定，台上的表演者是个腹语者。只是有一点不明白，他何必要让纺织工人们信服他是用屁股来发出这些声音的呢？

这确实是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一开始我还以为，不应该在纺织工们面前表演跟鬼魂的谈话，因为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鬼魂。但后来一个猜测让我惊讶不已——我突然

① 诺斯特拉达穆斯(1503—1566)，法国医学家、星占学家、预言家，出版过预言集《世纪连编》。



意识到,问题不在这里。是这样的,那个叫斯拉明斯基或是什么名字的表演者,凭着灵敏的嗅觉了解到,只有用粗俗下流的东西才能引起这些观众对他的兴趣。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的特长本身完全是中性的(据我所知,腹语者甚至并非用腹部说话,他们只不过是动嘴唇就能发音罢了),因此需要给它一层粗俗下流的包装。

哦,此刻我真遗憾身边没有一个象征主义者,比如说索洛古勃!最好是梅列日科夫斯基。难道还有比这更深刻的象征吗?或者最好换种说法,还有比这更宽泛的象征吗?我痛苦地想到,这就是被历史的火车头拖进死胡同的一切艺术的命运。如果连一个逗人开心的腹语者都要出此下策来求人捧场,那诗歌又该会怎么样呢?新世界里完全没有诗歌的立足之地,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立足之地会有的,但这是有条件的,诗人必须设法让人知道或用文件证明他有两个生殖器,或者他至少能用屁股朗诵,他的诗才会有人感兴趣。为什么,我在想,为什么这个世界的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一些衣冠禽兽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并强迫别人按照他们私自制定的无耻法律生活?

腹语者同时预言资本王国很快将要崩溃,还讲了一个大家都听不懂的老掉牙的笑话,最后在退场时又放出几个生理性的长音,台下报以感谢的笑声。

报幕员出来宣布我出场。我踩着摇摇晃晃的台阶走上台去,在舞台边沿站定,默默地扫视一下全场。应该说,这场面并不令人愉快。有时候,野猪和野鹿标本的玻璃眼睛里还能透出某种神态,某种观察者可以意会的,只有活着的动物的眼



睛才能表达出来的感情，只要这眼睛看上去很逼真，很生动，而不是很呆板。这同眼前的情形有些相似，只是正好相反——虽然注视着我的眼睛大多也是活生生的，从中流露出的感情似乎也是明白无误的，但我深知，它们表达的并不是我所设想的那种东西，在生活中，我永远也无法猜透这些眼睛里闪烁的含义。好在也未必值得去猜。

并非所有的人都在看我。富尔曼诺夫喝醉了，在同他的两个副官（就他们的情况而言，这一职务的词源无疑与地狱有关）嘀咕着什么；安娜坐在后排，牙齿咬着一根草秆，嘴角挂着轻蔑的微笑。我不认为她的微笑跟我有关系——她甚至没朝台上看。跟两个小时前一样，她还是穿着那条长长的黑天鹅绒连衣裙。

我伸出一只脚，双臂交抱在胸前，但继续保持沉默，眼睛盯着过道。没过多久观众席上便开始窃窃私语，几秒钟后这窃窃私语又变成了大声喧哗，里面还夹杂着口哨声和起哄声。这时，我故意压低嗓门，开口说道：

“先生们，请原谅我用嘴跟你们说话，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学会这里通用的交流方式……”

我说的前几个字没人听见，等到这句话快说完时，观众席已恢复安静，静得听得见台下苍蝇的嗡嗡声。

“富尔曼诺夫同志要我给大家朗诵革命诗，”我继续说道。“作为政委，我想就此提一点意见。列宁同志曾告诫我们不要过分痴迷于形式上的各种实验。希望在我前面登台的同志不要见怪，对，对，就是您，用屁股说话的这位同志。列宁教导我们，能使艺术革命化的并不是外在的标新立异，而是深刻的无



产阶级思想内涵。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作为例证,虽然诗讲的是达官显贵的生活,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无产阶级诗歌的光辉典范。”

台下鸦雀无声。仿佛是在向看不见的沙皇致敬,我把一只手举过头顶,用自己一贯的方式,丝毫不拿腔作调,只在诗行间稍作停顿,朗诵道:

梅谢尔斯基公爵夫人有件精致的家当——
黑丝绒的连衣裙,犹如西班牙的夜色。
她穿着它去见刚从首都回来的朋友,
那人一见到她,便浑身发抖慌忙藏躲。

“啊,我真痛苦,”公爵夫人想,“我真疲惫!
弹首勃拉姆斯的曲子吧——何乐而不为?”
这时一丝不挂的朋友就藏在窗帘后面,
他爱抚着涂得黢黑的面包圈,如痴如醉。

涉世不深的孩子们肯定会觉得
这个故事不可信,因为他们不了解
我们这里除了农民和工人阶级,
从前还住过吸人民大众血的剥削者。

好在如今任何一个工人都有资格
套上面包圈,就像从前的贵族老爷!



朗诵完毕，台下先是几秒钟的寂静，然后突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即便是从前在“流浪狗”，我也没受到过这样的礼遇。我用眼睛的余光瞥到，安娜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了出去，但我丝毫没有为此感到不安。我承认自己真的很得意，甚至忘记了此前对这些观众的不快想法。我挥舞着拳头向某个看不见的人示威，随后又从口袋里掏出勃郎宁朝空中放了两枪。观众也立刻用鸣枪和欢呼作为响应。我简单地鞠个躬便走下台，穿过热烈鼓掌的人群，向庄园走去。

我有点为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我想，真正的艺术同赝品的区别就在于，再麻木的心它也能找到与之沟通的途径，再无望的世界性迷狂的牺牲品它也能在转眼间给捧上天，捧进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完全自由的世界。不过，我很快便清醒过来，一种极伤自尊心的猜测刺痛了我：他们鼓掌不过是因为我的诗在他们听来有点像委任状，把可以为所欲为的领域又拓宽了几度，亦即在列宁“可以抢劫抢劫者”的批示上又加上一条还不十分明白的“可以套上面包圈”。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我头枕双手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我想，这两三个小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俄国知识分子永远无法改变的命运的绝妙写照。暗里写诗赞美红旗，明里却为警察局长歌功颂德并以此换口饭吃，或者反过来，内心里看见的是皇上的最后一次出场，嘴上却在大声谈论往无产阶级长满老茧的生殖器上张挂达官显贵的面包圈——永远，我想，永远都是这样。在这个可怕的国家里，即便政权不是通过刀光剑影的血腥拼杀，而只是轻而易举地落入诸如“音乐鼻烟盒”里那些流氓和小偷的手中，俄罗斯知识分子还是会



像下贱的理发师一样跑到他们那儿去讨订单的。

想这个问题时我已经昏昏欲睡，一阵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惊醒了我。

“听见了，听见了，”我喊道，甚至懒得站起来，“请进！”

门开了，却没人进来。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忍不住抬起头。安娜站在门口，仍旧是那身黑色连衣裙。

“能进来吗？”她问。

“当然，”我欠起身，说，“请进。请坐吧。”

安娜坐到圈椅上，趁她转身背对我的工夫，我赶紧把堆在地上带窟窿的包脚布踢到床下。

安娜双手放在膝上，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阵，一个她自己也不十分清楚的想法使她的目光显得飘忽不定。

“想抽烟吗？”我问。

她点了点头。我找出烟，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又递过去一只我平时当烟灰缸用的茶碟，然后擦着了火柴。

“谢谢，”她朝上吐出一股细细的烟雾后便不作声了。似乎，她内心正在进行一场思想斗争。我本想随便寒暄几句来挑起话头，但一想到这样的谈话一般会有什么结局时，又马上放弃了这个念头。还好，安娜自己先开口了。

“我不能说自己特别喜欢您这首关于公爵夫人的诗，”她说，“但跟晚会其他表演者相比，您还是相当出色的。”

“谢谢，”我很得意。

“顺便说一声，我今天整晚都在读您的诗。我在驻区的图书室里找到一本小册子……”

“哪一本？”



“不知道。前几页已经没了，看来是给他们撕下来卷烟抽了。”

“那您怎么知道这是我的书呢？”

“这无关紧要。我问了图书管理员。是这样的，里面有一首诗，是对普希金的改写。讲的是当你睁开眼睛时，周围只有白雪、荒漠和迷雾，接下去，接下去写得非常好。是怎么写的……不用，我自己能想起来。啊对了，想起来了。‘但我们胸中还燃烧着热望，一列列火车向它驶去，意识的蝴蝶从无处飞向无处。’”

“哦，我想起来了，”我说。“这本书叫《王国‘我’之歌》。”

“多怪的名字。有点孤芳自赏的味道。”

“不，”我解释道，“不是这个意思。中国古代有一个王国，它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吴’^①。这一直让我很惊奇。您知道，人们会说——在树林旁边，在房子旁边，可这里只有一个吴。好像是在指示某个不能言说的所在，只能说——在……旁边，而究竟在什么旁边——没法说。”

“要是夏伯阳，肯定会马上问您，您能说出您说的‘我’指的是什么吗？”

“他已经问过了。至于这本书——顺便提一下，这是我最糟糕的作品之一，我会想办法送给您另外几本——我可以做些解释。我以前去过许多地方，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不管我走到哪里，其实都只是在同一个空间里活动，这个空间就是我自

① 吴国的“吴”音译成俄语为“У”(发音为[u])，这是一个字母，同时也是一个前置词，意为“在……旁边”。



己。那时我把它叫做‘我’，但现在，或许我该叫它‘吴’了。不过这并不重要。”

“那别人呢？”安娜问。

“别人？”我问道。

“对。您还写过许多关于别人的事情。比如说，”她微微皱起眉头，像在回忆，“这首：‘他们聚集在破旧的浴室里，系着领扣，穿着护腿，计算着时间和距离，用额头撞击墙壁……我是如此厌恶他们的嘴脸，以致不能没有他们做伴——当四周发出尸体的腐臭，语言比征兆更加清晰，我……’”

“够了，”我打断她，“我记得。我并不认为这是我最好的诗作。”

“但我喜欢。总的来说，彼得，我非常喜欢您的作品。但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该怎么对待别人？”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如果凡是您能看到的、感觉到的和理解的东西都只存在于您自身之中，存在于您的王国‘我’之中，那不等于说，其他人都不真实？比如说我？”

“安娜，请相信我，”我着急地说，“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什么对我来说是真实的，那就是您。对于我们之间发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算争执吧，我难受得简直要……”

“是我的错，”安娜说。“我的脾气实在太倔了。”

“您说什么呀，安娜。都是我不好。对我的种种荒唐，您是那么大度……”

“我们别互相客气了。您最好告诉我，对您来讲，我真的像您说的那么重要吗？”



“您就是我的一切，”我发自内心地说。

“那好，”安娜说。“您好像要请我坐马车去城外兜风，是吧？那我们就走吧。”

“是现在吗？”

“为什么不是呢？”

我慢慢凑近她。

“安娜，您甚至不会……”

“求您了，”她说，“别在这儿。”

出了大门，我驾着马车向左转去。安娜坐在我旁边，脸颊上泛起一片绯红。她尽量避免看我。我开始觉得，她在为刚才发生的事感到懊悔。一路上我们一言不发。当我们进入一片树林，茂密的树枝交织在我们头顶，可以确信不会有任何不怀好意的目光盯着我们时，我停下马车。

“听我说，安娜，”我向她转过身去。“请相信我，我很珍惜您的热情，但如果您开始后悔了，那……”

她没有让我把话说完。她双手搂住我的脖子，用嘴唇封住了我的嘴。这事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至当她吻我时，我还在继续说话。当然，我并不十分在意我没有说完的那句话，免得扫了她的兴。

我一直觉得接吻是一种极为奇特的人际交往方式。据我所知，这是文明带来的新事物之一。众所周知，居住在南部岛屿上的野蛮人或者非洲土著从不接吻。他们还没有跨过那条界线，进而永远失去原本属于人类的天堂。他们的爱情是简单的；或许，“爱情”这个词本身并不适合他们之间产生的感情。爱情从本质上讲是在孤独中产生的，当身边没有爱的对



象时,爱情与其说是投向你所爱的他或她,毋宁说是投向头脑所创造出来的那个与原型有着微弱联系的形象。要让爱情真正产生,就得具备创造幻想的本领。安娜吻我的时候,她其实是在吻那个站在令她惊叹的诗行后面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人。她怎么会知道,就连我自己也在写这本书时也在痛苦地寻找这个人,但随着每首新诗的诞生,我愈来愈确信不可能找到他,因为他不在任何地方。他留下的话语不过是伪作,就像奴隶们凿在大理石台阶上的脚印被巴比伦人当作古代神灵下凡的证据。不过,话又说回来,难道神灵不就是这样下凡的吗?

这最后一个想法已经与安娜有了关系。我感觉得到她微微颤抖的舌头温柔的接触;她的两只半闭的眼睛离我那么近,让我觉得,我简直可以潜进去并永远融化在它们湿润的光泽中。终于,我们的初吻因气息不够而中断了。她把脸转向一边,我看到了她的侧面。她闭上眼睛,舔了舔嘴唇,仿佛嘴唇很干燥。所有这些细微的面部动作在其他情境中或许毫无意义,但此时此刻却格外令人激动。我突然意识到,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分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了。一分钟前,我还觉得触碰她的肩膀近乎亵渎,而现在,我的手却自然而然地放在了她的胸脯上。她稍稍闪开一点,不过我马上就心领神会,这不过是想让我的手畅行无阻而已。

“您在想什么?”她问。“说实话。”

“我在想什么?”我用双手搂住她的肩膀。“我在想,追求幸福好比登山……”

“才不是这样呢。解开挂钩。不是。算了吧,我自己来。请原谅我打断了您。”



“不错,这就像是冒险而复杂的攀登。在最终愿望实现以前,攀登的过程本身会吞噬所有的感觉。下一块可以踩踏的石头,下一把可以抓住的蒿草……您真美,安娜……我说什么来着……是的,目标会让这一切变得有意义,但绝不等于运动过程中到达的随便一个地点。就本质而言,接近目标本身高于目标。好像有个叫伯尔斯坦的机会主义者说过,运动就是一切,结果微不足道……”

“不是伯尔斯坦,是伯恩斯坦。您这个怎么解开……您从哪儿弄的这种皮带?”

“上帝啊,安娜,您想让我发疯吗?”

“您继续说吧,”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万一我有一阵接不上话,您可别生气。”

“那好,”我仰起头,闭着眼睛继续说,“但这里最要紧的是,你一旦登上山顶,到达目的地,目标也就随之消失了。从本质上说,它跟所有用头脑构建起来的对象一样,是不可捉摸的。你自己想想,安娜,当你幻想一位绝色女子时,她会完美地出现在你的想象中,但当她投入你的怀抱时,她的完美会顷刻间化为乌有。你遇到的东西可以归结为一系列极其简单又相当粗糙的感受,这些感受通常是在黑暗中体验的……哦——哦——哦!……但不论它们让你怎样神魂颠倒,一分钟前还令你着迷的那种美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想想都可笑的东西。这说明,美是不可企及的。说得更准确些,美是可以企及的,但可以企及的是她自身,而被情欲迷醉的理性要在它后面寻找的东西是不存在的。美最初甚至……不,我不行了。过来点……就这样。对,对。这样舒服吗?我的上帝啊……”



您提到的那个谈论运动和目标的人,他的名字的正确叫法是什么来着?”

“伯恩斯坦,”安娜对我耳语道。

“您不觉得他的话完全适用于爱情吗?”

“对,”她轻轻咬着我的耳垂,小声说。“目标微不足道,运动才是一切。”

“那就运动吧,运动吧,求您了。”

“可您说话呀,说话呀……”

“说什么呢?”

“随便说什么都行,只要别停下来。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想听着您的声音。”

“好吧。如果顺着原来的思路……请您设想一下,假设一个漂亮女人能给予的东西是百分之百。”

“会计……”

“对,百分之百。那么,当你看见她时,她已经给了你百分之九十,而剩下的,虽然为此形成的市场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却只是微不足道的零头。而且,前面的百分之九十是不能平分多少份的,因为美是无法确定无法分割的,不管叔本华如何胡说八道。而剩下的百分之十,不过是各种神经信号的总和,如果没有想象和记忆的辅助,一钱不值……安娜,求您了,睁一下眼睛……就这样……对,正是想象和记忆。您知道吗,如果我真要写一部不折不扣的色情剧本的话,我会给出几个暗示,而其余的全是不明不白的谈话,就像……上帝啊,安娜……就像我们现在的谈话。因为没有什么可写的——一切都要靠头脑来添加。欺骗,或许还有女人最大的秘密……啊,



我的姑娘来自古老的庄园……就表现在，美似乎是一张标签，在它后面隐藏着某种无比巨大的，远比它本身更让人渴望的东西，但它只是指引，它后面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一张贴在空瓶子上的金色标签……这就好比商店，橱窗富丽堂皇，应有尽有，内里却局促寒酸，空空如也……求您了，亲爱的，别这么快……是的，店堂内空空如也。想想我给那些不幸的人朗诵的诗吧。关于公爵夫人和面包圈……啊，安娜……不管它多么诱人，你总有一天会明白，这个黑面包圈面包圈面包圈的中间是空的空的空 - 空 - 空的!!”

“什么事？”我把头从枕头上抬起来，喊道。

“虚空，”门外又传来拖长的叫声，“可以进来吗？”

“卑鄙，”我咕哝着坐起来，睡眼惺忪地扫视一下自己的房间，窗外深蓝的暮色正浓，“见鬼！想干什么？”

“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

门开了。一个黄头发、罗圈腿的小伙子站在门口。名义上他是我的警卫员（好像叫谢苗，尽管我没有把握），但现在，受了红军几个星期潜移默化的影响后，谁知道他心里在打什么主意呢，因此，我晚上都是自己脱靴子，也尽量避免在院子里碰见他，以防万一。

“怎么，你在睡觉？”他四下打量着问道，“我吵醒你了吗？对不起。你今天可是让我们大吃一惊。看大家给你送什么来了？”

他把一个报纸包放在我面前的被子上，一种既熟悉又说



不清楚的味道扑鼻而来。我打开纸包。里面是个面包圈，中央广场上的面包店里卖的那种，只不过完全是黑的，散发着士兵们擦靴子用的焦油的气味。

“怎么，不喜欢吗？”他问道。

我抬起头，怒视着他，他撒腿就跑，等我从口袋里掏出勃郎宁时，他已经无影无踪了。我朝门洞连开三枪，子弹发出美妙的声音，擦着走廊的石墙飞出去。

“全是骚货。全是母狗，”我大声吼道，倒在床上。

很久都没人再来打搅我。窗外传来醉汉们的哄笑，还有几声枪响，接着大概是有气无力地扭打起来了。听动静，音乐会已变得混乱不堪，是否有人能控制得了这种局面，也就是彼得堡自由派所说的汹涌澎湃的民众浪潮，很值得怀疑。门还敞开着，走廊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我头脑里突然闪过一线希望——我想起梦通常能预兆吉凶——但这个希望是如此渺茫，以致看到门口出现的是科托夫斯基魁梧的身躯时，我并没有特别失望。想到他又来拿大走马换可卡因了，我不禁哑然失笑。

科托夫斯基穿一套棕色西服，戴一顶宽檐军帽，双手各提着一只旅行箱。他把箱子放在地上，抬起两根手指敬了个军礼。

“晚上好，彼得，”他说。“我，说实话，是来道别的。”

“您要走？”我问道。

“对。我搞不明白，您干吗要留下来，”科托夫斯基说道。“出不了一两天这些纺织工人就得把这儿放火烧了。真不明白，夏伯阳还在指望什么。”



“他打算今天就解决这个问题。”

科托夫斯基耸了耸肩膀。

“您知道吗，”他说，“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可以喝得烂醉，让他们暂时消失。但我更倾向于先行一步。火车晚上八点开。现在还不迟。只要五天我们就到巴黎了。”

“我不走。”

科托夫斯基仔细打量了我一眼。

“您知不知道，您是个疯子？”他问我。

“不错。”

“知道结果会怎样吗？他们会把你们三个人一起抓起来，而这个富尔曼诺夫将趁机夺权。”

“这吓不倒我，”我说。

“这么说，您不怕被逮捕？当然，对我们所有俄罗斯知识分子来说，即使是在疯人院里，仍旧拥有普希金式的秘密自由，还可以……”

我笑了起来。

“您呀，科托夫斯基，可真有本事捉摸我的心思。我今天正好想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您，所谓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秘密自由究竟是什么。”

“如果时间不长，不妨讲来听听，”他答道。

“大概是一年前吧，彼得堡出过一桩极有趣的事情。是这样的，从英国来了几个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当然，所见所闻令他们大为震惊——同我们在游泳池街举行了一次聚会。是诗人协会安排的。亚历山大·勃洛克也参加了，他整个晚上都



在跟他们讲,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跟在普希金后而讴歌这种秘密自由的。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一身素装,神情抑郁。他走后,那些英国人自然是被搞得一头雾水,他们开始刨根问底,这个(秘密自由)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谁也说不清楚。最后,出来个不知为何跟这些英国人在一起的罗马尼亚人,他说他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原来如此,”科托夫斯基看了看手表说。

“别着急,马上就讲完了。他说,罗马尼亚语里有一个相似的成语——‘哈兹巴拉嘎兹’或是类似的话。发音我记不准了。字面意思是‘地下的笑’。是这样的,中世纪时,经常有一些游牧民族侵入罗马尼亚,当地的农民于是建造了巨大的地下室,整片的地下房屋。他们一看到地平线上尘土飞扬,就把所有的牲口赶到下面去。他们自己也藏在那儿,完美的伪装使人侵者在地面上一无所获。藏在下面的农民自然是不敢出声,但万一有时控制不住成功的喜悦,他们就用手捂着嘴笑。这就是秘密自由,这位罗马尼亚人说,也就是当你坐在臭烘烘的牲口堆里,用手指着上面,压低嗓门嘿嘿笑的时候。知道吗,科托夫斯基,他形容得太恰当了,以致从那天晚上起,我已不再是一名俄罗斯知识分子。躲在地下笑——我做不到。自由不可能是秘密的。”

“有意思,”科托夫斯基说,“有意思。不过我该走了。”

“我把您送到大门口,”我说着站起来。“谁知道院子里会碰上什么事。”

“说的是。”

我把勃郎宁手枪揣进口袋,拎起他的一只箱子,正准备跟



着他往走廊上走时，突然心里生出一种奇怪的预感，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这间屋子了。我站在门口，把里面仔仔细细地扫视一遍：两把圈椅，一张床，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伊希斯》一九一五年的合订本。上帝啊，我近乎高兴地想，就算我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又能怎么样呢？就算我不知道我会去哪里，又能怎么样呢？我有去无回的地方还少吗？

“您忘了什么东西吗？”科托夫斯基问。

“没有，”我答道，“走吧。”

从门廊上看到的景象与布留洛夫《庞培的末日》有种隐约的相似。不，没有什么摇摇欲坠的圆柱，黑沉沉的天上也不见烟雾，只有两堆篝火在黑暗中燃烧，喝得烂醉的纺织工人在四处游逛。然而，只要看一看他们如何互相拍打肩膀，如何旁若无人随地小便或举着酒瓶往嘴里灌酒，喝醉了酒的女人们如何半裸着身体在院子里狂笑和闲荡，通红的火光如何映照着这纵饮狂欢场而，便会立刻感觉到，一场不可避免的风暴就要来临。

我们一言不发地快步朝大门口走去。一些带枪的人坐在篝火旁朝我们挥手，含糊不清地喊着什么。科托夫斯基下意识地把手插进口袋。感谢上帝，没人纠缠我们，但当我们转身毫无防备地背对这群醉汉时，距离大门的最后几米让我觉得很长很长。出了大门又往前走了二十来步，我停了下来。蜿蜒而下的马路上阒无一人，零星地亮着几盏路灯，昏暗的光线照在湿漉漉的石子路面上。

“我不远送了，”我说，“祝你好运。”

“你也是。谁知道呢，也许，我们还会见而，”他脸上挂着



奇怪的微笑说道。“或是听到彼此的消息。”

我们握了手，他又一次抬手敬了个军礼，然后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我目送着他魁梧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转弯处，我才慢吞吞地返回。我在大门口站住，小心翼翼地往里面张望了一下。夏伯阳办公室的窗户里没有灯光。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在院子里见到的情景会让我惶恐不安——这有点像荣格伦男爵描述的世界。我不想再从坐着醉汉的篝火旁走过去。

我清楚夏伯阳会在哪里。沿围墙走了大概有四十米后，我环顾一下四周。看不见一个人影。我弓身一跳，双手攀住墙沿，然后纵身一跃，翻过墙头。

四周很黑。篝火遮住了寂静的庄园的黑色轮廓。我摸索着穿过刚下过雨的树林，找到通往峡谷的人口，然后仰躺着滑了进去。一条看不见的小溪在我右侧的某个地方潺潺流淌，我伸出双臂，循着水声走去，没走几步就在一些树干中间看到一扇闪着亮光的浴室的窗户。

“进来吧，彼得卡，”听到我的敲门声后，夏伯阳喊道。

他坐在那张熟悉的木桌前，上面放着一个盛着家酿酒的大酒瓶，几副杯盘，一盏煤油灯和一个厚厚的文件夹。他已经醉得不轻，身上的白衬衫敞开着，露出了肚脐。

“你想说什么？”他问。

“依我看，您打算解决那些红色纺织工人的问题，”我答道。

“我正在解决，”夏伯阳给两个杯子倒上酒，说。

“看来，科托夫斯基很了解你，”我说。



“没错，”夏伯阳回答，“我也很了解他。”

“他刚刚坐夜车去巴黎了。我觉得我们没走真是大错特错。”

夏伯阳皱了皱眉头。

“‘但我们心中还燃烧着热望，’”他抑扬顿挫地朗诵道，“‘一列列火车向它驶去，意识的蝴蝶从无处飞向无处……’”

“您也读过？很荣幸，”我说，随即又苦恼地意识到，这里的“也”用得不妥当。“听我说，如果我们马上出发，还能赶上火车。”

“在巴黎我什么没见过啊，”他说道。

“显然没见过我们在这儿很快将要见到的事情，”我回答他。

夏伯阳笑了。

“你呀，彼得卡，你说得对。”

“对了，”我关切地问道，“安娜呢？房子里可不安全。”

“我给她派了任务，”夏伯阳说，“一会儿就来了。她不会有事的。你坐呀。我一直在等你呢，你看，已经喝了半瓶了。”

我在他对面坐下来。

“祝你健康。”

我耸了耸肩。现在没有办法了。

“祝您健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我们一饮而尽。夏伯阳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昏暗的煤油灯光。

“我刚才还在琢磨你的那些噩梦，”他把手放在文件夹上，说道。“你写的那些故事我又重读了一遍。关于谢尔久克，关



于这个不男不女的马利亚,关于那些医生和强盗。你有没有留心过自己是怎么从这些梦中醒来的?”

“没有,”我答道。

“试着回忆一下吧。”

我沉思起来。

“只不过从某一刻开始,我明白了这是一场梦而已,”我迟疑地说道。“当你太过难受时,你就会突然意识到,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

“因为什么?”

“怎么说合适呢。这么说吧——因为有醒的去处。”

夏伯阳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究竟醒到何处去?”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出来。

“我不知道,”我老实告诉他。

夏伯阳抬起眼看着我,笑了。我突然觉得他并没有醉。

“好样的,”他说。“就是那里。当你被梦境的洪流裹挟时,你自己就成了它的一部分,因为在这股洪流里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在流动,没有可以抓住的东西。身陷旋涡时你不会明白这一点,因为你自身在随它一起运动并觉得它是静止的。这样,梦中就会产生真实感。但有一个点,不是相对静止而是绝对静止的点,这就是‘我不知道’。当你在梦中进入这个点时,你就醒了,更准确地说,你首先是醒到这个点里的。然后才,”他环指一下房间,“到了这里。”

墙外传来机枪的射击声,随后是爆炸声,窗户玻璃震得直响。



“但这个点在生活中，”他接着说道，“是绝对静止的，对它而言，整个生活就是一场梦，跟你的故事一样。世上的一切不过是思想的旋涡，而我们周围的世界之所以变得真实，就因为你自身成了这个旋涡。就因为你知道。”

他在“知道”这个词上加重了语气。

我起身走到窗前。

“您听，夏伯阳，他们好像在放火焚烧庄园。”

“有什么办法呢，彼得卡，”他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在着火的房子里解决。”

“我同意，”我在他对面坐下，说，“您说得好极了，思想的旋涡，以及诸如此类。世界正变得既真实又不真实，这些我都懂。可一些不速之客马上就要到了……您明白吗，我不想说他们是真实的，但他们会强迫我们充分感受他们的真实性。”

“强迫我吗？”他问，“不会的。你看着吧。”

他拿起酒瓶子，把一只蓝色的小碟子拉到跟前斟满，接着又把杯子斟满。

“你看，彼得卡，酒本身并没有形态。这是杯子，这是碟子。这里面哪一种形态是真的？”

“都是，”我说，“都是真的。”

夏伯阳认认真真地喝干碟子和杯子里的酒，然后把碟子和杯子使劲摔到墙上。碟子和杯子被摔得粉碎。

“彼得卡，”他说，“你看好了，而且要记住。如果你是真的，你就真的会死。就连我也救不了你。我再问你一遍。这是杯子，这是瓶子。这里面哪一种形态是真的？”

“我不知道您指什么。”



“要我展示吗？”他问。

“展示吧。”

他身子晃了一下，从桌子里摸出自己那把镀镍的毛瑟枪。我赶紧上前阻止。

“好，很好。但用不着对瓶子开枪。”

“对，彼得卡。还是喝酒吧。”

夏伯阳把杯子斟满，又陷入沉思。他好像是在搜肠刮肚，寻找合适的字句，却又一时语塞。

“其实，”他终于说话了，“对酒来说是不存在什么碟子、杯子、瓶子的，只存在它自己。所以，凡是有生有灭的东西，在酒接受它们之前，都是一系列子虚乌有的形态。把酒倒进碟子，这就是地狱；倒进碗里，这就是天堂。而我们是用杯子喝酒。而这一点，彼得卡，让我们成了人。明白吗？”

窗外又传来一声巨响。不用走近窗户就能看见玻璃上面血红的反光。

“对了，关于地狱，”我说，“我忘了是否跟您谈起过。您知道为什么这些纺织工人迟迟没有对我们动手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深信，您已经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了。”

“是吗？”夏伯阳惊诧地问道。“有意思。什么人会出卖灵魂？”

“什么意思？”

“都说什么把灵魂卖给了魔鬼，或是卖给了上帝。可出卖灵魂的人是谁呢？他应该同他卖的东西有所区别，这样才能卖出去呀。”



“您要明白，夏伯阳，”我说，“我受过的天主教教育不允许我拿这些东西开玩笑。”

“我明白，”他说。“我知道这些传言是从哪里来的。确实有个人来这儿找过我，他对如何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很感兴趣。就是那个奥维奇金上尉。你认识吗？”

“在饭馆里碰见过。”

“我告诉他该怎么做。他极其虔诚地完成了这项仪式。”

“然后怎么样了？”

“没什么特别的。他没拿到钱，也没长生不老。唯一的结果是，在团部所有的档案中，他的姓由‘奥维奇金’改成了‘科兹洛夫’。”

“这是为什么？”

“做骗子可不好。他怎么能卖自己没有的东西呢？”

“这么说，”我问道，“奥维奇金没有灵魂？”

“当然没有，”夏伯阳答道。

“那您呢？”

夏伯阳审视一下自己，然后摇了摇头。

“那我有吗？”

“没有，”他说。

显然是我的神态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夏伯阳笑了一下，并安慰地拍了拍我的胳膊肘。

“是的，彼得卡，我，你，还有奥维奇金上尉，都没有灵魂。是灵魂有奥维奇金，有夏伯阳，有彼得卡。关于灵魂，不能说人人有别，也不能说人人一样。如果有什么可以说得话，那便是：它也不存在。”



“我现在可是完全糊涂了。”

“是这么回事，彼得卡……在这件事上科托夫斯基也错了。你还记得那盏带蜡的油灯吗？”

“记得。”

“科托夫斯基能理解形态是不存在的，但他却不能理解蜡也不存在。”

“为什么？”

“就因为，彼得卡，你听仔细了，就因为蜡也好，酒也好，它们可以选择任何形态，但就连它们本身也不过是形态而已。”

“什么东西的形态？”

“关键就在这里。这是这样的一些形态，关于它们，只能说，能够接受它们的任何事物都不存在。明白吗？所以，实际上，既不存在蜡，也不存在酒。什么都不存在。就连这个‘不存在’也不存在。”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是站在一道门槛上，紧接着，又是一阵难以抗拒的头重脚轻的感觉。思维突然间变得迟钝起来。

“蜡是不存在，”我说。“可酒还有半瓶呢。”

夏伯阳茫然地瞥了一眼桌子。

“没错，”他说。“但假如你仍旧能明白它也不存在，我就把胸前的勋章送给你。不过现在不能给你，得等我们从这里出去的时候。”

我们又对饮了一杯，我仔细听了一阵从墙外传来的枪声。夏伯阳对此毫不在乎。

“你真的不害怕吗？”我问。



“你怎么，彼得卡，害怕了？”

“有点儿，”我承认。

“怕什么？”

“死，”我回答，“确切地说，不是死本身，而是……不知道。我想拯救自己的意识。”

夏伯阳笑起来，摇摇头。

“我说了什么可笑的话吗？”

“你真有意思，彼得卡。没想到你能说出这样的话。你怎么，每次都是抱着这种想法冲锋陷阵的吗？这就好比一张报纸躺在路灯下想要拯救照在自己身上的灯光。再说，你想把意识从何处拯救出来呢？”

我耸了耸肩说：

“从虚无之中。”

“难道虚无就不是意识的对象？”

“您又要诡辩了，”我说。“就算我是一张报纸，想拯救照在自己身上的灯光，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的确是这么想的，并且这一切会给我带来痛苦？”

“可你要知道，报纸是不会思想的。上面不过印了一行斜体字：‘我想拯救灯光’。而旁边则写着：‘噢，我多么痛苦，多么疲惫……’唉，彼得卡，我该怎么跟你说呢……这整个的世界就是上帝给自己讲的一个笑话。而且就连上帝自己也同样是笑话。”

墙外传来一阵爆炸声，这次离我们非常近，震得窗户上的玻璃抖个不停。我清楚地听到了弹片击落树叶的声音。

“这样吧，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坚持不住了，“理论就



讲到这里吧。现在最好想个实际的办法。”

“说实话，彼得卡，你要是害怕的话，我们俩就会一块完蛋。因为恐惧总是偏偏招来你害怕的东西。如果你无所畏惧，你就不会被发现。最好的伪装就是无动于衷。只要你真正做到无动于衷，能对你作恶的人就记不起你，想不到你。但如果你心慌意乱，坐立不安，就像现在这样，那五分钟后纺织工人就全找到这儿来了。”

我茅塞顿开，不禁为自己的表现感到汗颜。同他的镇定自若相比，我的惊慌失措实在太可怜了。难道刚才拒绝科托夫斯基的不是我吗？我来这里是自己做的决定，而现在却把这点或许是生命中最后的时间浪费在担惊受怕上，真是愚蠢。我瞥一眼夏伯阳，暗想，其实，我对这个人一点也不了解。

“告诉我，夏伯阳，您到底是谁？”

“你，彼得卡，还是先回答你自己到底是谁吧。然后对我也就完全清楚了。否则你整天只会说‘我，我，我’，就像你梦里的那个强盗。可这个‘我’究竟是什么？是谁？自己看看吧。”

“我是想看看，可是……”

“如果你真想的话，那为什么你现在不看自己，而是看这个‘我’，看这个‘想’，看这个‘看看’，还有这个‘可是’？”

“好吧，”我引开话题，“请您回答我的问题。您能直截了当地回答吗？”

“能，”他说，“完全能。”

“您是谁，夏伯阳？”

“我不知道，”他答道。



两三颗子弹“砰砰”击中了浴室的板墙，飞起几片木屑，我本能地急忙低下头。门外有人窃窃私语，可能在商量什么。夏伯阳倒了两杯酒，我们没有碰杯就喝了下去。我犹豫了一下，从桌子上拿起葱头。

“我明白您是什么意思，”我咬了一口葱头说道，“但毕竟可以换一种方式回答吧？”

“可以，”夏伯阳说。

“那么您是谁呢，夏伯阳？”

“我？”他抬眼看着我，反问道。“我是反射在这个瓶子上的灯光。”

我感到他的眼睛反射出的光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脸上。我完全没有料到，我会豁然开朗。

这一鞭子抽得如此有力，以致开始我还以为，是一发炮弹在屋子中间炸开了。不过我很快就回过神来。我并没要求说出来，但言语的惯性已经把我的思想转化成了语言。

“最有意思的是，”我喃喃道，“我也是。”

“那么这是谁？”他指着我问。

“虚空，”我回答。

“这呢？”他指着自已。

“夏伯阳。”

“好极了！那这呢？”他环指一下房间。

“我不知道，”我说。

这时，“啪”的一声，子弹穿过窗户，击碎了放在我们俩之间的瓶子，还未来得及喝完的酒溅了我们一身。我们默默地对视片刻，然后夏伯阳站起来，走到放制服的凳子旁边，从衣



服上取下银质五角星，大老远地扔给我。

他的动作异常敏捷，很难相信这就是那个刚才还在板凳上醉得摇摇晃晃，两眼失神地盯着瓶子的人。他从桌上抓起油灯，灵巧地将它卸开，把煤油倒在地上，然后把烧着的灯芯往煤油上一丢。煤油迅速燃烧起来，洒在地上的酒也跟着烧起来，黯淡的火光一下子照亮了房间。在火光的映衬下现出浓重阴影的夏伯阳的脸，在我的眼里，突然变得古老而又熟悉起来。他一把掀翻桌子，弯下腰，揭开装有铁环的地洞盖子。

“从这儿走，”他说，“这里没什么事情可做了。”

我抓住梯子，试探着一级一级往下爬。下面又潮又冷，黑咕隆咚的。地洞底部离地面约有两米。我有些纳闷，我们到这里干什么呢。我伸出一只脚，以为会碰到墙，不料前面是空的。夏伯阳跟在我后面，他的一只靴子碰到了我的头。

“往前走！”他命令道。“快点儿！”

梯子旁边有一条狭窄低矮的巷道，两边用木桩加固。我一边走，一边瞪大眼睛，企图在黑暗中发现点什么。从穿堂风给人的感觉来看，出口不是很远。

“停，”夏伯阳小声说，“得等一会儿。”

他在我后面，距我有两米多远。我靠着一根木桩坐在地上。上面传来含混不清的吵嚷声。我又一次清楚地听到了富尔曼诺夫的吼叫：“别往里钻，你他妈的！你会给烧死的！我说他们不在这儿，早溜了！那个秃头抓住了吗？”想到这些人正在他们用集体的混乱理性制造出来的丑陋幻想的烟雾中奔突，真让人啼笑皆非。

“哎，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轻声叫他。



“什么事？”他回话。

“我明白了一件事，”我说。“自由只有一种，那就是当你从理智所建立的东西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这种自由叫‘我不知道’。您完全正确。您知道，有这样一种说法——‘思想一经言说就会出错’。夏伯阳，我告诉您，未言说的思想也会出错，因为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可言说性。”

“真有你的，彼得卡，说得好，”夏伯阳附和道。

“一旦我知道，”我继续说，“我就不自由了。但我不知道的时候是绝对自由的。自由，这是所有秘密中最大的一个秘密。他们，”我用手指敲了敲低矮的地道棚顶，“根本不知道自己自由到了什么程度。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他们……”我忍不住大笑起来，“他们以为自己是纺织工人……”

“小声点儿，”夏伯阳说。“别跟马似的乱吼。他们会听见的。”

“这就是说，不是这样的，他们，”我缓了口气又说，“他们甚至不认为自己是纺织工人……他们知道这一点……”

夏伯阳踢了我一脚。

“往前走，”他说。

我深吸几口气，让自己清醒过来，然后继续往外爬。我们一言不发地走完了剩下的路。大概是太低和太窄的缘故，我觉得地道长得难以置信。地下散发出一股潮气，不知为什么，还有一股干草味儿，而且越来越浓。终于，我伸出的双手碰到了一堵土墙。我站起来，挺直身子，头重重地碰在铁做的什么东西上。根据周围的黑暗，我断定我是站在一个不深的坑里，坑沿的上方是一块铁板。铁板和地面之间，有半米左右的空



隙。我钻进去，扒开填在里面的干草，爬了一两米后，碰到一只粗大的橡胶轮胎。我突然想起少言寡语的巴什基尔看守的那个大草垛，顿时明白了夏伯阳把装甲车藏在了什么地方。转眼间我已站在草垛边上了，草垛一侧的草已经被扒开，露出了半开着的布满铆钉的门。

冲天的大火吞噬了庄园。跟所有的大火一样，这景象蔚为壮观。离我们五十米左右的树林里燃烧着另一团火，稍小一些儿——我跟夏伯阳刚才呆过的浴室着火了。我觉得我看见了浴室周围的人，但这完全有可能是斑驳的树影，当火舌在风中抖动时，它们也跟着摇摆不定。不管我看见了没有，那里毫无疑问是有人的，因为疯狂的叫声和枪声就是从着火的地方传过来的。假使我不明内情，肯定会以为是两支队伍在激烈交火呢。

身边有簌簌的声音，我拔出手枪。

“是我，”安娜说道。

她身穿军便服和马裤，脚着皮靴，手里握着一根弯曲的铁棍，有点像汽车发动杆。

“感谢上帝，”我说，“您不知道您不在我多难过。脑子里总是在想，这群醉鬼……”

“别让我闻你满嘴的洋葱味，”她打断我，“夏伯阳在哪儿？”

“我在这儿，”夏伯阳说着从装甲车下面钻出来。

“怎么这么久？”她问，“我都开始担心了。”

“彼得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回答。“有一阵我还以为我们要留在那儿了呢。”



“那他现在弄明白了吗？”安娜问。

夏伯阳瞥了我一眼。

“他什么也没弄明白，”他说，“那边开火了，火力很猛。”

“听我说，夏伯阳。”我刚要开口，就被他用命令的手势制止了。

“一切顺利吗？”他问安娜。

“顺利，”她说，把发动杆递给他。

我突然领悟到，夏伯阳永远是正确的：我敢说我懂的事情还没有过。

夏伯阳迅速拨开遮在装甲车前盖上的干草，把发动杆插进散热器孔里，打了几次火。发动机轻微而有力地响了起来。

安娜打开门，钻进车里。我和夏伯阳跟在她后面上了车。关上门后，夏伯阳啪地一声打开电灯。在经历了地道的黑暗后，这灯光让人感觉有些刺眼。车内的陈设是我所熟悉的——几把窄小的皮沙发，一幅用螺丝固定在墙上的风景画，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本孟德斯鸠的书和一包“伊拉”牌香烟。安娜快步登上螺旋梯，坐在射击手的转椅上，腰部以下隐藏在机枪塔里。

“我准备好了，”她说。“可干草挡在前面，什么也看不见。”

夏伯阳拿起通驾驶室的话筒（我猜想司机就是那位被战士们称为拔都的巴什基尔哨兵），说道：

“扒开草垛。别让轮子陷进坑里。”

发动机吼叫起来，沉重的车身抖了一阵，然后离开原地，向前走了几米。上面传来机械的响动，我抬起头，看见安娜正



在摇一个像咖啡磨把手似的东西，机枪塔和她的座椅随之转动起来。

“现在好些了，”她说。

“打开前灯，”夏伯阳对着话筒说。

我凑近门上的瞭望孔。原来，装甲车前盖上装了一圈前灯，打开的时候，就像打开了一圈路灯，把一个昏暗的花园照得雪亮。

这个花园很奇特。照在树上的雪白的电灯光要比通红的火光亮得多，那些看上去好像人一样在黑暗中穿梭跳跃的影子消失了，已经看得清四周空无一人。

但很快我们就不孤单了。在光圈的边缘，出现了拿着步枪的纺织工人，他们用手遮挡着刺眼的灯光，不出声地望着我们。不一会儿，装甲车周围便组成了一圈全副武装的人墙。听得见零零碎碎的交谈：

“原来他们在这儿……不，他们跑不了……已经溜了……收起手榴弹，傻瓜，会把自己人炸了……”

他们朝装甲车开了几枪，子弹砰砰地擦着车身弹出去。一只前灯被打灭，人群中发出一阵欢呼。

“有什么办法呢，”夏伯阳说，“凡事都该有个了断。安娜，注意……”

安娜小心翼翼的卸下机枪套。一颗子弹落在门上的瞭望孔旁边。我朝里面挪了挪，以防万一。安娜满脸怒容地趴在机枪上，眼睛贴紧瞄准具。

“火！水！土！空！气！”夏伯阳喊道。

安娜快速摇动旋转手柄，机枪塔吱吱嘎嘎旋转起来。枪



没响。我疑惑地看着夏伯阳。他做了一个安慰的手势。机枪塔转了一圈后停了下来。

“怎么，卡住了？”我问。

“不是，”他答道。“已经完事了。”

我突然发现，枪声和说话声都听不见了。外面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发动机轻微的突突声。

安娜从机枪塔上下来，在我身边坐下，然后点燃一支烟。我发现她的手指在颤抖。

“这是黏土机枪，”夏伯阳说道。“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了。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机枪。只是几千年前，在燃灯佛和释迦牟尼佛降生前很久，有一位叫阿那伽玛的佛。他从不花时间解释，只需用左手的小指指点，他指什么，什么的真正本质就会立刻显现出来。他指一下山，山没了，他指一下河，河不见了。这个故事说来话长，简单地说，结局是这样的，他用小指指了一下自己，从此便消失了。他身上留下来的只有这根左手的小指，他的徒弟们把它藏在一块黏土里。黏土机枪就是这块包着佛的小指的土块。很久前在印度曾有人试图把这块黏土变成地球上最可怕的武器。但他刚在上面凿出一个小孔，这根手指便指向了他，于是他就消失了。从那以后，这根小指就被保存在一个紧锁的箱子里，辗转各地，直到最后遗失在一家蒙古寺院里。而现在，几经周折，又落在了我的手中。我给它装了一个枪托，叫它黏土机枪。刚才派上用场了。”

夏伯阳站起来，打开门跳出去。我听见他的靴子落在地上的声音。安娜跟着钻了出去，我依旧坐在沙发上看墙上的



那幅英国风景画。河流，小桥，飘着云彩的天空和朦胧的废墟——不会吧，我想，不会吧？

“彼得卡，”夏伯阳叫我，“你坐那儿干吗？”

我起身走出车门。

我们站在一块直径约七米，上面撒满干草，有一处不明豁口的圆形场地上。周围空无一物，只有一片柔和而平坦的、难以名状的光。圆形场地的边缘躺着半截带刺刀的步枪。我突然想起勃洛克《滑稽草台戏》里的一个场景：阿尔列金破窗跳出去，上面画着远方的窗户纸被撞碎，出现一片灰色的空白。我回头望了一下。装甲车的发动机还开着。

“为什么这个小岛能幸存下来？”我问。

“这是盲区，”夏伯阳回答。“小指指到了这块场地以外的一切。这就像灯柱的影子。

我向旁边跨了一步，夏伯阳一把抓住我的肩膀。

“你往哪儿去……别去机枪下面。”

他转向安娜。

“安娜，好了……离罪恶远点儿。”

安娜点了点头，小心地走到短短的喇叭形枪口下。

“看仔细了，彼得卡，”夏伯阳说。

安娜用嘴咬住烟卷，拿出一面圆形的小镜子。她把镜子举到机枪枪管的高度，还没等我明白过来怎么回事，装甲车已经不见了。这事发生在刹那间，而且轻松得难以置信，就像有人突然关掉了魔灯，被单上的画面一下子消失了。现在只剩下四个浅浅的车轮印，被压倒的草慢慢地挺起来。没有一点声音。



“好了，”夏伯阳说。“这个世界再也不存在了。”

“见鬼，”我说，“香烟忘在那儿了……听我说，司机怎么办？”

夏伯阳一怔，惊恐的看看我，又看看安娜。

“真见鬼，”他说，“把他给忘了……你，安娜，你怎么没说一声？”

安娜摊开两手。她这个手势中没有一点真情实感，我想，她长得固然很美，但未必会演戏。

“不对，”我说，“有点不对劲。司机在哪儿呢？”

“夏伯阳，”安娜说，“我无能为力了。您自己想办法吧。”

夏伯阳捻着胡须，叹了口气。

“别担心，彼得卡。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司机。你是知道的，有一种带特殊标记的纸，你把它往木头上一贴，就……”

“啊，”我说，“原来是一帮乞丐。明白了。别拿我当十足的白痴好吗？我早就发现他怪里怪气的。不过，夏伯阳，凭你们的才能可以在彼得堡混一混了。”

“在你的彼得堡我什么没见过，”夏伯阳说。

“等等，科托夫斯基呢？”我激动地问。“怎么，他也消失了？”

“由于他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夏伯阳答道，“回答这个问题可不容易。但如果你是出于人道担心他的命运，那就用不着紧张。我向你保证，科托夫斯基跟你我一样，有能力建造自己的宇宙。”

“那里有我们吗？”

夏伯阳沉思起来。



“有意思的问题，”他说。“我就想不出来。可能会有我们，但以什么身份，我可不敢断言。我怎么知道科托夫斯基在他的巴黎会建造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怎么知道科托夫斯基会在他的世界建造一个怎样的巴黎呢？”

“行了，”我说，“又是诡辩。”

我转过身子，向场地边沿走去，但没能到达最边沿，走到距离圆形边界有两米远的地方时，我开始头晕目眩，费了很大劲才坐到地上。

“您不舒服吗？”安娜问。

“我很好，”我答道，“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三个人一起生活吗？”

“哎呀，彼得卡，”夏伯阳说，“跟你解释多少遍了。所有的形态都是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意思是，空就是所有的形态。闭上眼睛。现在睁开。”

我不知道该如何用语言来描述这一瞬间。

出现在我面前的仿佛是一条泛着七色虹彩的宽阔无边的河流，它发端于无穷，又流向无穷。它围绕着我们这个小岛，涌向目力所及的四面八方，但这不是海洋，而是河流，因为它的流向清晰可辨。它反射在我们三人身上的光芒璀璨无比，却毫不刺眼，也不恐怖，因为它同时也是法力无边的仁慈、幸福和爱——说实话，这三个被文学艺术用滥的词已经无法表达任何东西。只要看着这些连续不断的五彩缤纷的光焰就够了，因为我能思考或梦想的一切都是这条七彩之河的一部分，确切地说，这条七彩之河就是我能思考或体验的一切，就是可



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一切,而且,我深知,它与我没有什
么区别。它即是我,我即是它。我永远是她,此外什么都不是。

“这是什么?”我问。

“虚无,”夏伯阳答。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它叫什么?”

“叫法很多,”夏伯阳说。“我叫它绝对之爱的相对之河。
简称乌拉尔。我们忽而变成它,忽而获得形态,但实际上既不
存在形态,也不存在我们,甚至不存在乌拉尔。所以人们才说
——我们,形态,乌拉尔。”

“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

夏伯阳耸耸肩。

“我不知道。”

“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呢?”我问。

“人总得在这永恒中做点儿什么,”他说。“所以我们才试
图游过这条并不存在的乌拉尔河。别怕,彼得卡,跳进去吧!”

“那我还能回来吗?”

夏伯阳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当然能,”他说。“既然你站在这儿。”

“那我还是我自己吗?”

“彼得卡,”夏伯阳说,“当你绝对就是可能存在的一切时,
你怎么会不是你自己呢?”

他还想说些什么,但这时安娜已经吸完烟,她把烟蒂扔在
地上,认认真真地用脚踩灭,然后,连看都没看我们一眼,就奔
跑着跳进河里。

“就像这样,”夏伯阳说。“这就对了。别费口舌了。”



他一边狡黠地对我微笑着，一边向场地的边缘退去。

“夏伯阳，”我惊恐地喊道，“等一等。您不能就这样丢下我。您总该说清楚……”

但已经晚了。他脚下的泥土塌了下去，他失去平衡，张开双臂，仰面倒虹彩的光芒中。这光芒跟水一样，先是泡沫四溅地在他身下裂开，等到将他淹没后又迅速合拢。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足足有好几分钟，我一动不动地望着夏伯阳消失的地方。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疲惫极了。我把撒在四周的干草堆在一处，躺在上面，凝视着高远莫测的灰色天空。

我突然意识到，时间伊始我就躺在乌拉尔河岸上，没完没了地做梦，也没完没了地在这里醒来。但若果真如此的话，我想道，我的生命又耗费在什么地方了呢？文学艺术不过是飞舞在宇宙最后一堆干草上方的忙碌的蚊虫而已。有谁，我想，有谁会读到我对梦的描述呢？我瞥一眼从四面八方流向无穷的乌拉尔河平静的水面。钢笔、记事本和所有那些能够阅读留在纸上的符号的人，此刻不过是一些五颜六色的光焰，忽明忽灭。莫非，我想，莫非我又会在这岸上睡着？

我不假思索地站起来，奔跑着跳进乌拉尔河。

我几乎什么也感觉不到，只知道它来自四面八方，因而也就不存在任何方向。我看到了这条河流开始的地方，顿时明白了这就是我真正的家园。犹如一片被风裹挟着的雪花，我向这个点奔去。刚开始我的运动轻松自在，可后来出了一件怪事——我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摩擦力拉扯着我的小腿和手肘，使我的速度慢下来。而速度一慢，我周围的亮光也开始



变得黯淡，等到我完全停下来时，光明已变成半明半暗，而这半明半暗的来源，我突然领悟到，就是天花板上的电灯泡。

我的手脚被人用皮带绑在圈椅上，头靠在一只小小的漆布枕头上。

半明半暗中浮现出铁木尔·铁木罗维奇两片肥厚的嘴唇，它们贴近我的前额，在上面留下一个湿漉漉的长吻。

“一场彻底的宣泄，”他说。“祝贺你。”



10

“八千二百俄里的空，”收音机喇叭里一个动情得发抖的男声唱道，“可我跟你还是无处安身……我该多么快活，如果不是你，如果不是你，我的祖国母亲……”

沃洛金站起来，啪地一声关掉开关。音乐停了。

“你干吗关掉？”谢尔久克抬起头问。

“我欣赏不了格列比翁希科夫，”沃洛金说。“人嘛，还是很有才气的，就是太喜欢胡言乱语。张口佛教闭口佛教，尽说那些听不懂的话。这会儿又唱起祖国母亲来了。你知道，这是从哪儿来的吗？中国的白莲教有这样一句真言：‘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编密码编得可真够玄乎的，要弄明白他的意思，非得累死不可。”

谢尔久克耸了耸肩，继续埋头工作。我揉捏着橡皮泥，不时地瞥一眼他敏捷地叠着纸鹤的手指。他干起这活儿来麻利得惊人。看都不用看。审美治疗实习课的房间里到处都是这种纸鹤；尽管今天早上热尔布诺夫和巴尔博林刚刚打扫过，扫出去的纸鹤在走廊里堆成了小山，地上还是很快又积了很多。但谢尔久克对自己千篇一律的作品的命运毫不关心，他只管



拿铅笔在纸鹤的翅膀上编号，写完便把纸鹤扔到一边，然后再从练习本上撕下一张纸，重新开始。

“还剩多少？”沃洛金问。

“赶开春应该能来得及，”谢尔久克把目光转向我说。“你听着，我又想起来一个段子。”

“说来听听，”我回答。

“简单地说就是，彼得卡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坐在一块喝酒。突然跑进来一个士兵报告：‘白军来了！’彼得卡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们赶紧跑吧。’夏伯阳不慌不忙，把两个杯子倒满，说：‘喝，彼得卡。’他们一饮而尽。又一个士兵跑进来：‘白军来了！’夏伯阳又把两个杯子倒满：‘喝，彼得卡！’第三个士兵跑进来，说白军已经包抄过来了。夏伯阳问：‘彼得卡，你能看见我吗？’彼得卡回答说：‘看不见。’于是夏伯阳说：‘我也看不见你。隐蔽得好。’”

我不以为然地叹了口气，从桌子上拿起一块新的橡皮泥。

“这我知道，只是结尾不一样，”沃洛金说。“白军冲进来，搜索一下房间，说：‘真邪门，又溜了。’”

“这还沾点儿边，”我也发言了，“尽管同样是胡扯。什么白军……我真不明白，怎么什么事都能歪曲成这样。还有什么段子？”

“我还记得这样一个段子，”谢尔久克说，“简单地说，就是彼得卡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游渡乌拉尔河。夏伯阳的嘴里叼着一个小箱子……”

“哎哟，”我哼了一声。“这是谁编出来的？……”

“简单地说，他眼看就要沉下去了，可还是叼着箱子不放。”



彼得卡对他喊：‘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扔掉箱子，你想淹死呀！’可夏伯阳说：‘说什么呢，彼得卡！不能扔。里面有作战地图。’还好，他总算上了岸。彼得卡说：‘怎么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把你那张差点儿要了我们命的地图拿出来看看吧。’夏伯阳打开箱子。彼得卡一看，里面竟是土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这是什么地图啊？’夏伯阳拿出两个土豆放在地上，说：‘你看，彼得卡，这是我们，这是白军。’”

沃洛金笑起来。

“全是无稽之谈，”我说。“第一，谢尔久克，即便是您能活上一万辈子，到头来能有一次机会淹死在乌拉尔河里，那也算您吉星高照了。第二，我怎么也搞不懂，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些白军，没完没了的。我想，这儿肯定还有捷尔任斯基和他的办公室吧。第三，这绝对不是军队的配置图，而是意识的隐喻图。箱子里面放的也不是土豆，而是洋葱。”

“洋葱？”

“对，洋葱。尽管考虑到一些个人情况，我倒宁愿里面是土豆。”

沃洛金和谢尔久克面面相觑。

“这个人也想出院，”沃洛金说。“啊，我想起来了。夏伯阳在日记中写过：‘六月六日。我们打退了白军……’”

“他从来不写日记，”我脱口而出。

“‘六月七日。白军打退了我們。六月八日。护林员来了，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了。’”

“明白了，”我说，“这肯定是指荣格伦男爵。不过很遗憾，他并没有来。还有，他也没当过护林员，他只是说过他一直想



当护林员。先生们,我觉得你们讲的这些事很奇怪。你们的消息是很灵通,但我总有这样的感觉,就是那个知道底细的人总想变着法子歪曲事实。不知他用心何在。”

有那么一阵子谁都不吭声了。我一边埋头干自己的活,一边考虑着等会儿该怎么跟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谈。他的行为逻辑直到现在我吃不准。在马利亚将亚里士多德胸像砸碎在我头上一星期后,他就让他出院了,而对沃洛金这样一个我认为再正常不过的人他却又给安排了一个药物疗程。无论如何,我想,是用不着提前想好答案的,因为我准备好答案的问题他可能一个也不问,且我的回答也肯定会驴唇不对马嘴。只能碰运气了。

“好吧,”沃洛金终于说道。“那您能举例说明到底什么地方被歪曲了吗?说说看,事情本来是怎样的?”

“您究竟对什么感兴趣?”我问。“您刚才提到的哪个段子?”

“随便哪个段子。再说点儿别的也行。对了,比如说这个段子,我可想象不出这里能有什么被歪曲。科托夫斯基从巴黎给夏伯阳寄来红鱼子酱和白兰地。夏伯阳给他回信说:‘谢谢,家酿酒我跟彼得卡喝了,虽然里面有股臭虫味儿,可红莓苔子没吃——鱼腥味太重了。’”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科托夫斯基什么也没寄过。不过这里编得有点儿像。我们是坐在饭馆里,确实喝了白兰地,吃了红鱼子酱——我知道这会给人什么印象,但那儿没有黑鱼子酱。我们在谈论基督教聚合体,所以用的都是术语。夏伯阳在解释斯维登



堡^① 书中的一个说法。书里说一道天国之光照进地狱深处，而住在那里的灵魂却以为这是臭水沟。我是这样理解的，这光自身会变形，但夏伯阳说，光的属性是不会改变的，一切都取决于接受主体。他说，并不存在什么能够阻止有罪的灵魂升入天堂的力量，不过是灵魂自己不想去那里罢了。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他解释说，我吃的鱼子酱对富尔曼诺夫的某个纺织工人来说或许就是带鱼腥味儿的红莓苔子。”

“明白了，”沃洛金说，不知为何脸色变得苍白。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出人意料的念头。

“等一等，”我说，“您说白兰地是从哪儿寄来的？”

沃洛金没回答。

“有什么区别吗？”谢尔久克问。

“没什么，”我若有所思地说，“只是我觉得，我就要猜到这些都是从谁那儿传出来的了。当然，很奇怪，也根本不像是他，但别的解释又太荒唐了……”

“听着，我又想起一个段子，”谢尔久克说，“简单地说，就是夏伯阳来找安娜，她一丝不挂地坐着……”

“先生，”我打断他，“您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这可不是我想编的，”谢尔久克无赖地答道，随手把一只刚叠好的纸鹤扔到一边。“简单地说，他问她：‘安娜，你为什么光身子？’她回答：‘我没有连衣裙。’他打开衣柜，说：‘怎么没有？一条。两条。你好，彼得卡。三条。四条。’”

“一般说来，”我说，“冲这话应该狠狠地揍您一顿。但不

^① 斯维登堡(1688—1772)，瑞典哲学家，神秘主义神智学家。



知为什么,我只是感到伤心。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安娜过生日,我们去野餐。科托夫斯基很快喝醉睡着了,而夏伯阳则开始给安娜解释说,人的个性就像一条接一条地从柜子里拿出来的连衣裙,人越不真实,这个柜子里的连衣裙就越多。这就是他给安娜的生日礼物——不是连衣裙,而是解释。安娜怎么也不同意他的说法。她试图证明,这或许在原则上能站住脚,但跟她毫不相干,因为她就是她自己,不戴任何面具。但对她的话,夏伯阳的回答是:‘一条,两条’等等。您明白吗?后来安娜问他,那穿这些连衣裙的人是谁,夏伯阳回答,任何穿它们的人都不存在。安娜茅塞顿开。她沉默片刻,然后点点头,抬眼看着他,而夏伯阳微笑着说:‘你好,安娜!’这是我最珍贵的回忆之一……我干吗要跟你们说呢?”

我不由得浮想联翩。我想起科托夫斯基跟我告别时留下的那个奇怪的笑容。我不明白,我想道。他可能听说过意识的地图,但他从哪里知道伪装的呢?他恰好在此之前离开的呀……我突然想起,当我问及科托夫斯基的命运时,夏伯阳是怎么回答的。

我恍然大悟。但科托夫斯基有一点没考虑到,我义愤填膺地想,他没考虑到他能做的事我同样做得来。如果说是这个迷恋可卡因的吸毒者,这个大走马和秘密自由的爱好者把我送进了疯人院,那么……

“我也讲个笑话,”我说。

看得出来,我的感想都写在脸上了,因为谢尔久克和沃洛金十分惊恐地看着我,而沃洛金甚至把自己的椅子往后挪了一下。



谢尔久克说：

“您千万别激动，好吗？”

“你们要听吗？”我问。“好吧，现在就讲给你们听。巴布亚人抓住了科托夫斯基，对他说：‘我们要吃了你，用你的秃头皮做鼓。现在最后许个愿吧。’科托夫斯基想了想说：‘给我一把锥子。’他们给他一把锥子。他把锥子一下子扎进自己的脑袋！对他们吼道：‘王八蛋，老子让你们做不成鼓！’”

我说完狂笑起来。这时门开了，现出热尔布诺夫没精打采的脸。他提心吊胆地扫视一下房间，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我使劲咳嗽了几声，整了整衣领。

“去见铁木尔·铁木罗维奇。”

“来了，”我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小心地把没捏好的黑色橡皮泥面包圈放在堆满谢尔久克的纸鹤的工作台上。

铁木尔·铁木罗维奇精神振奋。

“彼得，我希望，您已经明白了为什么我把您的最后一场经历叫做彻底的宣泄。

我模棱两可地耸了耸肩。

“您看，”他说道。“我曾经跟您解释过，迷失方向的心理能量会以偏执狂或谵妄症的形式表现出来。我的方法是从其内在逻辑来审视这种偏执狂或谵妄症。粗略地讲就是，您说您是拿破仑。”

“我没这样说。”

“假设您这样说。对此，我不会去证明您错了，或者给您注射胰岛素让您休克，而是回答：很好。您是拿破仑。可您要



于什么呢？在埃及登陆？封锁整个大陆？或是抛弃王位悄悄回到自己的科西嘉胡同？从您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便可推知其余的一切。就拿您的病友谢尔久克来说吧。这些似乎在强迫他剖腹自杀的日本人，就是他内心世界最活跃的部分。当谢尔久克本人体验到象征性的死亡时，他们甚至毫发无损。相反，在他的想象里，当他已经死了，他们还活着。而当他恢复知觉以后，除了叠这些纸飞机，他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我相信，这是他们给他施加某种新幻觉时建议的。也就是说，这种病毁坏的心理区域面积相当大，使得我有时甚至想采取手术疗法。”

“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只是拿谢尔久克打个比方。现在我们来看看您的情况。我发现，这是我的疗法的一次真正成功。这整个由您混沌的意识所构建的细致得近乎病态的世界消失了，在自身中瓦解了，而且不是医生的压力所致，而像是自身的规律使然。您的精神病自愈了。迷失的心理能量同心理的其余部分融为了一体。如果我的理论是正确的——我宁愿相信这一点——您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我相信它没错，”我说。“当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它的深刻含义……”

“您用不着理解它，”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说。“今天的您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已经足够了。非常感谢您，彼得，谢谢您把自己的幻觉记录得这么详细，可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要是我在自己的专著中使用您笔记中的一些片断，您不会介意吧？”



“这将是莫大的荣幸。”

铁木尔·铁木罗维奇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了，别这么一本正经的。您跟我可以随便点儿。我是您的朋友。”

他从桌子上拿起厚厚一叠装订好的纸。

“不过还是要请您认真填写一份调查表。”

“调查表？”

“纯属形式，”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说。“卫生部就爱搞这些名堂，因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是所谓的社会适应性测试。里面有大量各种各样的问题，每个问题下面给出几个答案。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其余的都是胡扯。正常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翻了翻调查表。大概有二三十页。

“当然，这是官僚主义的做法，但上面有指示。要出院就得填。我看您没什么必要再在这儿呆下去了，给您笔，填吧。”

我从他手中接过调查表，在桌子旁边坐下。铁木尔·铁木罗维奇优雅地转向书柜，从里面抽出一本厚书。

调查表分好几栏：“文化”、“历史”、“政治”等等。我随手翻开“文化”这一栏，读到：

32. 在下列哪一部电影中主人公在头顶挥舞着十字架赶跑了匪徒？

a)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b) 《拿撒勒的耶稣》



c) 《众神之死》

33. 下列哪一个名字象征着所向无敌的善?

- a) 阿诺德·施瓦辛格
- b) 西尔维斯特·史泰龙
- c) 让-克洛德·方丹

我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困惑,迅速向后翻了几页,停在“历史”部分:

74. “阿芙乐尔”号的射击目标是:

- a) 国会大厦
- b) 战舰“波将金”号
- c) 白宫
- d) 是白宫里的人先开的枪

我突然想起十月里那个可怕的黑夜,“阿芙乐尔”号开进涅瓦河口的时候。我竖起衣领站在桥上,一边紧张地抽着烟,一边注视着远处战舰黑色的轮廓,舰上一盏灯也没亮,只有细细的铁桅杆的顶端抖动着一团模糊的电灯光。有两个过路人在我旁边站住,一个是容貌出众的女中学生,一个是陪着她的广告柱子一般肥胖的女家庭教师。



“Look at it, missis Brown! ①”小女孩指着那艘可怕的轮船喊道。“This is Saint Elmo's fires! ②”

“You are mistaken, Katya, ③”家庭教师小声答道。“There is nothing saintly about this ship. ④”

她瞥了我一眼。

“Let's go, ⑤”她说。“Standing here could be dangerous. ⑥”

我使劲摇摇头,以使自己回过神来,并又往后翻了几页。

102. 谁创造了宇宙?

- a) 上帝
- b) 战士母亲委员会
- c) 我
- d) 科托夫斯基

我规规矩矩地合上调查表,向窗外望去。盖着雪的白杨树梢上有一只乌鸦。它摇摇晃晃地扑腾着,抖掉了树枝上的雪。不一会儿下面响起汽车马达的吼叫声。受到惊吓的乌鸦吃力地扇动翅膀,从医院的院子飞走了。我目送着它,直到它

① 英语:看,布朗夫人!

② 英语:这是圣埃尔莫的灯光!

③ 英语:您搞错了,卡佳。

④ 英语:这艘船跟神圣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

⑤ 英语:我们走吧。

⑥ 英语:呆在这里会有危险。



变成一个隐约的黑点。随后我慢慢地把视线转向铁木尔·铁木罗维奇,与他专注的目光不期而遇。

“我说,这个调查表有用吗?怎么想出这么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他回答。“不过,想必有它的道理。有些病人很狡猾,连经验丰富的医生都能骗过。所以,为了避免出现拿破仑为出院和发动百日政变而暂时承认自己是疯子这种情况,才想出这么个主意。”

他的眼里突然闪过一丝惊恐的神情,但马上又被他的眨眼给掩饰住了。

“不过,”他快步走到我跟前说,“您说的完全对。我现在才明白,我一直在拿您当病人看。结果,我连自己都不相信。真愚蠢,但这是我的职业病。”

他从我手里夺过调查表撕成两半,扔进废纸篓。

“您回去收拾东西吧,”他转向窗户说。“证件都齐了。热尔布诺夫会把你送到车站。有事给我打电话。”

热尔布诺夫发还给我的蓝棉布裤和黑毛衣上有一股尘土味儿和储藏室的气味;最让我难以容忍的是,裤子皱皱巴巴,肮脏不堪,而后勤处,据热尔布诺夫说,又没有熨斗。

“我们这儿不是洗衣房,”他恶毒地说,“也不是文化部。”

我穿上波纹底的高筒靴,戴上圆皮帽,披上灰色的羊皮大衣。要不是后背上烧了个窟窿,这件大衣还挺体面的。

“大概是哪个朋友灌够了黄汤,用烟头给你烫的,”热尔布诺夫一边穿他绿得刺眼的带风帽的短上衣,一边解释道。

有意思的是,他在医院里从不敢说的这种出格的话,并没



让我觉得有损尊严。恰好相反,在我听来,这话倒像神奇的音乐,因为这意味着自由。其实,他并没有故意出格,他平时跟人说话就是这种口气。医院的条条框框对我再也不起作用了,我不再是病人,他也不再是护理员,我们之间以往的所有联系都跟他的白大褂一起挂在墙上那只钉弯的钉子上了。

“提包呢?”我问。

他佯装不知地转了转眼珠。

“哪有什么提包,”他说。“你去问铁木尔·铁木罗维奇。这是你的钱包,里头有两万卢布,原封未动。”

“明白了,”我说。“这不是讲理的地方。”

“你以为呢。”

我没有跟他争下去。这种事连提都不该提。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他上衣兜里抽出一支自来水笔,我已经很满足了。

通向自由的门敞开了,敞开得如此平淡,以致我多少有些失望。门外是铺了一层雪的空荡荡的院子,四周是水泥围墙,正对面是不知为何点缀着红色五角星的绿色大门。旁边门卫室的烟囱里冒着一缕轻烟。当然,这些我从病房的窗口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我走下台阶,回头看了看毫无个性的白色的医院大楼。

“告诉我,热尔布诺夫,我那间病房的窗户在哪儿?”

“三楼靠边的第二扇,”他回答。“你看,他们在朝你招手呢。”

我看见窗户后面有两个暗影。一个把手举起来贴在窗户上。我也朝他们挥了挥手。热尔布诺夫很粗鲁地拽了一下我的衣袖。



“走吧。赶不上电气火车了。”

我转过身跟着他朝大门口走去。

门卫室里又挤又热。门卫戴一顶绿色的制帽，帽徽是两把交叉的枪。他坐在窗口后面，前面是一道用刷了油漆的铁管做的短栅栏。他仔细察看热尔布诺夫递给他的文件，将照片和我的脸反复对照，又跟热尔布诺夫窃窃私语一阵，这才终于放行。

“我见过他，一本正经的，”我们从门卫室里出来时，热尔布诺夫说。“以前在隔离室里呆过。”

“明白了，”我回答。“这事真有趣。怎么，铁木尔·铁木罗维奇把他也治好了？”

热尔布诺夫瞥了我一眼，没吭声。

医院大门前是一条狭窄的盖着雪的小路。我们沿路拐进一片稀稀拉拉的白桦树林，然后沿着树林边缘走了十分钟，最后又钻进树林。周围没有一点文明的痕迹，如果不算架在千篇一律的金属电线杆上的粗电线。那些电线杆就像高大的，戴着布琼尼军帽的红军骷髅。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走到林子尽头，到了站台旁边。一条木楼梯通向站台。

站台上唯一的建筑就是一间小砖房，烟囱里冒着一缕有气无力的烟，极像医院的门卫室。我甚至认为，这就是这个陌生世界的主导建筑类型。当然，我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做很全面的概括。热尔布诺夫走到售票口给我买了票。

“好了，”他说，“火车马上就到。一刻钟就到雅罗斯拉夫尔站。”

“很好，”我说。



“你打算怎么搞女公民？”

他的问题让我有点恶心。根据长期同大兵打交道的经验,我总结出,社会下层人毫无顾忌地谈论生活中的隐私与上层人谈论天气没多大区别。但热尔布诺夫显然是想刨根问底。

我耸了耸肩。

“我不会说特别想念你们的女同胞,热尔布诺夫。”

“为什么?”他问。

“就因为,”我答道,“她们全都是母狗。”

“这倒是,”他叹了口气,说。“不过你总要干点什么吧?总该有个营生吧?”

“不知道,”我回答。“我可以写诗,可以指挥骑兵连。走着瞧吧。”

火车停了下来,车门吱吱呀呀地开了。

“好吧,”热尔布诺夫伸出螃蟹状的手说。“再见。”

“再见,”我说。“对了,请替我向病友们转达最美好的祝愿。”

握罢手,我突然发现他的手上有纹身,以前从没见过。这是一只褪了色的蓝色的锚,上面勉强可以辨认出“波罗的海舰队”几个字,字迹苍白而模糊,像是被人故意抠过。

我走进车厢,坐在硬邦邦的木椅上。车开了,热尔布诺夫粗壮的身影从窗边掠过并永远地消失在虚空之中。等我这节车厢开到站台的一端时,我看到了围墙上方固定在两根杆子上的站牌:“柳树站”。



特维尔街心花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跟我两年前最后一次见到它时一样,依然是二月,满地的积雪,以奇怪的方式甚至潜入白昼的天光的雾霭。长凳上依旧坐着纹丝不动的老太婆们,在照看那些打雪仗的穿着鲜艳的孩子;纵横交错的黑色电线上方,悬挂着低低地垂向地面的天空。

不过也有不同之处,这是我走到街心花园的尽头时才发现的。普希金的铜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空地,但奇怪的是,在我看来,这却是世界上能有的最好的纪念碑。原来是耶稣受难修道院的地方现在也成了一片空地,掩映在一片凋敝的树木和乏味的路灯后面。

我坐在那座无形的纪念碑对面的长凳上,点燃一支黄过滤嘴香烟,那是坐在旁边的一位穿着滑稽的军官客气地敬给我的。这烟燃得很快,像炸药导火线似的,吸完后嘴里有一股硝酸钾的味道。

我口袋里有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外观跟我记忆中的杜马彩色百元钞差不多,只是尺寸小多了。还没出火车站时我就问清楚了,这点儿钱只够在一个不太贵的饭馆里吃顿午饭。我在长凳上坐了很长时间,考虑着该怎么办。天开始黑了,熟悉的楼顶上先后亮起了用一种古老的世界语写成的灯箱广告——“SAMSUNG”、“OCACO A”、“OLBI”。在这个城市里我根本无处可去,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波斯人,莫名其妙地从马拉松跑到了雅典。

“先生,您知不知道,无家可归是什么感觉?”我看着闪亮在空中的文字咕哝道。想起“音乐鼻烟盒”里的女人马尔美拉多夫,我不由得笑了起来。



我突然明白了下一步该干什么。

我站起身，穿过马路，在人行道旁边停下，招手叫车。马上有一辆水滴形的小汽车叮零咣当地停在了我前面，车身上沾满了泥污。方向盘后面坐着个大胡子先生，让我想起托尔斯泰伯爵，只是胡子短了点。

“您去哪儿？”他问。

“是这样，”我说，“我记不清确切地址了，我要去一个叫‘音乐鼻烟盒’的地方，是家咖啡馆。就在这儿不远，顺着街心花园下去，然后左转。离尼基塔门不远。”

“怎么？是去赫尔岑大街吗？”

我耸了耸肩。

“没听说有这么一家咖啡馆，”大胡子先生说。“大概是新开的吧？”

“哪里，”我说，“老早就有了。”

“一万，”他说。“先付钱。”

我打开门坐在他旁边的位子上。车开了。我偷偷地打量他。他穿着一件怪里怪气的夹克衫，衣服的式样就像那些布尔什维克首脑们喜欢穿的军衣，但衣料却是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方格呢绒。

“您这辆车不错，”我说。

看得出来，这话让他很得意。

“已经旧了，”他回答，“战后没有比‘胜利’更好的车了。”

“战后？”我问道。

“当然，不是说战后始终这样，”他说，“但至少风光过五年。如今什么都他妈的给搞垮了……所以共产党才上台。”



“别跟我谈政治，”我说，“一谈政治我就头大。”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

“正因为如此，年轻人，我们的周围才破败不堪。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告诉我们该怎样生活下去。如果人人都考虑如何整治俄罗斯，俄罗斯也就用不着整治了。可以说，这就是辩证法。”

“那您想把这辩证法挂在哪儿呢？”

“您说什么？”

“没什么，”我说，“没什么。”

我们在街心花园尽头停下来。前面塞车，急躁不安的喇叭声此起彼伏，橙色和红色的车灯闪个不停。大胡子先生一言不发，我想，他可能是觉得我的话不友好。我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您知道，”我挑起话头，“如果说，历史对我们有所教益的话，那就是它让我们知道，所有试图整治俄罗斯的人，结果都被俄罗斯给整治了。而且，怎么说呢，远不是按照最好的方案。”

“说得对，”他说。“正因为这样才要考虑怎么整治俄罗斯，以免再次发生这种情况。”

“就我而言，是用不着考虑的，”我说。“我很清楚应该怎么整治俄罗斯。”

“是吗？怎么个整治法？”

“很简单。每当意识中出现俄罗斯的概念和形象时，应该让这些概念和形象消解在自身的本质中。但由于俄罗斯的概念和形象根本没有什么自身的本质，结果一看，俄罗斯原来已



经完全给整治好了。”

他认真地瞥了我一眼。

“明白了，”他说。“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要的就是这个。所以才给你们这代人洗脑子。”

汽车重新开起来，拐到尼基塔街上。

“我不太明白您在说谁，”我说，“不过在这件事上倒是真该整治一下这些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

“有意思的是，您怎么整治他们？”

“用同样的方法，”我回答。“还要整治一下美国。一起整治，不必一点一点地来。要整治就全世界一块整治了。”

“那您怎么不去干呢？”

“我今天要办的就是这件事，”我说。

这位先生宽容地点了点头。

“当然，跟您一本正经地谈这些很荒唐。但我要说，您并不是第一个这样胡说八道的人。装模作样地怀疑世界的真实，这是逃避这种真实的最没出息的办法。告诉您吧，这就叫平庸。虽然这个世界看上去很荒唐，很残酷，毫无意义，有它的问题，但它毕竟是存在的，不对吗？”

我没说话。

“所以，说世界不真实并不能证明您精神崇高，而是相反。不接受世间万物，就等于不接受造物主。”

“我不太明白什么叫‘精神’，”我说。“不过说到造物主，我倒跟他有过一段交情。”

“这话怎么讲？”

“是这样的。他叫格里戈里·科托夫斯基，住在巴黎，从我



们现在看到的您车窗外的迹象来判断,他还在滥用海洛因。”

“关于他,您就能说这些?”

“何止这些,我还知道,他的头现在打着石膏。”

“明白了。请问,您是从哪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

我想了想。

“好像是第十七精神病院。对,没错。那儿大门旁边有一块蓝色的牌子,上面写着‘17’。还说是模范医院。”

汽车停了。

我望了望窗外。是音乐学院的大楼。“音乐鼻烟盒”就在旁边。

“我说,”我提议道,“我们还是问问路吧。”

“我不送了,”这位先生说。“赶紧下车见鬼去吧。”

我耸了耸肩,打开车门。我还没有站定,水滴形的小汽车便一溜烟儿地开走,急速朝克里姆林宫方向驶去。真叫人难堪,本想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没想到遇上这种人。不过还好,到达音乐学院大楼的拐角之前,我已经把这位大胡子先生连同他所有的鬼怪都彻底送走了。

我环顾四周。这条街我肯定认识。我向前走了五十来米,然后向右拐。一个熟悉的院门出现在眼前。在那个难忘的冬夜,冯·埃尔年的车就停在这儿。这里跟以前一模一样,只是房子的颜色变了。门前的马路上停着许多五颜六色、奇形怪状的小汽车。

我快步穿过压抑得难以名状的院子,来到装有玻璃和钢做的未来派遮阳板的楼门口。遮阳板上嵌着一块不大的标牌:



伊万牛

John Bull Pubis International^①

靠门的几扇窗户亮着灯，玫瑰色的窗帘半遮半掩，说不清是什么乐器发出的沉闷而机械的声响从里面传出来。

我拉开门，看见一条短走廊，走廊两边挂满厚重的皮衣和外套，尽头是一道显得突兀和笨重的铁门。一个身穿亮黄色西装、西装上钉着金色纽扣、罪犯模样的人从方凳上迎着我站了起来。他手里握着一只奇形怪状的电话听筒，上面挂着一截长度不超过一英寸的电话线。我敢肯定，他在站起来之前肯定曾激动地晃着腿对着听筒说过话，而且把听筒拿倒了——线朝上。这种令人感动的孩子般耽于幻想的本事，对这样一个暴徒来说是非同寻常的，这让我不由得对他产生了几分好感。

“只有俱乐部会员才能进，”他说。

“听着，”我说。“我几天前刚跟两个朋友来过这儿，不记得了吗？我们还用枪托砸过你的小肚子呢。”

这位身穿亮黄色衣服的先不怀好意的脸上现出一副疲惫而厌恶的神色。

“不记得了？”我又问了一遍。

“记得，”他回答。“可我们已经两清了。”

“我不是为钱，”我说。“我只想坐在你们这儿坐一会儿。相

① 英语：约翰牛国际耻骨。英文中“耻骨”一词与“酒吧、餐馆(pub)”词形相近，疑为作者有意误用。



信我，我一会儿就走。”

穿亮黄色衣服的先生苦笑一下，推开那扇铁门，撩开天鹅绒门帘，放我进入半明半暗的大厅。

座位没怎么变，还像以前那样像个穷摆阔气的二流餐馆。烟雾缭绕的小方桌后面坐着形形色色的客人。好像有人在抽大烟。天花板上挂着一盏样式古怪的圆形吊灯，它绕着一根轴缓慢地转动着，昏暗的光斑在大厅里四处游动。没人注意到我，于是我便在入口边上的一张空桌旁坐下。

大厅的尽头是一个亮着灯光的舞台，一个大脸盘、留着野兽般的黑胡须的中年人站在一台不大的键盘式管风琴的后面，用难听的嗓音唱道：

不许杀人——我没杀人。

不许背叛——我没背叛。

不许吝啬——我交出最后一件衬衫。

不许偷盗——我是失手，这回真的是我失手……

这是副歌。唱的好像是基督教的戒律，只是对这些戒律的阐释角度有些怪异。这种演唱风格让我有点儿不习惯，但看来它很对其他人的口味——每当重复这句神秘的“这回真的是我失手”时，听众总会鼓掌，而演唱者则微微欠着身，继续用他的一双大手击打着乐器。

我感到有点郁闷。我一直为自己的鉴赏力而自豪，再新潮的艺术我也理解得了，再花里胡哨标新立异的形式也影响不了我对其真正价值的判断。可眼前的东西同我习惯的经验



相去太远。不过,解释起来可能也很简单。有人对我说,科托夫斯基认识夏伯阳以前简直是个刑事犯,我之所以不能理解这种奇怪的文化,原因可能就在于此。还是在疯人院的时候,这种文化的各种表现就经常把我推进死胡同。

门帘晃了一下,穿亮黄色西装的人钻了进来,手里依旧拿着电话听筒。他打了个响指,朝我的桌子这边点一下头。立刻有一个穿着黑色礼服、打着蝴蝶结的伙计出现在我面前。他拿着一份皮面的菜单夹。

“您想要点儿什么?”他问。

“我不想吃东西,”我说,“只想喝点儿伏特加。我冻坏了。”

“‘斯米尔诺夫’牌?‘首都’牌?‘绝对’牌?”

“就‘绝对’吧,”我回答。“我还想要点……怎么说呢……能放松放松的。”

伙计怀疑地打量了我一眼,然后转过头去,望着穿亮黄色西服的先生,做了一个类似暗号的手势。穿亮黄色西服的先生点了点头。于是服务生凑在我耳边说道:

“裸头草碱?巴比妥酸盐?神魂颠倒?”

我把这几个词逐个掂量一遍。

“您知道吗?把‘神魂颠倒’兑在‘绝对’里,再好不过了。”

伙计又朝穿亮黄色西服的先生转过头去,难以察觉地耸了耸肩,用手指搓揉着太阳穴。穿亮黄色西服的先生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又点点头。

我的桌子上放上了烟灰缸和餐巾纸。餐巾纸来得很及时。我掏出从热尔布诺夫那儿弄来的钢笔,拿过一张餐巾纸,



正要写字,却突然发现这支钢笔头上不是笔尖,而是一个洞,就像一截枪管。我拧下笔帽,从里面掉出一只不带壳的黑色铅弹,像是配给“梦捷克里斯托”枪的那种。这个了不起的发现非常重要,口袋里没有勃郎宁手枪让我觉得自己像个赤手空拳的骗子。我认认真真地把子弹放回原处,拧上笔帽,然后打手势叫那个面色苍白的穿亮黄色西服的先生给我找个能写字的东西。

伙计端着托盘过来了,上面放着一只杯子。

“您要的伏特加,”他说。

我一口气喝完,然后从穿亮黄色西服的先生手里接过自来水笔,开始干活。开始时词语怎么也不听调遣,但后来,忧郁的管风琴声启发了我,只用了十来分钟,我就完成了一首诗。

这时那个大胡子歌手已经不在了。我没注意到他是何时退场的,因为音乐一直在响。很奇怪,听起来是乐队在演奏,至少有十件乐器,却看不到演奏者。而且,这明显不是我在医院里听惯了的那种无线电里的音乐,也不是录音,音质很纯,毫无疑问是现场演奏的。不过,当我断定这是服务生刚才端来的那杯混合物在起作用时,我就不再困惑了。我开始仔细聆听音乐,突然,一个嘶哑的声音唱出的一段英语歌词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

You had to stand beneath my window

With your bagel and your drum

While I was waiting for the miracle—



For the miracle to come...^①

我打了个哆嗦。

这正是我要等待的信号。从“miracle^②”、“drum^③”(这无疑是指科托夫斯基)和“bagel^④”(这里不需要任何注释)里就能听出来。没错,虽然歌手的英语水平还不过硬,他把“bagel”念成了“bugle^⑤”,但这并不要紧。在这个烟雾弥漫的大厅里坐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我站起来,摇摇晃晃,不慌不忙地穿过像律动的水族馆的大厅,向舞台走去。

音乐停了,停得很及时。我登上舞台,双肘撑在放着蹩脚的乐谱的管风琴上,紧张地扫视着鸦雀无声的大厅。台下的观众形形色色,但同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情况一样,这些人大都是些尖嘴猴腮的投机分子和衣着华贵的风骚娘们。我眼前所有的面孔仿佛汇聚成了一张脸,一张媚态百出而又厚颜无耻的脸,一张俗不可耐而又自鸣得意的脸。毫无疑问,这正是投胎转世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脸。人口处出现了几个脸颊冻得通红的年轻人,他们就像是换了装束的水兵。穿亮黄色西服的先生一边很快地咕哝了句什么,一边朝我这边点

① 英语:你只好站在我的窗下,
拿着你的面包圈和鼓
当我在等待一个奇迹——
等待奇迹到来……

② 英语:奇迹。

③ 英语:鼓。

④ 英语:面包圈。

⑤ 英语:号角。



点头。

我从风琴上抬起臂肘，拿起写满字的餐巾纸，习惯性地咳嗽几声，然后丝毫不拿腔作调，只在中间做些停顿，朗诵道：

万劫不复

生而复死，死而复生，变换身形和脸面，
锲而不舍，锯磨栏杆，大概已近七百年。
一个姓虚空的疯子
欲逃出第十七模范精神病院。
没有时间逃跑，这他知道。
何况无处可逃，连这“无处”也是死路一条。
但这些都不足挂齿，比起逃跑者
无论何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找到。

可以说，锯磨栏杆的过程是存在的，
也可以说，并不存在什么锯磨栏杆。
所以疯子虚空手执紫色念珠
从来也不假装知道哪怕一个答案。
因为在这个能够遁形的世界里，
最好别发什么誓，而要同时说
“不，不”和“是，是”。

念到最后几个词时，我掏出热尔布诺夫的钢笔朝吊灯射



去。吊灯玩具似的应声碎了，天花板下迸出一阵刺眼的火花。大厅里一片漆黑，站着穿亮黄色西服的先生和几个红脸小伙子的门口枪声大作。我皱着眉头，顶着难以忍受的轰鸣，卧倒在地，顺着舞台边沿慢慢地爬。大厅的另一头也有人开枪，而且是几支枪同时开，子弹撞击出的欢乐的新年火花从铁门飞进大厅。看形势不该顺着舞台边沿爬，应该退到后台去，于是我来了个九十度的转弯。

门口传来呻吟声，好像受伤的狼的嚎叫。子弹掀翻了管风琴，它就倒在我的边上。总算，我一边朝侧幕爬，一边想，总算打中了吊灯。我的上帝啊，难道这不正是我平时唯一会做的事情——用自来水笔射击这个虚假世界的光滑如镜的圆球？这是多么深刻的象征啊，我想，可惜，在座的人中没有谁有能力对眼前的情景做出评价。不过，我转念一想，这也难说。

侧幕后面同大厅里一样，一片漆黑，像是整个楼层都停了电。有个人一见到我撒腿就往走廊里跑。他绊了一跤，但没有爬起来，而是消失在了黑暗中。我从地上爬起来，伸出双手，摸着走廊的墙壁朝前走。看来，我很清楚地记得通向后门的路。门锁着。我用了一分钟的时间弄开锁，走到外面。

吸了几口冷风我才恢复感觉，但还是得靠着墙，走廊里的那段路已经叫我筋疲力尽。

盖着积雪的五米宽的马路对面，一扇大门敞开了，从里面冲出两个人。他们跑到一辆长长的黑色汽车旁边，打开行李箱盖，拿出两支样子吓人的长枪，然后连行李箱盖也没关就转身往回跑，唯恐错过这场枪战。他们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餐馆发黑的窗户上全是窟窿，让人感觉大厅里面有几挺机枪在同时开火。我想，我们那时的人虽然未必比现在的善良，但脾气肯定没这么火爆。不过我得走了。

我晃晃悠悠地穿过院子，来到大街上。

夏伯阳的装甲车就停在我预想的地方，机枪塔上的那顶雪帽也正是它应有的样子。发动机开着，车身后边冒着蓝灰色的烟。我走到跟前，敲了敲门。门开了，我钻进去。

夏伯阳一点儿也没变，只是他的左手吊在一条黑色的亚麻布带上。他的手上缠着绷带，看得出来，本该包着小指的那个地方是空的。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仅有的力气只够躺在座位上。夏伯阳马上便明白我这是怎么了。他关上门，对着话筒轻声说了句什么，装甲车随即发动起来。

“怎么样？”他问。

“不知道，”我说。“要搞清变幻莫测、充满矛盾的内心生活实在太难了。”

“明白了，”夏伯阳说。“安娜向你问好。她让我转交给你一样东西。”

他弯下腰，用那只完好的手从座位下取出一个贴着金箔标签的空瓶子放在桌上。瓶子里插着一枝黄玫瑰。

“她说，你会明白的，”夏伯阳解释道。“还有，你好像答应过要送给她什么书。”

我点点头，转过身，眼睛凑近门上的瞭望孔。开始只能看到划破冰冷的空气的星星点点的蓝色路灯，但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快，没过多久，没过多久周围便传来了我心仪已久的内蒙



古飒飒的飞沙声和哗哗的瀑布声。

1923—1925
于卡夫卡 - 尤尔特^①

^① 尤尔特在俄语中为“哥萨克分地”和“鞑靼公国领地”之意。此词与俄语中的“蒙古包”一词音形相近，疑为作者有意误用。

维克多·佩列文 著
郑体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夏伯阳与虚空